

## 杜伯华烈士传略

王庆宽

杜伯华(1904~1941)。1933年参加革命,1935年春入党,历任榆树县党的地下联络站负责人、晋察冀军区五支队二营教导员、房良联合县县长、平西专署专员、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等职。他一生中的革命足迹遍及东北、华北和西北,特别是在平西,他辗转战斗,踏遍了山山水水,立下了不朽功勋。不幸于1941年6月因医疗事故牺牲,终年仅三十七岁。

### 聪颖好学 医术闻名遐迩

杜伯华,原名维汉,字华昌。1904年生,祖籍河北省,幼年随父逃荒到吉林省榆树县夏宝村落户。伯华的父亲,为人忠厚正直善良,他会中医,常常免费为穷人治病,因会种牛痘,人称“杜花先生”,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伯华聪颖好学,虽仅读过四年小学,但在父亲的影响、教诲下,学会了医术。父亲病故时,伯华年仅十八岁。不但能为乡里看病,而且得到好评,榆树县举行医生会考,伯华名列第二。1931年由乡下迁到榆树县城,开办华昌诊所。为了更好地给人看病,他又开始学习西医,依靠自己的刻苦学习和丰富实践,医术闻名遐迩。伯华是一个有民族气节、有报负的爱国青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目睹日本汉奸恣意横行,人民遭受蹂躏之惨状,忧国忧民之心日深。

1932年8月,杜伯华遇到了姑表内弟、党的地下工作者李向之。李是从关内回东北做王德林部的抗日工作的。见到了表姐夫伯华,就向他介绍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伯华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鼓舞,决心参加抗日。从此,伯华在党的帮助教育下,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 榆树县第一个党的地下联络站

1933年,北京地下党组织派李向之等八人去吉林省进行建党建军工作,以杜伯华开设的“华昌药房”为中心地点,建立了榆树县第一个党的地下联络站,杜伯华为联络站的负责人。党交给杜伯华三项任务:搜集敌伪组织的情报,掩护抗日工作人员,以物资接济抗日武装。联络站在完成这三项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党派来的抗日同志,如抗联三军二十一支队队长杨文清、刘工人,抗联十军高级参谋翟亚夫(又名翟飞)等人来找王亚忱的部队,均是通过“华昌药房”进行联络、护送的。当时抗日武装缺乏医药,特别是红伤药,他就千方百计筹集运送,抗日武装缺乏胶鞋,他就一次又一次地搞到送去,抗日武装缺乏枪支弹药,他就想方设法,搞些枪支弹药。他曾用自己的钱给翟亚夫买了一支手枪,还为抗联十军买了两支手枪。

伯华通晓中西医术加之医德好,善交际,因此,来“华昌药房”买药、求医的人很多,生意兴隆,每天收入达三百元。伯华将这些收入,绝大部分都捐赠给东北义勇军做为抗日活动的经费。伯华为壮大抗日力量,广泛宣传群众,争取群众。只要同情抗日,对抗日有利的人,他就联系,就争取。在他接触的人中,不仅有爱国的知识分子,而且有日伪政权中的有爱国心的人。如伪警察署的刘杰,是个特务,但伯华发现他有爱国思想,就结识了他。通过教育,刘杰同情抗日,反对日本侵略,所以“华昌药房”联络站被县伪警察署察觉,

处于危难时，刘便暗地里给解围脱险。1934年出现的几次榆树县特务机关怀疑伯华的险情，均在刘杰的帮助下排除了。

1935年春，日伪特务机关——长春警备队，密令榆树县伪警察署：“逮捕杜伯华、查封‘华昌药房’。”刘杰得知后，立即告知了杜伯华，让他或走或散，马上抉择，不能等到天亮。杜伯华立即把联络站已被敌察觉、不能再用的情况转告了党组织。他个人也不得不弃家出走，药房让其妻和其内弟收拾变卖。当夜，杜伯华带上些路费，同刘杰一起，徒步取道黑龙江省五常县山河屯，历尽千难万险，绕道入关。

### 加入中国共产党 转战北平和西安

1935年春，杜伯华同刘杰入关后，到了北平，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继续为党工作。刘杰吃不了苦，后到重庆投靠了国民党。杜伯华在党的教育帮助下，进步很快，不久经李向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春，在西北驻守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倾向与共产党合作，请求“东北人民抗敌会”（党领导下的抗日组织）派送一批进步分子充实东北军，党决定派杜伯华等几十人前去，杜即奔赴西安，参加当时有名的东城门楼学兵队当队员。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学兵队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西安事变后，杜伯华到孙铭九的抗日先锋队三连任指导员。1937年初，杜伯华同一些学兵队队员返回北平，驻在北平西城粉子胡同二十五号煤铺，秘密地开展地下工作。

这家表面上看是李向之、肖丹锋、陈大哥、杨大嫂等四家合伙开的煤铺，实际上是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会（简称“民抗”）的社会支部所在地，是以东北人为主体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心。在这里组织抗日青年，宣传革命道理，营救难友出狱等等。杜伯华、肖丹锋、陈大凡、于毅夫、陈钟、张文海、焦若愚等同志，还有二十多名东北青年，都在这里参加活动，当时煤铺的生意不好，这么多人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吃饭都有了困难。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杜伯华从事教育、行医等工作，整日忙个不停，挣钱供大家用。每当入不抵支，遇到困难时，就变卖自己的铺盖和衣物来维持生活。有一次，伯华外出讲课，店里人吃饭没有着落，就把伯华的铺盖当出，并把当票贴在伯华的床板上，伯华见此情景，只是付之一笑，晚上就睡在贴着当票的光板铺上，他与同志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受到同志们的尊敬。

### 参与创建国民抗日军 日夜战斗在平西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炮轰芦沟桥，国民党二十九军英勇还击，中国共产党发表全面抗战宣言，29日南京政府宣布抗战，中日战争全面展开。但不久北平、天津沦陷，大片国土被敌占领，平郊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正在这时，赵同联络昌平县山区的民团头目组织武装，已集合二、三十人。为了弄清赵同的情况，党派杜伯华、阎铁、徐明三人先去赵同部了解情况，根据杜伯华等了解提供的情况，党决定利用赵同部建立党所掌握的抗日游击队。8月中旬，赵同部的二、三十人转到圆明园的正觉寺。党先后派王建忠、王远因、尚英、杜伯华等十几名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参加了赵同的游击队。杜伯华等十几人，是张学良学兵队的人员，受过军事训练。他们到了赵同的部队后，对部队建设、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短短几天，部队增加到五、六十人。8月22日，赵同的部队袭击了北京德胜门外的河北省的第二模范监狱，营救在那里关押的政治犯。杜伯华也参加了营救战斗。由于部署、安排得细致、周到，取得了胜利，共营救出七、八百人。其中近半数参加了部队，赵同的部队从而由五、六十人猛增到五、六百人。9月5日，全军编为三个总队，并正式命名为“国民抗日军”，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赵同为司令，郑子风为副司令，包旭堂为参谋长，高鹏为政治部长，

汪之力为秘书长，杜伯华为医务处长、军政委员会委员，后任二总队的政治部主任。

10月，八路军总部派吴伟等十几名同志来平西国民抗日军指挥部，并带来了朱德、彭德怀亲笔签名的给游击队的长信。这封信在全军中公布后，给部队以极大鼓舞，杜伯华就在二总队中，以信为动力，展开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统一战线的广泛宣传，并进行有关共产党、八路军的历史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更深入人心。

11月中旬，国民抗日军奉命开赴阜平整编。杜伯华带二总队全体指战员，同国民抗日军一起，过青水、杜家庄，爬太行余脉小五台，直下察南平原，越怀涑，过涿鹿，到达蔚县近郊。又取道走马驿、倒马关由涞源到阜平。阜平是新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村庄到处刷写着抗日标语，陕北民歌的旋律四处飘扬，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不时盘察路条，宛然像红军长期活动的苏区。杜伯华见此情景，真是欢喜若狂。

12月25日，经八路军总部正式批准，国民抗日军改编为晋察冀第五支队，负责建设平西抗日根据地。赵同为支队司令员，高鹏为副司令员，汪之力为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总队。其中二总队队长王建忠，政治处主任为杜伯华。

1938年11月底，五支队开往灵寿、行唐，进行活动与扩军。

3月下旬，敌人分路进攻晋察冀，五支队奉命回师反“扫荡”，支援阜平。不久军区又命令五支队返回平西，部队立即拔营北进。

4月2日，五支队抵达涞源城南，得到密报：有一支敌人运输队押送二十余辆马车的军需弹药从紫荆关运往涞源城，将于3日晨九时许过浮图峪，支队当即决定在二道河子村西的山沟里打伏击。夜半部队开始行动，部署一总队埋伏在二道河子村后山岗，放敌人进山沟后堵死退路，三总队埋伏在西南，从前向后打；杜伯华、王建忠带二总队隐蔽在南山，担任正面捕歼任务……。九时刚过，敌人先头部队就出现了。待敌人后尾部队钻进了口袋，顿时机枪、步枪都响起来，接着王建忠，杜伯华指挥二总队的全体战士从南山冲入山谷，大展雄威，敌人在受到意外地突然攻击后，还未来得及还枪，已人仰马翻，伤亡惨重。这次战斗全歼日军近百人，生俘二名，缴获全部枪支和物资，并打落飞机一架。

4月下旬，五支队开回平西。

杜伯华在五支队工作了八个多月，对五支队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房良联合县的第一任县长 平西专署第一任专员

五支队进驻平西后，根据军区指示，立即抽一批得力干部充实、整顿县政权和地方武装，并决定新建房(山)良(乡)联合县，委派杜伯华任县长。4月底，杜伯华、郭方、尚英、贾嵩明等来到房山五区政府所在地南窖进行建县筹备工作。

房山五区西北是百花山，与宛平八区毗邻，南有猫耳山作屏障，东经四区出川，是坨里、房山、良乡等重镇，也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东南前哨。这里矿产丰富、工业发达，文化基础也好。因地理位置重要，早在1938年3月我党已经派包森开辟了这块地区，并建立了地方武装，有了一定的基础。

杜伯华到南窖后，召开区村领导人会，知识分子会、工商界负责人会等等，说明来意，商讨建县大计，最后决定将县府设在五区长操村。5月8日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宣布房良联合县政府成立。房良联合县政府成立之后，杜伯华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的抗日政权，动员全县人民共同抗日，进行了大量工作，在四个月中，着重抓了以下工作：

第一，广泛开展了抗日宣传。杜伯华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亲笔起草了《告全县同胞书》，号召全县人民动员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为早日打倒日本侵略者，保卫房良，保卫祖国，浴血奋战。并将告同胞书四处张贴，又组织力量，深入到工矿、学校、农村，广泛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的工作。

第二，大力进行县、区、村各级的政权建设。县府宣布成立后，在党的统一战线和抗日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动员，先后有赵然、付伯英、陈伯诚、王培忠、王希久、郝绍尧、景松年、王有梧、罗化之等六十多名知识分子云集而来，到县府参加抗日，为县区的组织建设提供了充裕的人才。杜伯华知人善任，很快把县府的班子安排就绪：计有县府秘书马梦飞，民政科长郝仲林，财政科长谢景波，实业科长杨天资，教育科长郝绍尧，粮食科长姜子箴，司法科长姜永聪，县府的工作处处有人管，事事有人抓。同时，建立和健全了房良县抗日救国会，郭方任主任，赵然任组织部长，付伯英任宣传部长。另外，对房山五区、四区、九区的救国会主任和区长也进行了安排。县区组织机构健全之后，接着动员县救国会和政府的干部，深入到各村建政、建组和发动群众。村政府、救国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相继建立，全县出现了参军参战、筹粮送秣、支援前线的抗日热潮。特别是房山五区，群众发动充分，组织工作深入，抗日支前的热情高涨。当时流传着一首民歌唱到：“五区，五区，人人都是抗日的……”

第三，改造地方武装，保卫房良。1938年3月，包森来房山五区后，在江石之等同志支持、协助下，曾对五区保卫团进行了改编，对四区保卫团也做了大量工作，组建成房涞涿游击支队。但不久包森挺进冀东，对这支武装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进行彻底改造。为改造这支队伍，由尚英为政委、贾嵩明为队长，负责部队的改造工作，杜伯华与尚英、贾嵩明密切配合，全力支持，使部队改造工作进展很快、很顺利，最后改编为平西游击四支队（即房良县大队），下设三个大队，共约四百人，杜伯华为扩大队伍，还号召和组织青年参军参战，奔赴抗日前线，出现了不少母送子、妻送郎参军抗日的动人场面。

第四，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杜伯华模范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谢景波是房山五区自卫团的团总，当时颇有影响，杜伯华就亲自做他的工作。谢在当时的形势下表示愿意抗日，就安排他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四区的郝绍尧，曾任过旧房山县教育科的督学，但思想进步，杜伯华把他请出来，任房良县的教育科长。这些人参加县政府的工作，对动员各界积极抗日，对动员进步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参军参政，起了重要作用。北安村罗化之，开煤窑，当村长，有权势，杜伯华耐心做他的工作，给他讲抗日救国、至死不当亡国奴和抗战的策略、前途。罗在杜的感召下，弃家从戎，投身革命，后壮烈牺牲。杜还做三路土匪司令胡振海的工作，利用他抗日的一面，与其订立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由于统战工作搞得不好，房良县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第五，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筹粮筹款，支援抗战。杜伯华，身高体胖，平易近人，关心同志，态度谦和，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布置的任务都愿意积极完成。一次五区窑商会孔凡坤去县府送交抗日捐款二千元，伯华对孔说：“我军抗日有困难要多送些”。孔说：“下次尽可能多筹集，支援抗日”。杜一边点款一边玩笑地说：“花这钱，亡国奴味（因是中日联合票）！孔说：“杜县长，那就别要了”。杜说：“现在不要不行啊！将来一定不要它，要花我们自己印的票子。”有说有笑，非常随便。在群众的支援下，筹粮筹款任务如期完成，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并且还搞到了一些边区紧缺的物资，如油印机、电池、手表等。

但他对汉奸、走狗之类恨之入骨，严惩不贷。凡捕捉到的敌特汉奸，杜伯华都要亲自审讯，对证据确凿的坚决处死，有时敌人磕头作揖，说尽好话，杜伯华从不手软。

正在县府的工作逐步开展、深入发展之际，八月份赵同叛变逃跑，驻防平西的五支队与杨成武支队合编，驻房良县的五支队三营调走，房良县大队也同时调走编入正规部队，房良空虚。接着九区民团头子杨天沛、杨万方制造了王家台惨案，杀害我战士一个连。房山四区殷耀东，投靠日本，并引敌向我房良县府根据地进犯。九月份，日伪向我平西根据地大举进攻。在这种形势下，杜伯华奉命带领县区干部和警卫人员连夜西撤，走到大安山发现断后的警卫班还没有归队，马上派人去接迎。杜一直等到过半夜，人回来了才休息。第二天，杜伯华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进行思想动员，并将枪支弹药分配给所有工作人员，日夜兼程，迅速向西转移。

边区下达转移命令，房良县接到的最晚，因此行动迟于其它县。上级未见房良的干部转移，即派曾雍亚独立支队火速前来接迎，到了宛平的马兰，与正在转移的房良县的人员相遇。杜伯华向曾雍亚汇报了情况，县府人员随即同独立支队，经峨峪、马水口、涑源、到灵邱，到达一分区的地界。伯华把人员暂做安排后，即去一分区司令部汇报工作。

10月底，我军击溃了敌伪对平西的进攻，邓华、宋时伦的队伍参加冀东暴动以后也开回平西整训，并于12月初平息了房山九区杨天沛、杨万方的叛乱。杜伯华率房良县全体工作人员返回房良，县府迁到房山五区下石堡村。

县府迁到下石堡以后，杜伯华与县委书记郭强密切配合，为坚持房山五区(南窖、长操)根据地，巩固九区(庄户台、霞云岭)根据地，开辟八区(蒲洼、十渡)根据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使县府的工作机构更加健全，进展更有成效。

打开九区之后，在下石堡召开了庆祝大会，县委书记郭强、县长杜伯华在大会上讲了话。重点指出：杨天沛、杨万方一伙大敌当前，不思抗日，反而与人民为敌，制造王家台惨案，我们打九区地方反动武装是为了动员全区人民共同抗日。抗日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并宣布了对杨天沛、杨万方等人处罚。会后，又在王家台为死难烈士修了墓，立了碑，并在九区进行收枪、建政、发动群众等工作。九区的形势很快稳定下来，并成为房良县的巩固区。同时，工作又向八区发展，开辟了八区根据地，原五区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工作重新活跃起来。区村建立了政权和抗联会，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的人都参加了抗联会组织。出现了筹粮筹款，参军参战的抗日热潮。

1939年3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命令，在平西地区设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委任杜伯华为专员。杜伯华在任专员期间，根据边区党委和冀热察党委的指示，认真贯彻执行“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方针。为巩固、扩大平西根据地，积极贯彻合理负担政策，筹粮筹款，保证军需，积极组织支前队伍，运粮运草运弹药，转运伤病员，支援抗日前线，组织模范队、基干队，建立地方武装，并积极进行征兵扩军工作，保卫平西，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办小学、高小和识字班、夜校，努力提高平西人民的文化水平。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杜伯华忘我地进行工作。有一次敌人扫荡，他与同志一起转移，不慎弄掉了眼镜，高度近视，看不见，摔在老乡的猪圈里，弄了一身粪汤。部队等他批条子领粮，只洗了洗手就批起条子来。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全体工作人员各个奋力，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 救死扶伤 贡献卓著

杜伯华不仅懂军事、懂政治，胜任教导员、县长、专员等工作，而且精通医术，是个出色的医生。在他从军、从政时期，曾挤时间以超人的医术为不少军人、干部和群众看病。如在五支队时，在一次战斗中有位战士腿被打成粉碎性骨折，军医主张给他截肢。杜伯华看后说：“截了肢就不能打仗了，我给他治治看。”他上山采药、配药，制成膏药贴上，果然好了。1938年7月，五支队三营教导员史进前在长操驻防，得了瘟疫加伤寒，不省人事，生命垂危。杜伯华见后很痛心，说：“他很年轻，要想方设法救活他”。他亲自开方、采药，并托关系买药，精心医治，终于使史起死回生，重返抗日战场。史进前非常感激，至今记忆犹新，并写诗一首：

中西合璧医道精，三教九流尔也明。  
济病扶危热心肠，历雨经风过来鹰。  
长操同榻话当年，白山黑水战未停。  
未见分晓龙虎斗，神仙有情葬忠魂。

1938年2月，因敌进攻，房良县转移时，青委傅伯英病重走不了路，杜伯华将马让与傅骑，杜伯华拖

着又胖又重的身体经北直河，爬过大青杠梁，到四马台村，步行五十余里。到了四马台即从药店里给傅伯英抓了一剂药，傅伯英吃下去病除复壮。

1940年夏天，杜伯华调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聂荣臻指示卫生部长游胜华说：“伯华同志到卫生部工作，你应充分发挥他的专长。特别要把制药工作搞上去，以粉碎日寇对我之经济封锁。”杜伯华到任后，作风纯朴，工作认真，学到的医术知识得到了广泛应用，边区的药品生产蒸蒸日上，产品、产量、质量突飞猛进，如解热药、利尿药、防腐药、健胃药、镇咳化痰药、镇痛药、止虐药等等。在伯华的参与努力下，均有很大发展，使晋察冀边区的药品生产自给有余，除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远销平津、晋冀鲁豫、晋西北等地，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友区，而且还从敌战区换取了伪钞，并以此购进了化学药品和医疗器械，对粉碎敌人的封锁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2月20日，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发的《关于自制代用药品问题的训令》中指出：“自敌对经济封锁加紧后，西药之购买与输入日益困难，而我们边区土产原料炮制之各种药品……虽因技术设置所限，提炼尚不纯良，外观不若舶来西药之精致，但所采用之原料亦多系含有西药成分之原料，或按中医验方所配成，屡次试验均极有效。”聂总肯定的这些成绩，与伯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杜伯华，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联系群众，以身作则，刻苦学习，求知上进，工作深入，作风正派，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是党的优秀干部，是卫生战线上的楷模。这样一位好同志，不幸于1941年6月30日因医疗事故以身殉职。

7月15日召开了杜伯华追悼会。聂荣臻所送的挽联上写着“悼死励生”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卫生部长游胜华致悼词中，高度评价了杜伯华的光辉一生。杜伯华一生革命操劳，鞠躬尽瘁，对于他的死大家非常悲痛。面对伯华遗像，司令员聂荣臻、卫生部长游胜华、边区秘书长肖丹峰和与会全体同志，都泣不成声，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为之挥泪。追悼会后，杜伯华的遗体安葬在河北省唐县神仙山麓，与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葬在一起。为了纪念他，经聂总批准，将他生前创办的晋察冀军区制药厂改名“伯华制药厂”，榆树县委也决定将“华昌药房”所在街道命名为“华昌路”。

杜伯华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作者系原区史志办主任

## 赵然烈士传略

王庆宽

开辟房良，发展涞涿，英风不愧燕赵；  
创建民主，巩固政权，功绩可谓卓然。  
——房涞涿县政府挽赵然联

赵然，字学雍（1918年11月26日—1944年5月19日）。1938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5月入党。历任

房良联合县抗日救国会组织部长、中共房良联合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中共房涿涿联合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和房良联合县、房涿涿联合县县议会议长等职。

1918年11月26日(农历民国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赵然出生在房山县河北乡李各庄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兄弟四个,排行老大。爷爷赵信,由于还不起累欠的八百块钱的阎王债,被活活逼死。父亲赵润田,靠在煤窑上给人写帐,开荒种地,勉强地养活全家。赵润田豪爽仗义、爱国忧民,这些给了赵然很大影响。母亲李化莲慈祥善良,对孩子有教有爱,省吃俭用、会过日子。赵然少年时期聪明伶俐,对家庭的遭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父母对他非常器重。河北一带是房山县文化发达的地区,有钱人念书,无钱人就是东摘西借,也要让孩子念几天书。赵然八岁起在本村读小学,1931年到房山县长育高小上学。在小学读书期间,学习努力,成绩优异。1933年赵然考上房山简易师范。在简师学习时,喜好诗文,勤于笔墨,又爱看一些进步读物,善于思考和钻研问题,每次考试,都是前三名,博得进步教师的赏识和同学的敬佩,先后担任“级长”、“级代表”、“学生自治会主席”等职务。

1936年,赵然从简师毕业以后,到河北乡的黄土坡、晒台村当教师。他除教学生学习文化外,并经常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国民党的军队奉命南撤,房良两县沦陷,日本在房、良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惨案,不少村庄横尸遍野,瓦砾成堆。这些使赵然疾首顿足,仇恨满腔。

1938年1月,邓华支队派我军干部包森经斋堂、大安山,来到房山五区南窖,受到以姜时喆为首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包森到五区之后,召开上层绅士会、知识分子座谈会、村长联席会等,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只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就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侵略者。”在他的宣传、鼓动下,房山五区的人民觉醒了,以姜时喆为代表的一大批有爱国思想和抗日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加入了抗日的行列。李各庄村虽属房山四区,但与五区毗邻,五区的行动早已影响到四区。赵然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3月份毅然投笔从戎,离开家乡到五区参加了革命。

4月底,包森随邓华、宋时伦支队,准备挺进冀东。五支队赵同,派县长杜伯华、救国会主任郭方、政委尚英、支队长贾嵩明等到南窖以五区根据地为依托,组建房良联合县政府。5月5日在长操村东庙由郭方主持,召开了房良县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大会讲明了成立救国会的意义,决定了救国会人选:郭方任救国会主任,赵然任救国会组织部长,傅伯英任救国会宣传部长。5月8日,房良联合县政府在长操宣告成立。赵然到四区开辟工作。不久,赵然经傅伯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然回到四区河北一带,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战则胜,不抗战则亡”,“抗战光荣,不抗战耻辱”的革命道理,动员和组织了革命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参军参战,筹粮送秣,支援前线。他领导四区的群众,成立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从事救亡运动。他与傅伯英等察觉到原四区自卫团改编为我房涿涿支队二大队后,实际掌权人殷耀东脚踩两支船,要投靠日本,并准备成立“皇协军”。汇报后,我五支队及时地对这支武装缴了械(这支武装二百多人,有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十三挺,长短枪配备齐全)。

1938年6月到12月,赵然去五台山党校学习,同行的有郭方、傅伯英等,经大安山、清水、辗转到五台山,行程几百里。赵然在五台山党校学习期间,勤奋谦虚,刻苦认真,对党校老师彭真、邓拓、娄凝华、张瑞华等讲的革命道理,句句牢记,务求弄懂;勤于思考,好提问题,也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因此,同学们喜欢同他一起研究问题,通过学习,赵然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提高了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1938年12月,我军邓宋支队消灭了房山九区杨天沛的反动武装,解放了九区全境,打开了五区与八区通道。房良联合县政府迁到下石堡村。1939年1月,赵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时隔不久,提任为中共房良

联合县委书记，兼任大队政委。为了进一步巩固五区根据地，稳定九区根据地，开辟八区根据地，并把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平原去，赵然依靠上级党委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在挺进军七团、九团配合下，活动在房山县的山区和平原，从事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建党建政，扩军提干，组织抗日救国会、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等，为房良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6月，房良县委为了开辟平原的工作，决定在张坊附近的大峪沟村举办党员训练班，有180人参加。赵然亲自担任教务主任，宣传部长刘海峰任训练班的班主任，赵然在训练班上给党员讲课，深入浅出地讲明抗日救国、建党、建政、建军的道理，为党培训了骨干。在培训班上，他带着党员到南尚乐、半壁店等进行抗日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同月，为提高根据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抗日骨干，房良县在十渡成立了抗日高小，由县长刘介愚兼任校长，赵然亲自到抗日高小给学生讲课，讲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讲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我们必胜的道理。这所高级小学办得很活跃，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亲自来学校视察，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

1939年底，房良联合县政府由堂上村迁到马安村，后迁十渡。赵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十渡村苦大仇深的隗甫举同志，从小给地主扛长活，是个“穷花子”，赵然同志把他叫来，给他讲明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并问他“愿不愿意革命？愿不愿意翻身？”隗甫举听了赵然的开导，如梦初醒，激动地含着眼泪说：“我干！我要翻身，要革命，跟着党走”。赵然又说：“干革命不是一件容易事，又苦又累，甚至牺牲呀！”隗甫举说：“死咱不怕，苦点累点更不怕！”从此后，隗甫举同志跟随党风风雨雨，为革命奔忙，由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我军九团的一名骨干。

1940年5月，根据上级指示，杨流莹任县委书记，赵然改任县委组织部长，兼县大队政委，赵然一如既往，和县委同志紧密团结，积极工作。

1940年6月，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为了进一步完善根据地政权建设，房良县在南白岱村召开全县各界代表会，选举房良县县议会。赵然当选为县议会议长和晋察冀边区参议员，为抗日做了许多工作的民主人士周硕臣当选副议长，赵然在这次代表会上经上级党批准，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分，是房良县第一名公开的共产党员。从此以后，日本悬赏捉拿他。“赵然，赵然，共产党员”的顺口溜，也在群众中传开了。赵然任议长后，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广大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同月，与赵然同年参加革命的同学和战友、房良县五区区长杨天鹏在去长操的路上被汉奸程子良包围，遇难牺牲。战友牺牲，赵然同志万分悲痛，满怀复仇的怒火挥笔疾书：“幼年黄舍结深交，情自相投气自豪；把酒论诗来月下，品茗高喝在花朝。为求解放齐参战，因抗顽敌共执矛。不幸你遭奸细手，此仇此恨几时消。”7月间，六渡村党支部书记蔡玉存，清匪除奸，工作积极，却被这个村的汉奸隗甫万、蔡永生、蔡永才等人在一天夜间，抓到五合村外的东坡上，用石头活活砸死。赵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力量侦察情况，不久即抓到了隗甫万、蔡永生、蔡永才等人，为死难的烈士报了仇，雪了恨。夏末，赵然同志带领十八名游击队员打游击回来，在七渡村吃饭时，突然被敌人包围，赵然听到枪声，立即组织突围，夺路上山，我方未伤一人，化险为夷，而敌人却损失严重。后查明，这次被包围是六渡村汉奸隗丙汉（原为我村长）报的信，赵然同志带着游击队，日察夜访在西关上村将隗丙汉抓获处死。1940年秋，日伪对我平西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扫荡”，先后进驻长操、大安山、塔照等地，使大片苦心经营起来的根据地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不少革命同志遇难，有些人叛变投敌，当了可耻的叛徒、汉奸。接着在11月份，发生了房良一区事变。在这次事变中，共捕去我县区干部四十六人，其中共产党员二十七人，被敌杀害二十人，其中共产党员十六人。根据地被敌人占领，战友遇难牺牲，使赵然同志悲痛欲绝。为悼念遇难的战友声讨敌人写到：“献身革命挽时艰，辗转平西战顽敌。血染南沟（指房良一区）分善恶，骨埋北岭照忠奸。英雄自有英风在，血债还需血本还。寄语投敌诸叛逆，深仇清算待明年。”他们查明情况，及时向上级党汇报。12月，挺进军九团

开赴一区，迅速平复了一区事变。接着赵然又带着游击队进行除奸反特、恢复党组织和村政权等工作。

1941年春，赵然捉到一区叛徒王有才，亲自将其处死。罪恶累累的叛徒、汉奸石秀珠，在日本的豢养下，颇受重用。赵然巧施离间计，连续给石秀珠写了几封所谓的“回信”投入敌手。日本信以为真，把石秀珠作为我们“打入”他内部的好细给杀了。借用敌刀，为民除了害。同时，针对一区事变的教训，以堂上党支部叛变、上石堡党支部坚持斗争两个典型为镜子，在杨流莹、赵然二同志主持下，举办了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学习班，教育党员坚持革命，坚持斗争，过好生死关，并对照支部和党员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后，赵然、晋耀臣一起到上石堡村进行党的恢复工作。在上石堡发展隗合宽入党，并告诫说：“上石堡地理位置重要，要与大草岭、下石堡搞好联防，把工作做好。”

赵然英勇善战，他与肖炳林一起率县大队，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自1941年敌人在张坊建据点后，堵住了我们的南大门，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特别是卡断了我们与平原产粮区的通道。1942年春季，赵然同志决定夜袭张坊据点，拔掉这个钉子，当时他身体有病，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坚持战斗到黎明。这次战斗，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取得了全胜。赵然同志累得吐了血，但他还高兴地挥诗一首：“两列健儿行虎步，一腔热血涌心头。平原此去诛敌寇，誓与同胞血宿仇。”

1942年3月，由房涿涿县委书记贾吉平，副书记、议长赵然主持，在平峪村召开了县区干部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上级指示：组织武装工作队，突破敌人的封锁沟（房山到张坊敌人沿山边挖的封锁壕），深入敌后开展工作，分析了敌我态势和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赵然针对一部分干部对前途失去信心。一部分群众惶恐不安，一些领导干部不愿到敌占区游击区开辟工作等情况，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观点，反复讲解了内线与外线的关系，包围与反包围的关系等。指出只有开展敌后工作，打到外线去，才能巩固内线，扩大根据地，才能争取时局的好转。平峪会议统一了县、区领导干部的思想，增强了抗战信心，鼓舞了斗志。会后，县委以区为单位，组织了武装工作队，秘密越过封锁壕，深入敌后开展工作，使三、四、五、六、七区的工作发展很快。县委书记贾吉平、副书记赵然带头到敌占区和游击区去工作。赵然腿脚不好，县委不让他到危险的地方去，但他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总是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去工作。他这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与此同时，依照晋察冀边区政府《县、区、村组织条例》的规定，根据地进行了村级政权的改造工作，赵然为整顿政权组织，建立新的“三三制”村级政权，做出了贡献。

7月，赵然率游击队和民兵三百多人，配合主力部队，跨过敌人的封锁壕，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进行征粮和破交活动。在龙泉一带活动三天三夜，给了敌人沉重打击，当日军发觉向我围剿时，赵然指挥游击队和民兵安全转移。

12月，贾吉平调走，赵然接任中共房涿涿县委书记，他与县长马志毅在一起，继续战斗在房涿涿县。

1943年是历史上罕见的灾荒年，在根据地里，由于严重的旱灾、虫灾和战争，使生活遇到了极大困难。为了渡过难关，根据上级的指示，赵然经与马志毅商量，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进行了生产自救。在大生产运动中，发动群众开荒种粮、种瓜、种菜；发展副业烧炭、采药、养猪养鸡、搞运输等等。军队、县区干部在赵然同志的亲自带领下，也组织起来，投入了大生产运动，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据房涿涿二、九两个区三个月的统计：挖煤147000斤，割荆条132万斤，刨药材4300斤，打卖柴55000斤，共收入57000多元。

同时，积极开展节约粮食运动，号召群众每顿节约一把米，县区干部的口粮每天由12两减到10两。赵然下乡和群众一样，啃树皮，吃野菜。在他的带动下，县区干部都积极行动，自觉节粮，把节约下来的粮食，捐献给贫困群众，节粮运动影响很大，进一步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4月，赵然深入到一区区委检查工作，了解区干部整风学习、区委生活会、区委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并就如何转变作风问题，谈了具体意见，强调要搞好区委与区抗联，区政府等各方面的关系，在区

委的统一领导下，协调一致，共同努力，搞好工作，争取早日打倒日本侵略者。

7月，赵然主持召开了县委组织工作会议。赵然说：“为了坚持和巩固根据地，战胜困难，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经县委研究，根据房涑涑县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不同情况，确定了不同的整党建党的任务和要求，在下半年整党建党工作，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月，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赵然在会上报告政治形势，传达了盟军已占领西西里岛的四分之三，意大利一个师团投诚，意大利国内发生政变，墨索里尼被捕的消息，并决定要广泛宣传，把胜利的消息告诉党员、干部和群众。发动群众，更有效地开展斗争，打击敌人。

8月，赵然在县议会选举中，连任议长。

9月，赵然探家。赵然自1938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没有回过家。这年中秋节时，他想起了家乡的山，家乡的水，父母的情，兄弟的爱，使他欣然命笔，写道：“千家万户掌银灯，老少团圆笑语浓。酌酒无端撩别绪，青风有意动乡情。深思老父仍奔走，辄使征儿倍感哀，恨不一朝驱敌寇，好分吾父仔肩轻。”不久，赵然同志经领导批准，请假探家，刚一进门即被本村的汉奸发现了。母亲见到离家五年多的儿子回来了，又惊又喜，又想又怕，说：“孩子，你不怕吗？河南有白匪，河北驻日本，村中有特务，到处抓人，你回来危险呀！赶快走！”赵然温和地对母亲说：“妈！这几个小日本好收拾，他们是秋后的蚂蚱活不了几天了。”说话间门外的狗狂叫起来，敌人把赵然的家包围了。“不好了，你快跳窗出去吧！”妈说。“妈！您保重。”赵然跃窗而走，凭他的机智勇敢，安全地回到了根据地。

冬季，赵然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在减租减息不彻底的村庄和新开辟的地区，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通过进一步贯彻土地政策和劳资政策，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进一步调动了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对党更加信赖。一区栾树村佃户老头刘帮志说：“好！共产党好！要不是共产党能有今天吗？共产党为我们穷人把‘法子’都想尽了。”从此积极为党工作。

在这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赵然日夜奔忙，积劳成疾，早在1941年就染上了肺病，但他以“重时理一理，轻时不管它”的态度和惊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带病坚持工作，带病参加战斗，带病努力学习……但到了1944年3月28日，由于病情日趋严重，吐血过多，身体孱弱，病倒了。这时他仍然象藐视战场上的敌人一样，藐视疾病，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挣扎着奋力工作。他拿起电话筒，给地委书记李德仲打电话，汇报工作。当李德仲关心地问及赵然病情时，他当时本来正在吐血，已气力难支，却谎说：“已好！”总怕说自己病重领导着急，过了两天，赵然觉得病情实在严重，才给刘道生、李德仲二位领导写信，含着泪花，向领导说了实情：“我这几天总是吐血，不能再坚持工作了，需要短时间治疗和休养。”地委领导答应了他，并请来最好医生给他治病。但当医生要给他注射葡萄糖时，他坚决不让，说：“这好药省下来留着给重伤员用吧！”

赵然同志3月28日病重以后，寄住在西庄村隗永喜家。隗永喜对赵然精心照顾，他不怕传染疾病，不怕日夜煎熬，一心想把赵然早日扶养好，重上沙场，带领全县人民进行抗战。但赵然的病一日重于一日，生命垂危。1944年5月19日6时30分，赵然同志与世长辞了。赵然同志的遗体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西庄村南幽静的山脚下。

赵然，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工作深入，作风朴实，联系群众，团结同志，是我们党的一名好党员、好干部。5月27日，察哈尔省《黎明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泪水，怎能忍住不外流！》的通讯悼念赵然同志。

6月1日，经过十多天的筹备，为赵然同志举行了追悼会，会场布置的庄严隆重，到会人数比预定数字超过一倍多。把西庄庙前的场地挤得满满的。郝绍尧、王天瑞、刘介愚、马志毅、谭惠民、陈洪新、郝华亭、孙秀梅等均参加了，县区干部、农村干部还有不少党员群众也闻讯而来。在追悼会上，县委书记陈洪新同志致悼词时，伤心地说不出话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戈凤同志报告赵然的传略时，悲切的泪水夺眶而出，参加追悼会的同志个

个声泪俱下，一时间，悲伤的泪水、哭声笼罩了整个会场。赵然的父亲赵润田同志在会上发了言，他说：“喜儿(赵然乳名)，你是党培养起来的好儿子，你为革命日夜操劳，东奔西走，尽了忠，尽了孝，死的值得！”

县抗联会为赵然同志写了挽联：

领导民族健儿，杀敌致果，巍巍丰功传百代；  
献身革命事业，鞠躬尽瘁，耿耿赤诚照千秋。

全国解放后，政府为赵然同志修了坟，立了碑。

赵然同志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赵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 包森创建房山抗日根据地

宋成明

包森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受中共房涿涿联合县工委的派遣，到房山县创建抗日根据地，是房山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开拓者。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敌斗争英勇顽强，胆略惊人，智谋非凡。他在房山创建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建立了第一个区级抗日政权，开辟了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贡献卓著。

### 房山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

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的魔爪伸到了房山地区。1937年9月16日，日军占领了房山城。房山人民在日本侵略军的蹂躏下，陷于苦难的深渊。但房山人民没有屈服，极力奋起反抗，积极寻求救国的出路。

1938年2月，晋察冀军区独立师政委邓华奉命率三团挺进平西。队伍从阜平出发，经涞源，在蟒石口跟地方土匪联庄会发生冲突，打死了联庄会司令，捉住了小队长，部队继续向斋堂进发。

当部队走到涞水县马水村时，根据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边区党委的指示，邓华决定在平西组建房涿涿、宣涿怀、昌宛三个联合省。房涿涿联合县由杨春圃任县委书记、刘慎之任县长，包森任游击支队长，并由三人组成中共房涿涿县工委会。房山县是抗日前哨，有粮仓，有煤山，工农业比较发达，地理位置重要。中共房涿涿联合县工委成立后，即决定派包森到房山县开辟根据地。包森是知识分子，能写善讲，机智果敢，胆识过人，能独挑一面。

包森原名赵宝森，是陕西省蒲城县三合乡义龙赵家村人。1911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里。1930年，包森入三原县省立第三中学。1932年经中共蒲城县委秘书王培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进入西安高中。由于组织学潮被捕入狱，在西安学联营救下获释。1933年秋，在西安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时第二次被捕，被判刑十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获得释放。抗日战争开始，党派他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独立第一师地方工作队。1938年2月，随邓华支队挺进平西。房涿涿县建立后，他以县大队队长和邓支队代表的身份，带一个小连，经峨峪、大安岭，到房山五区的大安山。在大安山结识了进步青年王振铎，进一步了解了房山五区的情况。

当时驻房日军已命令原房山五区南窖一带，给房山日军送五十名壮丁和五十条枪。对此事五区窑商会、商会和各村村长正在进行商议，大多数人不愿当亡国奴，反对给日军送人送枪，但面对敌人的强大压力，又不敢公开违抗，一时决定不下来，后来把暂在南窖小学任教的爱国人士姜时泽请来商议。姜时泽提议找八路军去。在场的大安山村长张振武站起来说，我知道哪儿有八路军，我去找！于是，大家决定派张振武赶上牲口去找八路军。

八路军的一个连队到南窖巡防，并住在北安村进行掩护后，张振武接包森和警卫员孙乃谟到了南窖村。

包森是正当房山人民寻求救国的出路时，共产党派来的第一个房山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接来了包森，也就是接来了党的代表，接来了救命恩人。包森来到南窖以五区为基地，向周围各地区开展抗日工作，以顽强拼搏的精神，创建了房山抗日根据地。

### 创建房山第一支抗日军队

1938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包森来到原房山五区南窖村。爱国志士姜时泽带领南窖小学全体师生到村边欢迎。当天晚上，五区自卫团团总、各村村长、各界爱国志士及当地进步青年，在东庙集会欢迎。

包森在南窖一带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多种方式，团结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积极宣传抗日。他团结了姜时泽、王友梧、陈伯诚等十几名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通过演讲会、讲课、刷写标语等宣传抗日方针和政策。他向群众反复宣讲了党中央《关于日军进攻芦沟桥的通电》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物出物，各尽其力，团结抗有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他还用在敌人监狱中刻苦磨炼出来的左手写墨笔字的本领。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刷写很多抗日标语，不仅宣传的内容受群众欢迎，而且演讲口才和书写墨迹也受到群众的称赞。

包森懂得建立抗日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做后盾。他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同时，积极地做改编五区自卫团的工作。包森和团总解景波等人连续谈判了四天，反复讲明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之际，必须枪口对外，共同抗日的道理。自卫团团总在包森的引导下，茅塞顿开，明晓大义，同意抗日。

根据谈判决议，在班各庄召开自卫团改编大会，南窖、大安山、北峪等各村五区自卫团成员一百五十多人到会。包森在大会上宣布了将五区自卫团改编为房涞涿抗日游击支队的决定。由于当时五区自卫团官兵分住各村，思想工作不细，大安山村自卫团以二班长杜宝成为首，对改编不满，带领十九人，荷枪实弹，包围了大队总部，准备拼杀！包森闻讯后，不顾生命危险，手握驳壳枪，立即奔赴现场，质问手扳枪机的杜宝成说：“这是干什么？要开枪对准我。对改编有意见可以提，何必大动肝火，不准动用武力！”大安山自卫团成员看到包森威武庄严地站在面前，谁也不吭声，自动收起了武器。包森这才心平气和地讲解改编的道理，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服从了改编。

包森还做了原房山四区自卫团的争取工作。包森在东庄子村找到了原四区的维持会长殷跃东和四区自卫团团总郝洪如，经过包森耐心地讲解抗日道理，使其二人同意抗日。

在做好两个区的自卫团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将两个自卫团班长以上人员，集中到班各庄河滩开会。包森在会上郑重宣布：房涞涿抗日游击支队正式成立了！支队长包森。政治部主任姜时泽，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陈伯诚；第二大队长郝洪如；第三大部（特务队）大队长李兴。这就是包森创建的房山县人民自己的第一支抗日军队，这支队伍达到四百多人。房山第一支人民抗日军建立后，包森曾带领他们到羊耳峪打过地方土匪苏志超的队伍，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和粮食。由此，士气大振，抗日斗志更高。

## 建立第一个区级抗日政权

包森深深认识到,建立了人民的抗日军队。但没有政权,人民不能当家做主。军队还是难以存在和发展。建立了人民的军队,必须在军队的保卫和掩护下。建立起人民的政权,抗日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他就积极开展建立政权工作。

当时,南窖五区已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这个地区建立人民自己的抗日政权,条件已经成熟,包森跟姜时泽、王友梧等进步青年商议后,决定废除日本的维持会,建立抗日的救国会。

经过多方面的酝酿和筹备,包森召开群众会。在会上,包森郑重地宣布了南窖地区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它的任务就是为人民做主,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救国会主任王友梧。成立了区政府,区长罗化之、杨德福。

这就是包森在房山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区级抗日政权。

抗日救国会成立后,包森带领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在群众中进一步深入地宣传抗日政策,并带领群众清除汉奸,捉拿特务,打击敌人,激励人民,坚决抗日。

包森还在五区组建了“民族抗日先锋队”,由姜时泽、付伯英、陈伯诚三人负责,队员发展到百余人。

包森还到原房山四区河北村一带开展建政工作,团结了郝绍尧、郝洪如等进步青年,发动群众,废除了日本的维持会,建立了抗日救国会。

南窖地区的抗日救国会,还跟原房山九区霞云岭一带的地方武装取得了联系,双方互通情报,抗日人员互相来往,对敌斗争互相联防。南窖地区救国会有力地支援了霞云岭一带人民的抗日斗争,南窖地区的抗日火种,已撒播在霞云岭一带人民的心田中,在霞云岭一带的人民群众中,已开始燃起抗日火焰。

包森在南窖地区建立抗日政权,以此为基础,向周围地区开展抗日的宣传工作,使整个河套沟,下起磁家务村,上至堂上村。南起南窖村北安村,北至大安山、北峪村。在方圆六百多平方里的土地上,五十多个村庄里,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并为以后建立的房山、良乡联合县政府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广结抗日统一战线

在日军侵华、国民党反动派溃逃的情况下,散存在民间的枪支很多,一些人出自不同的动机,组织起地方武装。正如当时群众所说:“武装遍地起,司令赛牛毛”。仅房涞涿边界武装团伙就有几十个。这些团伙有的虽联合,但都各自为政,各有各的主张。

1937年11月,房山地区的一个武装团伙的头目陈东来,召集各股武装首领十六人,在涞水县石亭村插香结盟,拜为兄弟,逐将各股武装合编为“抗日救国同盟军”,陈东来任司令。下设十路。其中有六路在房山地区活动。

在房山地区活动的三路司令胡振海,驻防在娄子水村,与南窖自卫团仅一山之隔,曾多次攻打南窖自卫团,想霸占和控制南窖这一险要地势,但因南窖自卫团兵精、武器好、战斗力强,都未能取胜。

包森了解到,三路胡振海兵多,占据时间长,影响较大。他想将胡振海队伍争取过来,扩大抗日力量。包森为不惊动胡振海及其队伍,就带警卫员孙乃谟和特务队长李兴,取东道庆子、南观村,日夜兼程,直奔娄子水村。

包森到了娄子水村胡振海公馆,将自己随身带的枪弹和骑来的马,交给了门岗,说明要见胡司令,赤手空拳往门内闯。胡振海的卫兵涌上前来,手持刀枪,拦住去路。有的卫兵将明晃晃的大刀放在包森的脖子上,有的卫兵将枪口对准包森的胸膛,厉声质问包森说:“你何许人也?竟敢大胆闯进公馆见司令!”包森从容不

迫，面不改色，心不慌，堂堂正正地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八路军，是领导抗日的，今天有要事要见你们胡司令！”这些卫兵听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八路军，赶快报告给胡振海，胡振海隆重地接待了包森。

包森住在了胡振海公馆，用他那特有的演讲口才和苍劲有力的书法，向胡振海官兵宣传抗日主张，并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手抄本，送给胡振海学习。按照胡振海的安排，司令部的官兵轮番分拨听包森讲课。包森讲抗日讲了三天三夜，不合眼，不打盹儿，讲得口干舌燥，眼布血丝，仍然精力充沛，斗志旺盛，越讲越起劲。胡振海的官兵通晓了抗日大义，真心实意地愿意抗日。

包森看到胡振海队伍纪律涣散，人员复杂，没有改编为抗日军队，跟胡振海商议决定，胡振海五千人的队伍与抗日游击队结为友军，互不侵犯，共同联防，共同作战，互相支援。包森就这样争取了胡振海的队伍，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胡振海的队伍结为抗日友军后，曾攻打过周口店、长沟、房山城的日军，一度占领了房山城，并在琉璃河北边的白草洼一带截击日军，打死日军茂板大佐，缴获了珍贵稀有的“激光宝刀”。包森还在涞水县板城、白涧等地，公开演讲和书写标语，大力宣传抗日，收编了涞水县板城区王捷三和涿县山南区董凤海两股方武装。由于包森赤胆忠心，积极宣传抗日，在房涞涿边界结成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 为国捐躯 名垂史册

正当房山人民抗日斗争不断发展、壮大，房山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的时候，在1938年4月底，包森离开了房山，到了四纵队33大队任党总支书记。6月，奉命挺进冀东，配合和支援了冀东大爆动。

1939年10月，宋时伦、邓华带领队伍从冀东返回平西，包森留在冀东。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冀东游击战争。包森任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团长。在冀东建立了一支能打善拼的战斗队伍，开辟了以盘山为中心的包括遵化、兴隆等大片土地在内的游击根据地。在冀东战斗中，包森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包森终日为革命、为抗日奔忙，对自己的生活、利益、安危一概置之度外。曾有人劝他订婚成家，但包森表示不把日本赶走不结婚。

1942年2月17日，包森带领队伍攻打满洲军，当他登上遵化县野虎山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敌人的冷枪击中了他的胸部，为国捐躯，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

包森离开我们四十五年了，他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包森英名永垂史册。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 晋耀臣烈士传略

宋成明

晋耀臣在抗日斗争中壮烈牺牲，他的英雄业绩有口皆碑。晋耀臣参加革命后，历任房良县三区、七区、一区 and 房涞涿县九区、七区的党委书记。在区级党政群建设上成绩卓著。他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只要是革

命工作，哪里需要，哪里艰苦，哪里危险，就到哪里去；他对敌斗争，坚韧不拔，视死如归，不断摧垮敌人，开创新局面，他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迫害，英勇顽强，宁死不屈。

### 走上革命路

晋耀臣，名显枢、字耀臣。1916年农历六月出生于房山县蒲洼乡蒲洼村，1927年至1932年在本村念私塾，1911年至1938年在家赶牲口种地，1939年春参加革命。

晋耀臣的父亲晋国凯，地主成份，有耕地四十三亩，雇用长短工三人。但他思想进步，支持抗日，同情劳动人民，是个开明士绅，1940年当选为房良县的参议会议员。晋国凯的进步思想，对晋耀臣有影响。晋耀臣在家务农期间，常跟穷苦人一起劳动，相互有深厚诚挚的感情，晋耀臣还拿出自家的钱粮救济穷人，穷苦人也乐意跟他接近，跟他交心。

晋耀臣从小聪颖好学，刚毅倔强，仗义执言，敢于斗争。一次，因债务纠纷，晋国凯的亲戚仗势欺人，晋耀臣挺身而出，非要找地方讲理不可。他步行百余里山路，到房良联合县委书记赵然，要求帮助解决问题。赵然帮助他解决了问题后，见他胆大、精明，敢于申明正义，有文化，有培养前途，就留他住下了。晚上给他讲革命道理，讲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他参加革命。晋耀臣觉得赵然的话条条在理，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并回去跟家人商议。其父晋国凯和爱人王秀芳都支持他参加革命。从此，晋耀臣走上了革命道路，杀上了抗日战场。不久，经赵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晋耀臣参加革命后，1939年4月，到平西专署在涑水县峨峪举办的党训班学习。在党训班上，他认真地学习了党的基本知识、革命理论和抗日方针政策。学习后，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更深刻了，对党的抗日主张更明确了。在他年轻的心灵中，树立了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和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念。

### 肩负重任

1939年6月，平西专署党训班结束后，晋耀臣被分配到房良联合县三区(南、北白岱一带)任农救会主任(区委书记)。晋耀臣大高个，白净脸，威武英俊，两眼炯炯有神。他来到三区，以旺盛的斗志和顽强的毅力，在这里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飞机天天轰炸南、北白岱一带，开始是三、五架，后来是二十多架，先是白天轰炸，后来夜里也轰炸，搅得百姓不得安宁。

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军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弃枪逃跑，散存在民间的枪支很多，一些人怀有不同目的，利用民间的枪支组织武装团伙，一时地方武装风起云涌，占地为王。二路司令白秀亭占据张坊、南北白岱一带，经常抢粮要款，搜刮民脂民膏，当地群众惨遭欺凌。“正当三区人民受苦受难之时，1939年6月，邓华支队解放了张坊、南北白岱、南北尚乐广大地区。晋耀臣正在这时带着党的指示，肩负区委书记重任，到这里开辟工作。

晋耀臣在工作中很重视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和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斗争。他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他在南白岱村的庙台上摆上一张桌子，每天利用中午和晚上时间，向群众宣讲抗日政策，有时深入到户，与群众坐在一起亲切交谈。他经常召开村干部会、绅士会、知识分子座谈会，用党的抗日政策团结爱国志士、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统一抗日思想，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晋耀臣经过半年的艰苦细致工作，在三区普遍建立了村政权和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青年自卫队等组织，人民群众有了自己的抗日政权和组织。

青年人是抗日的骨干力量，晋耀臣很重视培养青年人。在整顿农、青、妇救国会组织时，注意安排青年人，让青年人从中得到锻炼和提高。青年邱绍明经常蹲在大槐树下听晋耀臣讲抗日道理，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晋耀臣主动找邱绍明谈心，启发他对党对抗日的认识，提高他的民族觉悟。并带他下乡，教给他工作方法，让他在工作中增长才干。晋耀臣见他思想成熟，抗日坚定，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引导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晋耀臣先后培养介绍佟博文、焦耀宗等人加入了共产党。

晋耀臣还参加了县委在大峪沟举办的党训班，组织本区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县委学习班上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抗日政策，密切党员和积极分子的联系，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到1949年春，全区十二个村，已有南白岱、北白岱、下滩、镇江营、郑家磨等八个村有了党员，有的还建立了党支部。

晋耀臣在三区抗日前哨建党建政，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前，抗日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每逢“五四”青年节、“七七”抗日战争纪念日，在艰苦的条件下，都召开纪念大会，组织纪念活动，还组织各村青年进行会操比赛。镇江营和南白岱村群众抗日成绩优异，被评为模范村。由于群众发动得广泛，打击了日伪军，巩固了三区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斗争向前发展。

三区抗日斗争打开局面后，1910年6月，晋耀臣又被调到抗日斗争的前哨房良县七区(石窝、南北尚乐一带)开展工作。他到七区任区委书记后，朝气蓬勃，满腔热情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减租减息、参军、征粮、筹款，对开辟七区抗日根据地和支援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 消灭叛匪

1940年底，晋耀臣调到房良县一区(龙门台一带)任区委书记。这个区是山区，由大草岭至芦子水共有大小村庄二十三个，在1938年冬已经开辟为抗日根据地。但当时在解决王家台事变中，对叛匪头子杨天沛、杨万方等人未严厉惩治，留下了隐患，以后在建党中又审查不严，混进了坏人。

1940年秋，日伪军大扫荡后，杨天沛等匪首与党内坏分子相勾结，私通日伪，于1940年11月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房良一区事变。庄户台、堂上、宝水等村党组织负责人叛变投敌。在这个地区工作的县、区党政干部四十六人被捕，二十人被杀，革命力量损失很大。一区的东半区一度由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又变成改占区。日伪军在三尖城上建了据点，并在霞云岭村修炮楼。挺进军九团二营虽于1940年12月13日攻克三尖城，击溃敌伪，但日伪军还是以南窖为据点，三天一进攻，两天一扫荡。党组织被摧垮，革命干部被杀害，不明真相的群众外逃，革命仍处于极端困难阶段。

晋耀臣调一区任区委书记，正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整个一区一片白色恐怖，再加上深山区交通不便，缺粮缺款缺弹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怕敌人追捕，不怕汉奸的暗杀，不顾物质条件的困难，临危不惧，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在深山老林中，跟日伪军周旋转战。

晋耀臣在这个地区，依靠群众，重新开展武装斗争，重新恢复党组织和村政权。他以蒲洼等西八村为基地，一步一步地向东向南发展，先堂上、龙门台村；后霞云岭、下石堡村，逐渐恢复了全区的工作。重新整顿武装组织，从区到各村普遍建立以党员为骨干的游击小组；晋耀臣还以芦子水，蒲洼，东村的青壮年党员为基础，组建了一百二十多人的复仇大队，任显本任指导员。游击小组和复仇大队由晋耀臣亲自指挥，开展灵活多样的武装斗争。晋耀臣还亲自领导上石堡、下石堡、霞云岭等村的游击小组，在各村进行警戒锄奸和消灭叛匪工作。晋耀臣在开展武装斗争，消灭叛匪，取得了节节胜利的同时，又从芦子水村开始，向东逐村整顿党组织，重新审查和发展党员，在各村重新建党建政。他在摸清党员底数之后，对每个党员严格把关，重新审批，对杨怀瑞等有叛变行为的一律从党组织中清除出去。他认真培养了一批年青积极分子，发展了一百多名年青党员，在东半区十五个村重新建立了党组织和村公所。上石堡村青年民兵隗合宽，抗日积极，立

场坚定，对敌斗争胆大心细。晋耀臣住在他的家，亲自培养他，给他讲党的知识和革命道理，教育他通晓革命大义，立志投身革命，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隗合宽认清革命道路，对敌斗争更加勇敢坚强，成为全区游击队总指挥。他带领游击队员到南窖、安子等日军据点摘电话机13台，活捉了罪恶累累的汉奸队长程子良。在打击日本侵略军和消灭地方土匪的斗争中，战功显赫，被晋察冀边区授予抗日英雄光荣称号。

晋耀臣带领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使霞云岭、龙门台一带由敌战区又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一区的农、青、妇救国会重建后，又重新显示了抗日政权的威力。在一些村庄组织起剧团和文艺宣传队、扭秧歌、演话剧、活报剧、唱革命歌曲等，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非常活跃。

1941年6月，房良县与涞涿县合并，成立房涞涿县，房良县一区改为房涞涿县九区，晋耀臣继续任房涞涿县九区书记。在这个区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后，晋耀臣认真贯彻执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政策，全区共减租五百零七石，清算地主粮食一千一百九十石。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调动了群众积极性，群众抗日情绪高昂，很快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征兵、征粮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

### 英风凛凛

为了加强房涞涿的沟线外斗争，在1943年10月，晋耀臣被调到房涞涿县七区(南白岱、南尚乐一带)任区委书记。

房涞涿七区是1941年将房良县三区和七区合并而成的，早在1939年这里已成为抗日根据地。但在1941年秋，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强占了这一地区并在张坊村设立了据点，经常住有日本军六十多人，又沦为敌占区。晋耀臣来到七区后，他首先组织了武工队，亲自担任指导员，郭德文为队长，有马剑书、郁文等人参加，他们一方面做伪大乡长郭雅如等人的工作，团结他们抗日，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对投靠日本侵略军、坚持与人民为敌的汉奸特务，坚决镇压。他们镇压了南白岱的高级三、邱祯才等，还发动群众编写了《十三月歌》，揭露嘲讽为日伪军效劳的十三名保甲长。

晋耀臣在这里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声势越来越大，威振敌胆。日伪军非常害怕，听到晋耀臣这个名字，都吓得丢魂丧胆。敌人对晋耀臣恨之入骨，多次张贴布告悬赏捉拿他，布告中说：“谁捉拿到晋耀臣重赏，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晋耀臣身体有多重，就给多少金和银。”晋耀臣把敌人的恐吓、暗害、捉拿都置之度外，他身背挎包和盒子枪，带领两名武工队员，照常机警地活动在七区各村。

1944年3月底，晋耀臣回家探亲，对爱人王秀芳说：“我到七区，是重回故地，敌人怕我、恨我，正在捉拿我，我常在狼群里转，说不定哪天会被狼叼去。如有意外，你是共产党员，你一定要坚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离家时，他抱着小女儿亲了又亲，恋恋不舍，王秀芳也一再叮嘱他谨慎小心。

1944年4月，晋耀臣到郑家磨(又叫马家磨)村开展工作，住在马仲录家，由于叛徒高进春(解放后已被镇压)向敌人告密，敌人包围了晋耀臣的住地，晋耀臣和两名武工队员从后墙跳出，敌人拼命追赶，晋耀臣看情况紧迫，他命令武工队员说：“你俩赶紧跑，我在后边掩护！”他向敌人连打三枪，两名武工队员向西面的山区跑去，敌人象疯狗似的扑来，晋耀臣已无法逃脱，就在郑家磨村的桥头上，摔碎盒子枪，撕碎随身带的文件扔入河内，准备跟敌人拼以一死。但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抓捕。房涞涿县委得知晋耀臣被捕，曾想尽办法，多方营救，但都未能奏效。

晋耀臣被捕后，受尽敌人折磨，但他英勇顽强，宁死不屈。敌人在押送他去石亨的路上，用铅丝绳穿着晋耀臣的锁骨，拉着走。晋耀臣忍受着剧烈疼痛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晋耀臣被敌人送到石亨后，继续坚持绝食绝水斗争，敌人折磨他，迫害他，将他倒挂在墙上，用开水浇身，他怒目而视，一声不吭，敌人见他毫不屈服，又用刺刀戳瞎双眼，他仍不吭声，敌人接着又在晋耀臣身

上连砍数刀，晋耀臣遍体刀伤，血染全身，此时已气息奄奄。敌人还不死心，又叫狼狗撕扯晋耀臣的肢体，最后将晋耀臣推入山坡下的壕坑中活埋。晋耀臣在敌人惨无人道的迫害下，从容就义，壮烈牺牲。他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显示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崇高气节。

晋耀臣为抗日救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功绩，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永远怀念晋耀臣烈士。

晋耀臣烈士永垂不朽！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 难忘的记忆

## ——记我的父亲周硕臣先生

### 周景和

九曲黄河东入海，一生咆哮多坎坷。父亲虽然已去世二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勾起我不尽的回忆。

据老人讲，我家的祖籍在山西洪桐县。那里的祖坟上至今还立着一个周姓翰林的石碑，从父亲以上的四代起，有三支开始逃荒，我们这一支人最后到房山县惠南庄。

父亲名国梁，字硕臣。他诞生在“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兵火之中。父亲的教书生涯开始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九一八”事变，日本扶植傀儡建立了满洲国；两年后日本帝国主义越过长城一线，加速了它在中国殖民统治的进程，平津受到直接威胁，学生积极组织南下宣讲团，一时爱国呼声四起。年青的父亲被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鼓舞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被他视为一个坚定的信条。于是，他就在教学之余，对比着中国的兴衰史研究孙中山先生的文集，研究三民主义。西安事变前后，父亲对蒋介石积极反共，对日方进行不抵抗政策极其愤慨，写信给蒋介石，要求他实行三民主义，积极抗日。结果，这封信被蒋介石冷置起来，父亲对蒋介石的最后一点幻想终于破灭了，从此，他便把希望寄托到共产党身上。

1937年秋，父亲在同事李振东的帮助下，偷偷的到了山区，在“野三坡”找到了共产党。他从山里带回《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一系列宣传品，开始了抗日宣传，走上了抗日道路。

1938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邓华支队（当地人称他们“黑马队”）来到平西，接着党又调宋时伦支队来平西加强力量。组织上找父亲帮助做征兵、筹粮等工作。父亲为了以实际行动号召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斗争，毅然把六哥周南及霍洪江等人送到我房涿涿联合县政府所在地“野三坡”抗日中学。后来，在五哥周景岩的一再要求下，父亲又把五哥这个生活上的唯一帮手也送到县里参加秘密工作，接着又动员舅舅参加了革命，并把年仅十三岁的八哥周景橙（乳名儒儿）送到了十渡的抗日高小。

1939年后，地方上的土匪被扫平了，到了1940年，平西的武装力量也空前壮大起来，除了有七团、九团、县大队等大力量外，每村都有游击小组。根据地其他方面的建设者如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及教育等都得到空前的发展。那时父亲经常跟着县委副书记赵然活动。从赵然身上，父亲感受到了革命队伍的温暖和

共产党人的伟大。1940年6月,赵然同志当选了房良联合县政府的县议会议长,父亲当选了副议长,从此,他们的合作就更密切了。一次,不知敌人怎么知道了我们有部分粮食抢运到穆家口子了(地名记得可能不准),就风风火火地来抢粮食。当时我们的主力部队又不在那里,情况异常紧急。当父亲和赵然同志知道后,就立即组织村里的干部民兵带领群众转移粮食。也就在这时,敌人的枪声打响了,枪一响,村里就乱了。看着纷乱的群众和来不及运走的粮食,赵然也急了,而且急得他一时没了好主意。这时,父亲当机立断,对赵然同志说:“这几袋粮食运不走就烧了它。眼看咱们叫敌人追着屁股打,不如布置民兵边打边撤。咱俩赶到前边去,让运粮的人离开大队,到小路上去单独隐蔽起来,然后设法引诱敌人去追县大队。”赵然一听,心里顿时一亮,立刻布置了后卫,跟父亲马上赶到大队前边去口后来,父亲领着运粮的人进入了一条不起眼的小山沟,把粮食暂藏进了一个石洞。赵然同志则叫大队带了几袋粮食,故意边跑边撤,把敌人引走。事后,赵然同志说:“我亏了有你这么个参谋长了!”

1940年秋天,五哥调到边区社会部工作。为了扩大情报网,与游击区的同志们联系方便,社会部的负责人王友同志(钟子云)指示五哥在长沟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站。父亲听五哥说以后,就积极支持五哥开展工作,决定由景春二恐、景秀四哥(二人均是大伯父的孩子)出任正副经理,以我家的名义在长沟开了一个“振兴文具店”。对外卖些书籍、纸张、笔砚等;对内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报纸,秘密接待同志,传递情报。为了便于工作,父亲还在村里办了个小卖部,来掩护工作,传送消息。

1941年,经过多次扫荡的日本侵略军知道他们是剿灭不了八路军的,于是又发动了所谓的“强化治安”运动。平西革命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搞起了大生产运动,进行自救,但有不少物资还是要到敌占区去搞。父亲就利用各种关系,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搞到了食盐、无线电器材、药品等大批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这年秋天,父亲见县大队的一百多个战士还穿着单衣,夜里宿营时一个个冻得让人看不下去,就问赵然同志,战士的冬装是怎么解决的?当父亲知道根据地太困难,一时解决不了时,就主动由自家承担起给县大队战士做军服的任务。他自己掏钱买棉花布匹,自己找人做,使战士们及早地穿上了棉衣。

1941年,随着平津等地的地下党组织与平西根据地的频繁来往,王友同志又指示五哥在我家设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站,在封锁沟外接应进出山的过往同志。五哥又找父亲商量,父亲直爽地说:“这是咱家份内的事,咱们宁可掉脑袋,也要掩护好同志,要是谁把消息漏出去,他就不是咱周家的人!”这样,我家这个交通站先后接送过数十个同志,其中多数是向往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用化名的工作同志。有时,一次要接待几个人,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王凤琪同志在家住的时间长,所以还记得。

这里谈搞交通站时给家里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头一件是:这年冬天接周宾的那一回。当时,五哥虽然调到了社会部,但也受县委的双重领导。赵然同志指示五哥到北平西交民巷去接北平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宾同志(当时叫张培华)。赵然向五哥交待说,张培华同志是边区政府姚依林秘书长的爱人,一定要保护好她的安全,而且她那里的情况复杂,接头时要找不到张二小姐(张培华)或张四小姐(张培华的妹妹)就不要暴露身份。后来五哥在北平先同张四小姐接上头,又同他一起到天津去接张培华同志。张培华见形势紧张,就问五哥叫什么?五哥说叫周景岩,张培华同志就说:“好,那我就叫周宾。”并指指妹妹,“她叫周平。”这样,按计划五哥和周宾先从琉璃河下车回家。路上二人以姐弟相称,就说弟弟接放寒假的姐姐回家,然后再由黄云同志的哥哥送黄云和周平乘车到涿州,再由五哥把他们接回去,最后在家里聚齐再越过封锁线到根据地去。后来,他们姐弟俩为了保留这段美好的记忆,一直便使用“周宾”“周平”的名字。解放后,我们两家还经常来往。姚依林夫妇对父亲及我们兄弟的感情依然很深。

另一件是这期间跟张大中同志的、交往。由于张大中同志到我家来往的比较频繁,交往比较多,感情也比较深。记得解放后在中山公园的一次会上,父亲见到了他,请他到家作客,他很快就来了。到村口他让汽

车停在离我家很远的地方，特意步行一段路程来探望父母，可见彼此感情之深。

1942年4月，在去根据地的途中，父亲不慎被捕了。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李振东和李丙辉同志及一个叫张府的老乡。之后，宪兵队让特务王殿臣带路抄了我的家，抄家后带走了二哥耀停和四哥景秀等几名人质。在狱中，敌人对父亲严刑拷打，老虎凳的砖曾加到三块，但始终没有动摇得了父亲的革命意志。他在狱中有诗写道：“忧国忧民志未酬，身陷囹圄更何求；青山处处埋忠骨，拼将吾血灌神州！”

最后，经组织决定，由五哥卖了家里的四十多亩好地，凑了二万多元大洋，才把父亲和狱中其他未牺牲的同志营救出来。

父亲出狱后，赵然同志代表组织来看望他。赵然同志对父亲说：“是组织上让你家属卖了地去营救你们的，今后有么么困难请提出来，组织上一定给你们解决。你们一家人都参加了革命，是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庭啊！”

但父亲激动地说：“我周硕臣早就把一家人交给革命了。一抓进去，就没想活着回来，现在回来了，要感谢党！要说要求，我只求党给我更多的工作，如果我死了，党要把我的孩子们拉扯上，让他们继续跟党走革命！”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在阜平温塘召开全边区参议会大会，父亲光荣地当选了边区参议员。会议期间，父亲认识了新当选的参议长成仿吾同志，见到了聂荣臻、萧克、程子华等同志。在会议期间，父亲还看到了根据地中心的广大军民那种崭新的精神风貌，领会了新的精神，心情异常兴奋，激发了他更大的革命热情。开会回来后，他工作更带劲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格了，对党的事业也更加忠诚了。

1945年春的一天，有个同志要父亲把一封信捎到县里去。就在父亲送那同志出门的当坎儿，我无意从桌上拿起信来玩，并撕成了两半。父亲回来一看，脸都气白了。对我这个两岁半的孩子，他无可奈何，急的团团转。后来，他想到在村里党支部工作的九哥（周景朱），就拿着信带着九哥到县里，要求县里先把九哥押起来，等县里把事情弄明后再放。县里信任父亲，执意不肯。父亲除做严厉的自我批评外，仍坚持这样做，直到由上级领导对父亲说，信上的内容及保密的必要性已过去了，父亲才把九哥带回来。

到了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的末日快到了，我边区也解放了张家口，国民党也很快抢占了平津。这时，房山一带的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原来投靠日军的石窝乡大乡长崔士镰也蠢蠢欲动。他看父亲在当地的威望很高，就企图拉拢父亲为他们办事，并传信请父亲到房山当他们的县长，还挑拨说：“老蒋拉到华北的军队有几十万，八路军是成不了气候的，死不了也只能钻山沟，你跟着他们受什么罪？跟他们干了那么多年才当了个副议长，你还喝他们的迷魂汤。”父亲听后，对那个传信的人说：“你回去对崔士镰说，我周硕臣没忘记他在辛庄杀的那几个贫农，他手上的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让他死了那份心吧！”

崔士镰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不久，原来那个孔团（汉奸队）的何茂银就带着蒋匪军扑向村来，这次偷袭幸有群众掩护，我家才免遭劫难，但前来找父亲联系工作的南尚乐陈化一同志却因隐蔽不周被敌杀害。

不久，父亲以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常驻代表的身份到了张家口，参加边区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所做的筹备工作。当时边区参议会三个驻会参议。一个是参议长成仿吾同志，当时他是华北联大的校长；一个是董岳同志（名字可能不准），他解放后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再一个就是我父亲。最后父亲当选了晋察冀边区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正当中共为和平建国而奔波时，蒋介石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父亲眼看着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要大打了，就立即返回故乡一乡，准备在解放战争贡献更大的力量。

父亲回家后不久，地方上就搞起了土改运动。父亲第一个交出了房契和地契，对家里的粮食等也都做了整理，拿出去交给村里平分。由于当时的土改运动有些过火，我家被划成地主，但父亲毫无怨言。后来，以谭惠民县长为首的土改工作队又到村里搞了土改工作复查，把我们的成份纠正过来，父亲对政府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大加赞赏。

解放以后，父亲从1949年到1953年做了一届房山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56年十二月到1958年四

月又做了一任房山县人民委员会的副县长。后来他感到年纪大了,提出辞职申请,被彭真同志安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作馆员。直到1966年7月12日,因文革的冲击,父亲才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旅程。

现在回顾父亲解放后那段工作和生活,许多事还记忆犹新。

解放后,他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一身布料中式装,异常朴素。他从不抽烟也不嗜酒,对子女要求也极严。记得他在县里工作时,我和二侄子瑞民从北京骑自行车给他去送棉衣,到了县人委,晚饭已过,他就亲自到厨房给我们找了点剩饭。厨师看不下去,要做点新的,他硬是不肯。

1970年我到张坊去教书,又听到了一些父亲在县里抓文教卫生工作的情况,说他作风朴实,没有官架子,以至他要在南尚乐商店买盒香烟招待南尚乐中学的几位老师,人们怕他破费,都不卖给他。有个学生家长知道我是周硕臣的儿子,几次请我去吃饭,向我表达他对父亲的敬佩之情。还有的老师讲,石窝中学是父亲抓的点,是他一手建起来的,说父亲抓教育网点抓得细,也抓得紧,为家乡的孩子能就近上学颇费了些脑筋。

父亲在晚年写的最得最好的一条横幅是:马列主义如日月,主席功德似地天。关于这一条幅的敲定,其本身也反映了父亲的一种可贵品质:那就是他善于接受不同意见的民主作风。原来父亲写的这条幅的字句是:“马列主义如日月,斯毛功德似地天”。一次他写了一幅后钉在墙上跟我说:“我想把这幅送给秦芝楼,你看这个能拿出去吗?”看一会儿我说:“字的功夫我看还可以,清秀之中还加有苍劲,我看还挂得住。不过从内容上看,写斯毛怕不妥,因为讲对仗“马列”对“斯毛”虽说很好,但一想意思,听着就不太好。”听了我的话,父亲便没再说什么,后来我看父亲再写就改正过来了。

特别不能让我忘怀的是1966年他曾嘱咐我说:“我的那本自传已经写好了,将来如果能拿出去复印,可印它一百本,这样就可以分赠给关心、惦念我们的亲友了。”而我却让它遗失了,这恐怕会成为我终生的遗憾。不过,后来我总这样的宽慰自己,即便我不保留它,又有谁能把父亲的那份历史抹去呢?只不过是让人们淡忘了也就是了,而与其淡忘,倒不如干脆就让它作九曲黄河的一滴水,随着那滚滚的波涛流去吧。因为自古以来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九曲黄河也就是这样流的,它毕竟还要这样永远流下去。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 郭维农传略

赵润东

郭维农,又名郭树棠,房山区岳各庄乡五侯村人。出生于1917年,曾任房山区政协常委。原系河北省参加伪“国民大会”的代表之一。他久居在外,其经历曲折,因此是本地区群众不甚了解的一位老人。

他童年时代于本村小学读书六年。十六岁时,随父到房山县属高小继续读书二年。其父郭广元,又名郭普泉,原系国民党房山县参议会参议员,同时在房山县教育局任事务员,他早年毕业于房山简易师范学校,擅长书法绘画、一掌金计算等,知识渊博,交际比较广泛,这给郭维农以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1934年,郭维农考入河北黄村农业职业学校,(后改为农业职业第四班)。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

习期满分配到北京南苑六河庄的南苑棉厂工作。这期间，又在“北大农学院”棉训班深造一年。其后，调往河南，在棉产改进会彰德（现属安阳）办事处，担任助理指导员。当时，因专业人员缺乏。所以他被安排在本单位内负责全面技术工作。二年之后，返回家乡，因没有合适的工作，暂且在本县长沟小学工作半年。接着，便到房山农场担任场长，（原场址在县城南肖庄子），直至解放。

### 二

在房山地区，甚至五侯村内，提到郭维农这个名字，人们都感到陌生。然而，一说“国大”代表，人们马上会想起这位具有特殊历史身份的人物。郭维农，一个出生在农村普通家庭的人，是怎么当上“国大”代表的呢？这是人们比较关心并经常提起的话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侵华历史。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希望有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时期，以便医治战争的创伤，建设富强的国家。然而，蒋介石不思励精图治，不与中国共产党和衷共济、力谋振兴，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视人民的要求，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政治协商会议有关“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险，英勇自卫。二年之后，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成战略进攻，全国形势根本好转。

这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面临灭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摇摇欲坠，狼狈不堪。为了巩固其日趋没落的反动统治，蒋介石对外加紧投靠美帝国主义，充当其忠实的奴才；对内又决定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选举伪总统和副总统，玩弄“还政于民”的欺骗手段。因此，国民党统治下的各机构的“国大”代表竞选开始，“国大”代表由此而产生。

当时，河北省按农会系统分配房山县代表一个。房山县县党部书记长常玉（县长，本县洪寺人。）接到指令以后，便立即召开会议，研究选举“国大”代表问题。会上有人提议，只给一名，弃权算了。有人却持反对意见。最后常玉讲：“河北省党部来指令，给一个名额，我们有人，谁也不给。无论如何也得选出一个。”经过再三筹划，决定“投票选举”。

为了加官晋爵，获取高官厚禄，许多官僚政客豪绅恶霸，不惜重金，贿买选票。这时，郭维农之父郭广元在县参议会任参议员，并驻会掌管会务。周围的人自然照顾面子，而郭维农本人既年轻，又有学历，竞选条件自然比较“优越”（农学院棉训班毕业，这是取得入选资格的条件之一）。1948年初，选举在房山县伪参议会进行。结果，郭维农占“天时、地利、人和”之条件，没花一分钱，一举当选为“国大”代表。此后，郭维农便从一个普通的农场场长，一跃晋升，开始了他的“国大”代表之生涯。

### 三

有人说，郭维农曾参加过“南京重庆谈判”。郭维农却坦率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作为“国大”代表的郭维农，从1946年后半年开始的确在南京。他见过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俞国柱、莫德惠等。在“国大”开会期间，他与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当时为国民党中央政府邮电部长）。并排面座。“南京谈判”期间他当时作为国民党社会人员集训队队员正在南京集训。

在南京集训之前，河北省伪党部曾举办河北省社会人员训练班。由河北省社会处处长瞿会汉任班主任。（当时河北省主席为孙连仲）。训练班共有一百多人。这些人来自当时的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妇女会等。训练地点在北京交道口——即河北省社会人员训练班，训练的内容为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特工训练等。每天按排队常规进行，时间相当紧张。本次集训，主要为南京集训选拔人才。集训期满，由这一百多人当中

选出三人去参加南京集训，其中入选的有郭维农、周润生和一个姓苏的人。

这次集训之后，便由南京政府组织了社会人员集训队，参加的有一百余人。这些人来自全国各省，包括台湾。集训日期为一个月，主要内容是：全国工会、农会等组织法，军事训练、特工训练，每日全副武装，十分紧张。这次集训为最高级集训。当时的组织者，训练班班主任是谷正刚，系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讲课教师为陈果夫、陈立夫等。队员们受训前，首先到中山陵园谒陵，受训完毕再谒陵一次。

紧张的南京集训过后，郭维农返回房山，然后到通县开会，成立河北省农会。会议选出农会理事长宋时君(河北省赵县人)常务理事郭维农(“国大”代表)，其中另有一个姓孙的“国大”代表，是南京组织部指派人员。马龙海(唐山人)和一个姓宋的(保定人)、马国瑞(保定人)当选为秘书长。农会会址在北京西单粉子胡同。(即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处)。自此，郭维农调往河北省农会，与周润生等住在会中，时约一年。

### 四

面对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蒋介石发出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愿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改编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下同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

1949年4月1日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共产党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4月20日国民党拒绝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在此之前，1948年12月从南京回来的国民党有关人员留住北京，而在北京的“国大”代表则组成“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由许惠东(北京市参议会议长)召集开会，准备“和平解放北平谈判”，决定派出代表团。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何思源(系山东省省长，曾任过北平市长)，代表吕复(北大教授)、康同壁(女，北京人)、马振源(北京电车工会理事长)、刘鸿瑞(河北省商会会长)、王乔年(工会人员)、冯莲溪(女，西直门小学校长)、郭维农(农会理事)及何思源的随从(实为中国共产党与何联系的地下工作人员，共十一人，共产党首席代表为叶剑英。何思源与叶剑英在法国留学时是同学。这次谈判何本想见到叶剑英。然而，北京城外，重兵包围。北京解放大局已定，何思源并未见到叶剑英。

回忆当时情景，国民党代表团十分狼狈。代表团欲要出城的时候，有人讲走不了了。因为外面已经被一百多名新闻记者包围了。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军统”特务到处跟踪暗杀。当时许惠东怕记者当中有特务，便借到西单“一亩园”饭庄请客为名，将代表团转移出去。随后，代表团一行十一人直奔西直门路北电车站，从电车工会要了一辆公共汽车，方才出城。出城时，许多老百姓，军人站在街道两旁欢欣鼓舞，掌声不断，都盼望着北平和平解放，代表团打着白旗，带着白袖章路过动物园时，遇到鹿砦，再往前走，对面就打响了机枪。解放军队伍中走过来一个连长，说清原因，怕代表团踏中地雷，由连长领着，来到海淀的解放军司令部所在地，住在一所民房(即招待所)里。夜里，谈判开始，解放军政委莫文骅(现炮兵司令员)代表叶剑英进行和谈。当时，解放军提出了几条规定，其内容是，傅作义下属军队等着缴械投降，各机关工厂保存好档案，市民等着安居乐业等。谈判结束了，代表团在此住了一夜，第二日返回城内汇报。当汽车走到西直门时，国民党城防司令走过来说：“别走啦!里边有一二百名新闻记者，怕你们挨黑枪，你们的车直接开到北京饭店，许惠东在哪儿等着。”代表团听后，连车都没敢倒，一直开到了北京饭店，当时的目击者都说：谈判代表好象兔子，连车都不敢停。到北京饭店向许惠东汇报谈判情况之后，代表团就解散了。再想找人也找不到了。经过外围战和谈判，傅作义率部起义。第二日解放军进城，北平得到和平解放。

### 五

北平解放后，郭维农回到家乡。其父郭广元与原解放军政治部主任莫余平有些交情，莫余平曾到郭家。郭广元要求莫带郭维农去部队当兵。莫便允许了。从此以后，郭维农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起初，莫余平不了解郭维农的历史，将郭维农安排在“四野”后勤部宣传队。郭维农没有文艺特长，因此又调到后勤部第六分部当会计。他随部队先后从廊坊至江西，南下到南昌、赣州，又准备入广州未成，部队撤回河北省杨村后改编为空军后勤部。当时，郭维农在财务处仍任会计。参军总计不到一年时间，郭被政治部保卫科停职反省，交待历史问题。期间反省四十天，后被迁回房山县法院，继续交待历史问题。郭又先后在煤矿、狱中呆有半年多。1951年4月10日被捕，迁回监狱（管生产帐和伙食帐），1953年6月13日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从房山押送通县监狱，半年后押往唐山监狱农场，又过半年后，押往张家口等地。1966年4月9日，刑满释放，留场工作。1975年12月8日迁回家乡，在房山县民政局橡胶塑料厂工作。

他当过“国大”代表，受过训练，被判处过徒刑，当过罪犯，后又当过工人。作为政协委员，受过党组织的教育、关怀。

1984年8月，房山县人民法院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党的政策，对郭维农的定案进行了刑事再审判决，法院发现该案在认定事实运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对此案重新审理。

再审查明，原审被告郭维农解放前充任伪职多年。1949年1月，郭任伪河北省农会常务理事之职，曾参加北平和平谈判，系和平谈判代表之一。

再审认为，郭维农解放前的反革命罪行实属严重，但属于“对北平和平解放确有贡献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应落实人民政府“既往不咎”的政策，原审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不当，应予纠正，据此判决：（一）撤销本院1953年6月13日对被告人之判决；（二）对郭维农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从此，郭维农的刑事案得到了公正的判决。

郭维农年过花甲，体弱多病，一直在家安度晚年。郭维农说：“现在，国家每月发给工资，政协还给订了报纸、学习资料，每次会议都来通知。我觉得党和国家给了我很高的待遇，我非常满意、知足，我本想多为人民出点力，只是身体不做主儿。”郭维农每天围绕大街走三圈儿，主动锻炼身体，他要多过几年幸福生活，多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大好形势。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 陈子贞传略

赵润东

陈廉，号子贞。1903年出生于房山长沟乡西甘池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天资聪明，自幼勤奋好学。其父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不惜花掉二年学费，领着子贞拜圣人并进私塾念书，这给予贞以后经商乃致

成为长沟地区的商会会长和擅长书画以致成为造诣颇深的民间书画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子贞的父亲早年肩挑杂货挑，走村串巷、沿街叫买，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子贞兄弟姐妹一共五人。大哥陈忠住在山里开小铺，二哥陈效赶牲口驮卖煤，子贞排行第三与弟弟陈明及小妹年幼在家。当时，家境贫寒，无力助读。入冬农闲的时候，便可念书三个月。开春以后，只得辍学随父下田。子贞酷爱读书甚爱书画，学习非常刻苦，加上才力过人，所得知识十分牢固。那时，一般孩子逃学往外跑，唯独他偷空从家逃到学校。就这样，两个冬三月，念了六月书。

之后，子贞在家一方面帮助父亲躬耕垄亩维持生计，一方面偷着学习。他见到什么写什么，遇到不认识的字，写在纸条上，见了识字人就问，别人告说了，他就深深地记在心里。这样过了好几年。在他二十来岁的时候，常常与邻居伙伴儿到上方山一带，攀山越岭，割荆砍柴，即使这样，他仍然不失学习的机会。

大哥陈忠在上方山下开了个小杂货铺。平日里代销些油盐酱醋，日用杂品，到秋后便收购山货土特产驮天津贩卖。后来，子贞就来到哥哥的小铺里当了小伙计。

起初，子贞念书识字，之后便又爱上了字画。没有纸笔，他就用削薄的竹板能在哪儿画就在哪画，看到哪有碑文字体，就仔细斟酌习练。真草隶篆，无不效仿，上方山下圣水峪村方圆三四十里几十户人家，每逢过年都要买几张纸裱糊门窗。大哥陈忠通常在此之前购进纸张供各家购买。这年临近年根儿，他又购进一领粉莲纸。过了一段时间纸就没了。

一天，陈忠携带好友张宗元回到小铺儿，一问子贞，只卖了五张纸。再一细打听，村里家家都有子贞作的字画。用竹板儿写字作画，这是陈子贞的独创。张宗元当时得知后，颇感兴趣，并提出非当场作画不可。子贞兴致顿起，当场作画，在场人无不拍手称赞。小铺儿里的一领粉莲纸就这样都给子贞练了竹板儿字画。

陈子贞的字画流传较为广泛。房山境内的文化事业部门和喜好书画的人，大都存有他的墨迹。

他的书法浑厚有力，各种字体工整而不呆板，他的绘画风格独特，国画工笔，线条清晰，布局别致，画面完整。无论人物、山水、花鸟草虫，细入毫发，形神毕现，其象征寓意，无不细腻传神。

他的字画一笔虎，构图新颖别致，点字头为一猛虎威严地蹲卧在峭崖之上，虎视眈眈，纵观旷野；其后便可顺着峰顶蜿蜒而下，经过九曲嶙峋的小径便可一泻千里，象急流、象瀑布，又似雄劲的虎尾。整个画面形象逼真，耐人寻味，正可谓“威镇乾坤”。

最为上好的作品要属他的八破图。所谓八破者，乃八物残损之形象也。其中有仿写在书籍字贴之上的真草隶篆字体，有画得真伪难辨的人民币以及工整清秀的印刷字体。那些构图各俱姿态，透视清新，古朴典雅，叠摺有致。那相互掩映的书页、书脊，纸张中间，被磨损被焚烧，被戳穿者，形象真切，唯妙唯肖，真乃是：“红黄蓝白黑五族共和，真草隶篆四体字花卉四秀”。

此外，还有百花齐放图，富贵长寿图等。其法为，从上到下，从小到大，四字依次相叠，黑白相间，字体严紧而富于变化。再下者，另有梅牡菊莲鸟虫相衬，神采匀细秀雅，独运匠心。据说，前此年，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访华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曾对陈子贞的字画大加赏识，可见子贞书画艺术造诣之深。

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华北大片领土，同年9月，占领房山城。他们烧杀抢掠，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房山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没有躲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蹂躏。

在这同时，以陈东来、白秀亭、胡振江、郭志等为首的各路土匪纷纷起来，活动于房山西部山区及涿良一带。这支队伍发展很快，仅两三个月时间，队伍就扩大到数千人。他们搔扰日寇，也搔扰百姓。

陈忠惧怕土匪司令砸抢铺子，于是就准备了一桌丰富的酒席送到山上犒劳。平时陈忠又多方维持各路土匪司令，因此，总司令陈东来特地发他袖章作为标志。这期间，没有遭到过抢劫，也没受到过欺辱，而且每到一处关卡都畅通无阻。

此时，三十三岁的陈子贞已经成熟。弟兄分家之后，他不再给哥哥小铺当伙计。于是下山，独立经营，

在长沟镇上开办了小铺，字号为“华贞号”。开始，主要经营破烂买卖(包括旧衣服，旧的日常用品)。这些破旧东西来源于北京，花钱不多买来，销后可以从中赚一笔钱。拿着这笔钱，再进京采购，回来再销售。日久天长，循环往复，小铺子买卖兴隆，越搞越红火，以后所经营的货物不断增加。没有多久，“华真号”的日营业额就达五六百元之多，居镇中同行业之首。在铺中经营的人员除年集忙时雇人以外，均由家人(儿子、儿媳等)担任。长沟镇，是房山城西南最大的一个集镇，它东临涿州，西通张坊以至河北易县。早先，这里茶馆酒店鳞次栉比，来往客商，昼夜不息。那时，到这里赶集上庙的人有的要走百八十里路。因此，长沟既是方圆数十里的贸易中心，又是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口。

陈子贞在此经商的时候，镇上驻扎着日本一个中队，中队长为小次目，过往行人，都要受到搜查盘问，一有可疑便可逮捕。

一天，一个日本翻译官来到子贞家中。说是小次目有请。子贞明知危险，但又无法推辞，只得随之而往。到了小次目跟前，通过翻译官的翻译得知，小次目的邀请只为绘画之事。子贞回家后画了“八破图”以及竹板字画，由翻译官转送日本中队长小次目，小次目收到字画，对中国普通平民的绘画艺术深感惊异，当即令翻译官回赠子贞现大洋五十块。子贞拒不接受，而翻译官又苦于回去无法交待，只得带子贞来到小次目跟前。小次目看子贞不受钱财，便问他需要什么。子贞讲要一个通行证。当下，小次目给陈子贞开了一个通行证，从此以后，陈子贞借着这个通行证可以出入于房山各地，往返于北京城郊。

1942年至1943年，是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时期。当时，西部山区的游击队与八路军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扼制和歼灭敌人。日寇为了疯狂“扫荡”，对根据地实行严力封锁，给根据地军民造成很大困难。这时，陈子贞已成为长沟商会会长。他借着通行证，曾给平西根据地运送过大量的盐、布、鞋等，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这在当时确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解决了一些问题。

解放后，根据党的商业政策，陈子贞的“华贞号”铺子被改为公私合营，子贞为私方经理，后来，由长子陈万清代为经理。

“文化革命”开始后，陈子贞因被称“资本家老板”之名而被抄家、游斗。他的妻子及子女也受到牵连。之后，他被下放到本村及水头村劳动改造，时达十年之久。“文化革命”后，党的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子贞恢复工作，追补工资数千元，但因年纪过高，退休回家。陈子贞在高龄八十四岁时，仍然不减当年。他能从左右两侧骑上自行车，奔走于房山、良乡各地。不幸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已经过早地去世，这给他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后来他一直作书作画，所到一处，无偿赠送，以此来补偿丧子之苦，幸福地度过晚年。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 老英雄蒋维平传略

宋成明

兵农礼乐般般会，手脚心神件件优；  
九州踏遍归玄圃，花果山中一老猴。

这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建国后全国政协副主席)谢觉哉，在1944年9月1日赠给蒋维平的诗，

赞扬他的非凡能力和功绩。

1938年3月,六十岁的蒋维平,参加了革命,同年五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年逾花甲,奋勇抗日。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的整风和大生产运动,荣获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称号,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嘉奖。1947年,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分院副院长。1951年后,他历任察哈尔军区直属医院、华北军区卫生部张家口医院、北京军区陆军医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国防部授予少校军衔。1960年授予中校军衔。他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并以高明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为部队战士和工农群众排忧解难,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崇敬。

### 戎马转战 夙愿得偿

蒋维平,原名蒋顺发,别名姬宾礼,北京房山石楼村人。他1878年生,七岁开始在石楼村拾柴拣菜,十五岁在河北阜城县庆和成估衣铺学徒。十六岁开始在阜城县东南关当了四年长工。苦难的童年,艰辛的生活,迫使他谋求摆脱贫穷和受压迫的地位,同时也磨练了他的坚强意志和倔强的性格,他开始思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897年2月,十九岁的蒋维平认为从军可以救国,就来到满清政府李鸿章部下,从军十五年,当过勤务员飞班长、教官。李鸿章卖国求荣,民众群起攻之,蒋维平对其深恶痛绝,便从部队逃脱,另择出路。1911年4月,他与二站村程德贤结婚,生有一女。1912年7月,他来到袁世凯部下,从军八年,在保定、长春、宣化陆军第三镇当过连长、副团长,袁世凯崇洋媚外,实行军事独裁,在人民群众的唾骂声中被赶下台,蒋维平因殴打骑兵一旅一团团长,被开除军籍。1920年8月,他又来到段祺瑞部下从军八年,在长春、宣化任骑兵副团长、团长,因东北军军官易职、缩编,边防军解散,在1929年2月,回到家乡石楼村学医务农。

在军阀混战的日子里,蒋维平成马生涯三十二载,转战南北,东拚西杀,历尽千辛万苦,却没有找到救国的出路。蒋维平伸张正义,对社会上不平之事,常打得头破血流,以理取胜,国民党当局也怕他“捣乱”,不敢收留他。他回到农村就医务农,从此获得新生。

他在石楼村办起了红十字会,建立了医务室和药房。贫苦的农民就医用药,他少要钱甚至不要钱;地主豪绅来治病,就让他们多掏腰包。

1935年春,他去通州潞河中学教会组织参加活动,和正在这里宣传革命道理的北平地下党员李向前相识。通过交谈,蒋维平知道李向前是东北的大学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为杀了七名日本兵,而来到北平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两人志同道合,亲如手足。从此,李向前常到石楼村蒋维平家,共谈革命形势,共商救国大事,常常谈得通宵达旦。蒋维平在李向前的启迪下,萌发了革命思想。通过李向前的联系,从南京的金陵大学和农科院引进技术和资金,在村里办起了观摩会。组织农民生产自救,观摩农业技术,展览农业成果,放映无声的农业生产电影,实行生产奖励,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他还组织人力、物力,在石楼村东的涝洼地里,挖沟排水,植树造林,使这块百亩农田由过去十年九涝,变成年年丰收。他还参加指挥治理防洪河道工作。

为保护农民的利益,他坚持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在村里建立了自卫团。他专跟地主豪绅要钱要粮,给自卫团购买了火枪、扎枪、大台杆等武器。他组织自卫团成员扛着枪,臂戴袖章,坚持到野外操练。自卫团发展到三百多人,声势很大。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房山地区。1937年9月,日军占领了房山县城及石楼、二站等村庄,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二站教堂惨案。在教堂避难的数百人,有八十多人遭到月军的杀害,教堂神父被杀死后,蒋维平挺身而出,自任神父,建立难民收容所,组织难民自救。这年冬季的一天夜里,驻在娄子水

村的地方武装头子胡振海派十二人，把蒋维平的家砸了，把程德贤打了，把蒋维平抢到了姜子水村。知道蒋维平是外科医生，让其充当“军医”。蒋维平看到胡振海的队伍纪律松弛，胡作非为，决心离开。几天后，他携家眷到霞云岭乡的杏黄村程德贤的亲戚家避难。胡振海派人每天三番五次地搜查和骚扰，使他的一家人提心吊胆，不得安身。

1938年3月，中共房涑涑联合县游击队长包森来到南窖，开辟抗日根据地，蒋维平得知这一情况后梦寐以求，便让女儿蒋淑环写了份申请书。申请书写到：“为抗日救国，我志愿加入八路军。”他把申请书揣在棉袄大襟的里层，弃家携妻子蒋志刚，冲破日伪军的层层封锁，冒着生命危险，父子一同找到包森，参加了革命。

六十岁的蒋维平，怀着抗日救亡的热忱，毅然地参加了八路军，1938年5月，由傅伯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中，有的人隐居，有的人退避，甚至有的人慑于日伪军强势，叛变投敌。而蒋维平虽年事已高，但他还是迎着激流，勇敢地冲上前去。他多年的救国夙愿得偿，内心激动，豪情不已。

### 开荒有功 评为英模

参加革命后，他开始在南窖包森支队卫生院当院长，后来到抗日救国会工作，曾任房良联合县九区救国会主任。同年10月，他将自己的医疗器械交给驻军，随部队奔赴延安，来到陕甘宁边区一二〇师三五九旅。

1940年3月，蒋维平随部队驻防在陕西省米脂县少为解决边区缺医少药，他到处收集民间验方，跟当地群众广道，爬山涉水、到深山老林中采集中草药。他每天早起晚睡，钻研医学，研究配制药品，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治好过病，为部队战士和当地民、众很多人治好过病，深受战士和民众的欢迎。部队转移时小，当地群众执意挽留，不让蒋维平走，《解放日报》为此连续发稿鸣谢七天。同年10月，三五九旅王震旅长奖给他一件裘皮大氅。

1942年，六十四岁的蒋维平，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前往南泥湾、九龙泉开荒种地。1943年10月，蒋维平被任命为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农场场长。在他当场长期间，处处以身作则，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脏活、重活干在前，跟年轻人一块开荒种地，他运用多年的务农经验，精心操作，严格管理，带领全场职工实干苦干，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农场获得丰收，上交余粮四千八百石。1944年，蒋维平被评为三五九旅及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参加了延安的群英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嘉奖。以后，他连续担任过察哈尔、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队、生产总社、农场家属学校等领导工作，成绩显著，被选为劳动模范。在1950年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

### 医德高尚 医术高明

1947年2月，蒋维平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分院副院长。1948年8月，第一分院划归为华北第一后方医院。这时，蒋维平已年逾古稀。党组织劝他休息，养好身体。他执意不肯，并坚决要求到山区工作。经他一再请求，党组织批准他继续留在部队，可以留胡须。从此成为部队有名的“胡子兵”。1948年底，他来到张家口地区，任察哈尔军区政治部抚保科副科长。1951年后，历任察哈尔军区直属医院、华北军区张家口医院、北京军区张家口陆军医院及二五一医院副院长等职，他不以官居，不以老居，不以功居，仍然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为部队战士和当地民众就医治病，排忧解难，竭诚奉献。

蒋维平对常见病、难治病均亲自作配方和治疗试验，效果都比较好。他自己花钱配药制药，经常工作到深夜，配制成丸散膏丹四十多种。他配制的碘化亚铁和陈皮糖浆，对治疗结核病有特殊疗效，因此向他求医

索药的人很多，他都有求必应。部队战士李庆平，患了淋巴结核久治不愈，经过蒋维平仔细观察，精心治疗，服用亲自配制的药，很快治好了病。铁路工人刑明的儿子邢春生患骨结核两年多医治无效，找到蒋维平后，蒋维平亲自医治，邢春生很快恢复了健康。

蒋维平的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当选为张家口市人民代表，在部队和乡村远近驰名。很多人给他写信，他每天要接到一百五十多封来信，这些信，有的来自遥远的边疆，有的来自海防前线，有的来自长白山林区，有的来自柴达木盆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中，除了表示向他学习外，有的向他汇报思想飞工作和学习情况，更多的是请他治病、索取药品和要张照片。他接到来信，都一一回信，不负众望。他有时白天没有时间，就晚上复信。他每天还要接待很多来访者。有时他在开会，门外也有很多人等他，但他不顾疲劳，对来访者总是热情诚恳，让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有一次，他已经很劳累，还继续接待采访者，不慎把腰扭伤了，别人劝他休息，他坚决不肯，他说：“不能只顾自己，要为大家着想。”直至接待完。他虽然年迈体弱，但是他还风雪无阻地亲自登门送药。

他每天接待来访者，给求医索药者付药、寄药、复信等，工作很劳累。然而面对紧张、繁忙的工作，蒋维平老当益壮，英雄本色不减当年，他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医院党委为照顾他的身体，减轻他的负担，经研究决定，由打字员耿印聪统一印制复信，X光室姜炳良统一制作照片，药房统一配制药品，满足来信来访者的要求。

蒋维平热爱战士，在张家口陆军医院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有的战士生活有困难，他就拿出自己的钱救济；有的战士复员无法安置，他就留在自己家中。战士于振江喂猪时，不小心手指头被猪咬掉，复员安置没着落，他就收容到自己家里。战士许才复员安置无家可归，蒋维平就把他引进到石楼村居住，并给他娶了媳妇成了家，使他安居乐业。

1954年，华北军区政治部为了表彰蒋维平的模范事迹，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老英雄蒋维平》纪录影片，在全国放映，影响很大。他的崇高品德，大家赞不绝口。

### 革命传统 代代相传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蒋维平的一贯作风。他担任陆军医院副院长后，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南泥湾精神，并且身带言传，教育青少年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在医院里，每天都起得很早，在院内种花种菜，他种很多羊红花、兰花，还种了西红柿、辣椒。他的勤奋一举三得，美化了环境，增添了中草药和蔬菜，改善了伙食。他在南泥湾开荒种地时使用的一把镰刀和一把九齿耙，一直保留着，还年年在他开辟的菜园里使用。他身穿的一件棉背心，还是在南泥湾时自己亲手做的多他的被子也是供给制发的。他常说：“现在生活好了，也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本啊！”

蒋维平过继的儿子蒋志刚参加八路军后牺牲了，1952年，他又过继了个孙子蒋镇。蒋镇结婚时，婚事由蒋维平主持操办，办得非常简朴。结婚那天，没有摆酒席，也没有大请宾客，只是亲戚朋友家来人吃顿小米饭熬白菜。抽烟是他平常抽的八分钱一盒的绿叶牌香烟，他为了鼓励孙子和孙媳妇积极劳动，在结婚仪式上，给买了两把锄头，两把镰刀，供他们劳动使用。

在张家口地区，大家都知道他是陕甘宁边区的老英雄，南泥湾的劳动模范。因此，请他作报告的单位很多，幼儿园小朋友请他讲故事，中小学学生请他讲革命斗争史，工厂、农村、机关的青年团员请他讲革命传统，他一都是有求必应，而且是场场座无虚席。

1952年，从抗美援朝战场上抬下来的伤病员，送到张家口陆军医院治疗。有的伤病员自以为有功态度蛮横，在医院里经常吵闹、打架飞抢物品、砸器皿，甚至殴打医务人员，谁也不敢惹。蒋维平站出来作思想

工作，给他们讲党的光荣传统，进行艰苦奋斗教育，跟他们的代表谈判，蒋维平一出面，问题就解决了。他威信很高，说话办事大家都信服。

### 慷慨解囊 支援家乡

蒋维平生活克勤克俭，处处节约。用自己节省的钱，一部分用来配制医药，送给当地和家乡的群众治病；另一部分用来支援家乡农业生产。1952年底，家乡石楼村办起了农业生产初级社，1956年发展成高级社，入社的有九十多户。当时农业社资金匮乏，他就将自己节约的薪金，两千元送给了家乡，农业社用这笔款买了两部双轮双铧犁、四架喷雾器、一匹马、建设了三十亩桃园，一百二十亩苹果园。还买了理发工具等，支援了家乡的农业生产。他还赠给张家口市郊区东窑农业社一千元，用于发展生产。家乡和东窑乡人民至今还广为传颂。

蒋维平跟家乡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他长年在外，有时回家看看。每次回家，他家都门庭若市，亲友满门。他回到家，总要到庄稼地走走、看看，还在地头上坐下来，跟青年人促膝谈心，给他们讲革命传统，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农业劳动，勇于克服困难，建设好家乡。他的模范行动和亲切诚挚话语，对青年人给予了鼓舞和力量，愿为家乡的建设多出力、多流汗。执著追求年花甲，为国为民献终身。蒋维平参加革命二十六年，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正确的方针政策，就像磁铁石一样，紧紧吸引着他，给了他方向，给了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他在党的铁一般纪律的约束下，为党的事业献终身。

1964年7月12日，噩耗传来，蒋维平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在张家口二五一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北京军区、张家口地区党、政、军领导为蒋维平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工农兵群众一千七百余人冒雨参加公祭，送灵车队长达五华里，沿街送灵群众近万人，蒋维平的灵柩安放在张家口市烈士陵园。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 房山的一代名人高克恭

戴家斌

一句“僧推月下门”，翻来复去地讲了一千多年，足以证明贾岛是房山人民的骄傲。但另一位住房山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很有地位的名人，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人就是以“房山”为号的元代著名画家高克恭。

高克恭，字彦敬，号房山。生于公元1248年，卒年不详。祖先是西域维吾尔族人<sup>①</sup>，后占籍大同（今山西省大同市），晚年住房山，官至大中大夫刑部尚书，故而史称高房山或高尚书。他官位显赫，但政绩平平，甚至连《元史》中都没有他的传记。但他钟情于湖光山色，精于书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日下旧闻考》中说：“高尚书画在元时推为第一。”临川危素赠诗云：“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铁纲珊瑚》一书中说：“高尚书彦敬，西域人，善画，青山白云，甚为致远。诗亦有唐人意度。有绝句云：无限红尘随马足，春光更比路人忙。”《房世县志》介绍他说：“其先西域人，公家房山，仕元官至刑部尚书，博学能文，善画寒林墨竹，赵魏公、虞文靖公多称之。”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高克恭在诗画上造诣精

绝，知名度甚高。但他虽官位显赫，却政绩平平，仅留下一个刑部尚书的虚名而已。

高克恭生于南宋末年，早年学习南宋著名画家米芾的山水画，但他又从米氏山水画中得到启发，并将米氏山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米芾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从人生如朝烟暮雨的悲观的佛教观念出发，一反宋代宫廷画派的刻板、工细的绘画风格，而用大、小墨点来点染山水，使画面产生一种虚无缥缈的艺术效果。高克恭则在这种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水墨吞吐，云烟出没之妙一洗而为翠滴玉流，青山白云之奇，从湖山清晓之景，一转而写夜色微茫之胜，阴晦明晴，千变万化，独剑一格”（近代画家张翼人语）。故而，高克恭的画被人称为“一代奇作<sup>②</sup>。”元代著名画家文征明说：“南宫已矣壮矣死，百年惟有房山耳。”认为南宋画家米芾（南宫）和五代时的画家董源（北苑）死后，只有高克恭才是百年少有的大画家。这个评价虽然有点夸大的成份，但却也说明高克恭的巨大艺术成就。

高克恭才华横溢，喜好杯中物。他每遇酒酣兴发，或好友在前，他则随兴研墨挥毫，凭借酒后的豪情，随意挥洒。这样的即兴之作，虽丹青妙手也难以临摹。他性格孤傲，不善与人交际。对于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淡然处之，但只要他认定为知己，则肝胆相照，一诺千金，终身不疑；若遇感情不合者，虽达官显贵他也不屑一顾。他的好友邓文原在介绍他说：“公性极坦易，然与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则倾肝鬲与友，终身不复疑贰。公在杭，爱其山水清丽，公退，即命童絜榼携杖履，适山中，世虑冰释，竟日忘归。尝见公作画时，虽贵交在侧，或不暇顾楫，有讥其简傲者，久乃识其真。浙右多豪门大族，或飞语污公，公亦不为弃。暨北归，行李无长物，贷与人而后具舟费<sup>③</sup>。”堂堂一位刑部尚书，徒“多豪门大族”的江浙辞官北归时，靠典卖行李来付车船费，这种清贫的生活和孤傲的性格，在当时是少有的。

高克恭的孤傲，还表现在他对朋友的真挚上。赵子昂是他的好友，同时也是当时的名画家。曾写诗称赞高克恭说：“高侯胸中有湖月，能照山川尽毫发”、“最爱尚书山水，绝与画史离群”<sup>④</sup>。对于朋友的称赞，高克恭却毫不谦虚地回敬道：“子昂写竹，神而不似，仲宾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比两君也<sup>⑤</sup>。”赵子昂是翰林院学士，官封魏国公，又是宋太祖的十一世孙，皇室的后裔，而李仲宾官拜集贤殿大学士，吏部尚书。他们两人都是高克恭的好友、同僚，而且在书画上的造诣都不在高克恭以下，但高克恭却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在画竹上不“神”、不“似”的缺点，并自称自己具备他们两人“神而似”的优点。这里，没有丝毫文人相轻的讥讽，而是他坚持自尊的孤傲性格的表露。

元代是一个多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元世祖灭宋统一中国以后，把全国人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这四个等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不平等的。同时，元代社会又将社会各界人分成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比娼妓都不如，排在“臭老九”的地位上。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使人民只能从虚幻的来世去寻求精神的安慰与寄托。同时，经过了多年的战乱和残杀之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希望得到一个较为安静的环境。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元朝统治者有意识地保留了原中原地区的封建制度，同时在宗教上实行宽容政策，在大力提倡儒学的同时，允许各民族的宗教存在。因此，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宗教都在各族人民中得到发展。高克恭是西域人，信奉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属于第二等级——色目人，但他又是属于“臭老九”之列的知识分子、（当然与政治地位低下的一般儒生不同），因而，他一方面高官显爵，当着刑部尚书，另一方面又同普通老百姓一样，在迷茫的宗教气氛中去寻求精神上的安慰。这种矛盾的心理，可以看作他学习并发展表现朦胧意识的米氏山水的思想基础。同样，他这种心理，是否也是形成他钟情于湖光山色，嗜好杯酒，不喜交际的孤傲性格的原因呢？

据《房山县志》记载，高克恭晚年居住房山，死后葬在房山城关羊头岗下。明代时曾有不少文人墨客专程探访，但“土人已无知其处者。”可见，明初时高克恭墓就不存在了。这是出自民族的义愤还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设想，如果高克恭墓尚存，那怕只有一块断碑，一垅土丘，那么它且不是如贾岛墓一样，是房山的又一文物胜迹、旅游景点？

高克恭墓已成为历史了。但高克恭与贾岛一样，是房山文化史上的又一名人，是房山人的骄傲，我想是不会有疑问的。

注：

①高克恭的祖籍，各史籍说法不一。《天府广记》说“其先自西域来，侨居房山”。《铁网珊瑚》、《图绘宝鉴》、《中国人名大辞典》均依此说。《中国画家大辞典》说“其先回鹘人”。1983年十院校编写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上说：高克恭“其先畏兀人，后占籍大同”。“西域”一词太笼统，而回鹘和畏兀人均为维吾尔族人的古称。现依《中国古代史》所说。

②《清河书画舫》

③④张翼人《李衍与高克恭——元代画家杂谈》

⑤《中国画家大辞典》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 锄奸英雄于振边

王庆宽

于振边烈士，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闻名平西房良、昌宛两县，战功卓越的锄奸模范、抗日英雄。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但他机智果敢、克敌制胜的动人事迹，仍在平西广为流传。

—

于振边，1921年春生于房山县大安山村一个农民家里。父亲于怀水，心地淳朴善良，靠种几亩薄坡地和给人当雇工，勉强维持全家生活。母亲赵晓环，生育一女一男，终日含辛茹苦，勤俭过日子。于振边自小憨厚诚实，少言寡语，但很聪慧，志坚心耿，喜善交友，见义勇为，帮助弱小，年龄大小差不多的孩子都愿意同他一起玩。1932年，振边十岁时，在本村小学读书，以私塾为主，也学些国语、常识等。在读书期间，勤奋好学，总是考第一。1936年振边小学毕业，由于生活所迫再也上不起学了，只好在家劳动。尽管自己和全家人用尽了全部心血，付出了繁重的劳动，但还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肚，而本村的地主老财身不动，膀不摇，却个个吃得肥头大耳。振边对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愤愤不平，但闹不清这是为什么。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于1938年春季来到房山五区南窖、大安山一带，接着又成立了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府派工作人员到大安山村宣传抗日救国、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号召“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共同抗日。振边听了宣传，明白了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八路军，闹革命，打日本。村中成立抗日救国会、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于振边被推荐为儿童团团团长。自此以后，于振边成为大安山村的抗日骨干，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宣传教唱革命歌曲，整日忙个不停。

1939年春季，于振边任大安山村公安员，这时，房良联合县五区公所迁到大安山村。振边感到自己

责任很重，为搞好治安，总是深入细致地了解情况，调查敌情，安排岗哨，巡逻检查，一丝不苟地工作。

1940年3月，于振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二

大安山村位于百花山的东南麓，是个风景秀丽，环境幽静的深山区，这里有丰富的优质煤炭资源，日本侵略者对此早已垂涎三尺。

1940年秋，敌人对大安山地区进行疯狂扫荡，并建起据点，长期驻守。日寇占据大安山地区之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振边目睹日寇的桩桩暴行，义愤填膺。经与村中青抗先队长王锡瑞等四人商量，决定弃家出走，去找共产党。于振边离开新婚不久的妻子，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攀着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找到了昌宛县四区政府（1940年秋，大安山一带由房良县划归昌宛县管辖），参加了工作。不久同去的四个人，一个思想动摇回了家，一个被父亲死说硬劝离了队，而于振边却立场坚定，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越来越坚决，越来越勇敢。大安山村维持会长张清海想利用他父亲于怀水把于振边拉回家去，他们把于怀水找到维持会，进行威胁利诱，说：“于怀水，你如果把于振边叫回来，要钱给钱，要官给官，如果不回来，就饶不了你全家……”。于怀水被迫去找儿子。在宝地洼村的山上见到了于振边，振边见父亲来了，热情接待，问长问短，又问：“您到这来有什么事吗？”于怀水吐了实情，说：“振边，你跟我回家去吧，不然日本就要杀咱全家呀！”振边一听就火了，掏出手枪来指着于怀水说：“这么说是日本叫你来的，你当了汉奸了。”要枪毙自己的父亲。在同志们的劝说下于怀水回了家。振边和同志们一起，披荆斩棘，继续战斗在抗日斗争的前线。

### 三

1941年春，昌宛县二区为开辟大安山，霍村、胡林一带的地区，成立了游击小队，政委杨怀清（区委副书记兼）、队长董春营，于振边以区公安员的身份，也编入了区游击队，并参与游击队的领导。区游击队成立后，于振边和队员们在一起。风餐露宿，夜行日伏，锄奸捉特，游击敌人，活跃在大安山、煤窝、霍村、胡林一带。

于振边，外号大个子，体魄健壮，胆识过人，并且有谋略，善用人，是游击队的好参谋。他遵照“打击首恶，争取胁从，感化无知，团结群众，分化瓦解，孤立敌人”的原则，在锄奸捉特、打击敌人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941年到1944年春，先后捕杀了叛徒、特务、汉奸十五人，威震敌胆，并在了解敌情，作伪军统战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当时，在昌宛县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山下怕何端，山上怕振边”（指日特汉奸）。于振边被评为昌宛县的锄奸模范、战斗英雄。

### 设伏兵，活捉叛徒张明太

张明太原是西苑村农会主任，共产党员。日本占据了大安山地区以后，他认贼作父，叛变投敌，给日本当起保长来，帮助敌人侦察我军政人员活动情况，告密杀害我西苑村民政委员王喜怀；为敌人筹粮捐税，敲诈勒索，坑害百姓，民愤极大。我曾多次警告他改邪归正，但张明太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利地与人民为敌。西苑村是我根据地通向大安山的交通要道，不除掉张明太，我区游击队去大安山地区活动就很困难。

1941年7月的一天，为除掉张明太，于振边率领几名队员，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山越岭，来到西苑村，埋伏在张明太住所周围。振边只身进前探听，张明太没在家，有些失望。但又想：“这小子可能是怕捉

他不敢在家住，天亮就会回来。”决定继续埋伏等他。天亮了，张明太果然骑着马从大安山村回来了，还一边走一边喊：“各位甲长听着，今天要把粮食收齐，给皇军送去，谁不送皇军就要谁的脑袋……”张明太得意洋洋，刚一迈进自己的家门，于振边一马当先，几个战士紧紧跟上，将张明太捉住了，把他捆绑上，准备带走。但张明太深知自己的罪恶，怎么也不走，拖着拉着也是耍赖，最后用枪托将他打死在西苑村。八路军处决张明太的消息传开了，群众为之欢欣鼓舞，对各村的汉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 入虎穴，剪除汉奸张清海

张清海是大安山村的反动富农，封建把头。1940年日本占据了大安山之后，就一头扎在日本怀里，当了铁杆汉奸。日本人见他摇尾乞怜，处处忠于皇军，就委任他当了大安山乡维持会会长。张清海当了会长以后，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抓捕杀害我区村干部和党员。先后杀害了宝地洼村村长、党员杨连通，元港村村长、党员安守邦等多人，并敲诈勒索百姓，无恶不作。于振边决定将罪恶累累的张清海除掉。张清海非常狡猾，他听说于振边要捉他，便加强了防卫，并搬到于振山的小院去住。大安山村是日本居住的巢穴，村的周围布满了炮楼和岗哨，戒备森严。于振山的小院居于大安房村中，院墙高，门户紧。张清海搬进去以后，又进行了加固，并安排了警卫。

如何才能捉住张清海呢？1943年3月，于振边进行了侦察研究以后，提出了具体方案。他找了西苑村王荣英（王老五）和赵亩地村赵广弟两名地下游击队员，交待了具体捕杀方案。王、赵二人依计而行，化装成当伙子的，白天进入大安山村隐蔽。深夜来到张清海住居的小院跟前，王荣英蹬着赵广弟的肩膀，攀上院墙，跳进院内，又接进广弟，二人拨开张清海的屋门，一跃进入屋内。当时张清海正端着烟枪吸鸦片，王荣英手持宰猪尖刀，对准张清海的胸膛猛力刺去，张清海毙命前突然一挺腿，脚蹬在王荣英的身上，刀尖滑破了王荣英的手腕动脉。二人见张清海已死，王荣英捏住流血的手腕，火速出村，胜利而回。敌人得知张清海被杀的消息后，惊慌失措，虽沿着血迹追来，但我早已转移。除掉了张清海，民心大快。但此事进一步激怒了日本，悬赏一万元，到处捉拿于振边。

### 引蛇出洞，捕杀伪自卫团长宋德福

大安山村宋德福，搜集我党我军情报，为敌效劳，是个日本特务。1942年秋后，被敌重用，又当上了大安山乡自卫团团团长。自此以后，他更有恃无恐，抓丁抓夫，敲诈群众，民愤极大。区公安员于振边曾派公安员赵国荣多次去做他的工作，但毫无成效，因此决定除掉宋德福。但宋很有“本事”，警觉性高，蹲在团部不轻易出来，捕杀他很难。

1943年秋，于振边带游山队来到苑港村，决定利用肖士儒与宋德福的关系，引蛇出洞。肖士儒在苑港村有双重身分，是我们的中队长，又是敌人的自卫团长，是宋德福的盟弟，宋对肖信而无疑。正好宋德福写来了一个条子，叫肖士儒给自卫团送些土豆，并到大安山去一趟。这个情况转告了于振边，他决定马上做肖士儒的工作，叫肖士儒把宋德福引出来。于振边做通了肖士儒的工作以后，二人商定了引蛇出洞的计策。第二天肖士儒依计而行，到了大安山自卫团团部，找到了宋德福，说：“大哥，找我有事吗？”“我想把我今天由苑港村下来时碰到的一个情况先告诉你，不知该不该说？”宋说：“什么情况，你就说吧，咱们哥俩还有不该说的事。”肖说：“今天我下来见大安山村北控石坡羊圈房里有个八路军，可能是病了，在那躺着。”当时日军已下了悬赏捉捕八路军的命令，捉到一个战士六百元，宋见有得赏的大好时机，就随肖士儒一起出了团部。走到村北的芦子地，提前化装埋伏好的游击队员一拥而上，活捉了宋德福，将其捆上，拉着他直奔北

港沟走去。经过审讯之后，将宋德福用石头砸死在北港沟中，为民除了害。

### 拉出来，打进去，在敌伪中建立关系

于振边模范地贯彻执行了“拉出来，打进去，瓦解伪军，动摇敌人”的政策。1943年秋，于振边组织赵么地村的民兵赵广宪、赵国安同他一起过大安山村西头岗楼上去摸岗，抓舌头。天还未亮，乘伪军换岗的间隙，二赵去摸岗哨，于振边在外掩护等候。换岗的伪军刚一来，即被我突袭捉住，将他带到龙头村。这个伪军叫许士斌，于振边问他：“你认识我吗？”“不认识。”“我叫于振边，他是我们政委杨怀清。”许士斌一听于振边的名子，吓得屁滚尿流，立即跪倒在地，请求饶命。于振边却和颜悦色，安慰说：“快起来，不要害怕，咱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为非作歹，我们决不伤害你。”并向他讲明了当前形势和政策。许士斌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提供了敌伪情况，并表示今后要立功赎罪。不久，于振边又组织西苑村的民兵，巧计活捉了伪军郭永顺。这个人抄过杨怀清的家，有罪恶，被捉以后认为活不了，所以怎么也不开口。于振边耐心地向他交待党的政策，只要弃恶从善，改邪归正，我们可以不记前仇，不咎既往。郭被感动得流下泪来，终于开口谈了详情。放他回去后，偷偷地到杨怀清家赔礼道歉。这两个伪军，以后成为我们的内线。

1943年冬，于振边去煤窑一带打游击，结识了煤窝村日本岗楼上的钵衣张进通(伺候日本人的中国人)。张进通是张家村人，振边见他有民族气节，就与张家村党支部商量，做他的工作，与他建立了关系，成为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于又与张定计，内外呼应，拿下了这个岗楼。过了几天，于振边带游击队围打这个岗楼，张进通在岗楼内偷偷将准备好的毒药放在饭里，想一下把十二个日本兵全部毒死。偏偏用饭前小队先盛了两碗饭去喂狼狗，把两条狗毒死了，事败未成。张进通已不能在岗楼内再呆，于振边先将其父母和全家接出转移后，又设法将他接走。张进通正式参军，战斗在抗日前线。

### 掩护同志突围，振边壮烈牺牲

1944年3月，宛平县政府派公安科科长王再田带领手枪队十余人到大安山一带开辟工作，二区民兵大队长杜凤鸣和于振边等率民兵和游击队密切配合。3月6日在黑龙关下边的公路上，伏击了大安山伪军队长尤茂之以后，晚上回师大安山，驻在中山村。

中山村地势险要，有大安岭作屏障，易守难攻。驻下后中山村支部书记张世许和中队长杨兴广布防了岗哨。七日，王再由让于振边写假报告给大安山之敌，准备把敌人诓出来，在大安岭上打伏击。于振边写好报告，让中山村情报员张志太送去，交给了伪自卫团政治教官杨国栋。杨国栋察觉张志太神色不对，生了疑。对张志太进行审讯。张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叛变说了实话后将其放回。同时，中山村中队长杨兴广也叛变通敌，送去真实情况，晚上，并偷着把岗哨撤了。夜十二点，在我毫不戒备的情况下，日本和伪军共六十余人，绕行小路，对我手枪队、区小队和民兵三十余人，进行了包围。拂晓前，当我集合去大安岭伏击敌人时，已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王再田率队伍和群众顺沟南下突围。于振边想，如果都往南撤，敌人会集中火力截击我们，损失会更大。所以他决定率四、五个游击队员向敌人封锁最严的北面，顺沟而上突围，引开敌人。赵成才不了解于振边的意思，非要拉振边向南突，振边甩开成才，说“不要管我，你向南跑吧！”振边向北突，边走边打。敌人有的认识他，说：“那个大个子是于振边，千万别让他跑掉！”振边冲到水峪村夹湖沟口被敌人打伤了。振边深感伤势重，难以脱险，他马上撕毁并吃掉身上带的绝密文件，又把枪藏起来，然后爬到一块大石头后边。霎时，敌伪军拥在他的身边，杨国栋(其父是日本保长、汉奸，于振边将其捕走，病死在我方狱中)见到了于振边，露出了十分凶狠狰狞面目，命令部下连续扎了于振边七刀。于振边为掩护战友，壮烈

牺牲，终年仅二十三岁。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还有王占勤、杨国臣、李万怀、许小东四同志。

解放后，对杀害我革命战士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惩处。给予振边烈士修了墓，立了碑。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 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典范江石之

宋成明

知识分子江石之原名姜振政，字实泽，曾用名姜时喆。1908年10月15日生于房山县佛子庄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童年因家中生活贫困借钱读书，最后以优等生毕业于通州师范，1932年至1937年曾在顺义、房山、怀柔等地区教书。1938年3月江石之经共产党员、邓华支队联络员包森同志介绍，邓华批准，参加了革命，同年4月2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历任房涞涿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邓华支队民运干事和工作队队长、密平蓟联合县长、游击一、二支队政治部主任、房涞涿游击队长、挺进军政治部总务处长、平西军分区敌工科科长、平西地委敌工部副部长、张家口市政府秘书长兼劳动局局长、察哈尔省政府财委秘书长、工业厅厅长。调地质部门后，任地矿司司长、北京市地质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1967年8月5日因病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江石之参加革命近三十年，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人民高度负责，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勤奋好学，功绩卓著，深受人们爱戴和称颂。

## 与民同心 同仇敌忾

江石之在通州师范读书时，读过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痛恨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32年，江石之在通州师范毕业后，到房山简师任教，曾组织过喜好文学的学生，成立群众性的“文艺研究会”，受到房山县国民党党部的敌视，以“赤色嫌疑分子”被驱逐。在黑暗的旧社会，江石之虽然遭受迫害，但他没有向恶势力低头，反而增强了斗争意志。他团结同乡知识分子郝绍尧、杨春甫、李卓云等一起与国民党反动势力抗衡，坚持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

1927年春，江石之和家乡群众一起，缴了国民党房山县保安队一个排的枪。国民党反动当局为对山区进行经济封锁，派兵到山区查禁食盐，群众已有一年吃不到食盐了，对此恨之入骨。有一次，群众得知国民党派地方武装一个排又来佛子庄查禁食盐，江石之和群众一起，早已做好对他们缴枪的安排。当这个排的匪徒撞入佛子庄庙准备闹事时，庙里道士把钟敲响，全村百姓群情激愤，从四面八方象潮水般涌入庙内，将这个排匪徒包围得水泄不通，这个排全部被缴枪，并把他们全都捆绑起来，痛打一顿。当时群众编歌谣为“民国二十六年，国民党派兵查食盐，查盐的不应当，一人扛着一杆枪，从黑龙关来到佛子庄，到了庙里都缴了枪……”。从此，县国民党武装再也不敢到佛子庄查禁食盐了，大灭了国民党反动派气焰。

## 扩大抗日力量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房山失守,江石之隐居山中,即与本地绅士组织自卫团防匪抗日,并计划由房山联合宛平、涞水、涿县组织四县山区联总会,并已将四、五、八、九区自卫团统一起来,互相联防,共同抗日。

1938年3月,邓华支队联络员、共产党员包森(原名赵宝森)受中共房涞涿联合工作委员会的派遣,带一个几十人的小连队来到房山县南窖地区。江石之带领学生热烈欢迎;江石之与包森取得了联系后,表明了自己要求参加革命和抗日救国的迫切愿望。包森向江石之传授了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任务。江石之积极协助包森改造地方武装,将房山县四区和五区两个保卫团改编为抗日游击队。江石之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找区、村干部和保卫团负责人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通过大量工作,最后将两个保卫团改编为房山县抗日游击队。五区保卫团一百多人,改为第一大队,四区保卫团二百多人,改编为第二大队,从此房山县有了自己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8年6月,江石之随邓华支队挺进冀东,在挺进冀东路上,曾在四海、延庆等地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激烈搏斗。作战中,江石之表现积极、坚决、勇敢,被派任密平蓟联合县县长,在当地开展抗日斗争。

1938年7月20日,江石之担任平谷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团结起来抗日救国,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并对县地方武装保卫团进行改造,改编原平谷县保卫团为平谷抗日游击队总队,共千余人,下设三个大队,委派了政治工作干部;还将原平谷县警察队八十多人改编为县警卫队,负责县政府机关保卫工作。7月中旬的一天,日军从西部进犯平谷,县长江石之亲自指挥游击队第二中队到岳各庄进行阻击敌人,获得阻击胜利。经过江石之积极宣传鼓动,平谷县广大群众增强了团结,抗日情绪高昂。

1938年底,江石之调回平西,任平西军分区敌工科科长,深入到土匪团伙中,作争取、收容和改编工作。

1939年2月,在房山县三流水村,由邓华邀集地方武装头子胡振海、白秀亭等人开会。经过江石之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胡、白表示愿意接受邓华领导,胡振海的部队被改编为游击第一支队,白秀亭的部队被改编为第二支队,各有二、三千人。江石之被任命为两个支队政治部主任。后来,由于日本特务的挑拨破坏,胡、白思想动摇,将江石之扣押。并多次制造枪支“走火”事件,企图谋害他。但江石之临危不惧,抓紧时机对胡振海、白秀亭的中下层人员进行说服教育,动员他们弃暗投明,从事抗日。江石之在胡振海部工作数月,在官兵中有很高的威信。因此,有整批的人员参加游击支队,游击支队迅速发展了一千多人,于1939年底编入挺进军。江石之在邓华支队任敌工科科长期间,深入敌人内部,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政策,瓦解敌军,收容改编土匪部队,扩充抗日力量,为推动平西及房山县革命形势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勤奋好学 廉洁奉公

1938年初至1944年,江石之是在部队工作,主要任务是在平西做争取、收容、改编地方土匪工作,用以扩充八路军,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1945年日本投降后,江石之转入地方工作。他曾在张家口市任市政府秘书长、劳动局长、察哈尔省财委会秘书长、工业厅厅长等职。1966年,江石之调到北京地质局任党委书记兼局长。在北京地质局工作期间,他刻苦学习政治和业务,努力鞭策自己,使自己成为既懂政治又熟悉业务的领导者。青年时期,他读过

马克思传、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及共产主义小册子，写了很多日记和学习心得笔记，在他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北京地质局当领导后，他仍然坚持不懈的学习革命理论，他认为：人要吃饭也要学习，不吃饭肚子饿，不学习脑子空。他不管工作多忙，也利用早晚挤时间看书学习，对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从未间断，他写了十多本学习笔记，联系工作和思想谈心得体会，他的学习笔记曾在地质部进行展览，被地质部评为干部学习标兵。临终前，他还让他的家属给他读报、学习时事政治。由于他坚持刻苦学习，因此，他对革命斗争总保持清醒认识，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

江石之同志在北京地质局工作期间，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他当时半身麻木，肌肉萎缩，行走不便，机关离家又远，按规定他上下班可用公车接送不付车款，但他却坚持按月付车款。他经常出差和下乡，从不吃请，从不让人特殊招待。他掌管过大量财物，却一尘不染。他对己严，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也很严。他的一个侄子从部队转业，侄子、侄媳曾多次找他托关系留在北京城内工作。江石之总是严厉地说：“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需要，分配到哪里，就在哪里工作”。其侄子一家分配到张家口，一直安心工作。

江石之的一个女儿，在农村居住，曾多次写信要求他托老战友关系参军，都被江石之拒绝。他以身作则，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在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是江石之的一贯作风。1953年5月17日，江石之在“五反”运动检查时，他检查了去江西省九江队请吃猪肉的事。这事他本不打算吃，人家硬拉，吃了以后，自己也觉不好意思，自己拿了五元钱，当时就跟工作组说，吃了，给了钱，以后还要检讨。在广州郊外，人家请吃了半只鸡，自己付了一只鸡的钱，另外半只鸡没有吃，就带领同去的同志到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在青岛休养时，一天去洗澡了，山东省地质学院派人给送了一些花生，自己付了五元钱，后来又把钱退了回来。在江苏省地质局，还应请吃了一顿丰盛的宴席。他将这些情况写了一首自嘲诗，诗为：

九江楼上一席肉，羊城郊外半只鸡。  
浴罢东海收小礼，工余南京享大席。  
半推半就风格差，亦步亦趋仿旧习。  
上海八连真好汉，下楼老江洗污泥。

会上念给大家听，大家称赞不已。

江石之一生坚苦奋斗，执著追求，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 忆赵亚平校长二三事

刘振祥

赵亚平校长调离良乡中学已有四十个年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虽没机会再见她一面，但她在良中的许多事迹，至今仍历历在目，发人深省，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 共产党更需要文化

良乡县城 1948 年 11 月解放，良中当即复课。不久赵亚平校长率察哈尔省北岳区第三中学全体师生(简称北岳三中)来到良中，从此党全面接收了这所学校，校名也改为北岳三中，1950 年划归河北省领导，校名为河北省立良乡中学。

解放初期的良中同学包括三中的同学，面对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很多同学急切地要求参加祖国建设，觉得没有再学习的必要了，加之生活困难，因而学习情绪不安，有的在课堂里就坐不住了。师二班王鸿元等几名同学离开学校，参加了我党举办的知识分子训练班。老区来的同学也三三两两走上工作岗位，中二班我们几名要好的同学也酝酿着走，去参加革命工作。

面对着这种局面，以赵亚平为首的学校领导，提出了共产党更需要文化的口号，论断和号召，小会座谈，大会讲解，反复说明共产党更需要文化的道理。赵亚平校长语重心长对我们讲：全国即将解放，新的中国即将诞生，我们不但要全力建设新中国，而且要建设人类最美好最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必须要有大批的有更高的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人才来担此重任，你们还是十几岁的孩子，现在形势已经变化，条件已经允许，目前党和人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你们应该服从党的需要，珍惜这一学习的大好时机。同时对一些生活确有困难的同学发给了助学金，我每月得到了 60 斤小麦的补助，这样在校住宿吃饭不要钱，解决了实际困难。从此，同学们的认识提高了，情绪安定了，绝大部分同学都坚持到了毕业。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同学们的情绪稳定之后，赵亚平校长又向我们同学提出并解决“学习的目的”这一根本问题。

学习的目的，在旧社会每个上学的人大都能对答如流，那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说明了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并认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解放了，共产党领导下一切都在变，我们刚刚被解放的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想知道共产党关于学习的目的是怎么个看法、说法和道理。提到这问题我又回想起赵亚平校长对我们的教育，她是我们认识革命的启蒙老师。

赵亚平校长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类，创造文化的道理，向同学们提问：我们口里吃的，身上穿的，日常用的，哪一件不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给了我们一切。饮水思源，我们学习的目的，理所当然的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旧社会把学习的目的视为升官发财、欺压人民统治人民，这不仅是忘本，而且是反动的，她逐一的批判了有关学习目的的错误观点。我们广大同学，特别是刚刚解放的同学，越听越爱听，越觉得有道理有意义，旧的学习目的开始在我们身上动摇，逐渐的土崩瓦解。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学习目的，也就是学习观，人生观，开始在我们青年学生的身上逐步的树立起来，这是我们思想上的一大转变。

## 重视抓思想政治工作

解放初期的良中，政治思想之进步，学习成绩之优良，党、团员比例之大，当时是比较突出的。而这与赵亚平校长带领学校一班人，充分发挥校党、团和学生会的组织作用，发动群众大家都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与她重视并善于抓思想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对此，从我一个学生听到、见到、体会到的几件事里，亦可略知一二。

良中由河北省直接领导后，赵亚平校长参与了省妇联的领导工作，经常外出，在校的时间大大减少了。但她一回校，很快就能将全校师生的思想学习情况作到了如指掌，并针对情况，开展工作。当时我根据她有关学习目的的讲话，写了“我的思想转变”一文，她回校后很快就看了这篇文章，并与我谈话。她亲切地说：“你写的内容、文字都不错，以后可以向着新闻文学这方面锻炼，这也是我们党的事业十分需要的”。得到了校长的夸奖，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动力，从此我更喜爱语文这门课。以致后来几十年没离开文字资料这一行，我想这同赵亚平校长对我的鼓励，教育有着很大的作用。

赵亚平校长还抓机会，经常请校外水平较高的领导给全校师生作报告，这我们也曾受益不小。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高振生同志的讲话，他是赵亚平校长的爱人，曾任平西专署的专员，他到良中来找赵校长时，往往就给师生作报告。一次他结合当前形势讲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而讲共产党，是唯物主义的党是进步的党，是革命的党，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最后他号召我们青年学生，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要思想进步，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好好学习，他高声的总结说：同学们，谁进步，谁学习好，谁就光荣，谁就伟大，谁就有前途！四十年过去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仍响在耳边。

赵亚平校长作思想工作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她关心别人的生活，了解师生的痛痒。很多师生从与她的接触中，体会到共产党的温暖和关怀，从而更加振奋了精神，努力工作和学习。1949年初赵亚平校长了解到原来良中的吴祥祉老师的爱人周家瓚即将在北京辅仁大学毕业，便十分关心的对吴老师说：“老吴啊！把你爱人调来吧……”几句话把吴老师说的心里热乎乎的，他的最大的心事，还没等自己提，校长就来和他商量的了，这怎能不叫他心里发热，感激万分哪！不久，这对青年夫妻，这对大学生就在良中生活、战斗在一起了，他们从青年到老年，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赵亚平校长在有关原则问题上又是严肃认真的，从来不调和、不含糊、不抹稀泥。和她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有着深刻的体会。记得有一次，校总务处一位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同志不安心工作，不服从组织纪律，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谁的话都不听。赵亚平校长对这位老同志一方面耐心的说服教育，同时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她把眼镜往上一推，真的动了气发了火，直到这位老同志承认错误方才罢休。

赵亚平校长在良中的时间很短，我对她的事迹知道的不多。但只要一想起她的一些事迹，我就不由得对我的这位女校长、我的启蒙老师，肃然起敬。就有着亲切爱戴，敬重的感觉，这也可能是北岳三中——解放初期的良中广大师生的共同感觉吧！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 伶仃瘦骨却铮铮

王凤梧

马先生，房山饶乐府村人，名“士信”。识者为敬其人，不呼名而称其字：诚之。私下，有人为其取绰号“瘦马”。先生本来单薄，又常年长袍广袖，则愈衬其瘦。有谚：“人贫志短，马瘦毛长”。贫人和瘦马均在被贬之列。始赐先生绰号者，不知是否有贬意，然不影响先生之被人尊重。

据我粗知，先生先饱读诗书，而后毕业于“卢沟桥师范”，因此，新知、旧学皆颇丰厚。

马氏大族，贫富颇殊，先生属于贫者。先生常把读书喻为“寒窗”、“冷板凳”，颇有讥富尊贫之偏见。

先生曾为(“七七”事变前数年)房山县一区董(即区长)，后为教育科督学。日寇占领华北，弃官为民。村人尊其品学，聘为饶乐府村小学校教师。薪俸微薄(也因物价频涨)，订为月薪谷梁六斗(每斗十二市斤)，即每天三斤多高粱或谷子。

先生尊奉陶渊明，尤其称颂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他自己却安于“六斗谷梁”的薪俸。

国民党南逃，其《复兴课本》被日伪政权废除，而日本军国主义奴化中国人的“课本”尚未编成，我们这四十多名学子，便读起了五经、四书……四十多名学生参差不齐，高者读《论语》，低者读《百家姓》、《三字经》。先生虽不无封建思想，却不迷信。大概是崇尚“唯有读书高”甚至“读书救国”思想所致。因此对《三字经》中的“负薪”、“挂角”、“囊萤”、“映雪”的故事津津乐道。大概也像尊崇陶渊明一样的尊崇范仲淹，对范公的“画粥”读书的安贫精神尤为敬仰。

先生教五经、四书，却无“私塾”冬烘夫子的作风。先生博学，又常即兴，讲到自己爱好处，常常不知日之将落。

有一同学好睡，常常在课上伏桌而鼾。先生执藤鞭疾趋，猛击其头……命我们打开《论语》找到某章，范读：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朽)也……听似已经心灰，如再睡，先生则再斥、再打、再叹。先生说：“这叫‘诲人不倦’……”

饶乐府村虽小，却多读书人。科举制时，有举人一，秀才数人；学堂制时，中学生、师范生更不乏人。而贫寒而不移其志如先生者，却绝无仅有。先生长年灰色布袍，白袜青鞋，寒冬则灰袍下加一棉袍，更多一顶礼帽毛围脖……

先生居南后街，前后院，本族数户，先生则居后院北屋三间。门前老槐一树，夏日邻里乘凉，亦可见奕棋者，可闻人声鸟声，而冬寒秋苦，则门可罗雀。

正街(也叫大街)路北为关帝庙，其东配殿三间为教室，其一间为教师办公室。自家至学校，先生要走半望许的一个“L”字。乡人多敬先生，每遇必有简短寒暄、问候，而只闻其唯唯，却很少见其抬头……

一家，住一外村中年女人。女人多姿色，常临门前。一年之后，她既憾且奇“每天见他往返四次，没见过他抬过一次头……”马先生常教育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那时候，写字(毛笔书法)是每天的必修课——大字、小楷。文字全临摹柳公权，小楷则摹刘春霖。我的大字用尽心力总平平常常。先生摇头慨叹：“‘肉’多则软则笨！”先生似不长于书法，很少用毛笔写字。偶然写之，似不甚美，然而却遒劲、苍老力透纸背。乡村小学校的“先生”常被村民请占卜、看风水、写春联，而马先生对此类事一概拒之门外……

日本兵占领房山城设日人县长桥本，又设中人县长名项镇安。为永远占领中国，日人的口号是“中日提携”、“中日友好”、“共存共荣”、“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共荣圈”……为奴化中国，有汉奸缪斌者，根据《大学》的“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演绎建立“新民会”。县里建立了这一汉奸组织，卖国求荣之辈趋之若鹜。马先生对此辈视而切齿，避而远之……村中有小铺经营油茶糖醋，兼卖烧酒花生米。日则正经生意，夜则聚赌酗酒，男女混杂，嘻笑唱骂……先生忽然击案长歌若哭——《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砂，夜泊秦淮到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先生即兴给我们讲起了唐诗、宋词。我们朦胧中感受艺术，却哪里知道先生对不知爱国之同胞是何等悲凄、愤怒啊！

中央军南逃，弃械颇多。平日宵小不良之徒，拾械聚众，哨集山林，昼伏夜出，打家劫舍，抢男霸女。美其名曰“抗日救国军”，并顺序称为了一路、二路……二路司令白秀亭，先生之学生也。以为，一朝有权

有势，理应荫庇亲近。派一副官长骑良马持大红金字请帖——请马先生以“恩师”之尊去“司令部”养尊处优……先生命来人复命：既为抗日救国，又何劫掠乡里？我能与土匪学生而同为土匪乎？！先生之血泪与撕碎之红柬落地斑斑……

伪县长项镇安亦未忘师生情谊，命人牵马莅校，请马先生去县衙以颐养天年……先生指西(县城)而骂：你既为汉奸，又思污及他人，何无耻之甚耶？！先生拂袖而起，来人败兴而返……

民国二十七年大年之夜，依“拜年”乡俗，我携弟凤桐及同学一二，造先生之府叩拜。乡里起“五更”者虽悲国难，但为取吉利，仍灯火点点、爆竹声声……至先生窗下，不见灯光不闻人声似非节日。我轻敲窗棂，叫：“老师，我们拜年来了！”先生斥曰：“国破家亡，还要拜年……”我们内疚且羞惭，轻轻而退……

日寇削弱中国人，伎俩颇多。饶乐府村东有良田广阔，名“四顷八”，为村民生活所系。县政府役民佚数万，占四顷八之大部修一飞机场——其实只是割尽青苗、不许再耕种。全场数百亩，无一地上建筑物，只“荒场”也。场西坎上有齐家坟(地)，坟地中有巨槐，高可数丈。日人在树尖上悬一红白相间条旗，作为导引飞机标志……数年之久，无一飞机降落！

四顷八所余不多土地，多种花生。村人有“拾”花生习惯。即：主人刨收，难免失落万一，老、小复刨复收亦可得些许……四顷八距村太远，老、少不可及。每当朔风骤起之后，浮土吹去便有点点“花生”露出……

马先生为国为民忧愤交加。区区六斗谷难养数口之家。每天课余，仍长袍、礼帽、围巾，携竹蓝出村东去……

四顷八上多一伶仃剪影忽直忽弯者，即先生在拾花生也——一片荒场愈加荒凉！

携回些许花生炒熟，舀得几碗开水烧开，全家亦啖亦饮，即一日之晚餐也……

先生饥且忧愤。民国三十年春与世长辞。先生享年仅五十有三。如以此计之，则今年应为先生之百岁矣。

先生死后，我曾在坟前默誓：必为先生立一丰碑！然而四十八年既逝，我亦虚度六十有二。一石未树，惭愧奚似？！

口碑亦即丰碑，我只著文存照。

我以七绝结束此文：

拒马河声易水声，房山爱国多英雄。  
斥奸斥敌音容在，伶仃瘦骨却铮铮。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 李琪同志在黄辛庄

张本荣

1965年3月，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同志来良乡公社的黄辛庄村蹲点。那时，我任良乡公社党委书记，闻讯后就很高兴。李琪同志是很有威望的领导，他来良乡蹲点，是对我们工作的很大支持和帮助，我积极作了安排。

黄辛庄那时有 300 多户人家，1100 多人，1200 亩粮田，是良乡公社的一个大村，多年来，生产一直搞不上去。

李琪同志一进村，水还没喝上一口，就派人到地里把大队书记郭月找来，要郭月介绍情况。而后接着就去一户社员的破屋里召集生产队长开座谈会，详细了解村里的情况。紧接着，他又深入到各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一天，他把我叫了去，问：“黄辛庄为什么搞不上去？”

因为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正批“唯生产力论”，批生产第一的观点，基层党委普遍受到冲击。黄辛庄的工作，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对他的问话，我很难正面回答，便吱唔道：“黄辛庄是个贫水区，打不出水来，搞生产有困难。”

李琪同志说：“要千方百计找水源嘛！”李琪同志还说：“共产党历来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注意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无论如何，还是要搞生产。”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李琪同志仍鲜明地坚持这样的观点，让人感到了共产党人无私的胸襟和超人的胆魄。我觉得遇到了一个良师益友，所以，遇事愿意找李琪同志商量。

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李琪同志亲手制定了黄辛庄的发展规划：一是兴修水利，抓粮食生产；二是搞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实行富民政策，改善提高全村社员的生活水平。

规划制定后，李琪便组织大队一班人，一步一步抓紧实施。首先搞了牯牛河截流工程，然后由李琪同志亲自出面，找县里的供电部门，在黄辛庄村北架了一条高压线，建了两级扬水站，从而解决了全村三分之二粮田灌溉问题。

农业生产的难关攻克以后，李琪同志就把着眼点放到综合发展，改变面貌，改善群众生活上来。

“要想富，先栽树。”李琪同志深知造林对农村长远发展的重要，就托在农场工作的夫人李莉同志给黄辛庄弄来 30000 多株杨树苗，发动全村社员在房前屋后，田间路畔栽满了树。为了使社会尽早收到经济效益，他号召社员在自留地和庭院里栽植花椒树。他当时有个明确的要求，就是家家要栽够五棵花椒树。

李琪同志认为，要想改善和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发展家庭养殖业是极其重要的。他带领黄辛庄大队的干部到惠南庄参观学习养猪能手杜宝珍的养猪经验，然后又到北郊猪场给大队弄来优良种猪，在大队办起了种猪场。这个种猪场面向全村社员，为社员发展家庭养猪服务。与此同时，李琪同志又发动社员养兔，养优良兔。养兔业在村里很快便发展起来，成为社员群众生活中的日用财源。

全村的养殖业发展起来之后，李琪同志又跟大队书记郭月商量，在村里办一个面粉厂。他开导郭月说，办面粉厂，既可以发展集体经济，又可以为社员群众生活服务，粉下来的麸子还可以用于养殖业，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不要犹豫，要大胆地搞起来。

于是，在李琪同志的指导下，黄辛庄办起了面粉厂，从此该村历史上有了第一个企业。这时的黄辛庄开始走上了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走农林牧副综合发展的广阔道路；社员的生活水平开始得到改善，社员群众的精神面貌一天比一天好。展现在黄辛庄人民面前的是一幅美好灿烂的前景。

可是，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揭开了。李琪同志被召回北京。

临走那天，李琪同志围着黄辛庄的麦地转了一圈，他看到小麦的长势很好，栽下的树长得很茁壮，很高兴，反复叮嘱：“要给树浇一点水”。

在场的干部群众都掉下了眼泪。

李琪同志走后，就再也没回来。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造反派冲进黄辛庄，要干部群众肃清李琪的“流毒”。大队部里有李琪同志亲手栽的两株槐柏，造反派说，这是李琪的两棵黑苗子，一棵是郭月，一棵是韩才（郭月、韩才当时是黄辛庄

村的两位主要领导干部)，必须拔掉。两株无辜的小树便被连根铲除了。

但已茁壮生长在黄辛庄土地上的那30000多棵白杨，是造反派再也拔不掉了的。

所以，到后来，黄辛庄人无论走到田间还是村路，只要看到那一排一排已长成栋梁之材的杨树，便总会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李琪栽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首先抓了农村改革，实行了富民政策，农村经济得到大幅度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黄辛庄的老人们把酒喝到酣处时，会说：“要是没有这十年的折腾（指“文化大革命”），按李琪的路子走下去，咱现在的好日子，兴许早就过上了！”

李琪同志领导黄辛庄人民栽下的30000多棵树，给黄辛庄人民带来巨大的福分。近年来，黄辛庄发展了十来个企业，盖厂房，搞装修以及群众建房、做家具都是用的这些树，树的换代更新卖出的木材，直接收益就达七、八万元。现在的树已更新两茬，更新后的树长得更加郁郁葱葱。

李琪同志已逝世二十四周年了，他关心群众疾苦，时刻以人民的事业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久留在黄辛庄人民的心中。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 浩然正气 风范长存

## ——记张晓梅同志

梁柯平 陈心濂

### 革命幼苗

张晓梅同志原籍河北省良乡，1911年诞生在保定一个工人的家庭，她的父亲张镜海是平汉铁路老工人，参加过“二七”大罢工，是保定工人代表，曾遭反动当局的通缉。他思想进步，三个女儿参加革命都得到他的支持。

晓梅原名锡珍。两个姐姐锡瑗和锡瑞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职业班读书，晓梅是女二师附小的学生。锡瑗、锡瑞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和罢课斗争，是进步学生中的佼佼者。在父亲和姐姐的影响下，晓梅从小十分懂事，追求进步，1925年，晓梅随锡瑞到北京。大姐锡瑗早一年到了北京，这时已是妇女界的活动分子了。锡瑗、锡瑞都在这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晓梅也在同一年成为共青团员。她被吸收参加共产党员晚上的学习，学了《共产主义ABC》和《社会发展史》，还学唱《国际歌》、《少年先锋歌》。晓梅年纪小，大家都叫她“小孩”或“小妹”。后来她改名晓梅，就是从“小妹”谐音而来的。

1925年秋，晓梅被选拔参加党校学习。这是党的北方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党校。不少负责同志到党校讲课；李大钊讲农民运动，赵世炎讲职工运动，肖三、卓闾译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刘伯庄讲妇女运动。晓梅学习很认真，她在党校受到了最初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培育，见到了她景仰已久的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同志。

1926年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中，晓梅第一次受到群众革命斗争的洗礼。段祺瑞的刽子手们在执

政府门前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许多革命青年倒在血泊中。危急之际，请愿队伍里的晓梅被大同学拉出了铁门外，幸免于难。她义愤填膺，第二天照样参加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

接着发生的事件，决定了晓梅一生的道路。

1927年，被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吓坏了的反动派南北呼应，蒋介石在上海搞反革命政变，张作霖在北京搞大逮捕，他们一齐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挥起屠刀。李大钊同志不幸被捕，受尽酷刑。李大钊同志是晓梅心中最崇敬的人。不断传来的坏消息揪着晓梅的心。4月28日下午，她下课走出校门，看到街上军警林立，行人低声传语，说要戒严了，还有人说要用美国运来的新式绞刑机杀害李大钊。晓梅仿佛头上遭到铁锤重重一击，不禁失声叫了起来。后来，她跟着人们走到刑场，挤到了离铁栏杆不远的地方。从人丛中，她看到李大钊同志从容不迫地走上刑台，看到李大钊同志要向群众演说，而敌人不准他讲话，向他脸上挥拳头。大钊同志挣扎着喊出号召人民继续斗争的口号。她还亲眼看到，大钊同志遭到超乎寻常的极残暴的凌辱摧残——被连施三次绞刑。晓梅眼前一阵阵发黑，两腿发软，心在流血。她怀着万分悲痛回到家里。不是怯弱，而是无法抑制的悲愤使她病倒了。她日夜不能安眠。一合眼，大钊同志英武庄严的态度，和蔼可亲的神情，慷慨就义的英勇气概，就浮现在她眼前。她痛恨凶暴的统治者，她永远不能忘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先烈。经过痛苦的煎熬和反复的思索，十六岁的晓梅下定决心，沿着先烈的足迹，继承先烈的未竟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生。

### 勇挑重担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8年夏，晓梅到了上海。同年9月，经邓小平、张锡璠同志介绍，晓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波分配在党中央住机关，为中央职工部整理材料，还担任中央翻译科的机要交通。在豺狼遍地的上海，中央机关要严格保密，工作人员要绝对可靠。晓梅在这期间锻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组织性纪律性。1930年，她和在中央职工部工作的徐冰(邢西萍)同志结婚。

1930年底，晓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走出机关，到杨树浦怡和纱厂当细纱工，做女工工作。怡和厂机器陈旧，剥削严重，细纱工格外艰苦。晓梅和工人姐妹一样，每天站着干十二小时的活，上工时用小竹篮子带点饭，中午用开水淘淘就吃了。放工出来腰酸腿软，两脚肿痛。她在艰苦生活中一点一滴地了解情况，联系群众，成了坚强的、能干的女工干部。不久，她被提拔为党的沪东区委妇女部长。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全国人民纷起要求抗日。上海工人罢工，女工也起来了。1932年的三八节，出现了妇女群众要求抗日的浪潮。各区都开了纪念会，散发了上海罢工委员会的告各界妇女同胞书，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传单的起草人是领导女工斗争的党的沪西区委妇女部长帅孟奇。三八节后，帅孟奇被敌人盯上，暴露了，必须及时转移。但工作需要人。上海市委经过研究，决定把沪东的张晓梅同帅孟奇对调工作，晓梅到沪西，帅孟奇到沪东，仍分任区委妇女部长。沪西区党的力量较强，但日本厂子剥削压迫特别残酷，工作条件艰苦而且危险。晓梅毫不犹豫地服从调动，挑起重担。五一节前夕，她向帅大姐交代了工作，就转到沪西，开始新的战斗。已八十七岁高龄的帅孟奇大姐，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晓梅同她对调工作的经过。她记得，晓梅不但党性强，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而且善于发现和培养干部。

### 抗日救亡

1932年秋，徐冰受中央委派到山东视察职工运动，因叛徒出卖在山东被捕。党派晓梅到北平，通过徐冰家里的社会关系营救他。翌年徐冰出狱，他俩都留在北平工作。徐冰的家是个封建大家庭，家规很多。晓

梅在工人中呆惯了，如鱼得水，现在她得改头换面，充当“三少奶奶”，适应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环境。她得一面侍奉婆母，周旋妯娌，同两个嫂子轮流主持家务，细心抚育徐冰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一面出去活动，执行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为了工作，有时也进行必要的斗争，以冲破封建家规的束缚。这个家庭，对她和徐冰进行地下工作，是个天然屏障，必须很好利用。既做好工作，又要在家中应付自如，不露身份，这对刚二十出头的晓梅，是很不容易的。

1935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广大人民的响应。北平、上海等地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救亡组织纷纷成立。晓梅是华北妇女救国会和北平妇女救国会的理事，她同刘清杨、孙文淑、韩幽桐等一起，团结各界妇女，配合青年学生，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现策。

西北军在绥远抵抗日寇侵略，激起各地群众的支援抗战热潮。晓梅是北平妇女绥战救护慰劳会的负责人之一。她团结各界妇女筹募捐款，制作卫生包，训练救护人员，支援前方将士。她还作为北平市的代表，同陈波儿、崔嵬一起，率领平津沪妇女儿童慰劳团到归绥、百灵庙等地开展慰问宣传活动，受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

1936至1937年，晓梅在她主编的《北平新报》副刊《妇女》周刊上，大力宣传枪口对外，团结抗日。针对要“妇女回到厨房去”的谬论和一些妇女的模糊认识，旗帜鲜明地阐述了革命的妇女解放观点，指出“妇女问题是整个中华民族解放问题中的一环”；“中华民族必须求得真正的整个民族的解放，妇女才有前途”；“在抗敌救亡阵线上，在民族解放阵线上，妇女们是不可缺少的战士”。号召“妇女大众必须团结起来，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争取我们爱国救国的自由，建设妇女和男子在经济上、政治上完全平等的新社会”。

在开展救亡运动和进行党的地下工作的同时，晓梅还执行了一项特殊任务。邓颖超同志带着肺结核病参加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被秘密护送到北平治疗。谁来掩护她，使她安全地获得良好的治疗并迅速恢复健康呢。党把这副担子交给了徐冰和晓梅。他俩通过社会关系，把邓颖超同志安排在西山平民疗养院住院治疗，化名“李知凡”太太。“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邓颖超同志离开疗养院，在徐冰、晓梅的家里住了两天，然后化装潜出日寇占领下的北平，返回延安。

一位与邓颖超同志同病室名胡杏芬的女青年，为这位“李知凡”太太的言行风度所倾服，产生了浓厚的感情。1939年，在她得悉这位同病室的“太太”原来是邓颖超同志之后，以《李知凡太太》为题写下了这段难忘的故事。文中提到的“邢太太”，正是当年负掩护和照顾之责的晓梅。作者对两位“太太”的关系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太太（按指邓颖超同志）的信很多，但来看她的人很少，少到只有一位，那就是她常常提及的邢太太。一天，吃过午饭以后，邢太太居然来了。她一进门，喊声‘五姐’，就拉着太太的手不放。太太的眼睛只对着她旋转，两个人的脸却堆着抑不住的愉悦和欢笑。那种亲切的样子，绝对不是装得出来的。”《中国妇女》杂志去秋转载《李知凡太太》一文时，配了一幅邓颖超、南汉宸、张晓梅三人当年合影于北平西山的照片。照片是邓颖超同志提供的，这里面包含着邓大姐对晓梅的深切怀念。

### 肝胆相照

晓梅在延安学习和工作两年后，1939年秋调到重庆，任党的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妇女组副组长，组长是邓颖超同志。她俩又在一起了。在重庆的政治、社会活动中，晓梅作为助手，以陕甘宁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协助邓大姐做了不少工作。在邓大姐回延安或出国时，晓梅就是南方局妇女组的负责人。

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抗战期间的南方局妇女组做了大量工作。她们研究国统区的情况，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国统区妇女工作的任务和主张；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党派和无党派妇女代表人物共同抗战；直接领

导一部分女党员，培养妇女运动骨干；在《新华日报》上创办《妇女之路》副刊并指导进步妇女刊物；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同各种阻挠妇女参加抗战和歧视压迫妇女的现象进行斗争。晓梅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妇运方针，做了出色的工作。

抗战初期，国统区妇女运动发展比较广泛，一度出现轰轰烈烈的局面。为了吸取各方意见，加强统战工作，邓大姐和晓梅不定期地邀请妇女界的党外朋友座谈，人数或多或少，经常参加的有史良、刘清扬、曹孟君、罗叔章、沈兹九等。聚会地点多数在史良家，有时在沈兹九家。聚会时，她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听取党的政策主张，同时讨论妇女运动的种种问题，各抒己见，集思广益。这种座谈会是邓大姐同党外朋友合作共事的好形式，从武汉到重庆，一直坚持到1946年。邓大姐不在重庆时，晓梅也坚持这样做。

针对当时出现的投降分裂危机，为贯彻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晓梅在1940年3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以战斗和团结来纪念“三八”节》的文章，呼吁妇女团结起来，扫清妥协投降毒素，粉碎汪精卫们分化动摇抗战营垒的阴谋。她还在有一万多各阶层妇女参加的“三八”节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

1941年皖南事变的前后，国统区形势恶化，特务到处抓人，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都上了黑名单。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撤退一部分已经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和朋友。晓梅协助邓颖超同志不分昼夜地工作，对需要转移的同志，逐个研究和安排。这样，一批党员和进步朋友得以安全转移到延安、香港和新四军驻地，一部分就近隐蔽下来。南方局也实行精简，只留下部分同志坚持工作。晓梅和留下的同志们一起，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准备坐牢，甚至牺牲生命。南方局号召留下的党员勤业、勤学、勤交友。晓梅尽心竭力，带头执行“三勤”。1941至1944年，在重庆和国统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没有了，可是党的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而且更深入更扎实了。坚韧不拔的共产党员，不畏艰险坚决跟共产党走的党外朋友大有人在。岁寒知松柏，患难存知己。晓梅一个一个地和同志们联系、谈心，润物细无声地进行教育，保存革命的种子。

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是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法宝的典范。在他们身边工作多年的晓梅，统战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她同党外朋友谈心交心，传达中央精神、传达周恩来同志的形势报告；同她们研究在恶劣环境下开展工作的方法；教给她们怎样对付特务，怎样甩掉“尾巴”；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直到调解夫妻间的纠纷。而那些党外朋友们，也在同晓梅的交往中看到党的光明，感到党的温暖，同晓梅结成莫逆之交，有的把自己的住所供晓梅约会碰头，传递文件；有的为我们传送情报，使一些时间免遭囹圄之苦；有的帮助我们掩护或转移有被捕危险的同志；有的影响自己的丈夫，促使他毅然起义，配合解放军的胜利前进。他（她）们同晓梅之间的关系，可谓推心置腹，水乳交融。现今一些党的老朋友和民主党派的老一辈领导人中，有不少人是晓梅模范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见证人。他（她）们在同我们党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深挚友谊中，凝结着晓梅的一份心血。这一时期，晓梅直接间接领导和联系的同志和朋友很多，他（她）们大都根据不同条件，运用各种形式，坚持革命，在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1944年底，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在南方局妇女组的组织领导下，妇女界举行集会，签名发表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晓梅和李德全、史良、刘清扬等发起并组成了中国妇女联谊会。这个以进步妇女为骨干的妇女统一战线组织，终于在1945年7月在重庆宣告成立。李德全任主席，晓梅当选常务理事。日寇投降后，重庆、成都、昆明分会相继组成。中国妇女联谊会的理事们复员到各地，又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成立分会。这个组织，在团结各地妇女反独裁争民主，发动妇女群众迎接城市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解放战争期间，晓梅曾在北平军调部我方军调组工作，同时指导北平妇女界的民主运动，随着解放战

争的胜利进展，晓梅先后在新解放的山东潍坊市和济南市负责妇联和工会工作。

1948年底，晓梅被调到良乡，任北平市委妇委副书记，同妇委书记张秀岩同志一起主持妇委工作，迎接北平的解放。

### 艰苦创业

1949年2月1日凌晨，即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之前几个小时，张秀岩、张晓梅两同志率领北平市妇委二十来个干部，冒着冬夜的严寒，乘车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北平是文化古都，新解放的大城市，拟议中的新中国首都。北平工作的开拓，对于指导即将解放的大批城市，对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党中央对北平市干部配备得很强，工作要求也很严。张秀岩大姐和晓梅都富有城市工作经验，也都曾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驾轻就熟，很快打开了局面。进城不久，成立了北平市民主妇联筹委会，晓梅当选筹委会主任。不久，张秀岩同志调中央，市委决定由晓梅任妇委书记，又派了杨蕴玉同志为妇委副书记兼妇联筹委会副主任，她俩一同挑起了全市妇女工作的重担。1949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市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晓梅当选市妇联主任。在市委领导下，全市各级妇联的干部，深入群众，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妇女工作。晓梅是妇联的优秀带班人。

组织妇女参加生产是头等大事。晓梅除了抓女工工作外，把干部派下去组织各种妇女生产小组：缝皮子、糊纸盆、拆洗缝补、做绢花、挑补花……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妇女们参加生产后，尝到了经济自立的甜头，高兴地说，我们不再“手心朝上”（指向丈夫要钱）了。挑补花生产发展得很快，到1952年已发展成有四千多人的挑补花生产合作社。北京市抽纱工业公司，就是在当年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它拥有六个厂，一个研究所，四十几名设计人员，近四千名职工，还有好几万在厂外加工的妇女，产品畅销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晓梅很重视妇女宣传教育工作，在组织生产的同时，组织识字班、读报组，还创办了《北京妇女》月刊。

在旧社会，女职工怀孕、生孩子根本没有保障，甚至要因此失业。解放初期，根据女职工们的要求，晓梅和市总工会的同志协作，取得市人民政府的支持帮助，给女工规定五十六天产假，女工怀孕七个月后不干重活不上夜班，生了小孩可领五尺白市布，二斤红糖，上班后有喂奶时间。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女工们的积极性。

托幼事业方面，市妇联办起了北海托儿所、中山公园托儿所等示范性机构。市妇联和区县妇联经过调查试点，在农村和街道办起农忙托儿所、抱娃娃组、“雨来散”等小型多样方便群众的托儿组织。晓梅常到托儿所看望保教人员和孩子们。有些热心的知识妇女出钱出房子办了几处民办托儿所，也得到晓梅的支持和鼓励。

为了贯彻1950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大法《婚姻法》，在市委统一领导下，晓梅代表市妇联，同许多单位密切合作，派出干部调查研究，广泛宣传。经过连续几年的工作，自主婚姻多起来了，干涉婚姻自由、打老婆、限制妻子参加社会活动等现象大大减少了。晓梅还配合政法部门，抓了包办买卖婚姻、虐待妇女的典型案件，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批判处。妇联的威信很高，法院判处婚姻案件时很尊重妇联的意见。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一举封闭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二百三十七处妓院，惩治了妓院老板、领家，解放了一千二百多名妓女，一时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为了消灭千百年来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野蛮的娼妓制度，解放被侮辱被损害的姐妹，晓梅和杨蕴玉同志花了不少心血。在市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部署下，市妇联副主任杨蕴玉同志率领一批妇联干部，会同有关单位，夜以继日地进行大量的艰巨的工作一封查妓院，设立妇女生产教养院，为被解放的妓女治病，教她们学手艺，帮助她们树立自尊心自信心。经过半年左右的工作，她们当中有百分之四十五人结了婚，百分之二十八回了家，其余的参加生产劳动或其它工作；大多数有了幸福的家庭，有些人当了先进生产者，或当了基层干部。由北京市开始的新中

国封闭妓院解放妓女的壮举，在许多年间一直为外国人士所关注，被称为“奇迹”。1960年8月，晓梅曾向建国后第一次重访我国的著名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介绍了北京市解放妓女的情况。

晓梅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是众所周知的。从建立市妇联筹委会开始，不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妇女代表人物被邀请或推举担任市、区妇联的各种职务。晓梅带领妇联干部做民主人士的工作，她自己带头联系李德全、刘清扬、林巧稚、杨葆俊等党外朋友。她对统战政策融会贯通，身体力行，做得真诚，做得自然。那些年，常有各界妇女到市妇联来找她谈心，有些名演员把自己的婚姻问题、生活问题也提出来向她请教。

晓梅特别关心爱护干部和细心培养干部。她循循善诱地向干部讲述执行统战政策的重要意义，她说，妇联就是联嘛，搞清一色就不能叫妇联了。我们不能坐了天下就忘了朋友呀。她手把手地教给女工出身的妇联负责干部怎样工作；她热情鼓励工农出身的妇联干部学文化，一批批地抽调她们下工农干部学校或工农干部轮训班。她按照党的部署和要求，抽调市妇联的骨干输送到党、政、工业、司法等各条战线，使市妇联干部一茬茬地不断生长。她严格要求妇联干部首先做好工作，认真执行政策，不得以权谋私，同时对干部的切身问题又十分关心和体贴。她为年轻的女干部介绍对象，主持婚礼，办机关婴儿室、托儿所。她发现一个即将出发到西北参加土地改革的青年干部患肺结核未愈，立即同医生商量把她换下来。她鼓励新提拔到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勇挑重担时说，“做不好首先打我的板子，不打你的板子，大胆干吧。”

### 宁折不屈

五十年代初期，晓梅得了高血压症，健康大不如前了。但她仍尽可能地坚持工作。她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赢得了党的信任和干部群众的爱戴。她曾任党的中央妇委委员，北京市委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一、二届执委和第三届主席团委员。她在北京妇女群众中很有威望，连任五届市妇联主席。

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晓梅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她被禁闭在妇联机关的一间小屋子里，被迫去干惩罚性劳动：刷厕所、洗碗碟、劈大木头、抬煤、摇煤球……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她患高血压已有多年，六十年代初曾出现过局部脑血管破裂，眼底出血。同被打成“黑帮”与她同命运、同劳动但又不准互相交谈的几位好同志，默默地照顾着她，只要躲开造反派的耳目，就尽量让她少干点，干轻点的活。尽管这样，那不分寒暑，每天清晨六点就要开始的劳动，那随时随地的揪斗，还有接待外调时不得不忍受的呵斥吼叫，种种难堪的折磨已把她的多病之躯，逼到了死亡的边缘。

1968年4月的一天，与她同命运的同志们把早晨的活已干完，早饭已经吃过，仍不见晓梅出来。经请求，打开那囚室的房门，人们才发现倒在水泥地上的晓梅，已没有知觉，眼睛也呆滞无神。屋里的灯亮着，桌上散落着药片。看来，她是在夜间感到不适爬起来服药时倒下的。她被草草抬往附近的一家医院。过了不多天，有人把晓梅的铺盖扔进机关的仓库。原来，在4月28日这一天（正是四十一年前晓梅为之悲痛欲绝的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的同一天），晓梅就这样在严重迫害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同志们在偷偷地抹眼泪，偷偷地互相传告耳闻目睹的有关晓梅的情况。晓梅倒下的前一天，让她登高刷大字报，当晚她表示手没劲，提不起裤子，连晚饭也吃不下，事实上这时她已犯病了，可是没人管。晓梅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清醒过来，说过两句话：“把我送友谊医院，”“我才五十七岁。”她的医疗关系在友谊医院，那里有她的长期病历。她多想活下去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啊！

晓梅同志很热情，很随和，但在原则问题上从来严肃不苟。在被揪斗时，她坚持按原则、按事实回答问题，不肯为摆脱一时痛苦而随便说不符合事实的话。她那在大是大非面前宁折不屈的松柏气节，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晓梅同志是深受人们尊敬的老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我国妇女运动的优秀领导人之一，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党外朋友的模范。她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熟悉她接触过她的人，都感到她身上有一股真正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她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对党外朋友披肝沥胆，荣辱与共；对同志对下级热情关切，真挚坦诚。她像一颗优良的种子，党把她放在哪里，她就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繁育。

注：刘振祥选自北京妇联 1985 年编《北京女杰》

（《房山文史资料》第 4 辑）

## 李雅三小传

杨亦武

李雅三，房山西街人，名志南，号雅三，原籍河北高阳县边渡口乡北柳庄。民国三年(1914)1月10日生。民国二十年随堂兄李云祥来房山南窖谋生。先后在南窖的同顺成布庄，义和成杂货庄当伙友。民国二十六年(1937)进南窖义和昌杂货庄充司帐。民国三十年(1941)义和昌倒闭，遂到房山县城吉顺成杂货庄当伙友。

李雅三父李永合，中国共产党党员，此间在北平为党做地下工作。由于当时处在敌强我弱的阶段，为保存我党的力量，经组织批准，李永合与另一位地下工作者张双喜来房山吉顺成李雅三处隐蔽。李雅三不仅做了掩护工作，而且经常向他们介绍房山城内敌人的活动情况。临别，李雅三送路费给他们。李、张平安返回北平。北平地下党组织认为，李雅三是“可靠的堡垒，是革命人，细心保护了我们的革命力量，不怕一切危险，一切为革命。”此后，李永合负责从北平至霸县的联络，经常出入李雅三处，吉顺成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地下交通站。

1948年12月房山解放。1949年初，吉顺成掌柜吴育之为年老体衰，辞职回乡，李雅三遂任吉顺成掌柜。李雅三家住洪寺，土改划为贫农。1949年10月，李雅三被聘为房山县各界代表会议筹备委员。1952年3月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李雅三“在政治方面不断提高，”段明确了“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的远大前途”，决心“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努力前进，为建设我们的祖国而奋斗”。此后，李雅三在领导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

1955年1月，李雅三调任房山县工商联主任，兼房山城关文百合营副经理，房山城关零售商店副经理。1956年，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李雅三积极投身于房山的“改造”运动。1958年10月，房良两县合并，李雅三仍任工商联主任。

1966年“文革”开始，房山工商联被封，李雅三到房山城关零售商店，1968年10月即遭错误揪斗。回到家里，衣服破烂，头带伤痕，李雅三瞒着家人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的。女儿友琴知道了真象，李雅三教育女儿：“这是运动，要经得起考验，要相信党。”表现了一个革命干部高度的政治觉悟及对党的信赖。随即，李雅三被两度关押接受“劳改”。“文革”后期，李雅三在城关零售商店站柜售货。1975年8月27日病逝。

附一： 原党的地下工作者给李雅三的一封信

志南如面：

多年不通信了，我有些想念，你家大小都好吧？自我与你父亲经上级党的分配，去北京做地下工作，是在敌人最疯狂的时期，在军事上敌强我弱的阶段，因此，去北京住的时间很长了，目标大了，经领导许可，到你处去了一个时期。那时你是在吉顺成当职工，掌柜的吴育之，你权利小，经你给我们介绍了城里敌人的活动情况，说敌人很疯狂，岗哨严禁，随时查户口。所以去你处的时间不太长，经你把我们送出城来，并告诉我们过一个时期再回来住下，还给了钱，忘了多少。我们安全地回到北京了，找到了领导，说了各方面的情况。上级承认你是可靠的堡垒，是革命人，细心的保护了我们的革命力量。不怕一切危险，一切为革命。希望你有时间回来，找我畅谈一回。我们现在收秋，很忙，以后通信。

张双喜 章  
1971年9月8日

附二： 革命工作人员家属证明书

|   |           |                     |                 |     |                            |       |
|---|-----------|---------------------|-----------------|-----|----------------------------|-------|
| 寇凤兰先生<br>李雅三同志已参革命工作特发去【革命工作人员家属证明书】并已函达 贵县政府登记请即收。当地政府发此即按工属优待。此证<br>河北省房山县人民政府<br>房山县人民政府方印<br>一九五二年 玖月 廿一日 | 日脱期产      | 部别                  | 籍贯              | 姓名  | 革命工作人员家属证明书<br>民优字第<br>62号 |       |
|   | 一九五二年三月 日 | 房山县 会议 常务委员会 各界人民代表 | 河北省房山县一区西街村门牌 号 | 李雅三 |                            |       |
|   | 点 地       | 职业                  |                 | 性别  |                            |       |
|   | 房 山       | 驻会委员(副主席)           |                 | 年龄  |                            |       |
|   |           |                     |                 | 叁八  |                            | 姓名 家属 |
|   |           | 遇 待                 |                 | 寇凤兰 |                            | 关 人 本 |
|   |           | 包干制                 |                 | 夫妻  |                            |       |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 胡春波小传

杨亦武

胡春波，房山区琉璃镇二街人。名应沂，号春波，原籍山西太谷县胡村乡南阳村，父建极。春波清光绪三十三年(1908)农历二月初四生。八岁丧父，十四岁随长兄应宏到河北新城谋生，进白沟河元利煤厂学徒，元利煤厂关闭，返原籍。

民国十六年(1927)，来房山琉璃河聚太隆粮店当伙友，后进琉璃河玉成厚粮局充司帐。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南侵琉璃河，避兵再返原籍。翌年秋，返琉璃河。民国二十八年(1939)进北京施家胡同大兴栈当伙友。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琉璃河丰盛永杂货店成立，入店充三掌柜。民国三十三年(1944)，回乡与张映东结婚，翌年子玉出生，遂接家小来琉璃河镇，从此定居琉璃河。

新中国成立，春波跻身商业，思想进步，靠近政府，赢得了工商界的拥戴和政府的信任。先后当选为琉璃河商会主任，良乡县工商联副主任、主任，良乡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人民委员会委员，良乡县副县长。

春波健谈、豁达。1950年，琉璃河镇召开群众大会，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春波登台发言，声色慷慨，感人至深。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春波了悟商界出路，顺应历史潮流。1952年，参加河北省召开的工商界代表会，会后奔波于良乡各乡镇，积极贯彻会议精神，号召工商界：“响应政府号召，清算过去商业中的违法行为。”春波还积极交纳税金，努力促进物资交流，妥善解决劳资纠纷。1956年，在春波先生的带动下，丰盛永与本镇的锦复隆、大成公，三顺兴等二十三家商号组成了公私合营。

1957年，春波先生任良乡县副县长，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后又到南尚乐水头畜牧场劳动两年多，1960年右派摘帽，1961年春波回琉璃河供销社工作。1974年1月14日退休。1979年，错划右派一案得以改正平反。1981年当选为政协房山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常委。1984年当选为政协房山县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86年1月9日病逝。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 彭老总二三事

吕雪琴 口述 刘振祥 整理

### 让马给战士骑

1939年春，日本鬼子为了进一步侵占我解放区，在山西省太原以南，正在加紧抢修白晋铁路。我八路军则针锋相对，敌修我破，边修边破，以拖延敌人的修路时间，不叫敌人的阴谋得逞。一次我部队奉命急行

军，日落到达目标——白晋铁路旁边，接着战斗打响了多我们一边打一边破坏抢修好的铁路，战斗一直进行了一夜，达到目的后，我们才撤回住地，当时我们把这次战斗叫做白晋破击战。

在这次破击战结束撤回住地的途中，我们部队负责掩护，不巧我班战士王福春同志得了急性病，肚子疼得一步也迈不开了。正在这个时候，彭总骑着马过来了，见此情景，翻身下马，问明情况后，立即提出将他骑的马让给得病的战士骑。战士们听了，都掉下了眼泪。那时，我是王福春同志的班长，急忙抢着说：“这可使得不得，首长工作忙，时间紧，身肩重，困难再大我们也能克服，我们全班同志轮着背，也一定把王福春同志背回去住地，请首长放心好了”。哪知彭总实心实意，说一不二，他耐心地向我们解释说：“我身体好，没有病，现在情况又允许我带他十里八里没问题。”说着便命令警卫员把王福春同志扶上了彭总的马。彭总跟着走了好一阵子，直到碰到了战地急救站，彭总才把生病的战士王福春交给他们，并指示他们负责救护转移。事情虽然不大，但对我们广大战士、干部，却是个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事后，每当 we 一想起彭老总让马之事，心里就热乎乎的，就觉得彭老总跟我们每个战士心连心。

### 和战士一起吃窝头

1940年春反扫荡之后，我太行山部队开展整军，当时我在这一地区八路军某部炮兵连当连长。一天彭老总亲自采我们连队检查工作。战士们见到彭老总下连队，人人精神振奋，为了表达我们对彭老总尊敬爱戴的心情，提出要给彭老总弄点好的吃。那时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战士们吃的是高粱面和黑豆面的窝头和稀粥。经过一番研究，司务长从柳梢上捋点树叶当馅，把高粱面里加点榆皮面当皮，炊事员给捏了一百多个饺子，准备给彭老总和警卫员同志吃，彭老总知道后，立即把我找了来，问战士们吃什么？我如实地作了回答之后，彭老总严肃地说：“为什么要给单做呢？我到连队里来，就应该和战士一样，战士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说着就叫我们把连队战士集合起来，当着面把饺子分给每个战士吃了，接着彭老总就和战士一起做起窝头来。

那时，干部、战士受到的教育、鼓舞可大了。大家感动地说：“只有咱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才会有这样的好领导、好作风。彭老总和我们的战士平起平坐心连心，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再强大的敌人，我们也能战胜”。

### 亲临前线指挥

1943年，日本鬼子还十分猖狂，对我晋东南太行山区根据地，接二连三的进行扫荡骚扰。我军领导机关于1943年春，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打击敌人的气焰，保卫解放区。1943年秋，敌人又出动一个大队，约一个团的兵力，进攻我晋东南太行山区根据地。我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以三个团的兵力，将敌人团团围困在官家脑村。这个村户不多，最后敌人被迫困守在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山头上，我军指挥所便设在山头下边。当时我在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四团的炮兵连当连长，那时我们的炮兵火力还不够强大，我们打完了炮，便撤下阵地观战待命，因此，对这场战斗看得很清楚。参加战斗的是三八五旅所属的三个团，参加指挥的有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旅长陈锡联、旅政委谢富治。作为华北的总指挥、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同志从始至终在前线战场上指挥战斗，一刻也没离开战场。敌人十分顽固，战斗打得非常艰苦。从拂晓打到日落，除敌人指挥官被直升飞机带走逃跑外，其余被我全歼，实现了一举消灭敌人一个大队的作战计划。

在战场上，我们亲眼见到了彭老总亲临前线，亲自指挥，身先士卒的革命精神；看到了彭老总全歼敌人的决心，战胜困难的毅力；还看到彭老总对高级干部的严格要求和严肃的态度。当我们炮兵连完成作战任务撤下阵地的时候，旅政委谢富治也跟我们后边往下走，这时手提木棍的彭老总见到后，对谢富治严肃地说：

“你下去干什么？不全歼敌人，谁也不准下来！”谢富治政委一声不响扭头就回前线去了。当时我们其余干部、战士见此情景心想，彭老总在战场上对大干部一点也不客气，同样严格要求，真叫人佩服。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 张晋龄生平记略

张玉泉

张晋龄，因耳聋被群众称为张聋子。1918年出生于雄县西数乡南辛立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因家境贫寒，只读了两年小学，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使他养成了勤恳而倔犟的性格。他农忙种地，农闲挑担串乡做小买卖。此间接触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逐渐对“闹翻身”、“求解放”，有了初步的了解。

## 在家乡沦陷的日子里

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了华北平原，大规模地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使家乡呈现出一片凄惨的景象。张晋龄义愤填膺，毅然放下锄头，扔下货担，扛起了枪杆，与日伪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他当村长期间，组织民兵破坏交通，割断电线，掩护我党干部，配合八路军小分队开展工作。因工作出色，事迹突出，于1941年5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他的思想进步更快，工作更加出色。曾多次受党派遣，深入雄县城内，搜集敌人情报，还利用多种渠道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使一些被迫加入敌伪组织的乡亲，有的成了共产党的内线，有的弃暗投明，携械参加我区小队。从此，张晋龄便成了雄县一带敌人的心头之患。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捉拿他。由于张晋龄沉着机智，英勇善战，多次在敌人的围剿中脱险。凶残的敌人恼羞成怒，便将张晋龄的母亲李大凤抓起来，利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让他说出晋龄的活动情况及活动地点。

张晋龄的母亲，不仅支持儿子的革命活动，还经常帮助我党传递情报，掩护革命干部，协助儿子开展工作。因此不管敌人怎么威逼利诱、摧残、折磨，她毫不畏惧，丝毫也没有暴露儿子的革命活动及我党、我军的情报，用生命保护了革命同志。1942年，张晋龄的母亲及其妻子赵淑婵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我冀中地区的革命形势逐步好转，根据地逐步巩固。为开辟新区，占领平南（北京南部）这块战略要地。于1943年冬季上级党委派遣张晋龄到涿（县）、良（乡）、宛（平）联合县五区任区委书记，兼武卫会政委，到窑上一带开辟工作，建立抗日根据地。

## 在水定河两岸驰骋

张晋龄到窑上地区便扎根在穷苦百姓之中，紧密依靠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战争的政策。秘密建立地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1944年农历六月十二日，在窑上村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党

支部。第一批发展三名：瞿恩波、邵书玉和白信(1948年叛变)。同时组织群众斗地主，开展减租、减息斗争。1945年春季，他只身闯入官庄村大地主许炎午的家里，进行斗争，迫使该地主给这一带长工增加工钱。不久，处决了辛庄村作恶多端的恶霸田存衡，并迫使窑上各村地主交出浮财、粮食分给劳苦群众。1946年初，平分了地主的土地。

他带领武工队经常转战在永定河两岸和京汉铁路以东的大片土地上。这一地带的百姓深刻记得，他曾三打公义庄、四进葫芦垡端敌人重兵把守的据点，还在良乡东关大集抓获汉奸。这一地带的敌人，一提起张晋龄就胆战心惊。而穷苦大众却为之赞叹。因为从他的言行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是劳苦大众的救命恩人。因此，张晋龄深受人民的爱戴和信任，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

1947年，国民党为保住这块战略后方，加紧了和平、津、保的控制，增加平西、平南的军事力量，疯狂地向我平南解放区反扑，并在涿、良、宛县建立了许多据点。当年秋季，涿、良、固三县的敌人对我五区以南韩营等村展开大规模地进攻。张晋龄及时向我涿、良、宛地下党提供情报，组织武工队紧密配合，粉碎敌人的进攻。在辛庄一带，良乡的伪保安团有六十多人，在返回时全部被歼。并夺回被敌人抢走的物资。我十几名干部群众被营救。

同年10月间，他带领三十多名区小队队员到永定河东的鹅房、郭公庄伪大编乡抢枪，辗转了一夜，捉住伪联保主任，缴枪十四支。途中虽与敌遭遇，致使伪联保主任逃掉，但这次行动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对敌斗争更加深入活跃起来。

### 在极端危难的环境中

张晋龄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下，总是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把顺利和安全让给别人。平日他关心同志的思想进步，组织队员们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鼓舞斗志。遇到干粮和水紧缺时，他总是让给别人吃喝。夜间行走，总是走在最前面。遇到战斗，需要撤离时，总是先让别人撤。一次，他和武工队长房文权、田连仲出去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包围，寡不敌众，他掩护那两位同志，让他们先撤。房文权执意让张晋龄、田连仲先撤。于是，他急了：“我是区委书记，请你服从命令！”就这样，等那两位同志撤到安全地带之后，他才撤离。

1947年11月的一天，敌人进攻固安县城。住在陶营村的张晋龄一发现敌情，赶紧派武工队副队长王茂发带几名队员去迎接埋地雷的民兵，没等他们回来敌人就到了附近。解放军大部队都转移了，这时有人让他随部队赶快撤离，可是张晋龄心里惦念战士们的安危，冒着危险藏在村口，等他们安全回来时才一块儿撤离。

张晋龄打仗英勇、果断、机智、灵活。固安县城失守后，他同区委撤到了固安县东北梁各庄一带活动。此时窑上地区已被还乡团占领，他们反攻倒算，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致使这一带百姓深感不安。张晋龄得知这些情况后，非常气愤。一天夜晚，他带着五位同志绕开敌人岗哨，潜入窑上、官庄等村散发传单，刷大字标语，威吓敌人，鼓舞群众对敌斗争的勇气，树立人民必胜的信心。

一天傍晚，张晋龄带着房文权和田连仲从大清河出发北行。到了窑上，天快亮了，他们三人在鲍庄与金门闸之间的荒沙岗子下休息，刚要睡着，被一个背粪筐的密探发现了。不一会儿，一队还乡团和伪军就向他们扑来。张晋龄三人没等敌人走近就先开了枪。敌人卧倒了，子弹向雨点般地打过来，许多小树都被打断。他们盯了一会儿，因田连仲身体有病，张晋龄让他先撤下去，才和房文权往南撤走。因不知道田连仲撤到哪里去了，张晋龄心里特别不安，他决心找到战友再一起回去。天黑后，张晋龄冒着生命危险，沿河堤往北找，走了不远，被河东大堤上的敌人发现了，“干什么的？”敌人大声问。张晋龄随机应变地大喊一声：“卧倒——”这一喊不要紧，吓跑了东岸的敌人，也把藏在草丛里的田连仲找到了，他们立即乘机往南跑去。

### 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

1948年春节，正值窑上地区解放前夕。时任五区区委书记的张晋龄与涿、良、宛联合县县长李景森和武工队队长房文权等十多人到窑上村开展工作，不幸因叛徒告密绝大部分人被捕。

大年三十这天，天刚蒙蒙亮，国民党特务赵文华带领一个团的伪军，还有个骑兵队，把村子围得水泄不通。当时张晋龄和李县长及房文权住在王琪家，武工队住在赵家。放哨的李凤国和张进昆均被敌人围住了。其余都钻进了地道里。由于当时窑上村党支部书记白信叛变，敌人从他那里得到了地道分布图。他们堵着洞口向里边喊话，乱喊了一阵子见没人上来，便用柴禾熏，仍然没动静，随后用镐砸锨挖，地道遭到严重的破坏，也没有人上来。张晋龄等十余人被困在地道里两天两夜，敌人一无所获，使出了最后一招儿，把白信推出来，让他冲地道里喊话，说敌人已经走了，让张等人赶紧上来。张晋龄因不知道白信投敌，听到喊声便让通讯员许建强走出洞口看看动静。不料一露头就被敌人抓住了。该通讯员经不住敌人的威逼，贪生怕死，敌人让他也冲下边喊话，说“敌人走了”。张晋龄等人信以为真，一出洞口就被一群伪军围着了。当他举枪向敌人射击时，因地道潮湿，枪膛卡了壳。张晋龄不幸落入了魔掌。李县长因被烟熏得晕了过去，被敌人拖上来。同一天隐藏在贾河村地道里的五区区长崔振春也被敌人抓去。这次我方损失惨重，有十一名干部战士被捕，四名战士被熏死在地道里。

被捕当天，敌人就对张晋龄用了酷刑。张晋龄泰然自若，闭着眼不理睬他们。

在押往监狱途中，张晋龄抓住一切机会向伪军宣传我党革命主张，揭露敌人谣言。由于他的宣传教育曾使一个四川籍的伪军哭诉被抓来当壮丁的经过。在琉璃河火车站等车时，张晋龄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交给身旁一同被捕的战士，并深情地对这战士说：“这些钱用不着了。你带在身上，路上买些吃的。你要好好保重身体。我跟你不一样……”那位战士接过张晋龄递过来的钱，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北平第一监狱里，敌人用尽了一切手段，威胁利诱、严刑拷打、软硬兼施，都未能使他屈服。他竭尽全力与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最后，敌人黔驴技穷，对他下了毒手。

1948年3月27日，国民党把区委书记张晋龄交给了驻扎在大兴县鹅房乡的还乡团。一起被提出来的还有涿、良、宛联合县县长李景森、五区区长崔振春。到了大兴县鹅房乡，匪徒们先是用铁丝穿透张晋龄的锁骨，拉着他到附近几个村儿“游街示众”。然后，又把附近村的老百姓赶到鹅房村西的永定河大堤上，召开所谓的“公审大会”。乡亲们无不暗暗落泪。张晋龄胸前流着鲜血，忍着剧痛，昂首怒目狰狞的刽子手们，坚强不屈，神态安然，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最后，在鹅房村西的河沟里，敌人把张晋龄、李景森、崔振春一同杀害了。张晋龄时年只有30岁。

1972年，窑上乡党委、乡政府为了永远纪念张晋龄烈士，给他立了墓碑。每年清明节前后，扫墓的人络绎不绝。每到旧历大年三十前后，窑上地区的人民，特别是那些曾跟他战斗过的老人们，都特别怀念他。并常常用他那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激励后人。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 民兵英雄隗合宽

王洪钟

抗日战争时期，在房山区霞云岭乡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民兵英雄，他的英雄事迹在这个地区广为流传，并富有传奇色彩。在1942年晋察冀军区召开的战斗英雄表彰大会上，他坐在第一排第一位，当时的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亲自奖给他一支左轮手枪，抗日政府奖给他一匹白马。这位闻名华北地区的民兵英雄，就是当时房山县九区的龙门台游击队队长隗合宽。

### 约货台伏击战

在霞云岭乡上石堡村的南面，有一个地方叫约货台。这里果树成荫，风景宜人。四十多年前，民兵英雄隗合宽曾在这个地方对日本鬼子打过一场伏击战。

1940年的农历三月，驻南窖的鬼子小队长丘本带领十几个鬼子和三十多伪军来到霞云岭地区进行“清剿”。当时，上石堡村抗联主任隗合宽，正在三十里以外的庄户台村赶集，听到鬼子“清剿”的消息，便立即抄小路，顺山梁赶回村里。这时，鬼子们已把上石堡村抢掠一空，一片狼藉。日本鬼子不但抢走了东西，还在老百姓的炕上和锅台上拉了尿，在锅里尿了尿，有几间房子还被点着了火。隗合宽看到这种情况肺都快气炸了，他在村子四周转转，发现在山上躲藏的群众还没有回村，便决定在鬼子回来时，打他个落花流水。

当时，上石堡村没有枪支，只有区里发的几个地雷和自己造的刀枪。正在隗合宽找地雷的时候，碰上了一个进村探风的民兵，这个民兵向隗合宽汇报了群众转移的情况，又帮他找了两颗地雷。隗合宽高兴极了，他把两个地雷一抱，冲那个民兵一摆手：“走，拿这两个铁西瓜叫小鬼子们去尝尝”。

俩人一溜小跑来到约货台，隗合宽叫那个民兵在山坡上放哨，自己很快把两颗地雷埋在了大路上。然后，俩人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等鬼子过来。约摸一袋烟的功夫，日本鬼子从邻村回来了。他们有的挎个包袱，有的刺刀上挑着鸡，有的抬着从村里抢来的猪，后面还有两个伪军强拉硬拽地轰着一头小毛驴。功夫不大，走在前面一个鬼子把大皮靴重重地踏在了第一个地雷上，“轰”的一声，他便被抛离了地面，然后又重重地摔在了道边上。顿时，鬼子和伪军乱了营，有的把抢来的东西扔下就跑，有的就地卧倒，抱着大枪寻找射击目标，那两个拉小毛驴的伪军。也早把缰绳一扔，躲在了一个石头窝子里。

还是鬼子小队长丘本比较沉着，他抽出东洋刀，冲约货台上一指，吼叫了几声，鬼子和伪军便一窝蜂似的向河谷东岸卷去。正好踏响了第二颗地雷，这时又有一个鬼子腿炸断了，还有一块弹皮在丘本袖子上穿了一个洞丘本再也顾不上寻找目标还击，带领残兵败将们拔腿往南窖方向跑去。

此时，隗合宽二人已经冲了上来，他俩拣起鬼子伪军们丢下的手榴弹，追着鬼子屁股一个劲儿的狠扔，又炸伤不少鬼子和伪军，一直把他们追出了三里多地。

这次伏击战，只用了两颗地雷，炸死鬼子一人，伤鬼子伪军多人，缴获三八大盖步枪一支，手榴弹十五枚，子弹四十多发。

这正是：

隗合宽，真勇猛，  
铁西瓜，显神通。  
炸跑东洋小鬼子，  
抗日斗争立头功。

### 割“耳朵”

1942年冬天的一个夜里，房山县霞云岭九区庄户台村的二流子郑国臣，偷偷的逃到了当时的日寇据点南窖村，卖身投靠了日本鬼子，充当了汉奸密探。从此，他多次化装侦察，探听我方情报，先后出卖我抗日干部和群众多人，欠下了一桩桩血债，人们恨透了这个汉奸卖国贼。

为了镇压卖国汉奸，打击日伪反动势力，我九区政府决定：掉鬼子这个“耳朵”，把郑国臣捉拿归案。

当时，南窖村是敌人的中心据点，驻有一个伪军大队，一个特务大队，一个伪警察所。村后北山上还驻有一个伪军中队，山上修了高高的炮楼子。在敌人眼皮底下把郑国臣逮出来，可不是容易事。稍有不慎，不但“耳朵”割不掉，反而会白白送掉性命。区政府研究决定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龙门台游击队长隗合宽同志。

194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隗合宽带领两名游击队员，化装进了南窖村，在我们的内线一伪警察所王巡长的帮助下潜伏下来。经过了解，得知郑国臣就住在特务大队。由于他颇受日军青睐，每天傍晚都要去日军中队部汇报军情，接受第二天任务。为了不惊动村里的伪军，隗合宽决定在南窖村外下手。

日落西山，天渐渐黑下来。隗合宽安排两名游击队员监视伪军大队，只身来到村外北山脚下埋伏下来。等了几袋烟的功夫，郑国臣大摇大摆地从村里出来，哼着小调往北山走。当郑国臣和隗合宽擦身而过时，说时迟，那时快，隗合宽一个虎跳，猛的向郑国臣扑去，他右手锁喉，左手下了郑国臣的手枪。跟着来了个“甩包袱”，把郑国臣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国臣这小子从小就偷鸡摸狗，略通拳脚，他一个“兔子蹬鹰”，挡开隗合宽，随即就地一滚，跳起身来扭头就跑。

郑国臣为什么不向日本岗楼上呼救呢？这里有个缘故。每逢天一黑，日本鬼子便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出来。如果郑国臣一喊，日本鬼子的子弹可没有长眼睛。所以，俩人打的是哑吧仗——郑国臣不敢叫喊，隗合宽也不能开枪。

惊慌失措的郑国臣，向南窖村里跑去，留在村里的那两名游击队员马上挡住去路。所以他又立即向右拐，朝水峪村跑去。

水峪村离南窖有四里多地，村里有一个日本鬼子联络员叫陈芬。此人与郑国臣有八拜之交，是一个铁杆汉奸。他早已上了我抗日政府的“黑名册”，成了除奸对象。郑国臣自恃腿脚灵便，以为甩掉了隗合宽等人，便一头扎进了陈芬家里，吹起天大的牛皮来。

其实，隗合宽等人并没有被郑国臣甩掉，当他钻进陈芬的屋子时，隗合宽也翻身跃墙跳进了陈芬的院子，并悄悄地打开了院子大门，把另外两名游击队员接了进来。就在郑国臣一碗茶水没喝完，满头大汗没落净的时候，隗合宽三人突然闯开屋门，把三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了郑国臣和陈芬的脑壳。当夜，这两条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便被押回了九区政府。

第二天，九区政府在龙门台村召开了公审大会。在公布了郑国臣、陈芬的桩桩罪行之，就地枪决了。这正是：

隗队长，智谋多，  
深入虎穴割“耳朵”。  
好比缸里抓“王八”，  
逮一个还捎一个。

## 虎口拔牙

抗日战争时期，隗合宽经常深入虎穴、打鬼子、除汉奸，有勇有谋，令日伪军闻风丧胆。他们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吓得胆颤心惊，就连伪军们在一起吵骂的时候都说：“你出门碰上隗合宽才好呢！”而当地的抗日群众却亲切地称隗合宽是“隗大胆”。

当时的隗合宽二十出头，身强力壮，虎背熊腰，而且还略通拳脚。他和游击队员们除汉奸、杀鬼子，割电线，摘电话，经常去敌区活动，搅得鬼子伪军终日不安。为此，日军驻南窖村司令部定下赏格：“凡活捉隗合宽者，赏银元一千”，“凡打死隗合宽者，赏银元五百”。并叫人画了隗合宽的头像，四处张贴。

出赏格是鬼子的事，伪军们可不听那一套。他们说：“那银元不是好挣的，谁碰见隗合宽吃饭的家伙就得搬家”。所以，有的伪军官兵还主动地与隗合宽建立联系，以保自己的身家性命。伪军中队长尤茂志，伪警察所王巡长，后来就成了我们的“内线”。

伪军里面也有个别的铁杆汉奸。当时的特务大队长程子良就是其中一个。他仗着自家在南窖，手下有人，曾经当众夸下海口：“他隗合宽不也是一个脑袋吗？老子不怕他。有朝一日叫他碰在我手里，一千块银元就算拿定了！”

为了杀一儆百，教育伪军官兵，打击敌人气焰，隗合宽请示上级批准，决心深入南窖，虎口拔牙，把程子良捉拿归案。

194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隗合宽带上四名游击队员，化装成赶牲口驮煤的、买东西的混进了南窖村。隗合宽头蒙着白毛巾，上身穿一件对襟漂白小褂儿，下身穿一条半旧的青布裤子，脚穿一双千层底布鞋，腰间别着张着机头的手枪和锋利的匕首。他牵着牲口在前面走着，看上去象个驮煤的，可他的眼睛却机警的注视着四周，其他三名队员尾随在后面，他们很快就进了南窖村。南窖是日伪的中心据点。而程子良的家，又安在村子中间，程家的右面，不到五十米，便是伪警察所。程家后边几百米的北山上，还驻着一个日军中队。要在这种场合把程子良生擒出来，不但不能开枪，甚至连发生一点较大的响动都不允许。不然，不但捉不住程子良，还会使我方受到很大损失。隗合宽决定天黑动手，奇袭程子良，然后连夜返回龙门台。

晚上八点多钟，伪军大队部和伪警察所里开始打麻将、押宝，不时的传出一片喧叫声和稀哩哗啦的麻将牌声。隗合宽五人悄悄换进了程家大院。只见程家大门已经上好，临街的窗户也全垒死了。隗合宽嘱咐了另外四人几句话，就一个箭步向程家大院临街的两间南房奔去。这两间房块石砌墙，石板盖顶，后房沿离地有一丈多高。隗合宽借着冲劲儿，在墙上使劲一蹬，双手早扒住了房沿石板。接着，他双臂一用劲，把右脚举上房沿，来了个“猿猴滚技”，便稳稳趴在了房顶上。这时，从伪军大队部和警察所传来阵阵哄骂声，伪军和伪警们正在挥霍着白天勒索来的人民血汗。隗合宽爬在房顶前边，认真侦察起院内的情况来。程家这处住宅，是一处不小的四合院，东西两面是三间房，北面一溜五间房，南面是四间房和大门。这时，院子里只有两间北房还亮着灯，并不时传出一男一女的说话打闹声。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只听北屋门帘一响，一个黑影走了出来，隗合宽正爬在房上吃柿子，看到屋里走出了人，便精神一振，他仍下手中的柿子飞身从房上跳了下来，两步就冲到了那个黑影面前。谁料想，这黑影原来是个女的，听听那女人“啊！”了一声，便一屁股瘫到了地上。这时的隗合宽双眼灼灼逼人，全身热血沸腾，他意识到，必须快速行动，出奇不意。于是，他脚不点地的飞快向北屋奔去。

北屋里的程子良，刚刚抽完大烟，和他的老婆打闹一阵后，正歪靠在炕上闭目养神。当他听到女人“啊！”了一声以后，开始没有往心里去，他觉得这深宅大院万无一失。心里骂着：“深更半夜的叫他妈什么。”正想着，只听“啱”的一声门响，见一人扑进了屋里，这才大吃一惊，赶忙伸手到枕头下摸枪。隗合宽上前一脚

踩住了他拿枪的手，乌黑的枪口早已对准了程子良的脑壳，就在程子良一愣神的功夫，隗合宽很快弯腰用左手把枕头下已经张开机头的手枪拿了起来，用双枪对准了程子良。

隗合宽用枪口一点，低沉而满带杀气的说：“程子良，你这个汉奸，不是要抓我隗合宽吗？我送上门来了，你打算怎么办？”程子良哆哆嗦嗦地说，“隗先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要什么我给什么，让我怎样就怎样，请饶我一条命吧！”程子良为保狗命，恨不得趴在地上冲隗合宽磕上两个响头。

隗合宽把双枪往腰上一插，抓起程子良的枕巾，先堵住了他的臭嘴，随即又掏出绳子，把程子良捆了个结结实实。最后，隗合宽抽出腰间的匕首，在程子良面前一晃，威胁地说：“姓程的，跟我走一趟，如果你不老实，看这个”。说完连推带拉，押着程子良出了北屋。

院子里吓昏了的那个女人，还瘫在地上没动。隗合宽押着程子良从她身边走过，她连看也没看一眼。

隗合宽打开院门，会合了另外两名战友，立即押着程子良绕出了村。等他们走出去三里多地，才听到南窖村里传出一阵枪声和叫喊声。

第二天，龙门台村召开了千人大会，历数了程子良的罪行。经我抗日政府批准，把程子良就地枪决。随着“砰、砰”几声枪响，这个卖身投敌，为虎做伥，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铁杆汉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正是：

隗合宽大智大勇，  
为抗日立下大功。  
入敌区虎口拔牙，  
不愧是民兵英雄。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 忆白文如同志

王国富

白文如同志是房山区东南召乡务兹村人，1914年8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儿时丧父，其家一直由母亲支撑着，经济和生活上很困难。当时的社会正值多事之秋，军阀混战，列强掠夺，水旱灾害连年发生。因此，伴随着成长，使他深刻地认识了黑暗旧中国的现状。

白文如十七岁那年与宁淑茂结婚。从此，二人便承担起繁重的家庭负担。1931年白文如一家仅以维持生活的小梨园被四周街坊种的钻天白杨遮盖，加上梨树病虫害加重，白文如不得不将梨树全部刨倒，改种庄稼，因地力差，收成少更难维持家庭生活。

到二十几岁时，白文如通过向他人学习和自己的努力，掌握了果树的管理技术，开始承包果园，做买卖。随着交往面的扩大，从更多的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中，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旧社会的罪恶。在接触的人中，他最信服的是王玉喜，中共涿良宛县的地下工作者。与王玉喜的交往是白文如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通过王玉喜，白文如又先后结识了张晋龄、田连仲等一些附近村镇的共产党人，了解了一些革命道理，从思想上产生了一种奋斗抗争的意识。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使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上。与此

同时,白文如开始同革命同志一道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坚定信念跟党走。此后他经常利用经营梨园做买卖的方便条件,为八路军送情报和生活必需品,在家中建立党组织的最早联络站。

1943年夏,在涿、良、宛县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由王玉喜和王秉章等人介绍,白文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务滋村的第一位共产党人。此后,白文如继续积极开展秘密工作,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务滋村第一个党支部,自己任党支部书记,担起了革命的一重任。

1945年7月,务滋村建立抗联会,白文如任主任。抗联会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组织,主要任务是实行减租减息。推行共产党的政策,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给党组织,八路军,区小队等筹集经费、粮食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实行保甲制,抗联会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监督伪保甲村政府、清查伪保甲长所管理的帐目。这些都深受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得到衷心的拥护。

抗联会成立后,由白文如组织并发起了兴修刺猥河下游的水利工程。这项工程北起官道乡东石羊村东小石桥,南到东南召乡路村西南,全长20多公里。这项工程使沿线各村防洪、排涝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深受群众欢迎,村民踊跃参加。从此抗联会的名声大振,白文如也随之名声远扬。

这次活动是共产党组织的抗联会第一次公开活动,兴修水利,人民受益,白文如却遭到伪国民党良乡县党部的敌视,当时的伪国民党良乡县党部书记黄侃就是其中之一。这次兴修水利,就是先从他家的占地开始的,出于当时抗联力量的强大,其表面虽然默认,但暗地之中却费尽心计想杀害白文如同志。另外,为了打击伪保长的气焰,通过清查务滋村伪保长的帐目,抗联会决定在1945年农历8月13日上午让伪保长徐殿魁游街示众。8月12日晚上,区小队三十多人来到务滋村,积极支持抗联会的活动。

8月12日夜里两点多钟,伪良乡县党部决定派良乡还乡团200多人由大队长毕喜亭带队,镇压抗联活动,抓捕白文如。还乡团沿路见人就杀,气焰嚣张,有人得信后连夜转告白文如,让他赶快躲藏起来。可白文如想到让徐殿魁游街的各项工都己安排就序,而且张晋龄、房文权等区小队三十来人也在村中,就断然的留了下来,急忙给村中的抗联会成员及区小队战士送信,途中不幸与还乡团相遇。白文如见已逃不脱,手急眼快将上衣口袋中一张共产党员的名单地址吞进了肚里,敌人见状,恼羞成怒,拳打脚踢,非要白文如吐出纸条,可是白文如深知名单的重要性,任凭敌人怎么打,硬是不吭一声。敌人无计可施,押着白文如出村,经过村中十字街时恰遇白文如妻子宁淑茂寻来。白文如见状,急忙示意妻子一定要冷静,并暗示家中似有东西待转移。宁淑茂眼见被打得满脸是血的丈夫,只得忍住悲痛,遵从白文如的意思回到家中将所有的文件材料用布包好,扔到对门路南邻居家的厕所中。

逮捕白文如之后,还乡团又抓走了村中的一些人,拷问区小队及张晋龄等同志的下落,然后一路押到村边一块空白场子上。敌人在实施完最后的诡计之后,面对始终坚强不屈的革命同志,举起了罪恶的枪口。

白文如被害后,敌人又在村中烧杀抢劫一空。目睹敌人的暴行,穷苦的百姓更加仇恨国民党反动派,革命的火种愤然烧起。白文如为了革命的事业,过早的离开了务滋村人民,然而他对革命事业操劳无悔,抱以终身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白文如同志已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事迹人们没有忘记。务滋村民为了纪念白文如等同志,建立了革命烈士墓。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 袁载民传略

卓成栋

袁载民从医五十三载，以医治妇产科病症尤为著称，他那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在良乡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留下的医著虽然不多，但其撰写的治疗肠痈八十五例篇及数以百计的经验良方，至今为后人所传用。加之他为人耿直，憎恶分明，救人于危难之中，常为贫家病人付药款，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敬佩。

老先生名堃字载民，祖籍山东，京郊房山大紫草坞村人。其父为农，早年家道贫寒，靠租种十余亩薄田和借贷度日，可谓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父叔四人均目不识丁，其二叔因家贫一生未娶。袁载民为长门独子，儿时拣柴放猪。谙世后叹家道不兴，皆父辈文盲所至，故发奋立志读书习文，但家境如是，无力攻读，因而其二叔去门头沟下窑挖煤备受折磨，省吃俭用得些少许收支，才得以跨入私塾就学。后因其叔积劳成疾经济来源中断，私塾仅读二年，便入窦店复巨恒中药铺习医学徒，从师邵万福。药铺生涯，名为学医，实为杂工。除铺内一应杂备由学徒担任外，药铺的制药、采药、丸散膏丹制作的所有下手活计均由徒工去做。至于学医，先生公开教授极少。名为学、实为偷。但又不得令其察觉，故常在夜间或借乡下讨债之机学习本草备要、沟头歌诀、濒湖脉诀等。从边偷至边学，进步维艰。袁载民十三岁进药铺一干就是十五年。十五年间经历了痛苦的磨炼落得手足斑痕累累，深得其师医道要旨。且丸散膏丹炮炙技艺娴熟，博得师尊喜爱与铺主信任，二十八岁专事从医，为乡邻治病。

袁载民从医后，遵古而不泥古，继承和发展了其师的医道真传，并时有创新，疗效颇佳，深得方圆数十里群众称道。当时窦店乃是集贸中心，每逢集日，铺前求医者甚众，多时日诊达百人，延医者数十里。当地盛传窦店复巨恒小袁先生，诊治疾痛妙手回春，尤善妇幼科诸多痛症，引得四方求医者绵延不断。

从医后，袁载民学习更加刻苦。结合临床攻读内论、脉经、甲乙经、难经、伤寒、金匱、医宗金鉴、本草纲目、傅青主女科等诸多医学经典，使其医求更精。行医中他极重临床，经常曰：“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因此看病行医从不妄断，总是问及痛者的方方面面，据其症状和舌象脉象得出正确的诊断结果，如对一般麻疹病患者的治疗用药，医著的经验疗法麻疹初期率温室透药调治。而他则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采用清凉透表药物治疗。使当时的有名老中医大惑不解，然而临床效果却令同行刮目。为良医者除具有很强的临床治疗经验外，还应具备深厚的药理素养。袁载民则是这二者集于一身，他深通药理，熟读药学，善辨药的真伪。更兼他有一拿手的丸散膏丹的炮炙技能，使得他行医治病得心应手。当时向南就医者最远达河北省涿州、涑水、易县；东边就医者达卢沟桥、长辛店、大兴；西处抵房山、长沟；北处至坨里、河北等地。晚年则波及本区境内深山区，慕名求医者不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入京郊。当时窦店地处南北交通要道，首当其中。复巨恒药铺也在炮火中被毁。袁载民举家同难民一道向西逃难。先逃到五侯，后至双磨，遭日军空袭，险遭罹难。最后逃至南尚乡后石门村时，日侵略军已占涿州，继续南犯，战争不知时日。一因盘费不足，二因逃难无期，乃携至家冒死退回故里。一进家园，满目凄凉，衣物被洗劫一空。邻里闻讯主动借衣被，借粮及炊具。草草把家安置下来。第二日返窦店复巨恒药铺，此时掌柜郭某已全家迁至北京，对店铺撒手不管。散去的伙计闻先生返回，又聚拢来，重操旧业。两日后有人告之土匪欲绑架载民先生，以要挟掌柜高价赎人。于是袁载民带家七口连夜逃至良乡城内。不久，复巨恒药铺连遭土匪洗劫，1938年春节前后，原复巨恒药铺伙计崔秀、金印章、刘惠、杨某四人找到良乡与载民先生商议生活之计。在众人恳求下载民找到原复巨恒掌柜，动员他再投些资

把窦店药铺迁至良乡。掌柜不同意，袁载民自己做主，伙同上述中同事，冒生命之危将窦店药铺残破的用具及草药偷运至良乡，在南街租了两间房屋，复巨恒又悄悄地开了业。

凭借袁载民治病声望，城内中药店福元、福祥两药局主动赊药给他们。病人闻讯上门求医，不久即传遍全县，请出诊及就医者与日俱增。三年后袁载民持纯利二百元送至原复巨恒掌柜手中，掌柜才来良乡查看。因他未出资，未出力，药铺从重新开张到盈利全为袁及伙计们所为。因此袁载民要求为全店伙计增加工资，掌柜不允，一气之下，他辞职不干。良乡人和永药铺掌柜赵子和闻讯，急去家中聘请。先生嫌其常售假药，有损名望，婉言谢绝。但赵三番五次到家中恳请，许诺给予高薪，并托人从中撮合。袁载民提出三点要求。即从此人和永勿售假药，不得粗制滥造丸散膏丹；他去人和永须带旧药铺司事崔秀等三人；工资均优于复巨恒。赵一一应允，于是袁载民便又到人和永坐堂行医，使濒于倒闭的店铺又红火起来，诊治疾病名声大振。

1945年日寇投降，国民党飞机在京散发传单，谎称若干万吨物资北运，商人恐惧。一时物价猛跃，大批商业倒闭。袁载民长子景荣失业在家。全家十四口全靠袁载民一人养活实难维持。遂萌生自办诊所念头。翌年即在良乡镇路家胡同租赁两间民房，父子二人开办了一个业余诊所。白天在人和永上工，早晚在家看病者即在家中取药，到后来看病者与日俱增应接不暇。他干脆辞掉药铺职事，一心从医看病教子学医。袁载民看病不嫌贫富，他言：“求诊者可论尊卑贵贱，远近亲疏，老幼妇孺皆病人也，医者治病治人非商贾”。又曰：“勿在病家餐，床上卧病人，地下立愁人。药钞医者餐，病家几多钱”。正是这种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使他在地区中医界享有盛誉。

解放后政府号召个体开业医生组织起来成立联合诊所，袁载民第一个响应，并成为大众联合诊所中的骨干。1958年良乡地区良乡医院建立，他又被聘到良乡医院任职。此时袁载民已年过花甲，医术更加成熟，但他仍刻苦学习，常查阅《医宗金鉴》、《寿世保方》、《医林改错》、《黄帝内论》、《温病条辨》等诸多经典医著。擅长妇科症积疝巨、崩症、痛经、经血失调、带下、不孕及内科膨胀、肋痛、肠痛、偏瘫。下痢、龟背痰、疥、疹等诸症功力深湛。如一女性患者，由家人百里用车送来就医，病者面黄肌瘦，毛发脱落，腹大断经。袁载民诊为症积；与其益气固本，活血化瘀药兼施针灸疗法，使其痊愈。又如一位被大医院宣判为死刑的肝硬变晚期女性患者，慕名求医，经他诊治，使其痊愈，病人愈后又生一子。

一妇人患乳疮症，左乳溃十一孔，跑遍地区数家医院和民间医师，均不奏效，病情反而加重，后得袁先生诊治。他查清病情之后，采用内服扶正去邪药物，外施药捻，经往返十余次后治愈，且乳汁畅通。

紫草坞村一男子患剥脱性皮炎(中医称湿毒)全身皮肤尽皆脱落，遍身流黄水，身不能着衣被，痒痛难忍，求袁先生诊治。他自制清热燥湿药面数斤，先在褥上撒药粉，再叫病人卧床，用笕筛药粉于其全身。内服清热解毒燥湿草药，数次而愈。此症属难治之症，且死亡率高。袁载民治病重临床，重实践，敢创新。他在治疗卵巢囊肿、剥脱性皮炎、阑尾炎、疮痍等杂症中也收到奇效。他曾告诫后人，为医之道，尊古不泥古，要在古人基础上加以创新，中医才能发展。他就是遵循这条原则，传授弟子也同样遵循这一原则。他教授严格，热爱中医事业，在技艺上刻苦追求。除自己提高外，还带起了一批中医骨干力量，使良乡医院的中医水平显著提高。当时慕名来看病者，半夜就来医院排队，日诊量最多达百余人。在他八十岁高龄时尚能看病五六十人。在繁重的日诊和疑难病会诊工作外，他还担任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解放初先后担任过工商联评议委员、医药联合会组长、卫生工作者协会会员。

袁载民一生谨遵古训，博采众家，崇尚张仲景、孙思邈、吴鞠通、龚云林、傅青主、王清任诸家。瘟疫精心审慎，选方用药不偏不倚，灵活善变，治愈病人数万例，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重医德，轻名利，为人服务不图报，不留名，拒送礼，堪称为医者的大家风范。因此，在他八十四岁高龄患病而歿时，数百名乡邻手持花圈沿路送丧、致哀。足见他为人行医济世的崇高医德水准和精湛的中医技能。

## 铁脚板任成水

李国栋

六十年代房山著名的十二面红旗之一，当时的房山县劳模、北京市劳模任成水，他的事迹 1961 年在《北京日报》、《人民邮电报》报道过，1965 年被拍成电影《红色邮路》，在群众中广泛传颂。

### 一

任成水生于 1930 年，房山区霞云岭乡四马台村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年幼的任成水扛起了红缨枪，多次和母亲一块给八路军送信。1946 年他参加革命工作，在张坊当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通信联络。幼年时送信有一定的基础，工作干的很顺利。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给八路军、游击队送情报的任务。解放前夕，年满 18 岁的任成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 年任成水当上了房山第一代投递员，到房山邮局工作。

### 二

1951 年下半年到 1953 年上半年，任成水分管房山一周口店—蒲洼—四马台—北岭—上石堡—四马沟—葫芦棚—黄院—房山的路线。途经 40 多个村庄，要翻过约 80 个山头，往返一趟要 6 天。星期日休息时还要做好交接邮件的工作。就这样不管风里雨里黑天白夜，几经春夏秋冬他硬是走出了一条从房山—青峰岭—拴马庄途经十几道山梁，近百个山头的路线，在投递中他还坚持把信件投递到户，挂号信送到本人手里。铁脚板就在这时形成了，铁脚板的精神、事迹也逐步的开始传颂在群众中。

从 1953 年 7 月起任成水又担起了从房山—丁家洼—坨里—万佛堂—南车营—半壁店—南窖—英水的路线，四天往返一趟。后来他又调至房山矿邮政所工作，直到 1955 年底。

从 1956 年开始他调到河北镇邮电支局工作，一干就是十七年，每天走百余里的山路，一年下来走过的山路达 4 万余里。他负责的是从河北镇到大安山的邮路，全长一百余里，山水沟滩等地形俱全，全程要爬 7 座山岭，过四个山洞，其中第三号山洞有六里多长，洞里泥泞、漆黑，山路更不好走，过明山有一个“老虎嘴”，山上只有窄窄的一脚之地，行人要手扶山崖才能通过，下望就是悬崖深谷。他每天就奔走在這條路上，下午三、四点钟报纸运到后出发，近午夜才能送完信件。冬天太阳下山早，有二分之一的時間得走夜路，送完报以后赶到哪就睡在哪，早八天前赶回河北邮局。大雪过后，山路都铺上一层冰，走在上面一步一滑，摔得浑身作疼。1963 年 8 月的一天下大雨，山洪暴发，他硬是穿好雨衣带好邮件出发了。走上大石河以后，听人说刚捞上个人来，过不去，他就绕行。扒着荆棘柴林，寻路走上山顶。谁料路走错了，又得下来，等到了陈家坟工地他已经成了泥人。第二天雨还下着，他又继续向大安山走，途中不慎触电，经过人工救护醒了过来。当时他浑身无力头昏心跳，但不顾别人的劝阻，挣扎着走向大安山。

报纸的时间性很强，有时报纸出版晚，往往是因为有重要新闻和消息，可越晚群众越想及早看到。他理解群众的心，尽量晚中求早。1965 年全国三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当选为国家主席，他硬是深

夜十一点多把报纸送到了矿务局瞧煤涧工地。同年2月,县委给大安山公社党委发了一个紧急指示,干部们急等着用,他心急如火,一口气将指示送到了。1963年以前,在河北支局投递范围的七个公社,78个村中绝大部分看不到当天报纸,最晚的要过一个星期才能看到,当时中山村有人订了一份《北京日报》,一个月只看到八张,一生气就不订了。要加快传递速度,有人提出必须添人,局里也同意,可任成水却算计着用改变投递路线的办法来解决。在上级支持下,他的第一次调整方案顺利地通过了,把原来的早八点出班不等当天报,改为等当天报,而且各段都增加了投递点。这样许多村能看到当天报了。只剩南窖等地还看不到当天报,他又第二次提出调整方案,打破原来的投递界线,实行巡回投递,每人又增加了投递点,使南窖等村也能看到当天报了。可这又产生了人力不足的问题,有人认为能保持第二次的调整路线就不错了,可任成水还是揣摸别的方法,觉得潜力还可以再挖,就又提出新建议:延长投递路线到大安山,信件一路投递,避免空跑。这样从河北到大安山的路段来回长达百余里,当天往返。

这段邮路能不能保持,成了实施方案的关键。任成水一狠心,主动承担了任务。这样河北邮局投递范围的群众都能看到当天报了。群众手拿报纸惊奇地说:“现在能看到当天报真是想不到。”

任成水在投递的过程中以优质服务,赢得人们的信赖。他开始走这条邮路时就听到群众反映,信不给代寄,报刊数量少,发工资不好汇,邮包要自己取,意见很大。他向领导请示后,决定改进工作,扩大服务范围。他每晚到工地揽收包裹,沿路卖邮票信封,小型包裹就顺便给代取了,工人要寄钱随时都可以找他,对于残疾人他就送货上门。他还特别留心用户的困难。一次看见一位用户在营业室没带全证件不能当即取款,以后再见到通知单时,他就把邮局汇款手续向用户一次讲清。煤矿工人经常调动,他就跟踪送信,从不怕麻烦。对于瞎信他总是想方设法投出去,决不轻易退回。1964年7月从江苏给陈家坟工地徐少三的一封信,他先后跑到陈家坟、西流水、瞧煤涧、红煤厂四个工地才找到徐少三,使徐及时从良乡车站接回从外地来的妻子儿女。一封从山西寄给张大有信,他碰了四、五次都找不到人,在认定确有此人之后,终于辗转打听到张大有的地址。他办事也不分份内、份外。有位中山村的老太太胳膊疼,托他买“金不换”的膏药,他借出去开会的时间,跑遍了十几个药店都没卖到,事过半年他还没忘,从城里的小药铺终于买到了“金不换”的膏药,又亲自给老太太送去。另外代别人刻章、购物等大小事儿,只要能办到的一定帮助办。

他时时处处热心为群众服务,受到群众的爱戴。他曾光荣地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市政协委员。1961年人民邮电报道了他不为名利、埋头苦干的事迹,并配有《做一个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的社论。1965年7月1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山区铁脚板——任成水》一文,用大量篇幅介绍他的事迹,并配发了社论《随时随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当年5月根据他的事迹拍成电影《红色邮路》。六十年代任成水已成为邮电战线上学习的榜样,许多服务系统干部、职工都在学习他的工作态度和革命精神。他的名字在京郊大地到处传颂。

### 三

然而,任成水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建国以后,他觉得革命成功了,自己也可以回家种地了。后来领导上分配他到霞云岭走大班,在人员不增的情况下由五天一趟改为四天。有的人说怪话,他也跟着跑,认为领导和他过不去。1952年领导考虑他没上过学,让他上了二十八天的速成识字班,使他在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1958年参加河北邮局的服务改进工作,他又在认识上提高了许多。1963年三次调整路线对他是个考验。当时有的人说是三分钟热气长不了,有的说是为了他个人出风头,局里十六个人只有一个赞同的。但他认为只要是为了工作,就不怕别人说长道短,经再次向组织建议批准后,他又主动承担了调整后投递的重担。虚心向别人学习是他不断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解放初期他就利用和杨万学在一块工作的机会使自

已达到高小文化水平。1959年参加市群英会，他又得到一个很好学习的机会，在听了全国劳模时传祥、罗书珍的事迹以后，他结合山区投递的具体情况，分析用户的特点规律后，使投递的速度明显提高了。另外他还主动向其他行业的先进人物学习，为山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排忧解难。

随着认识的提高，他逐渐地能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一次替人取款，由于疏忽把汇款单忘记放到哪了，当他找到后及时将取款单给人送去，可连声谢谢也没听到，但他仍然坚持为用户取款，而且更认真、更仔细了。

1973年10月任成水调到市邮局工作，先后任市邮局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全国上下焕发出新的生机，1981年10月，任成水又重新回到房山工作，1991年10月光荣离休。

如今，时代不同了，条件好多了，投递工作有马路可供驰骋，有摩托可供驾驭，但铁脚板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一宗珍贵财富，应该学习、借鉴、发扬光大。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 缅怀我的父亲隗永泽烈士

隗合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我的父亲隗永泽为抗击日寇壮烈牺牲的51周年。

提起父亲，我自出生后只见过他一次，他留给我的除了一张发黄的相片外，便是那张鲜红的烈士证书。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我父亲正在洪寺师范学校上学。由于战乱，学校被迫停课，父亲想当个教书先生的愿望破灭了，只好回到南窖村庄敬山开的药铺当学徒。

当时，有个叫包森的共产党员来到南窖宣传抗日，父亲常去听他的演讲。庄先生也给他讲抗日的道理（后来才知道他也是共产党员），于是他的心里便埋下了抗日的种子。

1938年12月，我父亲经县领导赵然介绍，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水峪村的第一批党员。

日本侵占南窖地区以后，对这里的人们进行了疯狂迫害。父亲恨透了他们，就对母亲说，要投奔八路军，扛起枪，打日本。

一天傍晚，母亲正在西屋厨房做饭，忽然看见一个挎着包袱的人影在窗前一闪就不见了，便知是父亲走了，于是，母亲和奶奶一起追了出去。等追到村外的北山坡时，看到父亲已经到了大台岭的半山腰。母亲哭喊着：“春子他爹，你回来！”本家的二大伯追过去硬把他拉了回来。第一次离家当八路的行动失败了。

1939年秋，父亲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瞒着母亲提前把几件要穿的衣服藏到村外的谷草垛里。一天早晨，鸡刚叫，父亲就对母亲说，南窖村有个同学欠我点钱，我去要，一会儿就回来。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踏着晨曦走了。

这一年的腊月，我来到了这个人世间。我刚刚记事，就记得日伪军常到我家来搜查八路。

有一次，奶奶有病正在炕上围着棉被喝小米粥，就听里院的大叔说“日本鬼子进村了”。不一会儿，一个小个子日本鬼子手里握着鞭子，一个大个子伪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闯进屋来。那个日本鬼子站在炕沿边问奶奶：“你儿子当八路的有？”奶奶打岔道：“我家没有大车。”气得那个日本鬼子照着奶奶的头就狠狠地

抽了两鞭，临走时说到：“你儿子当了八路军，他要是回来了你马上报告，不然统统死啦死啦地有。”

1944年的一个深夜，狗的叫声把我惊醒，听到二大伯的叫门声，并听说我父亲回来了。区政府派了两个人来送他，因怕村里有鬼子，就先到了二大伯家。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后看到父亲正在和爷爷、奶奶、大伯说话，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心里害怕，就躲到墙角偷偷地看父亲。只见父亲身着蓝布便装，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很精神。这时屋里的几个人逼着我叫爸爸，我被迫无奈叫了一声“爸爸”，只见父亲脸涨得通红，没有勇气答应一声。

白天父亲哄着我，把他身上仅有的两件东西：一把手枪和一个小圆镜子给我拿着玩。我幼小的心灵似乎预感到父亲还会走，就把这两件东西一会藏到母亲的箱子里，一会又藏到被子里。当时以为只要把这两件东西藏好了，他找不到，就不会走了。

终于，父亲还是走了，他到了县政府，找到了赵然和庄敬山，被分配到县银行工作。后来，银行主任庄敬山牺牲了，他便接替了银行主任的职务。当时地下斗争非常残酷，二区连续牺牲了五位区长，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他自告奋勇到二区当区长。他说：“现在的斗争很残酷，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第二天，鸡刚叫，父亲便走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亲。

1944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专员周林把我和母亲叫到了村里的杨天纪家，告诉了父亲牺牲的消息，母亲听后，抱着我痛哭。周林一边劝慰母亲，一边讲述了父亲牺牲的经过：

父亲带着五个同志去搞敌区工作，被特务发现，晚上，伪军头子何茂银带着十多个日本鬼子和狗腿子包围了他们住的院子。父亲他们发现后，从后窗跳出突围，结果不小心跑进了白薯井内。父亲用肩膀把五位同志顶了上去，别人还没有来得及拉他，敌人已经冲了上来，其他同志冲了出去，可他却被敌人围在了白薯井内。敌人想抓他，刚一探头，他便开枪打他们。敌人向井里开枪，他藏在拐弯处，打不到他。敌人喊话叫他投降，他大骂敌人，誓死不当亡国奴。日伪军恼羞成怒，找来了玉米秸和辣椒，点着了火熏他。烟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感到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就烧掉了随身携带的文件，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当敌人从白薯井里把他拖出来的时候，发现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下颚，见他还活着，就找来担架往涑水县城里抬。走到涑水城外，父亲渐渐地苏醒过来，他看到四周都是敌人便从担架上滚了下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第二天晚上，一个叫陈民生的地下党员，找了一领席，偷偷地把他埋在了小河边。

五十一年过去了，我虽然只见过一次父亲，可他的伟大形象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烈士伟绩，永泽平西！”

这是我的孩子们在平西烈士纪念馆的烈士名册上看到他们的爷爷——隗永泽的名字时，在留言簿上挥笔写下的两句话。

当我们站在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前，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是的，正是有了像我父亲一样千千万万烈士的英勇牺牲，才有了中国的今天！作为烈士的后代，我一定要继承先烈的遗志！

父亲牺牲后，母亲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和我的子女长大成人后，也都先后入了党或入了团，为党的事业而尽心尽力地工作。

安息吧，我敬爱的父亲！

## 浩然在新街

张玉泉

1969年初春，周口店乡新街村迎来了五位北京市机关下放农村劳动的干部，组长是一位浓眉大眼、方脸盘的中年男子。他中等身材，留着平头，穿着扣门青夹袄，脚登青布鞋。他热情、好说爱笑，很快就跟村民们混熟了。他就是著名作家浩然。

新街村的干部听说公社来了一批下放农村劳动的干部中有位名人，是农民作家浩然。村支委、文艺宣传队队长刘凤香想：“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她征得支书的同意，决心把浩然“抢”到新街来，她急急火火地找到公社书记提出要浩然的理由。公社书记赵英立即改变了原来的分配方案，同意把浩然分配到新街去。

—

浩然在新街将近两年的下放劳动生活中，与农民朝夕相处，结交了一大批农民朋友，白天在田间、地头、菜园里、瓜棚下一起劳动中谈天说地，晚上蹲在街头，坐在寻常百姓家的炕头上、灶膛旁拉家常、扯闲篇儿。在他的衣袋里总是装着小纸条、叶子烟，一边聊天一边卷“大炮”。从那冒出浓浓烟雾中了解了交谈者的身世、苦辣酸甜的人生。那些家常琐事都装进浩然的心里，成了他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写进了他以后的作品中。

农民是他的挚友，他是农民的知心人。村内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真诚的帮助。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萧尚德是村里数得着的困难户，他有七个孩子，最大的刚上小学五年级。萧的妻子体弱多病。浩然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经常到他家里帮忙，搞卫生、干家务。萧的15岁的大女儿因家务负担重，功课跟不上，浩然常去辅导孩子们作功课，写作业。还帮助孩子们洗衣服，给她们梳头洗脸。浩然还把自己孩子穿剩下的衣服拿来给萧的孩子们穿。

萧尚德患了黄胆性肝炎之后，浩然不仅不嫌弃，反而关怀倍至。他每次回家都从北京给萧尚德买药。萧尚德病重时，他把自己替换的衣服让萧穿上，几次带他去北京看病，并在自己家住下，让老伴帮助护理。萧到京看病路费、医药费和其它费用，全部由浩然支付。浩然每月工资仅80余元，拿出一半给萧看病。在他的热心帮助下，萧的病逐渐痊愈了。说起此事萧尚德的大女儿，现任村妇女主任的萧素清异常激动。她说：“是浩然象一团火给我家以温暖，帮助我们度过那段难关。”

普通农民李术明有两个儿子。因李姓大户重名多，而一直没给孩子起大名。一天在地下干活时，李术明特意张了嘴，让浩然给起个名字。没想到浩然欣然应允，随后问了李家的辈份排列，当场就给起了李博、李远的名字。李术明全家人觉得这名起得特别好，有意义，十分高兴。

浩然与村民打得十分火热。平日常有三三两两的青壮年去找他聊天。聊晚了就叫开供销社打上四两半斤的白干，就腌个白菜帮儿，每人吃上几口，挤在一个炕上迷糊到天亮。浩然也常到那些寻常老农民家串门子，赶到哪儿就在哪儿吃。他和村民们几乎不分彼此。一次他从家里回来在石楼火车站下车行走了七、八里路，又渴又饿，到村后又进不去屋。他随便拐进了党支部刘文奇家，不料也碰了锁，他只好打开窗户钻进了屋，翻开柜厨，端出剩饭菜热了热，填饱了肚子，便躺在炕上睡着了，自然得跟到了自己家一样。他有了好酒菜

有时不定提到谁家去喝。刘文奇等人的家里有新鲜吃的，也找浩然去一起吃，找不到就给他留着。

### 二

在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浩然虚心拜农民为师。他处处留心搜集素材，积累群众那些生动的有特色的语言。他在葡萄园干活时，结识了两位人称沙二奶奶和董二奶奶的老人。她们的俏皮话、歇后语非常丰富，说起话来，象联珠炮似的。浩然称她们为新街的语言大师。如：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走法；电线杆子绑鸡毛——好大的掸(胆)子；还有拿人家姓氏开玩笑的，把姓刘的说成“屁滚尿刘(流)”；姓周的说成：“稀屎混周(粥)”等等。凡是这类的用语，浩然听了都感到新鲜，总要问清是什么意思，再用心记下来，回到宿舍还要补记在笔记本上。

他在同村民的接触中象海绵吸水那样，每逢他听到的见到的或者遇到的那些他认为是有价值的能够发人深思的素材，他都要记笔记。这些都为他以后继续“写农民、给农民写”打下深厚的基础。他在以后创作的长篇巨著《金光大道》和短篇集《杨柳风》等作品里面有些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刻画得维妙维肖，把各种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不同思想、情绪和各式各样的行为，都活脱脱地表现出来。有的人物形象在新街至今还能找到他们的影子。还有那沸腾的新农村的种种场景以及散发浓郁泥土气息的田园风光，那些有意境的画面描写，新街人不仅感到形似，而且感到神似。这些都有力说明浩然在新街深入生活，扎根农民的功底是非常扎实的。

### 三

浩然在新街下放整整两年的时间里，积极协助村党支部开展工作，他既当党支部秘书又当宣传员，村里年初的工作计划，年终的工作总结，平日支部书记的汇报材料，学大寨、大批判会、“抓革命、促生产”誓师会上的发言都由他承担。一次在公社办的落实政策学习班上，领导让他搞个宣讲(国家既没外债，又没内债)大好形势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一阵掌声。自此乡里有什么大的材料也请浩然来帮助写。

1969年是个不平常的年代，适逢建国20周年大庆，又遇党的“九大”召开；纪念国庆、宣传“九大”的活动多、任务重。而新街村的文艺宣传队原来就搞得较好。浩然进村后便积极热情地帮助他们开展活动。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宣传队编写了许多时效强的节目。如小评剧《大槐树》、独幕剧《五棵大柳树》、七字一句的表演唱、快板书、顺口溜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他在为庆“九大”写的表演唱歌词(别人配曲)《公社喜开丰收镰》(署名集体创作)一炮打响，先后被县里、北京电视台调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为保留节目，每年夏收时节反复播放。词曲热情奔放，充分体现了农民丰收后的喜悦心情。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停播。浩然创作这些节目绝大部分在夜间，他创作起来非常专心、执着和严肃，创作前先深思熟虑，写出后再反复修改，才肯出手。他提炼出生活和感情，再创作出最适合的表演形式。

他还帮助党、团支部办黑板报和壁报，他给壁报起名叫《红笔杆》，辅导党团员群众写些批判稿、小评论和表扬好人好事的文章。不管是谁写的稿子他都尽量认真修改。在批评鞭笞不良现象的同时，他还鼓励和带头写些表扬文章，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扩大团结面。他对写稿骨干们说：“要多歌颂，少暴露，注意引导。”如1969年秋末，生产队按户分白菜时，每户一堆，有个代课老师偷偷用小棵白菜换人家大棵的。有人主张写小评论公开点名批评。浩然听说后便写了篇把小棵留给自己把大棵让给别人的颂扬文章在广播里念，在墙壁上贴，那人看了感到自己的行为很不光采。文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对创作骨干说：“这叫反其意而用之”。骨干们体会到：此法比直接了当地点名批评效果好，受教育人容易接受。

1970年秋天，浩然接到北京市委文化领导小组的通知，借调他回去接受新的任务。浩然在新街的两年，与其说是下放劳动的两年，不如说是扎扎实实深入生活的两年。是忠实地为无产阶级政治和人民大众服务的两年。在这些服务中，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为以后创作一批艺术品位高、思想性强、深受农民喜爱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 陈东来其人其事

张玉泉

陈东来原名陈福生。1937年后更名陈东来，当地人称“陈老耗子”。陈是原涿、良、宛联合县第五区（现窑上乡）五间房村人，1905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40年冬被我冀中分区处决。陈幼年上过两年私塾。十余岁开始放牛，15岁结婚，16岁时因挨了父亲打而出走，曾在村东大堤上流浪，遇吴佩孚部当了兵，后又被遣回乡，不久又参加了国民党的保卫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举旗拉杆子，成立抗日武装，曾先后任游击队四大队长、抗日复仇军司令、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人民抗日军司令等职。

“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在战场上被日本兵扎伤头部而晕倒，打扫战场时被救出。伤愈后回家。日本入侵房山大石河以东地区，他的叔伯姑姑等人被日军蹂躏。他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决心抵抗日本。1937年旧历10月，陈东来便在窑上、贾河村一带拉起杆子组织地方武装便衣队，打击小股日军。一次在永定河大堤上遇上两个骑洋马的日本鬼子，被陈东来用土枪打死一个，获手枪一支、东洋刀一把、洋马一匹。

同年，日军飞机炸开房山监狱，陈结识了刚出狱的周文龙等人。不久他们在天开组织28人结盟，称为“二十八宿”。仅一个月，便发展了200余人。陈东来出面向驻扎在琉璃河的国民党26军76旅（孙连仲部）请委，被委任为76路游击队四大队，弹药由该旅补充。数日内凑成600余人，转眼间即达千人，陈东来任大队长。

陈的队伍身着便衣，装备简陋，小部分人配有长短枪，大部分人只挂几个手榴弹，或持大砍刀。被群众称为“老便”。陈部构成较复杂，兵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被日军打散的国民党残部；二是无业游民；三是受苦受难不甘当亡国奴的黎民百姓。

陈东来的抗日旗帜打出后，人员与日俱增，而供给又没保证，每到一处都催款要粮，尤其对待那些有钱有势的富户毫不客气。催要粮款时，陈的部下时有对人捆绑、吊打、火烧或“借”、“抢”等现象发生。

1937年秋，驻扎大峪沟、西域寺的队伍给养接济不上时，就由陈东来、白秀亭开条子让各村村公所送。北尚乐村大地主杨雨楼依仗自己有武装抗交粮款，遭到陈部沉重打击，第二天杨雨楼一家及家丁共70余人被俘，抢走财物若干。

同年，陈的部下刘振海率百余士兵又到五间房村跟地主陈义家“借”枪，陈不给，敲门也不开，就砸，陈义从院内扔出砖头，一部的头打破。他们交上了火，地主陈义受了重伤，扛活的贾云被打死，房屋全部烧毁。从此，陈东来命令他的部下在家乡一不准“招兵买马”，二不准催款要粮，三不许在他的家乡胡作非为。

1937年底,日军对国民党孙连仲部76路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陈东来、周文龙的部队奉命破坏良乡、长舍一带大桥,以掩护76路军南撤。任务完成后,陈东来率部躲进张坊大峪沟一带,把游击四大队改编为“抗日复仇军”,把大队改为“路”,队长改为司令。第二年初,陈东来与周文龙在涿县石亭镇结拜为盟。不久,抗日复仇军又改为“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陈东来任总司令(付总司令郭志和、总参谋长苏永志),下设四路分片驻防,周文龙为一路司令驻长沟一带;二路司令白秀亭驻张坊一带;三路司令胡振海驻娄子水一带;四路司令张海驻涑水一带。各部建立后,均与日军有过小型交战,给日军以不同程度的打击。

1938年3月,八路军晋察冀一分团团长陈正湘和刘秉彦部挺进房山山区,组织抗日力量打击日寇。日寇感到陈的抗日力量越发壮大。这年九、十月间对“抗日同盟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古刹西域寺被炸。陈部有的撤走了,有的溃散了,有的叛变了。陈东来出山又重新组织力量,以便东山再起。

1938年秋,陈东来率残部驻扎官庄。中秋节前一天,驻码头镇警察总部的汉奸裴洪远(裴是官庄大地主许言午的姐夫,日本未到他就当了汉奸。他对陈是明拉暗打,一旦得手便消灭他)率要员到官庄陈东来处做客,据说双方商定8月19日陈东来率部投降日本。裴先来接应。8月15日中秋节,裴送陈一批过节用的食品,以讨好陈。8月19日晨,陈正要到村南迎接先来的裴时,枪炮一齐向他们打来,便衣队乱作一团。这哪里是“接收”,明明是消灭。陈东来见势不妙,带部分人先跑了,随后大部分人马也先后转移。大批日军进了村,挨家挨户搜便衣队。从早上至下午四时,折腾了一天,官庄村被糟踏得不成样子,杀了20多人,抓走3、40人,烧房40多间,赶走了若干牲畜。

1939年5月,陈东来接受我冀中军区领导,改为“人民抗日军”,约有2000余人,编成四个大队和一个回民支队,陈任司令,周文龙、高伯衡为付司令,徐弘为政治部主任(高、徐均为国民党党员)。我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派12名抗大学生任各队政委、辅导员等职,做政治思想工作,弹药款项均由军区供应。在定县、固安、新城、涿县、涑水、房山等地配合我五分区的抗日活动。后因国民党的挑拨,陈、周对我五分区的指挥时有抗拒,并与日伪频繁往来。

阳历1940年11月,我冀中五分区司令员朱占魁以召开“人民军将领会议”为名,拟将陈、周等人加以解决。周文龙拒绝出席,陈东来等人出席即被扣。

陈东来带着一个手枪队,十多个人,三、四匹马到了朱占魁驻地。当天晚饭后,把他们集合在一个四合院里,朱占魁的队伍突然把他们围起来,一进门就说:“谁也不要动”。手枪队长李二从马套里掏出手枪往外打了一枪,外边有人喊:“谁打枪呢?谁打枪就先打死他”。那些人进去就稀里糊涂地把保镖们的枪全下了。下了枪,说:“没你们什么事了”。第二天一早叫他们到院外站好队,朱占魁和陈东来都来讲活,朱说:“老陈不回去了,他要去受训”。陈对大家说:“我不回去了,你们愿意回家就回家,不愿意回家留下来,在这儿干。在哪儿干都成,绝对不许给日本人干”。他这么一说有的人哭了,他又说:“你们在哪干也好,都得枪口对外,我们是中国人,绝不能中国打中国人……”

这天夜里,陈东来被拉出来杀掉,就地埋了。

陈死后,陈妻携子去找,朱占魁热情地接待了陈妻,把他们安排在新城县南许家营村。朱对陈妻说:“我兄弟到军区受训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朱还把陈东来的儿子抱在怀里,十分关切地说:“你们娘俩回去不安全,就住在这里吧”。朱当时把村干部找来,让他们安排住处,说:“一切吃穿用都由我负责,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朱占魁一直未告诉陈妻陈东来被杀掉的情况。陈的妻儿在南许家营住了一个月,朱占魁的队伍就撤走了。

朱部撤后,周文龙(那时他已投降了日本)便带兵到南许家营把陈的妻儿接走,此时,才把陈被杀的消息告诉陈妻。陈妻大哭一场。

一个月后,周文龙给陈东来在他的家乡窑上乡五间房村村南买了五亩坟地,给陈做了棺材,墓上还发了

砖券，做了石板套。起灵时由翟德成(陈部团长兼官庄村保长)和他的叔伯姐姐陪同，把棺材先运到涿县合各庄周文龙的住地隆重地祭奠了一番，后运到官庄镇出殡。在官庄镇搭上灵棚，全军将士们披麻戴孝，请了几十个吹鼓手及念经的和尚，唱大戏(据说光唱戏就花了四百大洋)。三天后，用了64人的杠，抬着灵柩，到五间房下葬(文革时坟墓被掘)。1945年日军投降后，周文龙去了东北。陈妻和儿的生活没了着落，便从涿县合各庄搬到柏家坟(涿县)的娘家去住，直至解放后才正式迁回窑上乡五间房村定居。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 碧血白草尖

## ——景松年烈士生平追忆

张玉泉

—

景松年，又名景长青，1917年生于房山县南窖乡中窖村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从小务农，断断续续在南窖上完初小，以后考入房山县立高小。1939年房山高小毕业。此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展开，怀着高度爱国热情的景长青，在家乡结识了我党的工作者包森。随即被派往平西抗日根据地，先后到霞云岭、马安村中共房良县县委所在地工作，改名景松年。1939年12月至1941年6月任二区(六渡、十渡一带)区委书记。为了不断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1942年1月至1942年12月又被派往八区(张坊、圣水峪一带)任区委书记。1942年底任房良县武工队政委(未上任)。

张坊、圣水峪是敌我“拉锯”地区。我党的抗日工作和地下工作者经常遭到日伪反动派的破坏和捕杀，工作十分困难。景松年到任后积极开展工作，把区委所在地由圣水峪迁到张坊西北的深山东关上村的庄户山安营，后又迁到庄户山正北的白草尖的山腰上。

这里住着姓隗和姓王的七八户人家。景松年和他的区小队共20余人便住在隗家一所小院里。由于连年旱灾，当地老百姓吃上顿没下顿，区小队的生活也很困难，穿着家做便衣，每人每天半斤玉米粒，一个月能吃上一两顿小米饭，算是改善伙食。还常常用萝卜缨、蔓茎疙瘩、树叶、野菜充饥。尽管生活十分艰苦，可是，他们的抗战热情却非常高涨。为了粉碎日寇的侵略活动，保卫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支援大部队作战，景松年经常出生入死，秘密潜伏在敌占区房涿涿平原村镇，搜集情报，打击小股日伪反动派，破坏敌人的攻势，捉捕日伪头目，还为前线征粮催款和输送所需物资。据当地群众回忆，景松年三天两头到敌占区捉回日伪骨干，如把大边乡乡长、伪保长等扣押起来，然后让他们用粮食、款、物资等来赎人，使敌人非常恼火。

二

1943年农历腊月初八，寒风凛冽，天刚破晓，驻扎在南窖的日寇和伪军，集结三、四百人，在汉奸的

带领下突然从驻地东西两路摸上来，妄图一举将他们歼灭。敌人先杀害放哨的武工队员。刚刚起床的队员们听到枪声想冲向门外，不料，敌人已堵住了大门。“抓活的”，敌人狂叫。景松年见来者不善，为了保存实力，命令战士跳后墙往白草尖山梁上跑。这时西侧山梁上的敌人的子弹象雨点似的打来。武工队员们在乱石丛中以荆棵、巨石作掩护，边打边向南山梁撤退。当大部分队员撤到南梁安全地带时，敌人点着景松年的名字狂喊：“有胆量的下来，”他说：“你们有胆量上来”。此时敌人集中火力向他打来，他的双腿负了重伤。为了避免同志们的伤亡，他拒绝战士们救护，强忍剧痛，拖着双腿，爬到一块巨石后面，打出了最后一颗子弹，把敌人吸引过来。当敌人爬上山时，他砸坏了手枪，把手表掙在胳膊根上，安然躺在草丛里。

天亮后，敌人开始搜山。沿着他爬的血迹，找到了景松年。此时他已因失血过多而昏迷了。凶残的日本鬼子仍不放过他，又冲他的胸部连戳数刀。年仅25岁的景松年就这样牺牲了。

敌人下山时，把座落在山腰上的50余间民房全部烧毁，同时挑死一人，烧死一人。

### 三

景松年牺牲后的第三天，县委派区武工队队长刘鹏飞来处理景松年和另外两位不知姓名队员的后事。刘从当地买了柏木棺材安葬了他们。

安葬不久，景松年的三妹得知消息，便从老家赶到白草尖。她在村公所的帮助下替母亲察看哥哥的墓地，并请人帮助打开棺木瞻仰了哥哥的遗容。回到家后便一病不起，不久就病逝了。景松年的独女景惠英为其三姑打幡送葬。至此，景松年家只有孤女寡母。

景松年牺牲的消息村公所和景松年的妹妹一直向母亲保密；直到三妹病死也没告诉她。东关上的老百姓，特别是白草尖上的住户，每到他的祭日或清明节都要在老景的墓前扫墓哀悼。在他牺牲的当年，隗大娘等三户不约而同地为他供奉了牌位，逢年过节时为他烧香、叩头，以慰祭英灵。

解放后，为了缅怀先烈的遗志，教育后代不忘过去，在烈士牺牲地建立了纪念碑。每逢清明节或是腊月初八日，都有成群结队的少年来祭扫烈士墓，献上洁白的花环，举行入队、入团宣誓。如今这里已成为当地党委、政府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 韩营村武卫会主任刘国珍

唐占忠

解放前，涿、良、宛联合县五区韩营村(现窑上乡)为平南革命根据地。由张晋龄领导的区武工队和平南第二支队，以此为中心在京汉铁路以东和永定河畔广大土地上，对日寇和顽伪军不断进行打击。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村都先后建立起地下党组织和民兵武装。尤其韩营村广大民众，革命斗志极为高涨，斗地主，闹减租，挖地道，捉汉奸，青壮年踊跃参军，在艰苦的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创立了不朽功绩，涌现了不少动人事迹。当时我虽年幼，但对一些英模先烈之壮举，却耳闻目睹，敬仰至深。

我这里写的武卫会主任刘国珍就是其中的一个。

### 一

韩营村东北四里，永定河西岸，有座金门闸，是清朝康熙年间修的排水闸。闸西北 50 米处有一大土丘，上边长着许多杨树、柳树、紫穗槐和杂草；丘东脚下塌了个洞，传说里边住个拐狐狸。解放前，韩营村的巫婆张半仙在洞口挂起一块写有“狐仙洞”三字的红布，愚弄百姓。一些迷信的人常来求子祈安。豪客富贾甚至土匪路经此洞也叩头求顺。当时，“狐仙洞”的谣言流传甚广。一九四六年，河北省新城县土匪起家的王凤岗，卖身投靠蒋介石，鱼肉乡里，到处剿捕共产党。老百姓给他编了个顺口溜：

新城县的王凤岗，  
土匪起家霸一方。  
勾结土豪和蒋秃，  
一心剿灭共产党。  
害得百姓无宁日，  
盼他早日见阎王……

王凤岗虽是杀人眨眼，但他很讲迷信，每次讨伐总求神保佑。一九四七年七月一天，他带大队人马从固安县出发讨伐韩营村，由大兴县的榆垓、薛营、庞各庄西下永定河大堤。到狐仙洞时，他骑在马上命令队伍停下，让两名贴身护卫去洞前求仙。两人走近洞口刚抱拳下拜，突然，“轰”的一声巨响，被炸得血肉横飞。与此同时王凤岗的马受惊乱蹦。将他掀翻在地摔个半死不活。当他苏醒过来感到出师不利又怕中埋伏，有气无力地命令队伍“回师”，顺永定河道仓惶逃回固安县城幸免劫难了。

原来那天中午，大兴县北章客村地下交通员送来王凤岗讨伐韩营的消息后，村中百姓惶惶不安。基干民兵要与之决一死战。在这紧急关头，刘国珍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命令民兵带领男女老少，迅速转移到贾河、鲍庄、辛庄、陶营等村暂避。他和唐亮带上两颗地雷和六轮手枪，朝着金门闸方向跑去。到了那里，他和唐亮商定：第一，把地雷埋在狐仙洞前，王凤岗若求仙，必炸他个稀巴烂。第二，如果他直奔咱村，就在队尾开枪将他牵住，咱俩潜入堤下苇塘与敌周旋，誓死保卫韩营民众。当两人埋好地雷隐藏土丘密林间不久，王凤岗的队伍便到了狐仙洞前。不出所料，两人目睹了敌人遭轰炸和狼狈逃走的情景。二人走下土丘，哼起了边区小调：“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们好喜欢……”，返回了韩营村。

### 二

刘国珍是韩营村人，是区委书记张晋龄在 1945 年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另三名是张珍、韩仲山、车兴贵）、村武卫会主任。1947 年国民党疯狂向平南解放区反扑，在涿、良、宛、固地区建立了许多据点，勾结地主还乡团，对根据地军民加紧反攻倒算。当年农历 12 月的一天夜里，刘国珍因奸细告密，被良乡还乡团从当村一家小酒馆捉住，五花大绑押到辛庄村。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和审问：“张晋龄在哪里？第二支队在什么地方？村里还有谁是共产党？”他始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敌人为撬开他的口已使尽了各种刑法。鞭子、皮带抽，压杠子，灌辣椒水，烙铁烫，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刘国珍横下一条心：宁死不屈，咬紧牙关任敌人百般摧残，也不暴露党的秘密。经过一夜和半天的拷问，得到的回答还是三个字“不知道”。敌人费尽心机没得到什么，于是下了毒手，伪军队长李长荣抄起一个方凳朝刘国珍头上劈下去。顿时，脑浆迸裂。看着还有口气，又让三个杀手将他拖到村南梨树林子补了一枪。刘国珍就这样惨死在敌人手里。噩耗传到韩

营村，男女老少泣不成声。在敌我斗争非常紧张的形势下，刘国珍之妻屈氏和女儿由几位上年岁的老乡帮助，将刘国珍尸体用一辆牛车拉回家，选了一块空地，便草草掩埋了。第三天下午，张晋龄得知刘国珍被害消息，从大兴县采育一带赶回，组织全村民众给他开了个追悼会，悲愤交加地跟大家说：“刘国珍同志是我党忠诚战士，在同日寇顽伪的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他那为我党和民众利益宁死不屈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牺牲是我党的损失，但我们不要丧失斗争信心，敌人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啦，我们要踏着他的血迹，紧握手中心枪，在中华大地上继续战斗……”刘国珍死后，韩营村的百姓没有被敌人吓倒。复仇烈火更为高涨。之后又有任万清、任万川、韩仲田、唐亮、孙永申、孟庆安等基干民兵，经张晋龄批准加入平南第二支队，投入保卫家乡，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 三

刘国珍早年不幸父母相继去世，家业贫寒，和弟弟刘长(乳名)相依为命，当小做活的维持生活。后来伯母得霍乱病故，家产由刘国珍继承，从此弟兄二人分守家业独自求生。刘国珍忠厚勤快，村里有人给介绍了个媳妇屈氏，婚后一年生个女儿刘丑，一家三口靠扛活打碱为生；刘长懒惰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日子过不下去便向兄嫂勒索。自从刘国珍参加革命当了武卫会主任，不忍弟弟堕落下去，对他严加管教，他不但不悔改，反而恩将仇报。刘国珍被杀后他企图独霸家产，逼嫂子改嫁。屈氏丈夫杀仇未报，小叔子又趁危打劫。一天清早，屈氏走到五间房村南，准备去找张晋龄告刘长，结果被刘长知道了。刘拿着牛耳镰追上去，两下将屈氏头砍掉。事后刘长因杀嫂之罪被区政府处死。刘国珍夫妇去世后，家中只剩刘丑孤身一人。乡亲可怜她。从五间房村为她招了个女婿田启，婚后一年多因难产也死去。从此，刘国珍一家断门绝后。历史总是不能忘记的，刘国珍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生命，他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 房山名医方徽伍

杨亦武

方徽武，名型，号徽伍，房山城关东瓜地村人，清光绪九年(1883)旧历七月十四生。祖居浙江宁海，明永乐初(1403)，其先祖避难流徙关东。满清崛起，方氏入汉军正蓝旗。清顺治初(1644)，随世祖入关，定籍房山。

父焕文，为庆王府掌管五顷一十六亩庄头，岁终向王府纳赋。焕文有二子，长子方塾，号训之，民国年间为涿良三县名医；徽伍是焕文之次子。

徽伍九岁入私塾，十七岁从父命与家中长短工一道下田种地。然其秉性好学，又受乃兄熏陶，每于工余苦读医书，乃致焕文怒其不专农事，横加训斥。徽伍便以布遮窗，伏灯夜读。后其父无奈，打发他去看守村外的30亩梨园。

光绪 32 年(1907)，徽伍得到其兄方塾的支持，结束农耕，开始了长达 12 年之久的习医生涯。其间，几乎博览所有中医经典；方塾又时加点拨，因而造诣日深。

当时，方塾行医涿良房，广结同道，医界名流多来方家切磋医技。徽伍参与其间，时有精要之论。某前辈抚徽伍肩称道：“以你的资智，完全可以行医了！”

徽伍首次行医事出偶然。民国八年(1919)，夏村某人高烧不退，请当地一名医诊治十余日，毫无效果。便想起方家老二。于是吩咐病人家属牵驴去请。徽伍一向未肯出手行医，来人依那名医所嘱扯谎将徽伍骗至驴背。徽伍糊涂而来，见到那名医，才知实情，再三推托，不得已出手断脉。徽伍开出药方请那名医指教，看罢笑道：“此方开得真好！”病属不解，那名医说：“看不好病，也治不死人。”

病属拿着徽伍药方去抓药，顺路送徽伍回家，那名医不肯走，他要看看徽伍的手段。当晚，病人服下徽伍的药高烧竟退。名医坐不住了，收拾医篋连夜回家。

初试医道，便技压名医，在乡里引起一番轰动。求医者纷至沓来。首次行医之后，方老深感知识浅薄，又潜心钻研医理十余年，至四十余岁方正式应诊。

民国 16 年(1927)，南尚乐土堤某亲戚病危，徽伍前去奔丧。病人已丧服上床，仅存一息，家人连守几天几夜，不见气绝。徽伍见他周身浮肿，断是闭尿症，对家人说：“我治治看。”出手朝四缝穴一针，病人清醒过来。徽伍开过药方，对家人说：“再吃点药看看，说不定能好。”家人将信将疑，煎药给病人服下。病者神智完全恢复，当即翻身下床，口喊撒尿，连尿六沙锅，浮肿全消，竟起死回生。

石窝永安药局老板得知，请徽伍到药局坐堂。永安药局本因经营不善濒于倒闭，徽伍坐堂后因处方灵验，药价便宜，且能治病，远近百姓多来药局求方抓药，药局生意随之兴旺起来。

民国 18 年(1929)，徽伍染肺病，辞永安药局回乡疗养。方塾请来河北定兴某武师为徽伍发功治疗。此人乃民医耆宿，精通武术气功，又深晓医道。治疗间，徽伍师从此人，掌握了武术某些内外功法，并于医道大有裨益。

民国 19 年(1930)，徽伍到县城保元堂药局坐堂。民国 24 年(1935)，辞保元堂去芦村奎庄堂药局。

一天，徽伍从芦村回家路过夏村，被村民马某拦住：“方先生，我母亲病得不行了，请您看看还有救没有？”徽伍来到马家，见马老太上床，不醒人事。徽伍看过，对马某说：“别急，这是气裹水。用了我的药，老人会好的。”马某转忧为喜，当即依方抓药，一副药服下，马老太果然生还。

徽伍堂姐出嫁涞水县娄村沈瑞玲。民国 25 年(1936)，其子中怪症，周身发热，冬天不能穿衣，四处求医，无人能治，后想起了堂弟徽伍，徽伍闻讯赶到，一断便知是“骨蒸、发热”，几剂药用过，症状全消。沈瑞玲见徽伍医术不凡，特出资开设永兴药局，留徽伍坐堂。

县城南永合祥药局杨老板，久慕徽伍医名，蓄意请徽伍坐堂支撑药局门面，所苦徽伍在娄村堂姐家，无从启齿。杨老板向徽伍内弟求法，徽伍内弟前往娄村，谎称徽伍家中出事，请徽伍速归。徽伍当即离开娄村，随内弟东返。回到家中，徽伍尽知原委。时值“七·七事变”翌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徽伍远在娄村，不放心家里。南永合祥近在县城，便于顾家，杨老板又是一片诚心，徽伍便答应了杨老板，在南永合祥安顿下来。

徽伍的中医造诣时辈莫及。日本侵华以后，刁难民医，在保定举行中医汇考，考试合格，发行医证，方准行医，考试不合格不得行医。当时，房山全县敢去应考的只有方徽伍等五、六位名医。由于考题苛刻，参考者大多交了白卷。徽伍有手指颤抖的毛病，写字慢，草成试题，在试卷上抄写三分之一，考时结束。考官念他答题准确把草稿附于卷后。结果，房山县只有徽伍考试合格，获行医资格。

徽伍有济世怀，日常行诊，富人多收钱，穷人少收或义诊。民国 28 年(1939)发大水，难民涌进县城，瘟疫流行，徽伍在南永合祥开锅舍药，以济贫病。

乡邻某氏，借他人 200 元钱应急，请徽伍作保，无力偿还，徽伍去地 42 亩代为抵偿。

徽伍有操守，识大义。日伪时期，次子锡智进山抗日。他不畏日伪迫害，依然留在县城坐堂行医，且绝不与日伪合流。三年内战时期房山县国民党伪保安团长张德祥扬言以通匪罪活埋徽伍全家，并在城外西沙河挖好坑穴，徽伍闻难不惊，威武不屈。张终因惧怕我方力量和群众舆论而不敢胡为。

徽伍在南永合祥坐堂，竭力助杨老板经营，深为杨老板倚重。杨老板临终，将子守谦招至榻前向徽伍托孤。此后徽伍一直未离南永合祥，直到解放。

1956年5月，房山县政府组织联合诊所，徽伍被安排到大生堂联合诊所。不久，河北省卫生厅派权威人士调查全省各地名老中医，来到房山县(当时属河北省)。来人与徽伍论医三天三夜，感慨道：“我走遍河北，象先生这样造诣的全省只有五位，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来人聘请徽伍到省卫生厅任教，定高级知识分子职称，被徽伍婉言谢绝。不久被县政府请到县立医院中医部。当时，他已73岁。

1957年，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发掘中医遗产，批准徽伍收徒。徽伍前后收徒三批，十三人，大多学有所成。房山区卫生局现任副局长袁涛、房山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石玉波、房山第二医院中医科主任张化雨、原区中医医院副院长袁风云均师出徽伍门下。

徽伍在中医领域卓越的贡献和良好的医德使他在房山县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先后当选为房山县人民代表、河北省人大代表、房山县人民委员会常委。老人于1972年去世，终年89岁。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 引导我步入革命的师长

白璧

按：赵然同志是抗日战争初期开辟房良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今年是他不幸逝世五十周年。白璧同志写了这篇纪念文章以缅怀赵然同志的革命功绩。

赵然，字学雍，1918年出生于房山区河北镇李各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38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成绩卓著，1939年春，就担任了中共房良联合县的县委书记(当时党不公开，县委机关对外称教育处)。这个新建县大部分是贫困山区，政治、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文盲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赵然同志和其它县领导人一起，在组织和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肃清土匪、建立基层革命政权的同时，还指导和帮助各村办起了初级小学校，并在县政府附近的西庄村建起了第一所抗日高级小学校(简称“抗高”)。赵然同志亲自到校为我们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宣言》等政治课，我就是“抗高”认识赵然同志的，他的言传身教，指引我们这些青少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残酷的环境中，鼓励我们战胜困难，奋勇前进。

### “大战起因是分赃不均”

我上“抗高”读书时十二岁，当时除知道打日本救中国，不当亡国奴以外，其他革命道理什么都不知道。赵然同志工作十分繁忙，而他总是抽时间为我们讲课。他简师毕业，善于启发诱导，口才又好，讲课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很受同学们拥护，经常讲完课，同学们还不出教室，有的同学说，赵老师讲课，时间过得就

快了。对我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初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一次报告，他说，本世纪不到三十年就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大战的起因是“狗咬狗，两嘴毛，分赃不均”打起来的……。他形象地说明两个帝国主义阵营为了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以罪恶战争的性质和目的。时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而赵然同志讲的“狗咬狗……”这句话，仍记忆犹新。

### 教育我们执行政策

1939年秋，“抗高”随县政府迁到马安村。一天，我八路军某部从敌占区捉来了一个日本鬼子(战场上当时很难捉住一个日本俘虏)，我们听到后非常高兴，下课后晚饭没吃就同马德旺等同学去观看，当时我们想这回可该报仇了，没想到“鬼子”住地戒备森严，不许随便观看，我们“抗高”学生身着灰色军服，破例允许在窗外一看，不看则已，一看把肺都气炸了——“鬼子”正在悠然自得地吃白米饭、鸡肉、鸡蛋等(当时领导干部和重病号也难吃到)。我们看后非常气愤，边走边发牢骚，碰巧被赵然和王玉中老师听到。回校后，找我们谈了一次话，批评了我们的态度，开始我们不服气，赵老师耐心地给我们讲“三大纪律”歌词中优待俘虏的道理，强调指出，只有认真地执行纪律和政策，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后来我们心悦诚服地承认了错误。这次谈话，使我第一次懂得了抗日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是打倒日本人民的革命道理。后来得知这个日本人是测绘技术人员，到延安后参加了“反战同盟组织”，做了很多有益工作。

### 依靠群众才能战胜日寇

1940年春，因工作需要，第一期“抗高”学生提前毕业，分配工作，我们年岁小的组成了房良青年工作团(受县青救会领导、戈枫同志任团长)，专搞宣传工作，并随县抗敌后援会(县委和各人民团体)迁到张坊镇瓦沟村。6月，赵然同志当选为房良联合县议会议长。工作更忙了，但他对我们仍很关心，有一天给我们作形势报告，大意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敌后，又有许多国民党要人和高级将领投敌，还有一些顽固分子，不打日本，专搞磨擦，进行反共，准备投敌。因此，我们要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就是国民党不抗日，我们全国四亿五千万同胞都动员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会后，根据赵然同志讲话精神，立即到平原地区惠南庄一带开展宣传活动，到处书写：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抗战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大字标语，并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县议会副议长周硕臣先生一起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毛主席《论持久战》和《八一宣言》，以坚定干部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我们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很受群众欢迎。

### “英风不愧燕赵，功绩可谓卓然”

和赵然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是个不知疲倦的领导人，白天黑夜都在拼命地工作和学习。他经常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吃粮等问题。公益活动他都以普通干部身份参加，1940年麦收后，机关改善生活吃包饺子，大家都说赵然同志你工作忙甭参加了，他风趣地说，我怎能“不劳而食”呢，包饺子你们都不行，说着拿起擀面杖，一人轧饺子皮供十人包，连专职炊事员都自叹不如。1941年由于日寇频繁“扫荡”和经济封锁，赵然同志超负荷工作，缺乏营养，抵抗力差，得了肺结核病，经常咳嗽，有时吐血，但他从不把病放在心上，照常坚持工作。1942年冬，他又担任了房涿涿联合县的县委书记，工作更加劳累，在缺医少药又不

能及时休养的情况下,1944年5月,病魔夺去了刚满二十六岁的宝贵生命,追悼会上,县“抗联”和县政府送的两幅挽联,概括了赵然同志短暂一生的卓越贡献,表达了全县党政军民对他的怀念之情。挽联全文是:

领导民族健儿杀敌致果,巍巍丰功传百代;  
献身革命事业鞠躬尽瘁,耿耿赤诚照千秋。

开辟房良,发展涞涿英风不愧燕赵;  
创建民主,巩固政权功绩可谓卓然。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缅怀赵然同志的丰功伟绩,必将激励我们开拓进取,奋力拼搏,使房山再度辉煌,为提前三年实现小康,做出新贡献。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智勇双全的“碗儿田”

唐占忠

“碗儿田”,是解放前我涿、良、宛联合县五区区委书记张晋龄领导的武工队副队长田连仲的绰号,现房山交道大北柳子村人。出身贫寒,少年就给交道、兴隆庄,石羊等村地主扛活。后来,实在忍受不了地主的剥削和虐待。索性带着妻子孩儿端着破碗沿街乞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碗儿田”由此而得名。

1943年冬,张晋龄到窑上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时,苦大仇深的田连仲投入党的怀抱参加了革命。跟随张晋龄和武工队长房文权、王茂发在京汉线以东永定河两岸,同日寇、顽伪、地主豪绅进行斗争。深受贫苦大众爱戴。他立场坚定,思想进步,有勇有谋,功绩显著,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了武工队副队长。

1946年,国民党对平、津、保增加军事力量,疯狂向平南解放区反扑。在涿、良、宛县建立许多据点,逃亡地主,富农反动分子又死灰复燃,蠢蠢欲动,反攻倒算,蛊惑人心,制造谣言“刚了张聋子,活埋碗儿田,枪崩王茂发,吊死房文权,谁通共产党,全家都抄斩!”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保存实力,区委和武工队暂时撤离窑上到固安县以东一带活动。但是,他们仍不断深入敌后,开展“搬石头”(称反动地主、富农、顽伪分子、土豪劣绅等为绊脚石)斗争。多次乘夜到长安城、北蔡、韩营、官庄、窑上、公义庄等村散发传单,刷大字标语,串通堡垒户,巩固贫农团,捉汉奸打击敌人,鼓舞民众。

1946年农历腊月廿二夜,田连仲只身潜入北蔡村。堡垒户吕月和鲁新民告诉他说恶霸地主张连登从北平回家过年来了。吕月和鲁新民给张连登扛活多年,受尽了剥削和压迫,对他恨之入骨。于是,三人秘密议定捉拿方案。第二天,田连仲在鲁新民家地窖睡足了觉,夜幕降临他把手枪和绳子掖在怀里,由鲁新民引路从张连登后院角门悄悄溜进“张宅祠堂”。农俗腊月廿三家人团聚祭灶拜祖宗。晚饭前,前院张灯结彩,扛活的使唤人打点供品,端摆宴席。张连登招呼使唤人到后院祠堂祷告。这时,吕月和鲁新民抢先听命。一个提着马灯,一个端供品陪他走进祠堂。当吕月摆好供品点上香,张连登走近桌前合手下拜之际,田连仲从供桌下窜出喊道:“不许动!”未等张连登反应过来,三人一拥而上,有的扭胳膊,有的用毛巾堵嘴,有的用绳子绑,霎时,“顽石”变成了“软蛋”。田连仲用手枪顶着他后背,逼着他急速往出走。吕月和鲁新民故做惊

恐地跑回前院，岔声地喊：“不好啦！八路军把大院包围了，咱们东家也被逮走了……”顿时，屋里院里乱作一团，张连登的四个小老婆你哭我叫，东躲西藏，成了热锅蚂蚁。正在前院乱作一团时，田连仲押着张连登，走出村外，穿过沙丘和树行，踏上永定河大堤，乘着月光向固安县方向奔去。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在兴修水利中牺牲的女教师

李俊忠

房山区西北大石河畔的辛庄村有座葵楼山，这座秀丽的青山永远不会忘记一位曾为改变山区面貌而献身的年轻女教师——刘君德。

刘君德，1935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新繁县崇义村一个农民家庭。她家生活贫困，解放后生活有了保障，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在校期间，积极上进，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7年暑假毕业时，她向领导表示，愿意到艰苦山区去锻炼。组织批准了她的要求。她高兴地告别母校，来到了京西山区中学——河南中学任教。

当时，河南中学刚建校不久，条件艰苦。吃的是小米和玉米面。这对一个在南方长大的姑娘来说，很不习惯。她对关心她的领导说：“你们不用为我担心，开始不习惯，慢慢就适应了。”

刘老师因为深度近视，看书、做实验都很吃力。她为了把知识教给学生，备课、讲课都很认真。从来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而少写一节教案、少做一个实验。为了给学生做好一次实验，不知她准备了多少次，直到成功为止。她衣服上留下了许多被硫酸、盐酸烧成的小洞。同学们反映：刘老师讲课细致有趣，回答学生提问耐心，都愿意听她讲课。

刘君德还积极参加各项劳动。学校组织的支农劳动，每次她都争着去。

1959年6月，当时房山县河北公社兴修水利、要求机关、学校参加修渠。6月15日，河南中学全体教师分别到各村劳动。刘君德被分到辛庄村挖水渠。

在辛庄村西，要修建一条水渠，引大石河水到蓄水池。刘老师和几名同学一到工地，就挥锹干了起来。

下午休息时，刘君德和两名学生坐在渠边说笑着。谁也没有想到，水渠突然塌方，她们三人同时掉进渠里，迅速塌落的沙石很快埋到了她们胸口以上。闻讯跑来的师生、村民赶忙刨石抢救。两个学生得救了。当刘君德被救出来时，因体质弱，埋得时间长，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

在场的师生和乡亲泣不成声。这个悲痛场面，使高高的葵楼山也不禁低首向英雄默哀。

辛庄村领导特意在刘君德老师牺牲的葵楼山脚下选择了墓地，安葬了刘老师。坟前立着一块青石墓碑。河南中学老师撰写了碑文，介绍了刘君德同志的简要生平和牺牲经过。

辛庄村的乡亲为纪念刘君德同志，把修建的扬水站定名为君德扬水站。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房山分校校长

## 为革命捐躯的一家

张玉泉

在涿良宛联合县五区窑上乡有个辛立庄村，村西头有一个大院子，院内有一个小铺，小铺门外放着几个高矮不等的木头墩，站在木墩上可以观察到村内东西大街的行人，这就是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

小铺的主人是王董氏和她的两个儿子王玉峰、王玉岭。从1943年我地下工作者到这一地区开辟工作，就在这里建立了地下联络站。当时联合县县长李景林，六区区委书记张晋龄及区委干部杜春波等人经常到这里秘密开会，搜集敌情，研究对策。每次来集中，王董氏即让儿媳妇烧水做饭。她坐在门外站岗。只要发现街上有来历不明的人就暗示在小铺开会的人躲藏起来。

日本投降后，五区成了敌我“拉锯”地区。我地下工作者在这个联络站里活动日趋频繁，引起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注意，他们常常派密探监视小铺儿的动静，跟踪王董氏和她两个儿子的行动，指使奸细每天到门前查看脚印儿，及时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汇报情况。

1946年冬季，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这个地区革命干部的搜捕和残杀，斗争形势异常残酷。地下联络站成了敌人监视的重点。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王董氏和两个儿子经常躲在外边。当年十二月九日，夜色漆黑，王董氏的大儿子、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峰回村开会临时住在家里，被敌人发现当夜把王的家包围了，王玉峰被捕。他们连夜把王玉峰带到交道大编乡里突击审问：王玉峰坚强不屈，对我党情报只字不吐。第二天敌人就把他拴到大马车上。秘密拉到辛立庄村西树林里杀害，杀前王玉峰对身旁陪绑的人说“看来你死不了。如能回去，给我妻子捎个信，让他无论如何把我儿子拉扯大，将来给我报仇。”他又对身旁另一个吓得走不了的人大声呵斥：“怕什么，怎么也是死，3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伪军发怒了，先把他拉下车，恶狠狠推进树林里，让他跪下他坚决不跪。敌人没办法，便从他的身后打了一枪。凶狠的敌人用的是炸子儿，王玉峰半个头部都炸没了。

王董氏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从此，她怀着强烈的仇恨，出生入死不顾个人安危加紧了搜集情报的工作，她常常神出鬼没，让敌人摸不到踪影。1948年1月的一天，天气十分寒冷，王董氏跟往常一样肩上挎个搭裤，上面插上纸绒花去官庄大集上‘卖花’，以便了解驻那里的伪军数量和装备情况，到官庄不久就被当地的伪保长发现了。他们紧紧盯在她的身后，想知道她去跟谁接头。王董氏发现有人盯梢，便故意把敌人引开，向村北小陶村走去，刚到小陶村村南，就被一个便衣追上了。王董氏发现被追上了，立刻坐在道边上，那特务也站出来恶狠狠地说：“走，我送你回家！”王董氏站起来瞪了他一眼，不客气地甩了一句“用不着你送！”说着向东边村路上走去。没想到刚走了几步敌人就冲她打了冷枪，王董氏倒在了血泊中。

王董氏被杀害的当天就被小陶村的侄女知道了，她立即到辛立庄送信，王董氏的叔伯兄弟们用门板把她抬回家，借了一口狗碰头的棺材装上，草草埋了。

王董氏牺牲后，二儿子王玉岭为了给妈妈和哥哥报仇，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区小队，不久当上了区小队长，多次英勇打击伪军还乡团。1948年底他跟随区委书记张晋龄，县长李景春来窑上村工作，由于叛徒告密，他们钻进地道里，被敌人堵在里面熏死了，挖开地道后把他们的尸体装进麻袋，扔进了永定河里。

几天后，我地下工作者到王家报信：扔进了河里的八路军尸体有个穿白鞋的，可能是王玉岭。家里人即刻向河岸跑去找尸首，滚滚的河水早已把尸体冲没了……

我地下联络站仅仅成立了四年，王董氏娘儿仨先后为革命殉难。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忆良乡一区大队长谭巨隆

张成基 口述 张文玲 整理

谭巨隆出生于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一户农民家庭。自小憨厚老实，读过小学，后随父亲下地参加劳动。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谭巨隆积极地参加了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送情报。随后又参加了青年救国会，接受党的抗日救国思想的教育，并积极地向群众宣传，号召人们组织起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谭巨隆同志在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44年脱产到宛平五区（游击区）武装部工作，在对敌斗争中，多次组织民兵打击敌人，配合部队英勇作战，成绩显著。

1947年4月谭巨隆调良乡一区武装部任大队长。良乡一区是对敌斗争非常艰巨的地方，全区60个村庄中有5个敌人的重要据点（南岗洼、王佐、魏各庄、洛平、焦各庄），周围的长辛店、良乡、坨里等地驻有大量的敌军。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疯狂地对解放区大举进攻，对其统治区域内的老百姓多次实行强化治安。这个地区是我方向敌占区开展工作的重要门户，敌人为了堵截我方军政人员进入敌占区，除设有据点外，还强制各村老百姓在交通要道处理设地雷和“下地枪”。1947年1月初，就曾强令上万村每甲（10户为1甲）在交通要道口下地枪，每天晚上拉上线，第二天早晨再起带回来。当月下旬，良乡一区原大队长王文志在去上万执行任务时，被上万地枪打成重伤。

由于这个地区属于平西地区的一个重要门户，在这一带开展武装斗争非常重要，故在原大队长王文志因伤情不能归队的情况下，组织上派谭巨隆任一区武装部大队长。

谭巨隆到任后，除听取区委领导和武装部同志的情况介绍外，还深入各村了解情况，教育民兵应发挥作用，并做好配合大部队作战的准备。他在各村建立民兵组织，开展对敌斗争，多次参加了南岗洼、良乡段炸铁路和割断电线的活动。1947年7月，深入到西片北车营、上万一带开展工作。12日晚，谭巨隆带两名民兵由北车营到上万村去督促交公粮一事，因找不到保长，见到了一个姓苏的和一名叫张月的两个甲长，正在跟两个甲长商谈交纳公粮任务时，发现驻坨里的敌人向他们包围过来，谭巨隆他们向敌人开枪并扔了两枚手榴弹后，敌人向西退去。谭巨隆感到这里不安全，就让这两个甲长去北车营一起研究交公粮的办法，尔后写封信带给保长。这样一行五人便离开上万村直奔北车营。

在北车营的路上，要通过一个30多米长的道沟，深处有六七米，浅处也有二三米，没料到敌人在这里设下了埋伏。当谭巨隆他们一行走进包围圈后，各种枪支、手榴弹一齐朝他们乱扔过来，顿时打成一片火海，尘烟四起。姓苏的甲长当场被打死。谭巨隆身负重伤，他艰难地爬上北面的土坎，跑出300多米。这时敌人已经认出他就是区大队长，便紧追不放，边追边打，直至谭巨隆身上多处中弹倒下，才上前去用枪托砸，刺刀戳，石头砍，活活地把他给整死了。姓张的甲长和两个民兵走在后边，战斗打响后，张向敌人喊：他是下

道片的保长张月，因为敌人均为当地人，平时都很熟，就没打枪。这样两个民兵也一起逃离了战场。

战斗结束后，敌人认为我方一定要去收谭巨隆的尸体，便用了三天时间，在周围的山坡上设下埋伏，想打我方的伏击，我们没有上当。第四天，我方得到可靠消息，敌人撤了，才组织民兵在独立二营两个连的配合下，从当地买了一口棺材把谭巨隆的尸体装殓埋在一棵大杏树底下。

1955年清明节时，他的儿子由本村的民政委员带领将其父亲的尸骨起回老家安葬。北车营村党支部当时为告慰英灵召开了追悼会，悼念谭巨隆同志。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 回忆父亲韩晓耕烈士

韩怀聪 口述 张玉泉 整理

父亲韩晓耕于1914年出生在门头沟区斋堂乡川底下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高小毕业后一面务农，一面干裁缝。

1938年，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经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韩巨俞介绍，韩晓耕在村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调入宛平县政府工作，后来又调入一区区公所当民政助理，1940年调宛平三区任教育助理，1941年又调回一区任民政助理，1943年调到昌宛房联合县政府工作，1944年初调往八区任区长，直至牺牲。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了门头沟、斋堂、清水、杜家庄一带，实行烧杀抢掠，环境十分恶劣。1940年日本又在燕家台、高铺一带建岗楼，实行三光政策。父亲一参加革命就被派往敌占区宣传抗日，组织百姓转移，掩护八路军和地下工作者通过日寇封锁线。父亲韩晓耕每到一处都深入到百姓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的政策。并利用自己会做针线活儿的一技之长，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一次他到清水下乡，发现一户农民贫病交加，生命危在旦夕。他立刻和其它同志一起四处找粮食，后来找到一些玉米，送到这户家中，给他们做玉米粥喝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为了解救乡亲于危难之中，他不怕担风险。1939年春我八路军让燕家台村的干部李政体转送给我区政府一封鸡毛信。李将信给拆开看了。为此我八路军某部要枪毙他(因误认为李是日伪探子)。正在此时，父亲赶到问清原因，为李政体做了保，八路军才放了他。此后李的母亲逢人便讲：是晓耕挽救了她儿子的生命。李家庄青年农民赵勤顺去口外的途中，被八路军某部抓获。被怀疑他是汉奸，要用大石头砸死他。也遇上了父亲认识他，了解他，费了许多口舌才把他保了下来。

1940年秋驻在柏峪村岗楼里的日本鬼子搞大清乡，将川底下村的百十名老百姓(该村有许多抗日军政人员的家属)都圈到了柏峪村，鬼子汉奸们百般污辱、折磨乡亲们。驻燕家台、上下清水工作的父亲得知情况，便立即组织游击队连夜潜入柏峪附近，往岗楼里打枪，造成攻打岗楼之势，把受难的乡亲全部营救出来。

### 二

父亲在对敌斗争中十分英勇机智。在宛平八区(敌占区)日本鬼子三天一清乡,两天一扫荡。斋堂、柏峪、燕家台、清水等村都在敌人的严密控制之下,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八路军白天藏到山上,夜里入村骚扰敌人。一次父亲白天到李家庄工作,被敌人发现,便尾随跟踪。父亲机智地甩掉了敌人,溜进了一户叫赵勤顺的家里。当时赵妻和孩子在家。父亲进门连忙说清情况和对付敌人的办法,就立刻坐到赵家的炕头上,带上假发,穿上赵妻的大襟褂子,接过赵妻手中的针线活儿就做起针线来。几个日本鬼子进了院一边喊着捉八猴子,一边在院子里乱搜。然后进了屋,发现炕上坐的人便盘问:“她是谁?”赵妻对答如流:“我姐姐,给我做棉衣来了。”日本鬼子看了半天,没发现什么疑点才走出去。

还有一次,父亲从李家庄到燕家台去开会,路遇一队日本鬼子从清水去燕家台,正路过李家庄。父亲抱着棉花袋子,鬼子前头走,他在后面跟。直到了解了鬼子的准确去向,他才走,开。当地一位大娘见到此情替他捏了把汗说:“晓耕呀!你的胆子可太大啦!这么做太危险啦!”父亲说:“打鬼子怕死不行,干革命就不怕死。有你们保护我们,在敌人眼珠底下活动也不怕。”

敌人恨死了父亲,他们四处派人抓他,抓不到他,就让汉奸、特务抓家属。一次奶奶和大娘刚刚被转移到燕家台准备进山避难,不幸被一个汉奸发现。他把四、五个鬼子带进大娘家,对大娘进行审讯。问大娘的男人、小叔子是哪村的,干什么去了。大娘回答的全是假话,遭到鬼子汉奸的一顿毒打,并警告大娘,明天不交出大伯韩晓智和小叔子韩晓耕,就把她们喂了洋狗。组织获悉后,便连夜把奶奶、大娘接进山。

我四岁时死了亲生母亲,父亲东奔西跑搞革命,生活无依靠。经宛平县政府(在木兰)批准。让我跟随父亲住在机关。他下乡时我就跟他的同事看守所所长于振锋在一起。后来县政府转移了,我过了一段被寄养、流浪的生活。

### 三

父亲参加革命后,由于环境恶劣,他很少与家人团聚。1944年旧历年底,父亲与继母彭桂芳回家住了三天。父亲一进家门就拆洗自己的棉裤,边拆边洗边烤,晚上就做好了,又帮助家里人做些针线。临走时,他对爷爷奶奶说:“日本鬼子的统治不会太长了,我们很快就解放了。我们在外打鬼子说不定哪会儿牺牲了。我把孩子就托给您们了。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叫孩子念书为革命做些事。”回过头来又嘱咐我:“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多锻炼自己。”说完叹了口气,又说:“苦命的孩子,爸妈不能照顾你,你就自己长点志气吧!”我当时才刚刚懂点事。

父亲为人民为抗日胜利时刻准备着牺牲自己,誓死不当俘虏。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1944年4月,原房涞涿七区划入昌宛房为新8区(范围是黄山店、圣水峪、长沟、坨里、房山城关一带),全部为敌占区,县委派父亲去任8区区长兼武工队队长。该区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只有几个人,几条枪,他们在敌人的伏击和包围中出生入死与敌人周旋。这个地区不到一年内曾牺牲了四位区长(注1)。

是年7月,县委指示父亲到敌区去征收小麦,并派一个排的军队配合。一天晚上父亲和特派员张国久,从孤山口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刚来到韩村河天就亮了。他让部队赶回山里。他们在等到傍晚太阳落山了,才找韩村河的联保主任,向其说明了来意。又连夜赶到五侯村。立刻召集岳各庄、尤家坟等村的伪保长开会,宣传革命道理、讲国内外大好形势、分配征购任务。散会后由五侯保长派人送到龙门口村保长李景全的家里。这时天已亮了,不能活动,只好呆在那里,由于又热又累,父亲和张国久只好到院子后面一片树林里休息。

二人正在迷迷糊糊时，李保长来到他们跟前说：“天开来人了(天开是伪大编乡日本鬼子的据点)”这时 30 多个敌人已把父亲和张国久给包围了，拿枪对准了他们。父亲见情况紧急，当机立断，命令张国久撤。张国久绕到树林后逃走了。他只身与敌人搏斗，父亲躲在树后边打枪，边扔手榴弹还击。终因寡不敌众，被房上的敌人用机枪打中了，躺在了血泊中。牺牲时年仅 30 岁(注 2)。

1944 年 10 月，由县政府派人将尸体转送到我老家川底下村，召开了追悼大会。之后将父亲安葬在我家的坟地里。

父亲离开我们虽然已有 50 多年了，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 附：                  张国久给烈士女儿韩怀聪的信

怀聪：

来信收到。

我听说你父亲死时你三岁。你父亲准确死的日子也记不清了。昌宛房成立八区武工队，现在的黄山店、圣水峪、上下中院一带，山外长沟、坨里，还有房山城东一大片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都是敌占区，那地区死了不少干部。你父亲是 1944 年春调去的，我比他晚去两个月，武工队政委是刘鹏飞。队长也是区长，是你父亲。组织委员是李正宝。农会主任是李景春。还有一些人，区里共七人。

那年夏天，县里领导到我们那里去，还带着一个排的军队，让到敌占区去征收麦子。我们分两个组，你父亲带领我，还有一个敌工人员叫李振生，他对敌占区很熟悉，我们叫他去带路找保长。七月初麦子打完了。一天晚上一排军队从孤山口绕出封锁线，到韩村河天要亮了，军队赶快回到山里。我们天亮就不能动了。因为特务敌人到处有。我们三人钻在一户呆到下午太阳落山才找到联保主任，向他交待了任务。连夜又到五侯。晚上召集了岳各庄、尤家坟等村的联保主任会，宣传了国际形势，分配了征购任务。开完了会已是夜里 12 点钟了。让人把我们送到龙门口村。

我们到副保长李景全家，吃了饭。天就亮了，只好呆在他家。到中午天实在太热，我们几天没睡觉。他家屋后有块空地，还有树。他给了个席片，我们便就躺下了。正在迷迷糊糊中，李保长前去说天开来人了(天开是伪军据点)。我赶紧起来见敌人在四周拿枪对准我们。我说快跑，敌人就开枪了。我从人群中跑出去。因有树四周又有他们的人，怕伤他们自己。我绕着出来了。你父亲钻到一个厕所里。他在里边打枪，扔了几个手榴弹，最后房上边敌人的机枪打中了他。据说敌人来 30 多人，还有日本。

你父亲是壮烈牺牲的，死得坚决。敌人太多。看来我们俩都往外跑也不可能都活着，实际是你父亲掩护了我。敌人没顾上马上追我。我跑到沿村，敌人追到沿村也没搜着我。

这是我记忆的一些情况，因时间关系，简单给你介绍一下。

张国久

1938 年 6 月 2 日

注：

①《房山文史资料》第 7 辑曾刊载过原八区区委书记景松年的革命事迹；第 9 辑曾刊载原八区区长陈志的牺牲始末。

②韩晓耕的详细牺牲经过，详见张国久同志给烈士的女儿韩怀聪的信(摘录)。

《房山文史资料》第 10 辑)

## 养猪状元杜宝珍

卓成栋

早在六十年代就享誉京郊的房山县十二面红旗之一的养猪状元杜宝珍是南尚乐乡广润庄村人。他从小就给有钱人家放猪、养猪，给别人扛活，做长工。青少年时代在地区先后参加过青救会，抚先队，1943年在村保公所做事。同年任村游击组组长。

解放后杜宝珍先后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主任。1953年成为村第三任党支部书记。1954年经河北省保定地区通县专区的推荐，被农业部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并参加了在保定召开的劳模大会，受到了毛泽东、邓子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1959年杜宝珍参加了全国民兵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并获得一支半自动步枪的奖励。

惠南庄村有300多亩土地，人口1000多，属地区的一个小村。1953年由互助组合并成立合作社，当时一直是村中土改领头人的杜宝珍所带的村中三个合作社之一的先锋社就在地区很有名望。他的社全部是贫下中农；他们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来共同搞好生产。由于杜宝珍带头苦干和社员的积极努力，加之他认真钻研农业技术，有效适时地对农田施肥，选种和管理，使粮食亩产很高，达到小麦夏产150斤。秋后交公粮高达140万斤。这在当时是地区最高的数字。杜宝珍也由此逐渐在村里树立了威信。

1956年惠南庄村四个初级社合并成高级社。1957年南河、广润庄、惠南庄三村并社，同年秋后附近六个村又将高级社合并。到年底，长沟地区100多个村子的高级社又并成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如此快的速度并社和发展，在此期间以杜宝珍为首的惠南庄各项成绩仍然在地区名列前茅，并多次获通县专区的表扬和嘉奖。当时，村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满了锦旗和奖状。

杜宝珍带领惠南庄养猪，那是在1957年村中成立高级社时，他在一次去顺义参观学习中发现木林的陈各庄村在带头人王景观的领导下养猪成绩卓著。当时他还没回来就萌生一种想法，如果把陈各庄的养猪方法带回到惠南庄那不是为社员致富的一种很好途径吗？于是他在参观时就多了一个心眼，不但留心观察，而且询问了解得十分详细。一有机会就来看人家怎样拌饲料，怎样喂、怎样进行圈舍管理，并暗暗记在心里。回村后杜宝珍和几个骨干社员一商量，都认为他的想法不错。

大家思想统一后；杜宝珍组织人建起了猪舍，同时亲自带人去顺义陈各庄购回仔猪，回来养了一阵子，猪长的不快也不好。他又跑到了陈各庄了解人家的做猪饲料的方法，向他们学会了如何做饲料。但圈养又出了问题，他再次来到陈各庄，一次两次三次……一直跑了六次，终于从陈各庄取得了从育种到饲养，从制作饲料到后期管理的一整套养猪经验，使惠南庄的养猪事业一下子兴旺起来。由开始的两排猪舍发展到了10排120多间，生猪存栏数达千头以上。他们利用惠南庄产粮多的优势，秋天多贮青饲料，与麦麸、玉米皮、豆饼等相配合，把猪的饮食结构安排得科学合理，生猪长得快，肉多，体大。其中最大的一头猪，体重达到千斤以上，每年出栏数也超过了千头。1965年《北京日报》的记者姜士英、王立佳以及作家浩然也先后来村中采访，同年秋季惠南庄的养猪事迹被刊载在《北京日报》上，引起了全市郊区的轰动。

杜宝珍养猪有两点最值得推崇，一是他刻苦钻研养猪经验，不弄清不透决不罢休的韧劲儿。当时有人问他南方的猪为什么爱长，他说是种的问题与地域问题，因此他把南方的种猪拿到北方因地制宜地进行改良，果然收到了效果。又如他发现陈各庄的种猪在肉型上有优势，他就马上把那儿的种猪选回来，进行改良后，

培育成独特的瘦肉和肥肉型猪种。

二是他把养猪与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融为一体,提出猪要养好既离不开粮食,也离不开青饲料。而一旦过了季节、青饲料就会变质。为此他提出青贮保鲜法,使淡季和旺季的猪的青饲料饲养达到优势互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饲料配比法。

杜宝珍还选拔培养了自己的两名兽医,猪闹瘟病他和医生一道盯在猪舍、观察变化,有时亲自带他们到别处学习讨教,使兽医的实践能力提高很快。有的时候干脆把当时的养猪专家李国伟、曾兆光请来村中亲自指教。

由于长时间与猪打交道,对猪的生活习性也了如指掌,他看到猪的动作就知道是否有病,看到猪的影子就知是什么品种,看到猪吃的饲料就能判断猪的增长速度等等。日久天长他对猪产生了感情,每天不到猪场转一遭就吃不香饭,睡不着觉。谈到养猪他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六十年代的惠南庄靠养猪出了名,养猪也使惠南庄的村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杜宝珍由最早的放猪娃成了养猪专家,养猪状元。可他仍没有在养猪事业上止步。正当他仍在不懈进行时,文化革命一下破碎了他的目标,他因养猪使村民致富,也成为他当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文革”以后,当农村形势稍有些稳定,他又重振精神在村南拒马河边重新盖起48间猪舍,又养起了猪,又争得了先进。1975年到1980年间重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杜宝珍又经过几年的努力,终因年纪的增长和体力不支,七十多岁的老人终于没能使惠南庄的养猪事业再度兴旺起来,但他那种孜孜不倦的锲而不舍的追求,却一直在感染着地区的人们,每当人们谈起惠南庄的养猪,都无不为此位六十年代的红旗的带头人而引以为自豪。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 合作化运动中的宋希儒

顾梦红

作者按:4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农村的那场波澜壮阔的合作化运动,使数亿农民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我区坨里镇上万村翻身农民宋希儒带领村民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人民公社,一步一台阶,业绩斐然,曾多次出席全国劳模会、群英会。并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房山县县委员。他自1954年入党,任上万村党支部书记近40年,如今年逾古稀的宋希儒仍在村党支部工作,说起当年往事,谈锋犹健,历历在目,如数家珍。

### 互助组

1948年底,房、良解放后,进行了土改。穷人有了地,翻了身,奔好日子的心气可足了。但一家一户毕竟势孤力单,不是缺牲口,就是少犁杖,再碰上天灾病祸,日子就更不好过了。1950年刚分到土地的农民中,有的开始卖地卖牲口,两极分化的苗头已经显露。为了广大农民的前途利益,党和政府发出“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的号召。

1951年春，我和宋希炎、王永文等七户农民自愿组织起互助组、互助互利。有活一块干，打粮归各家，年终齐工找价。这样不误农时，扶危济困，初步显示出人多力量大的优越性。村里的互助组后来有10多个，多是临时性的，不太巩固。那年春旱，好不容易盼来场雨，家家抢着播种。我们组当时没有耨，我借了四家都碰壁而归。有的单干户还嘲笑我们，当时我憋了一口气，一定要置点“产业”，互助就是要比单干强！秋后我和王永文、王顺、宋希炎等几个壮劳力上山割了七天荆条，卖给土洞村编筐户，挣了60多块钱，我们几家又凑了些钱，到良乡集上买了犁杖、绳套、耨、耙、铡刀，还买了一头毛驴。第二年，我们气粗了，胆子壮了，不但把我们几家的地种得好好的，还种了本村和南四位、焦各庄几户农民不愿种的地，共150亩左右，我们的互助组在附近各村也有了名气。

1952年，京西矿区河北小区的区长刘永明、助理刘振邦来村里进行调查研究，帮助我们巩固互助组。由于七、八家劳力在一起干活，各家地的数量、肥瘠程度不同，再加上观念意识、天时节气等原因，出现些矛盾是很自然的事，比如耨地，晴天时耨地草很快晒死了，阴雨天耨地草就锄而复生，工时怎么算，又如送粪，各家的地路程远近不等，粪肥质量也不一样，计工划价很费脑筋。由于大伙心较齐，都以大局为重，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各种矛盾，粮食增产、各家收入增加。第二年组里又买了32头小猪，添了大牲口、集体家底厚了，越来越红火。那一年，我们被评为北京市模范互助组，我去北京开了劳模代表会。

1953年初，党中央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了引导农民尽快走上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上级党委号召有条件的地区要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河北小区区委领导张成基、张廷库又来到上万村。他们对我讲互助组不但要巩固，还要扩大要发展。张成基问我：愿不愿意搞初级社？我当时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而且尝到了跟共产党走，搞互助组的甜头，便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愿意，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分了地，又给我们指出光明大道，我打心里愿意”。他还指示我们：不但要巩固自己的互助组，还要团结帮助其他互助组，天下穷人是一家，等到条件成熟了尽快转入初级社。

### 初级社

1954年6月24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我们几个互助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南上万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任社主任、王永文、吴自新任副主任。上万村是个几千人口的大村，当时有两个初级社。分别叫南社、北社。我们南社有96户，200多名劳力，千余亩地，三挂大车，十多头毛驴，两群羊，还有一个灰窑，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是名副其实的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入社后，大伙儿心气高劲头足，团结得象一个人，起早恋晚地干，一点不觉得累。那年春节，我在社里值班，当时上级要求我们不忘阶级斗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晚上睡觉都不敢脱鞋。大年初二早上天刚亮，就听外面有人喊：“着火了”，冲出门一看，社里的草垛着了。社员们纷纷赶来救火，副主任王永文急得直哭：这是社员们一冬的心血汗水呀，眼看开春，没有草料，牲口怎么干活呀！我劝他：“哭什么，咱有合作社，这点小灾算什么？”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初三早上，社员们自发地拿着镰刀背筐、绳套来到队部，要求提前开工上山割草。三天时间，割出三垛草，望着大伙，我也很感动：还是集体力量大呀！要是单干户，谁家着了火，真得急出人命来。

前进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雇农方存玉、生性懒散，又好喝酒，土改后第二年就把地卖光了。入社后旧习难改，三天两头找社里借钱借粮，不给就闹：“我在旧社会给财主扛长活，借三斗不给二斗九，现在怎么成打击对象了，共产党还让饿死人么？”社员干部对他意见很大，有人要开除他。我当时正在区里开会，听说这事后赶回村里，多次找方存玉谈心，跟他对比解放前后的生活，问他共产党好不好，愿不愿跟共产党走，他说：“我也是穷苦人出身，当然愿意跟共产党走。”我说：“共产党可不养懒汉，要想有吃有穿过好日

子就得靠勤劳致富。”根据他家的情况，我安排他上灰窑，让他儿子放牛，让他妻子为社里搂垫脚，这在当时属“特殊照顾”，可他又说没鞋穿，仍不上工。我让老伴把我的鞋给他送去，他又说没粮吃干不了活，我又将家里的白薯给他一驮子，又送三斗玉米，方存玉很感动，说社里人真好。从此他不再闹了。

那年麦收之前，老中农王文全又要退社。王文全是地道的庄稼汉，耕耩锄刨样样精通，又有20亩好地，入社后按地四劳六分配，他感到吃亏了。这种情绪很有代表性，影响即将到来的夏收夏种，也影响全社的稳定和巩固，我们经研究后请示区委同意，决定调整麦收分粮方案，多给王文全等麦地户300斤。我让老会计王志广到王文全家为他算细账，对比单干和入社时的各项收入，使他心悦诚服，认识到入社的优越，不再嚷嚷退社了。

1955年，党中央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要求全党大胆领导群众性的合作化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上万南北两社合并，定名为“上万果林社”，社员400多户，占全村90%以上。我任村党支部书记兼社长，马德青、王永文、吴自新为副主任，王志广是会计。两社合并后，土地多了，力量更强了，由于准备工作充分，再有南社的基础和影响，合并后上下齐心，粮食增产，果林增收，被区里评为模范社。这年北京市召开农村工作会，我做为模范社代表参加了。彭真、刘仁、赵凡同志都讲了话，鼓励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农民坚决跟党走，迎接农业合作化的新高潮。55年底，我又被北京市推选为全国劳模。上万村的农业合作社也在全市出了名。

### 高级社

1955年底，党中央发出试办高级社的通知。高级社与初级社相比，规模更大，土地人口增多，而且取消土地入股分红，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了。1956年初，区委刘天生同志来上万村找我，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要求把附近北车营村的初级社合并过来，成立高级社。北车营也是个上千人的大村，地域面积比上万还大，原有四个初级社，但都不太巩固，已散了三个。我想：既然是党的号召，对发展生产有好处，我就坚决去干。有些干部社员考虑两村人多事多，不好管理。刘天生同志说，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956年3月，两村正式合并，共有860户，劳力3870人，土地、果树、耕牛大牲口等生产资料都作价归公，实行按劳分配。我担任社主任和党总支书记，王永文、马德青、王贵友、杨文开等为副主任。

这年春天，区里来了技术员教社员给果树剪枝，当时农民一般用老办法管理果树，见技术员剪掉许多壮枝，挂果枝，很不理解，议论纷纷，说是破坏生产，我们请来区长耿子华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同志宣讲新法剪枝，科学管理的道理和好处，又请使用科学种田科技剪枝的农民来现身说法讲解。使大家消除顾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新鲜事物。新种的8000棵苹果树很快挂果了，成为两村主要收入之一。

1957年秋，我社粮食增产，仅小麦就20多万斤，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植树造林、推广农业“八字宪法”各项工作红红火火，社员们都心情舒畅，我们又被评为北京市模范社。当年，我被推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在北京怀仁堂参加全国劳模会议，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陈云、邓子恢、彭德怀等同志还和我们一起座谈。

### 永丰社

1958年，房山、良乡两县划归北京市、原属北京市京西矿区的上万北车营划归属房山县。各地办社的浪潮不断高涨，上级党委找到我和坨里村的郭华(郭也是全国劳模、坨里永丰的主任)，提出要两社合并，

大踏步地走向社会主义。解放后穷苦人跟共产党走合作化道路，只要是上级党委的要求，我们都毫不犹豫地去做。1958年初，两社正式合并，成立了永丰社，包括坨里地区12个自然村原来10多个小社，人口近二万人，土地2.5万亩，郭华任社主任，我为党总支书记兼第二主任，陈万生、高玉成等任副主任。永丰社除山林土地外还有灰窑4个，装卸队，农机修配厂等副业是名副其实的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大社。合并后的一件壮举是修长虹渠。北车营上万两村干旱缺水，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永丰社研究决定：从辛开口村东的大石河拐弯处修一引水渠，修一个扬水站，再将水从高处引向石梯坡，经今化工厂西侧到达北车营上万，全长15华里，宛若一道起伏弯曲的彩虹，故名长虹渠。全社上下总动员，真是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大年初一，两千多名社员在工地吃饺子，放鞭炮，不怕天寒地冻，抡开膀子大干。几个月功夫，长虹渠修成了，大伙敲锣打鼓地庆贺。那一年，我参加北京市劳模代表团赴朝鲜慰问人民志愿军。

### 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1958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房山县自9月1日至9月5日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436个行政村，328个高级社及长阳农场，共建八个大型的人民公社。9月5日，数万群众敲锣打鼓到良乡开庆祝会，会场上彩旗飘扬，口号震天：“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一天等于20年，一步跨入共产主义”、“15年超英赶美”。人民公社体现了一大二公的特点，但也助长了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的形成，紧接着而来的放卫星夺高产，大办食堂、大炼钢铁等显然超越了客观实际的活动，但当时人们都是怀着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大热情去做的。

1958年底，我在北京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国群英会，房山县出席全英会的还有杜宝珍、李秀荣、杨文辉、吴春山等人。刘少奇同志做了报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我们。

1959年以后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也开始调整农村人民社，1961年，大公社划小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格局。1961年7月，我按照上级的安排，回上万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

作者附记：宋希儒同志在上万村领导群众走集体化道路坚定不移，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后，继续发展集体经济，人民生活逐步提高。“文革”中，他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批斗，被开除党籍。1969年恢复党籍，进入革委会，担任副书记。1976年开始任上万村党支部书记。1986年因身体原因一直任副书记、支委。1995年，不再任职。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 百花山上的末代和尚

张玉泉

吕正春，1915年出生在斋堂镇青龙涧村一个雇农家庭里，兄妹六个，他排行老二，全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靠父亲砍柴、烧炭、打短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五岁时全家搬到百花山脚下的黄坨村落户。十岁那年全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此时欠下百花山寺庙里一笔烧炭款和山药款无力偿还。父母只好狠心把他送到

寺庙当了小支使,就算顶了债,还写了字据。他入庙不久,父亲在一次外出卖木炭的归路上被老抢儿打死,全家人的生活便没了依靠。母亲拖着几个弟妹回到了娘家,家中空无一人。

十岁的吕正春在寺庙里只能干些小零活儿混饭吃,如打扫寺院,收拾禅房,每天赶头毛驴到百花山半腰中去驮几趟水。当时寺里只有乐海住持和普云和尚,普云因与住持不合常在外边游荡,后来又来了个叫新有的。

据吕老介绍:自唐代百花山建寺庙以来,显光寺的僧人到底有多少代,因无史书记载,谁也说不清楚。但可以追溯到明朝以后,相传有十代方丈,可从头一个高僧叫闪洪的排起,他们的法名顺序为:闪、法、定、无、真、常、乐、菩、提、道等十代。到新有就不在排列之内了。在闪洪之前百花山寺庙里没有人迹,不知是什么原因。

吕正春在庙里呆了三、四年,师傅看他老实巴交,又能吃苦耐劳,说他很有出息,开始让他打扫殿堂、烧香叩头、收拾供桌上的器物。后来在百花山下又买了几亩地让他去耕种。到厂冬季师父还常常带他到山下去化缘。

他十五、六岁时,乐海住持为了让他学点文化,好能独立看经书,就把他送到莲花庵、洪水峪念了两年私塾,回来后在,庙里跟师傅学习做法事,念念经书,拜拜佛。

吕正春 19 岁那年(1934 年)住持乐海领他到北京施乐庵正式受了戒。法名叫“提春”号儿叫“大井”。从此他可以独立组织做道场、法会等。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佛事活动,就是每年的五月十八日百花山庙会时做道场。每逢这日子的前两天,山前山后的村子里准备的民间花会多达十几档或几十档,还有些群众团体,宗教组织,北京天津涿州来的商贾也都提前两天云集到山上划地盘、搭棚子。这一天,进香的、赶庙的、看会的……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附近十至四、五十里的村都组织了花会,如大刀会、吵子会、少林会、狮子会等都集中到山顶上汇演。规模宏大,场面隆重。各道花会在山顶上都要到每座庙前表演一番,然后再到娘娘庙前集中汇演。整个活动组织有序。上山的人不少是进香的、拜佛的、许愿的、还愿来的,还有上布施的、整整一天不断线,上布施的还要管一顿斋饭吃。吕正春和他师傅,这一天忙得不可开交。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百花山成了我党前方与后方的主要联络站。史家营和门头沟的清水一带建立了日军据点之后,切断了我根据地通往敌占区的交通要道。百花山又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后来萧克司令员领导的挺进军司令部设在百花山西麓的黄坨村,八路军第十一军分区在百花山上设两部电话机。房县公安局的情报站,也设在护国显光寺中,侦探长董春明就在情报站里工作了几年。提春本人因忠实可靠,又是本地人,对周围环境相当熟悉,因此常让他为我党做些地下工作。如摸敌情传递情报,接待我地下交通员等。

1940 年至 1942 年,日本鬼子先后五次上山搜捕我地下工作者,袭击我情报站,都因事先得到情报,安全转移,未受到损失。提春也经常到山下各村的百姓中活动,他走到哪儿就吃住在哪儿。那时僧人与地方老百姓关系十分密切,老百姓放羊、或路过、或办事也常在庙里食宿。提春到附近村里工作(以化缘为名)在老乡家吃住是常事。1941 年和 1942 年显光寺的住持乐海和后去的新有相继圆寂了,经常呆在庙里的只剩提春,他想还俗。当时常来庙里的谭区长让他再坚持一段,为的是让他以僧人的身份做掩护,帮助我党做些工作比较方便。因此,他服从了需要坚持下来。

1944 年秋季的一天深夜,驻东斋堂、杜家庄据点里的日本鬼子和伪军纠集了数百名兵力,对百花山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因我方得到情报及时,很快转移了,致使日本鬼子又一次扑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鬼子纵火烧掉庙中所有禅房。提春没了落脚之地,才下山还了俗。

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黄安坨,恢复吕正春的名字。1946 年他 31 岁时结了婚,当了村干部,因支前工作出色,1948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 年为支援工业建设,到北京当了市政工人。以后又参加了怀柔水库、密云水库的建设工程,又转入北京市水利局工作。1988 年正式离休回到黄安坨丰十安度晚年。

提起二十多年的僧侣生涯,吕老总是对百花山怀有一种极不寻常的感情,说起寺庙中的生活更是激动不已。

## 王邦屏轶事

王国林

### 身世

关于清末房山县拔贡王邦屏的情况，《房山县志》卷六有这样记载：王邦屏，别号：石楼、甫三，保定府藩署政法学院毕业，历任直隶省望都、定县、满城、藁城等县知事(七品官)之职务。

王邦屏，石楼村人。生于清同治壬戌三年(公元1864年)，卒于1930年9月17日。享年六十六岁。

王邦屏在家中排行第二，其长兄邦翰、三弟邦理、四弟邦宪。邦屏家在当时村中，属于书香门第。房屋、土地、农业颇丰。邦屏自幼受父母、长兄熏陶和影响，他自八岁开始读私塾，且读书勤奋、上进心强，知识略高于别的同龄儿童。历十载寒窗，从十九岁走出家门，就读高级中学。之后，于保定府政法学院毕业。此后，仍然求学不辍，历经会试、乡试、朝考，最后获得学衔“拔贡”。拔贡——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两朝年间，凡经本省各级考试后，录取入府的县学者，通称(秀才)生员，也同时称为贡生。在过去科举制度中，贡生总称“五贡”；这包括：恩、拔、副、岁、优贡等五种类。五贡均属于科班出身资格；另有靠捐纳取得贡生者——称例贡。此非正途。

### 在任二三事

石楼村北街，过去曾有座辽代建筑——龙王庙。庙内(于1956年拆毁)大殿五间，殿堂宏伟、壮观。山门由砖石结构砌成，高大、古朴、坚固。大殿飞脊重檐，庄严、壮丽。大殿明柱悬挂一幅木制对联，文曰：

庙立前朝上自明清下民国

门临大道南通涿郡北房山

落款题：满城知事王邦屏书。此副楹联，几经风雨，已然褪色，而字迹清晰、依稀可见。清朝光绪年间，王邦屏进京赶考，正赶上隆冬季节，冰冻路滑，骑马出村突然马失前蹄，邦屏一头栽下，不慎左臂骨折，疼痛不已。家人劝说，别去赶考了。王邦屏个性强、自幼刚毅。左臂受伤，不影响右手写字、作文。他全不当回事，此一去则一举成名，考上拔贡。

王邦屏自幼读书刻苦，秉性刚毅。为免受外界干扰，以布遮窗，伏灯夜读，颇有三国时关羽“夜读春秋，秉烛达旦”的精神。同时他也不当书呆子，学会农活多样。经常与家中长短工一块下地、种田。

邦屏一家，在石楼村内，属大户人家。一天，四弟邦宪带上两名小长工，牵上毛驴，驮上粗布口袋，从村东的“运盐道”去琉璃河镇办货。购进咸盐二百斤，回家一过秤，才知道一百斤盐竟差二十多斤。此时的王邦屏正任河北省定县知县，因公务进京城办事，临时在家，小住几日。他闻听此事后，当即叫四弟带两个伙计，要亲自去印证此事是真是假。

次日一早，王拔贡身穿二斗罗布棉袍，头上带一顶黑皮帽子，和邦宪等三人，一起上路走村东运盐道，直奔琉璃河镇上盐场。

这次去再称盐三百斤。装好口袋，当即结帐付款。然而去炭场再过分量时，果然又差了六十斤盐。这时，

王邦屏却成竹在胸，带领三人去盐场论理。

卖盐的小伙计，见来说咸盐分量不够，毫不在乎。“我们盐场是琉璃河街上有名的官字号买卖，秤是准斤十六两。”

“我们八十斤就是一百斤。买就买，不买拉倒。”王邦屏一点不慌：“那好，我今天去衡器店为你修杆新秤，卖上三个月，少一天也不行，现在就立下字据”。卖盐伙计见来者不善，就反问：“你是谁？少管闲事，不然我们人多，掌柜的也不是善茬的。”这时，邦屏平心静气地说：“你听说石楼有个王拔贡吗？我就是。”伙计一听，顿时傻了眼。慌忙请出掌柜，并表示服法认罪，自此再不敢坑害百姓了。

王拔贡依法监秤，秉公办事，受到附近十里八村乡亲们的交口称赞。

### 捐俸修衙

旧社会封建习俗，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叫作“官不修衙客不缮店”。但是，王邦屏在河北省藁城当知县时，却捐俸积资，修缮县衙。为此，当地乡绅、富豪也纷纷响应，筹款备料，修缮年久失修的县衙门。县衙门口五间，中间过堂门，下台阶过甬道、可入大堂。“廉明公正”木制匾额，就悬挂在大堂门口。重修过的县衙门、公堂典雅庄重。

该项工程由“帮审”（县长助理）操办。三弟邦理协助，使得修衙工程提前按质竣工。王拔贡在藁城为官十载，岁至花甲，告老还乡。当地百姓，成群结队，为王知县送行。

### 遗作

王拔贡邦屏，一生好学，孜孜不倦。琴棋书画、诗词词赋无所不通。百年之后，留有遗诗一册，名曰《友松书屋诗抄》，全书诗作计二百首，诗文中用典确切，堪称佳作。今录其中五首，内容涉及家乡房山，供读者品评鉴赏。

#### 游上方山兜率寺(秋日入山访僧)

世外幽楼昼掩关，松林萧寺乱峰环。  
片云孤鹤意俱适，流水疏钟声自闻。  
风叶绿堆芳草径，霜花红映夕阳山。  
金刚读罢蒲团坐，相对无颜俗虑删。

#### 过天开村

清溪流水碧迢迢，隔岸霜林秋色娇。  
人在大房残照里，青山红叶马嘶嘶。

#### 娄子水村访刘绍三同学

砚席分襟已廿年，劳辛身世总徒然。  
时艰不插风尘脚，羨煞刘郎世外仙。

### 夏村衍庆庵赏牡丹兼参观学堂

历经苍桑劫，千里出庙堂，寻芳来盛地，集社谒花王。  
已入文明界，如游富贵乡，儿童醉心学，休负好时光。

### 罗家峪避乱

避乱深山借养疴，数间茅屋倚卷何。  
虫鸣坏壁经冬少，犬吠荒郊入夜多。  
故国几人存骨肉，边关何日罢兵戈。  
湘军已老文襄死，空使英雄叹奈何。

拔贡王邦屏的诗文作品，保留完好。抗日战争结束，房山解放前夕，村中小学校，因无课本上课，曾用邦屏的诗当作教材，教授学业，发挥了一定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 热血春秋

### ——记张廷瑞烈士

贲麟

张廷瑞烈士，曾用名张乃东、张振东、张之达，是我区中国共产党组织活动的创始人。1928年张廷瑞在曹章、小次洛村建立了党小组，使我区党的早期组织活动整整提前了十年。他还先后领导过学生、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不分昼夜地在房、涞、涿地区开展工作，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并担任房良涿联合县长。1940年9月25日，时任新(城)、固(安)、涿(县)联合县长的张廷瑞，为恢复抗日根据地，西渡大清河时，不幸牺牲，为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流尽最后一滴血。

### 启蒙

永乐村是河北省涿县(今涿州市)城北拒马河畔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村庄。据说村名与明成祖朱棣登基有关。1901年3月初的一天，在村东高坡住的张唤家喜气洋洋，一家人围着刚生的胖小子商量取个什么名字，“就叫廷瑞吧！”爷爷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望着能传宗接代的小廷瑞，父亲张唤一连气地说好。是啊，过惯了苦日子的农民做梦都想发达乡里，改换门庭。

张唤一家是靠勤俭和机遇走上发家道路的普通农户。多少年来，张唤家也和村中大多贫苦农民一样，

有一头耕牛，几亩薄田，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靠自己省吃俭用，没早没晚的干；也靠自己上过两年私塾，能当上县粮房催租员，除有了一份多余的收入外，还能从中捞点好处。有时农民一时交不上租子，他常给先垫上，农民还不上，就把没人愿种的河滩地抵给他。几年下来，也竟有了十来顷河滩地。这一年拒马河发水，冲下来的泥土把河滩地变成了肥田，从此张唤发了家。他在村东富户集中的地方盖了八间新房，又添了儿子，张唤发誓要让儿子多读书，自己不就是因为读过两年私塾才发达起来的吗！

渐渐长大的张廷瑞显出绝顶的聪明，别人随口教他的诗书，跟着念两遍他就能背出。到了入学年龄，他被父亲送入本村私塾。他因为学习刻苦，成绩常名列前茅。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入本县的完小。

1920年，张廷瑞考入以师资强、教学质量高而闻名的保定育德中学。这所学校是由原同盟会员所办，同学们思想十分活跃，一些马列书籍常在同学们手中流传。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都在这里留法预备班学习过。在此，张廷瑞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入学不久的一天，他听说一名叫邓中夏的学者要来校讲演，于是早早挤到教室前面。只见大步走来的邓中夏却只有二十五、六岁。他身穿大褂，留着分头，眉宇间充满活力。“同学们！”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邓中夏开始演讲。他的演说逻辑明晰，语句幽默而生动，象磁石般地吸引了张廷瑞和同学们。当天夜里，辗转难眠的张廷瑞就写了加入学校“文学研究会”的申请，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在保定外围组织的一名成员。

1921年末，张廷瑞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成为保定地区团的领导人之一。他以极高的热情发展团的组织，先后发展了直隶女二师李培芝(后来成为王若飞的爱人)、保定六中杨企业、保定铁路何是泉等十余名同志入团。连他的二弟张廷宗也在他的影响下考入北平四中，后来投身革命，牺牲在井冈山地区。

1922年，经中共北平市委批准，保定建立了中共基层组织。同年11月，张廷瑞由团转党，从此成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战士。

### 初试

1924年3月14日，保定直隶女子第二中学爆发了驱逐封建校长燕士奇的学潮。女学生们都发动起来了，李培芝等学生领袖却没了主意。学潮运动引起了张廷瑞的高度关注。他受组织委派，一方面积极向学生领袖李培芝、王绍华等提出下一步活动意见，一方面组织了保定学生联合会，发动学联动员整个社会支持学潮，把学潮扩展成为反对封建、腐败的教育制度的运动。由于京、津、保社会进步力量都起来支持学潮，直隶省教育厅终于罢免了燕士奇的校长职务，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当时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评价这次学潮的胜利时说：“在女子教育革新运动上具有伟大的价值。”

1925年，中共保定支部成立，张廷瑞担任了支部书记。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张廷瑞领导了保定地区反帝爱国示威运动。运动胜利了，他却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告别了使他踏入革命征途的学生时代，张廷瑞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到石家庄担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专门从事党的工运工作。他通过活动，在铁路工人中组建了13个工会小组，还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宣传队。为了给铁路工人争取工资，他发动领导了保定铁路工人大罢工，迫使北京铁路局给工人补发了工资，取得了工运斗争的重大胜利。

张廷瑞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开始受到敌人的跟踪和监视。1926年9月18日，张廷瑞在天津开会时，因叛徒告密，遭到军阀当局的逮捕。

### 播种

尚庄是涿县靠近房山县界的一个自然村。1928年春的一天，一位手提文明棍，身穿灰大褂的读书人来到了位于尚庄村西头栖霞寺大庙内的尚庄小学，引起了村民和小学生的注意。很快一个消息在村民中传开：“咱村来了新的教书先生，听说学问还挺大呢！”这位新来的教书先生就是刚刚被党营救出狱的张廷瑞。受保属特委指示，他化名张乃东，到涿县、房山一带秘密发展党组织。尚庄成为张廷瑞新的落脚点。张老师教书点子多，知识又丰富。他不但开设了语文、算术、常识、修身等主课，还开设了体育、唱歌等副课，受到学生热烈欢迎。他通过把革命道理编成歌词、教同学们唱，起到了宣传革命思想的作用。时间一长，张廷瑞接触了许多有革命倾向的贫苦农民青年，并为他们办了一所平民小学。在平民小学的学生内发展了孟庆昌、马才、赵福龙、毕文起、张秀增、彭德山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成了中共涿县特支。

1929年初，经张廷瑞、马才介绍，房山曹章村有文化、有追求的年轻人杨福贵加入了党组织，成为房山区的第一位中共党员。不久，马才又介绍了曹章村的李景春入党。根据上级指示，杨福贵又在小次洛秘密发展党员。并成立了小次洛党支部。张廷瑞通过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涿、房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 家乡

千年的拒马河自房山奔流而下，到永乐绕个弯向北又向东直奔大清河而去。它经历过燕太子丹送一去不返的壮士荆轲的悲壮场面。今天它看到的是3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张廷瑞走在大堤上，脑子里还在回想着那惊险的一幕：他领导尚庄农民进行“反验契纸”的斗争，使村里的地主十分惊慌，到县里勾结保安团，要对张廷瑞下毒手。幸亏老校长魏恩镇知道得早，塞给他十元大洋，让他快跑。前院保安团开始搜人，后院，张廷瑞已经开始销毁所有文件，迅速撤离了尚庄。

1930年6月，张廷瑞从尚庄撤回家乡永乐进行工作。在村西沟落了脚。永乐分为村东，村西两半，村东住地主和富户，村西住贫苦农民。张廷瑞父亲张唤本来住村东坡上，可张廷瑞一到家，竟然提出给全家每人留两亩地。自食其力，其余全分给穷人，把张唤气得火冒三丈。联想起张廷瑞有一年回家乡到地头给父亲帮忙，正赶上处暑收黍子，张家雇了20多个短工已把50亩地的黍子割倒。张廷瑞对父亲说：“爸，你回家吃饭吧！这我来看着。”父亲走后，张廷瑞将割倒的黍子全都分给了周围拾穗的农民，自己剩两捆黍子就躺下睡觉。父亲吃过饭，套大车来拉黍子，见地里的黍子已经干干净净，气的照张廷瑞身上就一巴掌，张廷瑞擦擦眼：“我怎么睡的这么香？”从此，张唤认为花钱供孩子读书是养败家子，中断了小弟廷碧的上学。今天，张唤新账旧账一齐算，拿起一根粗镐把，冲张廷瑞就打。张廷瑞只好搬到村西的贫苦百姓中间。当然，这也正合了他的心愿。

在永乐村西沟，张廷瑞又一次秘密发展了江风、王忠等一批党员，成立了支部。掀起了永乐地区的雇工罢工斗争。由于当时河北省农民斗争此伏彼起，这场斗争震动了县里和省城。村东的大户告张廷瑞“阴谋暴动，妄砸官府。”然后给县太爷送上了一份礼，请求派兵镇压。

1930年9月，百余名保安队员包围了西沟张廷瑞家，威逼他的妻子交人。为了保护张廷瑞，正在他家的母亲高喊：“警察逼死人了！”跑出房间一头扎进井中。老母亲的行动激起了广大村民的义愤，吓得保安队连忙撤兵。又一次脱离险情的张廷瑞。匆匆告别了心爱的妻儿，告别了老母亲的遗体。奔向省城保定。

### 铁窗

1931年初,保属省委调张廷瑞任保南市委书记,化名张振东,负责井陘、平山、灵寿,行唐、新乐等地党的工作。由于他的忘我工作,这一地区党的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他不幸又一次被敌人逮捕,受尽了酷刑。后来被送到北平。

在北平,张廷瑞被判刑10年,转到北新桥陆军监狱坐牢。张廷瑞老练豁达,乐于助人,很快得到难友的尊重和信赖,被难友们称为“老大哥”。身为“老大哥”的张廷瑞很自然地成为难友们的领袖。在一次难友遭监狱看守毒打后,张廷瑞发动难友进行绝食斗争。最后,监狱长不得不公开道歉,答应放宽限制,改善伙食,冬日可以取暖,难友可以公开购书读书等条件。购进来了一批《唯物辩证法》、《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书籍,使监狱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校。不久,他们又获得了订阅报纸的权利,难友们及时通过报纸了解狱外的斗争形势(张廷瑞在狱中时,北平经历了由奉系军阀统治转向由有一些爱国进步思想的西北军二十九军统治的转变过程,可能是狱中情况转好的重要原因)。张廷瑞扩大战果,组织难友编演进步戏剧,进一步争取看守和难友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萌生。他还乘杨杏佛、胡适之等社会知名人士来狱中视察,及时要求去掉难友的镣铐,使监狱长不得不当众表示同意。

1936年,张廷瑞被减刑释放。他告别难友们,迈向了新的战场。

### 揭竿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在房涿涿地区负责党的组织活动的张廷瑞,面对日寇的暴行,义愤填膺。为了尽快投入抗日大业,他派出党员李永福、李合到北平、保定等地汇报情况,接受指示,一方面日夜奔波于农村各地,组织动员地下党员建立抗日联合阵线。10月,他接到中共保属省委“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心情十分振奋。他立即联络号称“涿州虎”的下胡良村中共党员于振坛,召集党员骨干,组织一支抗日救国军;由于振坛负责军事,张廷瑞负责政治工作。

队伍拉起来以后,他们连打几个胜仗。在冯村伏击,击毙7名鬼子;在王家坟伏击运输队,缴获一批军用物资。连续的胜利使驻涿县日军司令官板田大队长十分恼怒,亲自集合300多人前往清剿;敌众我寡,抗日救国军迅速退到长沟以北的太和庄,并与驻守这里的“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第一路周文龙部队取得联系,共同合围来犯日寇。日军在板田带领下疯狂追击,进入太和庄地区,突然受到左右两面夹击,刽子手板田当场毙命,剩下的敌人只好掉头撤回涿县。

几天后,日寇进行报复。1937年12月22日,日军700多人偷偷包围了太和庄。双方一交火,战斗就十分激烈,机关枪、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周文龙见难以取胜,匆匆率队西逃。抗日救国军在抵抗中伤亡很重;于振坛急忙收拢余郡向西撤走。日军占领太和庄后,兽性大发,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祸及东长沟,共被烧房屋300多间,被杀百姓13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太和庄惨案。

### 争取

1937年末的一天,房山天开村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是“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第一路司令周文龙结婚的日子。这时副参谋长,“涿州虎”于振坛(于振坛已受张廷瑞之命,带队与周的队伍合并)躬身向他说:“有贵客相见。”周文龙转身过去,见张廷瑞笑容满面地出现在面前,不由惊喜万分。周文龙虽是山西榆次

人，但他出生地在离涿县尚庄咫尺之遥的豆庄村，对张廷瑞的名字，从小就如雷贯耳，十分佩服（张廷瑞在尚庄活动时，周文龙只有14岁）。后来周文龙因在东北军骑兵二师当兵时携枪逃跑被抓，又与张廷瑞同关在北平陆军监狱，对狱中的“老大哥”张廷瑞所做斗争常有耳闻，只恨自己无缘结识。今天张廷瑞亲来贺喜，他顿感满面增辉，连连拱手：“大哥大驾光临，小弟倍感荣幸”。席间，张廷瑞向周文龙讲了“大敌前当，唯有共同抗敌，团结一致，才是真道理”，使在场的人十分赞同，纷纷要求张廷瑞留下共同对日作战。周文龙更是诚心相留。这正合张廷瑞要争取改造周文龙部队的心意，于是他在周文龙处担任了政训处主任。

为了改造周文龙这支带土匪习气的部队，张廷瑞一边宣传抗日道理，一边把一些党员骨干安排在要害岗位，使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日积极性十分高涨。不久，周文龙部队主动在长沟伏击了一支日寇骑兵巡逻队；光缴获的战马就达30多匹，狠狠打击了日寇的气焰。

1938年春夏之交，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派了杨贯之带一排战士来到政训处，协助张廷瑞做周文龙的工作。周文龙让杨贯之当了自己的秘书，派另一名八路军干部徐正冲担任了部队的高级参谋。队伍也迅速发展到现在近一万人。

### 突袭

队伍发展了，纪律严明了，一些混在队伍中的流氓、兵痞感到自己的位置没有了。他们的头目兵痞出身的副司令张老六千方百计地挑拨张廷瑞与周文龙的关系。阴谋暴露后，张老六带了一些人逃到琉璃河当了汉奸。对张老六的到来，日军部队长对马大佐十分高兴，双方开始打起周文龙的主意，决定以高官厚禄收买周文龙，于是派两个说客到长沟去说服周文龙。

送走日寇派来的说客之后，周文龙找来张廷瑞、杨贯之商议，并说明了自己抗日到底的决心。“不！”张廷瑞表示：“应该去。”说得周文龙一时摸不着头脑。张廷瑞告诉周文龙：“不如将计就计，借机进城，来个黑虎掏心，打日寇一个天翻地覆。”说得周文龙、杨贯之拍手叫好。

1938年3月25日，张廷瑞、于振坛、傅德才等陪同周文龙到涿县城内与对马大佐、丰岸一佐美等日军头目谈判“共图大业”。然后在城内四处游逛，摸清敌人分布情况，随后策马回到驻地。

几天后，正值庙会，勇将傅德才带12名手枪队员潜入涿县，直冲日军守备队，共打死对马大佐以下20余名日军。此时警察中队长唐尧也乘机打死十几名日军，率队伍起义。在城门站岗的警察乘机打死站岗的日军岗哨。埋伏在城外的于振坛向城里发动进攻，直到城内勇士和起义警察撤出战斗，胜利回到房山西域寺住地。

### 灾难

连续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一些领导人的头脑，而日军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他们派奸细详细了解了“同盟军”司令部及驻地的情况，派来飞机对这里进行狂轰滥炸，炸塌了千年古寺——云居寺，炸倒了古树民房。由于“抗日救国同盟军”没有防空经验，伤亡很大。当日夜里，日军兵分数路对同盟军部队进行了合围，从黎明开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在迎战和突围中，战士们一片片地倒下。于振坛和杨贯之部队组成的二团，战斗力较强，他们保护着政训处突围，经过三天苦战，终于突出了包围圈，身边只剩下百余战士。但部队到达野三坡附近，又遭到亲日的六善会截击。于振坛只好掉头再次杀向鬼子的追兵，不幸牺牲，百余战士也大多牺牲在与鬼子的搏斗中。傅德才等战将也杀出重围，牺牲在豆店大红门。对他手下的手枪排成员，鬼子全部用机枪射杀，以报涿州“黑虎掏心”之恨。

“同盟军”遭灭顶之灾，近万人的部队就这样消失了。带警卫员冲出重围的张廷瑞大病一场。他躺在石

窝不远的山村里，发着高烧，脑子里闪现的是战友们冲锋陷阵的身影，嘴里不断喊出“冲呀、杀啊”的声音。高烧退下后，想起牺牲的战友，眼里流下悲愤的眼泪。

身体稍好一些，他让警卫员扶他去找部队，没想到竟遇到了在战斗中失散的妻子董兰英和孩子恩子、秀文、蕴文四口日人。看着篮子里的野菜和饿得皮包骨的孩子，他的心象刀割一样。回到爱人临时居住的四壁漏风的窝棚里，爱人给他盛上一碗“喂喂扔”（用玉米秸泡盐水）。张廷瑞没舍得吃，他把饭菜留给了孩子们，狠狠心告别家人，继续出去找队伍。

一天，警卫员王忠告诉他，周文龙已回到石门，身边只剩 20 几人。他爬起来，马上让警卫员带他去看望周文龙。已在炕上躺了一天一夜的周文龙见到张廷瑞，痛哭失声：“弟兄们都完了，我们败得太惨了。”他还表明自己不想再干了，想去北平过几天舒心日子。张廷瑞掩住悲痛，告诉周文龙：“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十分关心这支队伍，已让去军区司令部汇报工作的徐正冲带来了改编命令，没想到回来时正遇上敌人包围和战斗。上级指示我们，跳出敌人包围，转到冀中地区吕正操司令员的管辖地区，组织队伍，将来再杀回来，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

1938 年末，张廷瑞、周文龙带着小股队伍，秘密穿过平汉线，转移到冀中十分区，开始了新的战斗。

### 牺牲

1939 年，张廷瑞在冀中十分区负责对抗日武装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思想工作的任务。不久又随三十二团（团长刘秉彦）在安次、永清参加战斗。

1940 年，抗日战争进入十分艰难的一年。敌人在十分区增派了部队，修筑了碉堡、封锁沟，进行了强化治安。由于朱占魁司令员以开会名义将原抗日同盟军首领陈东来扣留后杀掉，使陈的结拜弟兄周文龙等十分不满，又怕遭到陈的下场，在新城县双铺头村联庄自卫团头目王凤岗的煽动下投靠了日军，被日军改编为“皇协军”，由周文龙为司令，王凤岗为副司令。

为了打破敌人封锁，冀中十分区调张廷瑞担任涿新固联合县县长，组成张廷瑞、樊干等精兵强将组成的 100 多人的县大队，力图恢复这一地区的抗日局面。但是县大队每次跨过大清河，就遭到王凤岗、周文龙的包围追击，难以站住脚。他们决定采取更加灵活的战术，选拔了 16 名干部，再一次跨过大清河，终于在涿新固三县交界处站住了脚，他们逐个村庄召开会议，做群众工作，恢复民主政权。

9 月 25 日，工作队在西双铺头开完了大会，张廷瑞发起了高烧。但他仍坚持步行八里到达中代屯村，王凤岗听到汉奸报告，集中了上千人从四面向他们合围。听到枪声张廷瑞让樊干带人先撤，自己带人断后。当张廷瑞冲出包围后，发现随行的工作人员将文件包丢失，又回到中代屯寻找。当他们又一次冲出包围，渡过大清河时，敌人从三面向他们逼进。他们一边过河，一边射击。当敌人乘机逼进了张廷瑞，警卫扑过去与敌人搏斗。张廷瑞打光了子弹，他与敌人在水中搏斗。敌人最后向张廷瑞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张廷瑞倒下了，鲜血染红了大清河。他的遗体至今尚未找到，但烈士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这一带人民的心中。

（《房山文史资料》第 11 辑）

## 普通党员的楷模

卓成栋 王国林

李金于 1920 年出生在周口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自幼务农，1948 年参加解放军。自 1954 年从部队复员回乡到 1983 年一直担任周口村的党支部书记。他以身作则，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担任领导期间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为了全村的事业呕心沥血，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在村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李金 1950 年在部队入党。1954 年在部队三次立功，后复员还乡，被安排到京西矿务局保卫部门工作。当时村里急需人才，李金毅然留在村里，并将 400 元复员费分给村中的两个合作社。同年，李金被选为村中西社社长。

1955 年李金担任了当时大村(包括周口村、周口店、云峰寺三个村)党支部书记。

1956 年初，周口店乡成立高级社(包括周口村、周口店、官地、山口、云峰寺)，李金任党总支书记。此间，李金领导全乡高级社，提出“绿化千亩塔山，向周口店河滩要千亩良田”的口号，得到全乡人民的热烈响应。当时全乡五村群众派出精兵强将，在塔山的三个坡面上开始了植树造林的大战，仅三个月就遍植松树和其它树种上万株。与此同时，五村还派出部分劳力开向了周口店河的大河滩砌坝、清石、平整滩地，围造良田。正是这一举措为周口店地区的林业发展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 年底，大社由五村一乡划分为一村一社，原周口店乡撤消。周口村以本村为基础，单独成立了高级社。李金任村党支部书记。

1957 年，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的号召，李金利用周口村的集体优势，购买了当时北京市在农村中的第一台铁牛拖拉机，使周口村的名声远播华北地区。

1958 年，周口店地区成立了人民公社，原以村为社的格局又被打破，小社又组建成大社。

人民公社成立后，李金又带头将村中新买的铁牛拖拉机无偿交给了当时房山县农机局。1956 至 1958 三年营造的千亩塔山林产也无偿地交给了房山县林业局，以后成为周口店林场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在大社期间在周口店河滩营造的千亩良田也有 20%划到了周口店村。对于党的决定，李金坚决地执行，从不顾及本村的小利益，而是从大局出发，为地区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9 年后，周口村成为周口店人民公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决地区群众缺水的实际问题，李金又提出在缺水区开掘大口井的建议。周口村并率先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本村所辖地段开始打井工作。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到 1962 年周口村开挖了十口大井，每口井可浇灌土地几百亩，基本解决了本村的吃水难和农田的浇灌问题。

在带领全村发展农业的同时，早在 1956 年李金就极有眼光地赎买了当时周口店西和北方向的几处灰厂。如当时的姜家窑、大刘顺、大北帮等，为周口店地区后来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为了将生产的灰石运往使用单位，李金在担任周口店乡党总支书记期间还建了近百辆马车的运输队，成为周口店地区的一支重要的运输力量。

1960 年李金在周口村首次创办了周口村煤窑。利用挖出的煤炭发展本村经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为村中添置了脱粒机、扬场机、水泵、铡草机等农业基础设备。六十年代中期村中又建起了修配厂、保温材料厂、小水泥厂等，使周口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六十年代末周口村被评为北京市的农业先进典型，当时市农口提出“平谷学习许家务，近郊学习东升大队，远郊学习周口村”的口号。

1973年10月李金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他被评为北京市农业战线上的劳动英雄。

1983年,63岁的李金主动向党组织提出要求退居二线,让符合四化标准的年轻同志上岗,在地区发生很大反响。

1996年,76岁高龄的李金在上地干活时因肺心病发,不幸逝世。听到这个消息,周口村的村民很多都流下了眼泪。在追悼会上,村党支部书记段东生的悼词说出了全村人心中要说的话:“全村不论什么时候,起得最早的是李金,睡得最晚的是李金;全村干活最多的是李金,挣得最少的是李金;盖房交木料最多的是李金,住房最少的是李金;向党组织从没伸过手的是李金,在村中威信最高的是李金。”

是的,李金同志从1954年回村后,放弃出外当工人的机遇,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无私地交给了周口村。在他当领导期间,很多颇为感人的故事,村民们早已深深地牢记。

如前十几年,区里领导夏方伟同志在周口村蹲点,发现李金的一大特点。即不论谁跟他干活,都特别地累。他每天早起起来先到村中主要场地转一遭,8点准时到了打井工地;一天下来,晚上吃完饭队里开会;学习,他给社员讲政治课;活忙了夜里接着挑灯大干。一年下来,他竟打了300来个夜战。在他的表率作用下,全村社员标着膀子干,当时亩产就达到1400多斤。

当书记的抓经营管理,不论是谁找到头上要求照顾,他都一视同仁,照顾人不照顾活,照顾活不照顾人。干部家属必须同大伙一起干活,不准搞特殊化。外出开会,自带干粮,不花村中补助;村中来客人,从不陪客。

1973年村中盖了一批住房,他把自己家的房料全部交给集体,交得最多,可他仅要了30平米,六口人住这么少的房子,就连社员都要求给书记加房,可李金坚决不要,这在当时村中传为佳话。

李金对自己严格,对同志热情。当百姓有难,他总是伸出无私的双手。五保户肖白氏,李金把她的养老给包了,长期帮她担水、照顾,甚至零用钱的开销全管,就连死时抱头的事他都干了。村干部魏广仁、魏世忠在队里干了一年,年终补贴家里人看着少,这事让李金看在眼里,他找到会计,让会计从自己的工分中分别给他们两人拨了500个工分,事后两人一直认为是大队照顾他们的。直到十几年后,才知道当时的补助是李金个人的,他们不相信,李金为什么从没提过这事儿。

李金在村政事业建设中默默地奉献,也带起了一大批有为的年轻干部。其中村民付宝良被评为河北省和北京市的农业劳模,付秀英被评为北京市妇幼保健劳模,付让被评为北京市林业劳模,程淑芹被评为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而做为集体形式出现的周口村党支部,也多次荣获地区,市的先进集体和农业发展的先进样板,在北京西南地区,甚至在全市、全国享有极高的荣誉。

李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一个普通的党员之所以能在地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村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主要原因是他以一个普通党员言传身教,履行党员义务,忠实地按党章的要求去做的最起码的生活准则,这也是每一名基层党员最需要的东西。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 龙乡英雄李宝

王国林

房山区东南召乡前信用社主任、残废军人李宝，1945年1月7日出生在西南吕村一户农民家里。他从8岁开始上小学，1961年初中毕业。

1965年1月26日，李宝参军入伍，当了一名空军战士。李宝参军仅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7年1月5日，毛主席亲手签发了“援越抗美”的战斗命令。入越作战的目的、任务十分明确：保卫河内，保卫太原钢铁、发电厂，与越南兄弟并肩作战，抗美援朝。刚入伍两年的李宝，在空军防空兵某部一连二排五班当班长。随着入越参战部队，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中越边界——友谊关。1967年6月18日，炮兵一连全体指战员刚刚集合完毕。空袭警报声就响起来了。炮五班战士在班长李宝带领下，飞快跑向高射炮阵地，迅速作好战斗准备！此时，有二批12架敌人飞机从西北方向呼啸着向高炮阵地上扑来！当敌机飞入火力网时，阵地上的高射炮立刻怒吼起来……

紧接着，第二批飞机又飞过来，对我方阵地狂轰滥炸！当我军正向首批飞机还击时，敌机突然改变航向，向炮位、阵地上俯冲而下。五班班长李宝意识到，一场生死搏斗将要发生。面对硝烟战火严峻的考验，他毫无惧色，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当他正全神贯注地指挥炮手奋力还击敌人飞贼的时刻，就象有人猛推了他一把，就应声倒下了……美军飞机F-105投下了重磅炸弹，就此引爆子母弹同时爆炸。顿时阵地上硝烟弥漫、炸弹横飞、震耳欲聋。

过了好一会儿，被震昏了的李宝稍稍清醒一些，他不顾自己被炸伤的右腿疼痛，吃力地用双手撑地，勉强坐了起来。但双腿象灌了铅似的，几次挣扎，想站起来，均没有成功。他这时才发现右小腿已炸断大部分，只连着一点皮肉。由于流血过多，阵地上黄土、杂草都染红了……。战友们见班长受伤，都投来关切的目光。李宝向炮手们高喊：“别管我，快打敌机！”就在这时，副班长王泽海左腿也被炸伤，血流不止，仍毅然坚守在岗位上。这次激战，炮一连与兄弟连队协同作战，共击落美机三架，击伤多架。

这一仗，五班长李宝作战英勇顽强，记一等功一次，全班荣立集体三等功。李宝赴越后，曾多次立功受奖。在前一次战斗中，他们所在的炮连还击落“鬼怪式”轰炸机一架。上级党委给炮一连记集体二等功一次。1967年底，该连被评为“四好连队”，一等功臣李宝作为四好连代表，去北京参加“代表大会”。1968年国庆节，李宝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国庆观礼，他幸福地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1969年1月25日，李宝和其它代表在首都体育馆大厅里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并留影纪念。

李宝于1969年退伍还乡。三十年来他扎根农村，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居功自傲，生活上有困难，从不向组织上伸手。至今，拖着一条伤残的右腿，仍然兢兢业业地在农村金融战线上工作着。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 忆父亲刘岗甫二三事

刘占武 口述 李 忠 整理

我的父亲刘岗甫，名叫刘琨，岗甫是他的大号，是张坊镇南白岱村人，生于1905年，1967年逝世。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农庭，念过几年私塾，能写会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他为人厚道，邻里关系很好，谁家有个大事小情请他，从不推辞。

### 走向革命的第一步

父亲在“七七”事变前，大部时间是在商业上当写帐先生。曾在张坊的恒义号、同益兴等商号当过写帐先生。在1938年当地解放以后，经人介绍到由政府设在穆家口村设立的贸易局去管财政和业务工作。当时局长是郝一鸣。这是他开始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在贸易局工作时期，通过他以往的关系为解放区购运了不少的油、盐、布匹、纸张等用品，购运方法主要是我们村可靠的吕申、黄起山、邱贞桂等人，赶着毛驴往山里解放区运送。及时地解决解放区军民生活和办公用品的急需，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 征粮又争人

约在1940年，父亲又被调到区里工作，任财政助理。凭他以往的社会交往和为人，在征粮征款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了征粮征款，长沟以西、南白岱以东几乎所有村庄都有他的足迹。特别是当时半壁店、广润庄等一带村子是敌我双方的两面政权，伪保长白天为敌人干事，夜间为八路军做事。有一次在征粮工作中，广润庄的孟虾米(外号)找我父亲说他们村伪保长王敢干(外号)不让群众给八路军交公粮。夜间我父亲就同他一起去广润庄，找到了伪保长做政治思想工作。经过反复交待党的政策，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后，不仅使公粮如数交齐，而且还争取了伪保长掩护我地下工作人员。他曾对伪保长说：“老孟(指孟虾米)是八路军派的地下工作人员，今后他的生命安全由你负责，出了问题找你算帐。”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以后交粮交款和掩护老孟的安全问题。

### 在振兴纸店被捕

日本鬼子不断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人在我解放区边缘地带的塔照村、张坊、北白岱先后建立了据点；为了封锁解放区，东从周口店西至张坊村靠北山根一线挖了长达百华里的封锁沟(沟深约十米、宽约五米)，对我解放区实行了严密封锁，给解放区军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解放区军民生活和办公用品的困难，组织上决定由民主人士周硕臣负责在日伪军占据的长沟镇组建了一个振兴纸店。这个纸店实质上是解放区安排在敌人心脏的一个购物点和情报站。纸店由周景秀和我父亲负责。虽然振兴纸店成立时间不长，却为供应我解放区军民生活必需的用品作了大量工作。由于我方游击队长王殿臣叛变，当了汉奸。1943年春季的一天，他带领特务伪军把长沟振兴纸店给抄了，并把

周景秀和我父亲抓走，到涿州宪兵队关押。我父亲在监狱中受到压杠子、灌辣椒水等严刑酷打，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始终坚贞不屈。当时我和母亲曾几次去惠南庄周硕臣家商量营救办法。托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钱。为营救父亲把房子、土地都卖光了，仍无济于事。半年过去了，后有人出主意，带上钱和重礼物去托王殿臣的盟兄弟、大峪沟的周得九，才从涿州监狱里救出来。

### 急中生智保军粮

父亲从狱中出来后，在家休养一段时间，身体基本康复后，就又回到区里工作。约在1945年，上级部署的中心任务是征粮入库。当时以县财政科长隗甫从为首的征粮工作组，由平原一带敌占区征收玉米、小麦等公粮几十万斤。没有粮库，就在西白岱村设了一个中转站；把征收的军粮都送到西白岱村王兆魁家临时中转站；再由父亲和顾永生等人负责组织向解放区转送。就在这收、送公粮之际，中转站还有四十多万斤粮食没运走时，敌人向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当时敌人快进村了，我父亲和顾永生等人急中生智，急忙把运粮队人员安排转移后，立即锁上存有粮食的屋门和院子大门，又用扫帚打扫了人畜脚印，并在门上挂了写有“小心地雷”的牌子，随即撤离，迅速转移到大峪沟村。敌人进攻到西白岱村烧了三百多间房子，但对王家大院的房子没有烧，因而保住了四十多万斤粮食没受损失，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

### 听从党的安排

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父亲被提任为房山县三区区长。后因工作需要，1955年又调任华北局直属的房、涞、涿水利渠道管理委员会任主任；先在房山县半壁店村办公，后迁到涿县的孙庄去办公，一直工作到1967年病逝。

在这管水利的十多年中，父亲为了开发房、涞、涿三个县的水资源，合理地运用拒马河的水，解决三个县的用水矛盾，跑遍了山川和平原。如开发房山的马刨泉、北甘池的将军庙泉等。特别是为了涿县孙庄一带数万亩旱田变水田，从房山县的蔡庄村南到涿县孙庄修建了几十华里长的大灌渠，解决了孙庄一带的用水问题。他办了许多好事。他经常对我们讲，要听共产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决不能动摇。他最值得我学习的是立场坚定，在那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论环境多么艰难残酷，他从不动摇。管钱管物的时间很长，但从来没有往家里拿过一粒粮，一寸布，家里再穷也不能占公家的一点便宜。在他几十年的革命过程中，经过土改、三反、五反、四清等政治运动，没犯过任何错误。他病逝在十年动乱时期，因当时我正在“牛棚”里，都没有向他老人家告别，我们一直怀念着他。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作者李忠系原区建委干部

## 我所知道的蒋维平

侯国智

### 青砖门楼

我家住在石楼村东街北胡同，出胡同往西一拐有一座青砖门楼，就是蒋维平老英雄的家。因为蒋维平会医术，所以乡亲们叫他“蒋先生”。那时，我常和小伙伴在这门楼前的台阶上玩耍，而且常听大人们背地里小声议论：“蒋先生在那边当了大官啦！”同时伸出姆指和食指比划个“八”字。其实，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因为蒋先生在石楼村人缘好，没人去告密，又因为铁路西边就是八路军出没的地方，也没人敢难为他。蒋家院里住着两位老太太和一位姑娘。一位是他的夫人程德贤，一位是他的弟媳，南边口音。那姑娘就是蒋先生的正上中学的女儿。不知怎么论的，家里人让我跟程氏叫表姐。她会些简单的外科手术，那是蒋先生在家教他的。据程氏讲，蒋先生在家时曾嘱咐她，“你只要学会这点手艺，就饿不着你！”我小时跟小伙伴在五哥家的场里玩捉迷藏，被翻场用的桑木叉子齿扎穿了左眼皮，从伤口可以看到眼珠子了。伤口是蒋大奶奶给治好的。治好蒋大奶奶什么也没有，还是我父亲主动送去了二斗大米作为谢礼。

### 荣归故里

房山是1948年底解放的。在这不久，我第一次见到蒋老英雄。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留着一部长长的大胡子，两眼炯炯有神，身板虽然挺瘦，却声似洪钟。穿着一身军队的干部服，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英雄气十足。他给欢迎他荣归故里的乡亲讲了许多话，还给照顾过他家的亲朋好友送一些礼物。

由于他过去从杨户屯过继来的儿子参加革命牺牲了，他又从杨户屯过继了个孙子蒋震。随后，他给孙子娶了媳妇。送给他们的礼物是：铁锨、大镐、背筐子。这在当时可是件家家传颂的新鲜事儿。蒋先生说这叫移风易俗，新事新办。这样做可以让他们从事劳动，永远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

第二年，孙子媳妇为他生了个重孙子，他十分高兴，起个名字叫真理。1976年以后我在石楼中学任教时，虽然没教过蒋真理，但他却是我家的常客。因为他是我的堂兄——外号“大金票”的侯国祥的徒弟。蒋真理为一些机械加工方面的问题，常跟我讨论。

蒋老英雄主张植树造林。他贡献出自己的津贴费买了许多大桃，让乡亲们吃桃，桃核归公，由村干部在村西北角，建了一座“维平苗圃”。栽种了石楼村第一座桃园。我小时曾到苗圃参观过，里边青青翠翠，欣欣向荣的样子。直到现在做梦也常常梦到身在苗圃的情景。

### 同庆“八一”

1954年夏，我在河北保定一中念高中一年级回家过暑假。那些年，度假的中学生都组织起来搞宣传，我又几次被推为负责人。那年正赶上蒋老英雄也在家休假，于是我提议与蒋老英雄联欢，同庆“八一”建军节，请蒋老英雄给大家讲革命故事。这一提议得到全体同学的拥护，也得到蒋老英雄的同意和热烈欢迎。

1954年8月1日，我们二三十位同学一齐来到蒋老英雄家，他和他的全家都十分高兴。他给我们讲了他闯荡一生最后投身革命的经过，给我们看了他在延安时穿过的打着补丁的灰军装、群众慰劳的布鞋、当地织的白羊肚手巾，他参加革命后多次获得的奖章、勋章。

蒋老英雄说，他幼年抱着扫除社会不平，杀富济贫的雄心，参加过旧军队，军阀混战使他大失所望。随战友柴先生来石楼安家落户之后，他推行过合作社，搞过棉花试验田。他还去房山二站的天主教堂当过神甫，这使他懂得了上帝救不了贫苦老百姓。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来了，各地以抗日的名义，一哄而起拉起许多武装，他看三路“老便”胡嘎巴胡司令的队伍，还有点真抗日的样子，又去了胡司令的队伍，细看他们也不行。于是就重操旧业，在周口店开了个“维平大药房”，以便悬壶济世。

1938年5月，八路军到了房山一带，老英雄才找到了真正的抗日队伍，他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傅伯英），随着邓华的队伍上了延安。当时药品奇缺，他就爬山越岭给八路军采药治病。他参军那一年，已经六十岁了，在耳顺之年，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因为他高寿参军，因此部队特别批准他留下那大胡子。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时，王震将军让他主持开发九龙泉农场。他带领战士种粮食、种棉花、种草药、也种罂粟。粮棉供军用，草药给延安军民治病，罂粟除去药用外，都卖给了胡宗南的“双枪”（大枪、烟枪）部队了，换来了药品、棉布直到缝纫机，为反扫荡、反围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主席曾多次视察九龙泉农场，还对蒋老英雄讲：“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哟，不然要批评死你啰！”他朗朗大笑回答：“感谢主席关怀！不过要是死了，你批评我什么也听不见啦！”延安“四老”之一的谢觉哉，与蒋维平交往甚多，曾有诗为赠：

兵农礼乐般般会，手脚心神件件优。

九州踏遍归玄圃，花果山中一老猴。

借着谢老的题诗，他把自织的白土布染成红色，化妆成孙悟空，大唱猴子戏，把农场的生产劳动与文化生活搞得红红火火。

由于他功绩卓著，被评选为延安地区劳动英雄，并多次立功受奖。他最珍爱的是最早的一枚小长方形，上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像的那枚劳动英雄奖章。众多奖章中，还有1950年全国群英大会的奖章。

最后，他为勉励我们，送给每位同学一张他亲笔签字的他的照片，他给我的那张照片背面题词是：

赠给革命的后备军，敬爱的侯国智小朋友留念：祝你战胜困难，永远前进，为祖国建设努力，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七十七岁老战友蒋维平

1954年7月30日

看来，这是老英雄前两天就准备好了的。

这些照片，我一直珍藏到现在已经四十四年了。在我经过的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在我遇到艰苦困难的过程中，我都要看看这位老英雄的照片，念念他给我的亲笔题词，内心里就受到极大的鼓舞与鞭策，全身就增长了战胜困难的无穷勇气和力量。

在这次联欢活动中，我们全体同学也送给蒋老英雄一件礼物，即由我作词、刘学谦老师写在一张蓝色虎皮萱纸上的字，内容是：

六十参加八路军，白发苍苍童子心。

行军渴饮延河水，采药踏遍太行林。

九龙泉畔开荒地，南泥湾里炼真金。

殊勋累累献共产，念念不忘接班人。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 废除科举后房山的三位普教人物

刘佩伍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后，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房山普教战线涌现不少为培育后代尽心竭力，终生以教的知名人士。为缅怀前辈、启迪后人，现将他们的经历、业绩作一简单介绍。

赵宗瀛(1870年1月—1939年1月)，字淑瀛，汉族，房山县南街人，清末贡生。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布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后，他便在房山县云峰书院的基础上，率先创办了房山县立小学堂。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改为房山县两等小学校，旋即分为男校和女校，赵宗瀛任男、女两校校长。同年，他由清政府委派赴日本考察自治学务。回国后，于1906年任房山县第一任劝学所所长(相当现在县教育局局长)。任职期间，他多方筹措办学资金，研讨学校课程设置与学校管理，并劝导全县各乡村废除私塾，兴办学校和开展平民教育活动，为房山新学的兴办，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宗瀛为人勤慎，办事公允，在房山享有较高的声誉。1909年(清宣统元年)出任京兆师范学校校长。1916年后，他离开学界，到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秘书厅任职，曾获一等内务奖章和五等嘉禾章。

赵宗瀛工诗善写，尤以篆书著称，常为邑人称颂。

邱陵(1893年10月—1937年8月)，号雪樵，汉族，房山县饶乐府村人，京兆第四中学毕业。回乡后，出任房山县立小学校长。1922年应聘到房山县私立长育小学任教并主持校务。当时长育小学始建两年，诸业待举。邱陵到任后，承担教务重任，致力于确立教育教学制度，团结学校同仁，历经艰难，终于把长育小学办成校园繁花树茂，清幽雅丽，教育教学秩序井然，教育质量列房山县前茅的第一流学校。

邱陵博学多才，精于韵律，谙于教务。他组织“学生自治会”，以加强学生的自我管理；自编国文教材，熔文言、白话精华为一炉；组建“古文研究会”、“算术研究会”、“体育锻炼队”、“乐器演奏队”，以丰富学生的课余活动；创办校刊《长育日报》、《新月》，作为学生习作园地，培养学生的创作才能。1933年，房山县教育局举办全县高小学生观摩会，长育小学文场(语文、算术会考)、武场(体育表演)均获全县榜首，使省里来县考察的督学感叹不已。从此，长育小学声名大振，遐迩闻名，前来就学者远至北京、天津。

邱陵以教育为己任，具有安贫乐教思想品格。在长育小学经费处于困难时，他安于“菜根、书味”的清贫，并常说：“育英才，其乐无穷”。他还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对国民党反动派背离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恶痛绝；“九·一八”事变后，他忧国忧民，在课堂上，用手击头，慷慨陈辞，“头可断，血可流，宁死不做亡国奴”。“七七”事变后，战火燃遍房山，他携眷南迁，至高碑店被日军捕获，捐躯于敌人的刺刀之下，妻子闻讯后携女儿投河自尽。

邱陵的从教业绩和民族气节，深受房山各界人士敬仰。

邱陵遗诗二首：

归来赋罢止山坡，卓尔心交少会期；  
刚日读诗柔日史，醒中作字梦中诗；

不分畛域随人意，且把勤专永自持；  
若值都中相识者，请将近况代陈词。

### 二

几番辛苦几经营，校务频仍自事轻；  
惊禁寒蛰颓壁寄，伤怀旅雁碧天横；  
山川陡变添诗意，松竹常青见物情；  
领略西郊闲景色，沙河曲曲绕房城。

赵权(1880年—1961年)字仲恒，汉族，良乡吴店村人，曾任良乡县立高等小学和良乡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校长多年。

任职期间，坚持服务乡里，为社会培育人才的准则，治学严谨，以校为家。在领导教育教学中，主张以理服人，摒弃体罚；开展学科竞赛，奖优促劣；建制度，抓质量，学校同仁精诚团结。将良乡小学办成人才辈出，教育教学秩序井然有序的模范学校。

赵权为改良私塾，兴办新学培养新型师资，在当时政府的支持下，于1930年至1937年，先后创办良乡县立乡村师范学校(1930年—1933年)和良乡县立简易师范学校(1933年—1937年)。赵权任校长，主持校务。师范学校前后两届，招收高小毕业就读。为良乡地区培养新学师资近百人。

赵权终生从教，为人谦诚勤慎，治学有方，在良乡地区颇有声望。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 仁理和尚记事

赵润东

仁理，俗名王栋，1924年3月11日出生于岳各庄乡五侯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人除了耕种，在农闲时还要做些棚匠活，所以人们称其为王家棚铺。王栋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王润田在其三岁时去世，全家靠母亲和年迈的祖父母支撑。

王栋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少年时代在本村读了6年小学，基础扎实，颇能识文断字。“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疯狂占领中国大部领土，房山境域很快也遭沦陷。当时，国民党中央军且战且退，自房山附近撤至五侯村时已溃不成军，他们在五侯与南章村交界的土沟(人称南章沟)弃下面粉、枪支和车辆，轻装向南溃逃，老百姓称为中央军退却。混乱之中，百姓们携妻带子背井离乡，四处逃难。13岁的王栋随家人向西部山区逃奔，行至上方山下的中院村，在其表弟张全家住下，时达半年。

1938年，为了糊口，王栋到北京鸿庆纺织厂学徒。三年之后转到昌平区清河大成煤站当会计，后又转到顺义煤站。这期间，先后有四年多时间。

1946年，已长成人的王栋独自来到北京，在虎坊路西柳树影开了一间刻字店铺，字号为善谦刻字铺。

他心灵手巧,不用事先在章料上书写,直接用刻刀操作,而且真草隶篆样样精通。这年,王栋娶妻成家,本来可以享受小家庭的温暖,但不幸的是,半年后媳妇因病逝去,这不能不给他以精神上的打击。不久,国民党军队又到各乡村征兵扩军。本村保长挨家统计,王栋自然被列入名单。其兄王桐来到北京说明这一情况,让他想想主意。后商定谎称其在北京已当兵。于是就到照像馆,穿上国民党军服照了假照片。其兄带着王栋照片回到村里向保长出示并作说明。但保长不允,说有照片不行,还要有护照,否则说不清。其兄感到不易混过,赶紧又返回北京,让王栋想办法。王栋无奈,为了逃避当兵,只得收了买买关店铺,与朋友陈精忠一起到西郊机场坐飞机到了四川重庆。

陈精忠是个买卖人,在成都开有“记时钟表店”。王栋随陈转到成都后在店里搞钟表修理,几天过去倒也觉得安然。在这半年时间里,适应和熟悉了周围的环境,于是常去附近的近慈寺听法师讲经,因而有幸与能海法师相识。能海法师时为近慈寺主持。寺内有一照客师姓周名影师,系北京昌平人。谈起话来说是家乡人,倍感亲切。各叙家常志向,由周引见,王栋当了居士,法名定伦。随后的两年内,他经常出没寺院,聆听各位法师讲经说礼。1948年,拜能海为师正式受戒出家,法号仁理。

近慈寺位于绵竹县云雾山中,有庙产80余亩,是能海率弟子惨淡经营复其旧观的一处道场。能海俗姓龚,名学光,字缉照(1886年—1966年)。生于四川绵竹县汉旺场。其父母早亡,依靠长其10岁的姐姐抚养成人并就近塾书,14岁时入成都恒升通匹头业学徒。“庚子乱后,清政腐败,外侮日亟”。能海弃商从戎,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考入陆军学校速成班,190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派赴康定张蓬山镇守使部任侦察大队长,将一年,升为连长,不久被调赴云南总督胡文南开办的讲武堂任教官。此时,朱德也在校,雅相器重(解放后能海在全国人大开会,朱总司令常关心过问)。讲武堂结束,返川军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旋即辞职返渝。1915年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实业,半年后回北京。此行,对日本佛教颇有感触,于是萌生学佛之念。

起初,他于涪陵天宝寺从师于住持佛源法师。1924年,在其39岁时出家,法名能海,字阔初。以后,研习汉译三藏教典,(即以沟通汉藏学为己任)禅教诸宗。“七七”事迹后,他率弟子20余人返川,成都文殊院法光和尚请其住南郊近慈寺,寺为文殊院下院,年久失修。能海率弟子数十人住寺,苦心经营,不但恢复其旧观,而且先后建成威德殿、大师殿、藏经楼、沙弥堂、译经院、金刚院、方丈寮等,蔚为一大伽蓝。以后,藏僧来成都必朝近慈寺,对道场风规均甚赞叹。

能海法师为保护名山大寺文物终生奔走,不遗余力。先后在成都近慈寺、重庆真武山、绵竹云雾寺、峨嵋慈圣庵、山西五台山清凉桥及上海金刚道场,共开建道场6处,译述及讲稿共70余种。1950年,解放军代表来近慈寺询问进藏事宜,能海都详细告之,并选弟子隆果、弥悟为翻译,协助与西藏地方交涉洽谈,旋即亲往北京,会同喜饶嘉措等共商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迭电西藏地方当局,申明党中央眷顾西藏、宽宥为怀的诚意,努力协助党和政府完成和平统一的伟大使命。这期间,仁理跟随师父苦修钻研,深得师父的教诲,不但懂得了较深的佛礼,掌握了一定的藏语知识,还学到了师父明察时势,积极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四处奔走的进步思想。同年,能海法师离川进京,与仁理分手,仁理仍留四川。不久,他下山住进云雾山寺附近的茅棚坐禅修行。

1951年10月,能海法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10月又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会议。之后,来到五台山,率弟子上五台山开荒造林,自食其力。自此,能海法师定居中台下2.5公里处清凉桥内。1953年,仁理离开四川回到北京,在琉璃河镇开“新时钟表店”修理钟表,时间约有1年。后来,仁理到五台山找能海法师,师父劝他回来。仁理同意,并于1955年来到五台山。半年后,北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仁理陪同师父赴北京参加大会。会议期间,仁理根据党和政府关于宗教方面政策,建议能海在北京建一处佛家道场。能海同意,地点定在上方山。会后,能海和仁理与公安部门联系,经批准,仁理上山看寺。同时,师父又派来二人,东北来二人,仁理在上方山上与其它四位僧人耕作之余,在集市时

到长沟、琉璃河两镇上收揽些破旧钟表修理，换回零用钱作为五人生活费用。1956年，根据组织安排，仁理调到云居寺参加培训，主要学习拓经技术。1957年正式开始锤拓历代石经。

仁理精通钟表修理和篆刻，经过系统学习，很快又掌握了拓经技术。他居住在石经山藏经洞旁边的山崖下面，认真锤拓经文。1958年4月28日，突然来了公安人员将他逮捕，原因是涉嫌反革命罪。当时，房山的社会秩序基本安定，但剿匪清特工作始终未停。社会上流传仁理是美蒋特务，因为心灵手巧，能用洗脸盆制造电报，盛满水即可发报。说他在上方山时经常与台湾联系。本次逮捕，主要是有人揭发他在社会上散布反革命言论，被定为历史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后来得知，检举人就是其姐夫。当时，其姐夫蒋有林在公私合营单位工作，准备单干在长沟镇开蒋字铺饭店。于是筹备资金向仁理借款200元，同时，劝仁理还俗为他记帐。仁理讲自己身为出家人，没有资金。另外，现在都要公有，你自己搞不好，目前的政策是变化多端。其姐夫对此十分不满，一是怨他不借钱，二是阻止他继续工作。于是到公安部门检举仁理诬蔑党的政策是“诡计多端”，由此便导致了仁理一场牢狱之苦。

仁理被判刑后，为了清除宗教迷信思想，先在狱中写了半年交待材料。1962年以后开始与曾经留美、英、法国专家一起在科仪厂搞科研项目。如我国飞机、军舰等所需高精度150型直流发电机，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供应紧张。国家为解决这一问题，将研制任务交给科仪厂。仁理当时担任压装下线工序。经反复试验，解决了换项器工艺加工改革，与专家们一起成功地制造出我国的产品，从而取代了进口发电机。接着，仁理又研制塑料制品工艺技改。当时，塑料凉鞋刚问世不久，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对扉边问题也无法解决。仁理对此提出技改建议，很快得到领导同意。他研制出的塑料凉鞋无边模具一年可节省400余人人工，节约修边费达18万余元。之后，他又研制铝制品加工工艺。如椭圆形铝制品卷边工艺，当时国内是个老大难，仁理仅用两个月时间，采用滚轮轨道技术试制成功，其工艺与日本产品完全相同。从此，全国各铝制品厂都来参观。据不完全统计，仁理在狱中搞技改项目一百多项，为科仪厂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由于改造表现比较突出，仁理提前一年释放。当时的军管代表坚持要他留下，许诺给他长二三级工资，仁理因此又留厂二个月，于1972年出狱，到东北继续研制塑料制品。后来，仁理研制的管道防腐材料、万能注头等被国家批准为发明专利产品，为国家有关项目填补了空白。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 张晋龄的堡垒户

唐占忠

1939年冬，张晋龄奉上级党委派遣到涿、良、宛联合县任五区区委书记兼武卫会政委来到窑上（今窑上乡）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当务之急是找到秘密立足点，即堡垒户，以开展地下活动，组织民众同敌人进行斗争。那时窑上地区几乎村村都有他的堡垒户，最密切最可靠的有两个，一个是张珍，一个是尹宝山。

张珍，韩营村（今窑上乡韩营）人，1918年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在村东永定河堤下盖了两间碱铺，以打碱为生。1943年冬的一天傍晚，他正在铺前熬碱，突然听到枪响，见一个年轻人从堤上向他跑来，气喘嘘嘘地说：“我是八路军，鬼子追我呢！”张珍早就听说八路军是打鬼子的，见此情景，他毅然想了个金蝉脱壳

之计。他俩人对换了穿戴,张珍迅速钻进了旁边苇塘。这时,一群鬼子和汉奸从堤里过来,到了张晋龄跟前问:“刚才跑过来那个人呢?”张晋龄用手往苇塘里一指,这时太阳西下,鬼子面对茫茫的苇塘踌躇了,于是朝苇塘里乱放一阵枪扫兴而归。过了一会儿,张珍走出苇塘,俩人亲热地拉了手互相介绍后,张珍说:“你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要是看得起我,就在我这里住下吧。”张晋龄高兴地说:“你是我救命恩人,以后你就是我的堡垒户啦!”

从此,俩人白天一起熬碱,晚上到韩营村和附近村里串联贫苦农民,建立贫农团和民兵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不久,张珍经张晋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韩营村建立起第一个党支部。由于根据地逐渐扩大,引起敌人疯狂反扑,日寇和汉奸经常到韩营一带骚扰,张贴告示扬言清灭共产党,捉拿张聋子(张晋龄绰号)。根据斗争形势,张晋龄决定张珍当伪保长,明着替敌人干事,暗里为党工作。

后来,张珍在穷哥们帮助下搬回村,在东头盖了三间土坯房,为保张晋龄安全,和妻子在屋里炉坑处秘密挖了一个通往村外的地道。一天夜里,他和张晋龄去万里、窑上、贾河等村散发减租减息传单,天快亮才回来,上炕便睡着了。早晨,张妻商秀英喂猪,突然听到村里人说敌人来了,她放下猪食瓢急忙进屋把他俩叫醒,让张晋龄躲进地道。这时,听见汉奸赵文华(窑上村人)带着几个随从走进院里喊道:“张保长在家吗?”张珍赶忙迎出门外笑着说:“您今天怎来得这么早哇!”赵文华趾高气昂地说:“夜里北边几个村发现张聋子的传单,有人说他来这村啦,你跟我挨户去搜。”张珍为了张晋龄和乡亲们安全,机敏地说:“您起大早来还没吃饭吧?”赵文华“哼”了一声,于是他高声叫屋里妻子准备酒菜。

当商秀英把酒菜端上桌,赵文华问:“这狗肉什么时候弄的?”张珍装作诉苦的样子说:“前天张聋子和平南支队在这村住了一天,让老百姓把狗打死,逼着我这保长头一个打,这就是我家那条黄狗肉哇。张聋子神出鬼没,今天您来算扑空喽,得了,咱们踏实喝酒吧!”赵文华吃饱后晕头转向地回肖场村据点了。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调兵遣将抢占胜利果实。为了与敌人周旋,张珍携妻同张晋龄的区小队撤到固安城内休整。1946年冬,国民党兵分三路,由良乡、大兴、涿州向固安城发起进攻。战斗非常激烈,敌我相持三天,据冀中军分区指示,部队暂时从地道撤出固安到太清河以南待命。在撤退战斗中张珍和妻子都光荣牺牲,为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尹宝山,窑上村(今窑上乡)人,1917年出生穷苦农民家庭。三岁时父亲给涿县义和庄曹喜地主家扛活因车祸身亡,十五岁时母亲积劳成疾不幸离开人世,他为了活命到涿县北蔡村地主张连登家当了长工。1944年春的一天下午,他在永定河打青草巧遇张晋龄。尹宝山一听张晋龄是八路军到这里跟穷人一道打鬼子闹翻身的,喜出望外地问:“我跟你干行吗?”张晋龄拍着他的肩膀说:“行啊!”三天后,尹宝山辞退了长工,回到窑上村当了抗联股长。张晋龄经常住在他家,尹家成了贴心的堡垒户。每天晚上尹宝山跟张晋龄出去活动,妻子谢氏总早早把饭菜做好等候他们归来。由于尹宝山对革命工作忠贞不二,不久,经张晋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农历十月的一天夜里,张晋龄回到尹宝山家里说:“上级要求尽快将咱地区群众做的900双军鞋和500斤食盐送往任邱根据地。”尹宝山听后俩人反复商量最后确定一个方案。第二天天刚黑,张晋龄化装成车把式同尹宝山赶着两辆马车到了永定河金门闸北桥头。不久,各村抗联股长陆续到齐,把物资放在车上。然后,再把白天割倒捆好的芦苇装上车,用大绳捆牢。三更天,两辆拉苇子大车沿永定河大堤向南走去。第二天一早,到固安城北大桥时,不出所料,被敌人拦住,两个鬼子和一个汉奸从岗楼出来端着枪喊道:“站住!”车停下,那个汉奸问张晋龄:“拉苇子干什么?”尹宝山怕敌人听出张晋龄口音马上搭茬说:“他是哑巴,我们盖房用。”这时,两个鬼子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刺刀朝苇子车里捅,尹宝山赶紧从腰里掏出几盒哈德门香烟递给敌人。鬼子见烟高兴地收住枪说:“开路开路的!”两辆马车闯过盘查第一关,往南继续又闯过大清河口、骆驼湾、柳泉等几道关口,顺利把物资安全送到目的地。1944年12月,驻扎良乡的日寇纠集地主还乡团经常到窑上一带侵犯,并强迫各村出一人到良乡受训,目的为日寇培训谍报员。根据冀中军分区党

委指示，对敌开展以牙还牙斗争。张晋龄将计就计派尹宝山去良乡受训。日寇谍报员在良乡城里行动自由，尹宝山借机到处走动，把敌人情况摸个一清二楚，在南门里罗府街与一个姓石的店员建立了秘密关系，为张晋龄后来二闯良乡城抓捕逃亡地主张连登、刘汉奎提供了可靠情报，对打击敌人嚣张气焰起了积极作用。

1948年腊月三十，张晋龄和县长李景森在窑上开展工作，由于叛徒告密不幸遇难，尹宝山为躲避白信的出卖和追杀，只好携妻至涿县辛村岳父家隐藏起来。解放了他才回村继续为党工作。1950年清明节，尹宝山在村西头自己分得的一块地里给张晋龄堆起一个坟头以示纪念。1972年窑上乡政府为张晋龄建起烈士陵园立了墓碑后，他每年清明节都要回故乡给张晋龄扫墓，缅怀英烈。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 董存瑞式的英雄张林

张玉泉

来历水村在解放战争中曾出过一名董存瑞式的英雄，他叫张林。1926年，张林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全家20多口人靠种几亩山坡地为生，遇到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一家老小只得吃树叶、野菜糊口或外出逃荒要饭，终日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张林兄弟六人，他排老二，为了养家糊口，十多岁时曾外出打工，终因挨打挨骂又受气，还吃不饱，又逃回家里。长大后他在村内接触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当时的四区区委书记杨春茂同志向他宣传革命思想，启发他闹翻身，求解放的志向。他参加民兵游击队后，1946年深冬的一个晚上，老杨去黄山店动员扩军时因叛徒告密被敌人杀害。张林看到这血淋淋的事实后，怀着满腔的悲愤到当时县政府所在地南窖参加了县大队，不久因作战英勇升为班长。后来，张林随县大队又编入了野战军，提升排长，在山西、平北一带活动。1947年7月的一天，部队奉命攻打张家口附近一个叫小西庄的敌人据点。我军把盘踞在小西庄的敌人团团围起来。不久，驻张家口的敌军蠢蠢欲动，调集部队增援小西庄。如果让敌人的计划得逞，我军将受到敌人两面夹击，会导致全军覆灭。为阻止张家口驻军的增援，必须火速炸掉通往小西庄主要干线上紧靠小西庄的公路桥。任务就落在张林的爆破小组身上。

张林带上三名战士连夜迂回到大桥附近，谁知，敌人已经预料我军炸桥，切断交通的计划，已派兵把守桥的东端，给爆破带来巨大的困难。我军迅速调来机枪班把着桥的西侧，以强大的火力做掩护。张林先派两名战士爬到桥头上炸，均在途中中弹倒下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张林背上炸药包跳到桥下打算把炸药包放在桥墩上引火。但因桥墩过高无法放上去，在这万般无奈的紧急关头，他只好用手托着炸药包拉着导火索，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烟雾石块腾空而起。顷刻间，大桥炸断了，把气焰嚣张的敌人挡在河岸的东端，为我军攻克小西庄赢得了时间。而我们的英雄——张林同志也同大桥一起同归于尽。

张林烈士的英雄壮举，虽然不像董存瑞那样广为传颂，但同样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年仅23岁的生命。

1946年末,我县政府在佛子庄把张林牺牲的情况通知了张林的家人。他的弟弟张玉代表家长领回了抚恤金(六百斤小米)。解放后政府又赠给他家一匹退役的枣红马。从此张林这个响亮的名字和他那光辉的英雄事迹才被人所了解和颂扬。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 良乡三姐妹革命纪略

宋成明 杨文祥

张锡瑗、张锡瑞、张锡珍是在房山区良乡办事处纸坊村(扎楼子)出生的三姐妹,是北京乃至全国早期的共产党员,也是房山、良乡地区革命先驱。

张家三姐妹的父亲名叫张镜海,原是良乡火车站站长,很早就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和教育。他参加过长辛店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0年迁居保定市居住,是保定铁路段工人代表、工会主席。他先后遭受过反动当局的通缉和迫害。去世前,居住在良乡西街(旧称署前街)。三个女儿的革命活动,都得到了他的支持。

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1978年3月16日口述、秘书王瑞林记录的资料,以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在1978年6月23日所写的资料、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都讲述了张锡瑗的情况。张锡瑗也叫张希远,1905年生,1920年随父搬迁到保定市居住,与其妹张锡瑞同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职业班读书。1924年,姐妹二人作为骨干分子参加共青团。1925年上半年,张锡瑗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共产党领导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活动。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期间,她和邓小平作为同学相识。中山大学学制两年,张锡瑗于1927年秋学业期满,离开莫斯科回国。回国后,张锡瑗参加领导了一次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张家进行的。罢工后,张锡瑗到武汉,在党中央的秘书处工作。在这里,她和邓小平老同学相遇,甚为喜悦。后来,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到了上海,张锡瑗也到达上海,在邓小平下属秘书处工作。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了。当时,邓小平不到二十四岁,张锡瑗不到二十岁。曾经有大半年时间,邓小平、张锡瑗与周恩来、邓颖超同在一个党小组,同住一幢公共租界楼。张锡瑗1930年在上海宝隆医院生孩子,因患产褥热病逝。生下的女孩,放在徐冰和张锡珍家里,没过几天,孩子也死去。张锡瑗的尸骨安葬于上海江湾公墓,1969年迁葬於上海烈士陵园,现已改名为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张锡瑗的二妹张锡瑞,也叫张君怡,1908年生,1924年与其姐张锡瑗一起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职业班读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学潮运动,并在该校加入共青团。后来,与张锡瑗一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秋,姐妹二人经过东北边境回国。到达上海后,按照党组织指示到保定协助铁路工会发动铁路工人革命,配合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其后与周达文结婚,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8年在天津病故。

张锡瑗的三妹张锡珍,也叫张晓梅,1911年9月出生,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秋,被选送到党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党校学习。1928年9月,在上海经邓小平、张锡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张晓梅入党后,被分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翻译科机要交通。1932年秋,党组织调张晓梅到北平,主编《北平新

报》副刊、《妇女周刊》。1939年秋调到重庆，任党的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妇女组副组长，协助组长邓颖超做统战工作。其爱人徐冰，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49年11月，召开第一次北京市妇女代表大会，张晓梅当选为市妇联主任，连任五届市妇联主任。1968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离开了人世。1978年2月17日，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补开了追悼大会。

张家三姐妹很早进行革命斗争，那是在1927年秋天。张锡瑗的弟弟张锡玖（也叫张乃平），当年八岁，至今对此事记忆犹新。据他回忆，张锡瑗、张锡瑞离开莫斯科，经过东北边境，化装成渔民、乞丐、阔小姐等，冒着生命危险回国，后到达上海，按照党组织指示到保定发动铁路工人罢工。姐妹二人到达保定时，正值铁路工会为工人领不到工资和受迫害打抱不平。有个开压道车的工人，因生活所迫，让其妻给保定铁路段总监工龚肇基家当佣人，其妻受尽虐待，还被强奸。这名工人愤怒地找龚肇基进行说理斗争，反而被毒打，并被诬陷为强盗，关押在保定火车站警察局，其妻请求工会代为申冤。以张镜海为首的工会代替其妻在保定法院起诉，由于龚肇基与保定法院勾结，因此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遭到当局的镇压。

张锡瑗、张锡瑞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集工会委员马世忠、刘长河等十多人到张家开会。张镜海、张锡瑗讲述了工人起来革命的道理，号召工人紧密联合起来与反动当局展开斗争。紧接着，又召开了小组长联席会议，六十多名组长到会。会上决定工人立即行动起来，要求反动当局给工人补发工资，释放被关押的工人，给受害者赔礼道歉。工人起来斗争，给反动当局沉重打击。狡滑的龚肇基见势不妙，变换手法，软硬兼施。先是宴请，此招不成，又动用警察和宪兵抓捕了张镜海及部分工会委员。这时张锡瑗的三妹张晓梅及党组织负责人也来到保定，参加并领导工人斗争。他们夜间开会，白天外出四方联络，张锡瑗全家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全国总工会和地下党组织支持下，召开了保定铁路工人大会，提出“打倒龚肇基，补发工人工资”的口号，开展了反饥饿运动，及时组织成立工人武装纠察队。工人们营救了张镜海及被抓捕的工会委员。全市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组织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反动当局被迫让步，立即签字答应补发拖欠的工资，释放在押工人，严惩龚肇基。游行持续到深夜，工人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张锡瑗三姐妹组织和发动工人起来斗争，直至取得胜利的事迹，当时在该地区传为佳话。

斗争结束后，张锡瑗姐妹三人于1927年春奉命离开保定，赴武汉，又到上海参加了新的斗争。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 四进葫芦袋的张晋龄

唐占忠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向华北进攻。施行野蛮的烧、杀、抢“三光”政策和挖封锁沟、建碉堡、设封锁卡的“囚笼政策”。为扼守北平，在平南一带建立许多据点，葫芦袋（今葫芦袋乡）是其中一个。葫芦袋位于永定河、小清河两河所夹狭长地带，居南、北十八村之中，地势险要，如同剪轴控制涿、良、宛三县若干村镇。1944年，张晋龄遵照冀中军分区“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决定拔掉根据地边缘的葫芦袋据点。

农历三月的一天上午，他化装成卖货郎从韩营村起程，挑着货担沿永定河大堤北上。到葫芦袋正东，他

居高临下向村庄眺望：村外被铁丝网、深沟、土壕包围着：四门都有碉堡、吊桥和岗哨，戒备森严。他走下堤到了东门，两日军和一个汉奸放下吊桥，用枪刺一横拦住了。张晋龄镇定地放下担子，顺手从里边拿出两条哈德门香烟，苦笑着递过去说：“我，做小买卖的，这点小意思请皇军收下！”日军接过烟哈哈一笑说：“进去的，开路开路的！”张晋龄挑起担子进了村。进村不远拐进路北第二条胡同，就到了东北角堡垒户刘老四家，在门口，看看前后无人便闪进院里。张说明来意，刘老四欣喜若狂，一边叫老婆做饭，一边忙将货担里手榴弹、地雷取出藏进草棚子。回到屋里，两人亲热地交换情况。饭后，张晋龄离开刘老四家，摇着货郎鼓，走遍大街小巷，尤其对徐家大院（日寇小队部）做了仔细观察。傍晚，又回到东门，守门日军见是那个卖货郎没有阻拦，放了吊桥让他出了村。

端午节下午，张晋龄和武工队长房文权带着四名队员，化装成农民，背着破被卷，拿着锄头和镰刀走近葫芦堡南门。守门敌人问：“干什么的？”答：“麦收到了，进村打短工。”敌人看他们是卖苦力模样，没搜查便放了吊桥。进村后，他们穿胡同陆续走进刘老四家。晚饭后，张晋龄布置行动计划：房文权和刘老四各带一名队员分头对付村东、南两门守敌；他和两名队员对付徐家大院守敌，以两点枪声为号。行动开始了，对付两门的分别由一人悄悄爬到碉堡前埋好地雷，一人在隐蔽处用枪瞄着岗哨。张晋龄三人在徐家大院后门、西侧门迅速埋好地雷又绕到前门对过的房顶上监视敌人。这时，县大队、区小队早就在东、南门外埋伏好，等候攻击时刻。

午夜两点，房文权抠动了枪机，“叭、叭”两枪，岗哨应声毙命。队员拉响了地雷，碉堡砖瓦四溅，尸体横飞，他俩很快放下吊桥。县大队听到枪声吹起冲锋号，飞快涌进东门直朝徐家大院扑去。南门刘老四听到枪声同样打死岗哨，炸毁碉堡，放下吊桥，策应区小队火速向徐家大院杀来。张晋龄三人从房顶上将手榴弹甩到大门前，四个守门日军当场炸死。这时，我大部队集结门前架起机关枪，猛烈向院里扫射。敌人乱的像热锅蚂蚁，两次反扑都被击溃，招架不住后向西侧门、后门退缩。先跑出的被地雷炸死，后窜出的边还击边逃向村北门。当我军追到北门时，残余日军丢盔卸甲如丧家之犬拼命向长辛店逃去。几乎同时，西门守敌在听到村里号声、枪炮声如暴风骤雨，知道大事不好，为保活命一枪未放，钻出碉堡，越过吊桥，向良乡逃去。战斗就此结束。我军缴获敌人迫击炮两门，步枪、“三八”枪37支，机关枪3挺，子弹600多发，军装90余套。葫芦堡据点拔掉了，解放区扩大了，民众抗日积极性高涨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狼子野心的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抢占平、津要地，疯狂向解放区进攻。当时在良乡、长辛店、丰台等地的一些地主、汉奸、特务，组成还乡团大肆向窑上一带实施报复，各村民主政权、人民武装相继遭到破坏，张晋龄和武工队暂时撤到固安县以东活动，葫芦堡又成了敌伪据点。陶营村地主王斌的儿子王汉成，躲在葫芦堡勾结还乡团，经常侵犯南十八村，制造了不少血案，民愤极大。为除掉这个坏蛋，农历腊月二十二日深夜，张晋龄绕过固安封锁线，顺永定河大堤北行，潜入佛满村，来到堡垒户李志祥家。两个人研究了个牵羊喂狼法三进葫芦堡。第二天上午，他拉着两只山羊来到葫芦堡南门，守门伪军拦住问：“干什么来啦？”回答：“过年没钱，进村卖羊去。”一个伪军端着枪吹胡子瞪眼地说：“妈的，老子正想吃羊肉呢，留下！”张晋龄假意苦求，伪军才勉强说：“留下一只吧！”张晋龄急忙拉着羊拐弯抹角来到刘老四家。据刘老四说：“今天是二十三，王汉成在西头李寡妇（姘头）家过节呢。”乘中午吃饭时街上无人，张晋龄绕北街串胡同到了李寡妇家门口。往院里一看，只有一辆自行车在东屋门前放着，他轻快地走近窗下一听，王汉成正跟李寡妇饮酒作乐。张晋龄掏出手枪闯进屋高声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喊声如五雷轰顶，吓得王汉成束手被擒。张晋龄从怀里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开导火索，撩起王汉成衣襟别在腰带上威逼说：“跟我走，用外边自行车驮着我出西门，如不听说我就拉弦……”。王汉成像木偶人一样带着张晋龄到了西门。守门伪军一见是王汉成，恭顺地说：“您出门呀？请走好！”。车驶出西门到小清河边停下了。张晋龄拔出王汉成腰里的手榴弹，封好导火索，揣进自己怀里，义愤填膺地说：“你为非作歹，

坏事干尽，我代表党和根据地劳苦大众判你死刑！”随手扳动枪机，“当，当”两声，王汉成像死狗一样倒在河边。张晋龄怀着胜利的喜悦，沿着堤岸，穿过茂密的树林，大踏步向南走去。

1947年麦收时节，良乡国民党部派特务赵文华，（窑上村人）到葫芦垡据点指挥还乡团去各村抢粮。一天下午，张晋龄在韩营村听到夏场村交通员送来的情报，说他们村上午被葫芦垡敌人抢走五车小麦。张决定立即组织武装力量开展保粮斗争。第二天上午，他让武工队换上伪军服装同县大队一起隐进永定河堤里岸，刚到任场村正东，前边侦察员曹贵回来报告说赵文华带抢粮队去西场村了。张晋龄和县长李景来临时议定分头行动。县大队越过永定河大堤，穿过任营村苇塘火速向西场村进军。不一会儿，进军号吹得震天响，敌人进西场村还没来得及翻抢，听到号声知道共军大部队打来了，吓得魂飞胆破，屁滚尿流向西边小清河逃跑了。我军一枪未放便赶跑了敌人，险被遭抢的西场得救了。张晋龄带领武工队急行军取道直奔葫芦垡西门。守门伪军见是良乡来的队伍不敢阻拦，张晋龄高声地问：“昨天的麦车没往良乡送，现在什么地方呢？”伪军回答：“徐家大院西边大场哪！”张晋龄轻蔑地一挥手，队伍进村了。到场边一看麦车原封未动，只有四个看守伪军在树凉下玩牌。他满怀义愤地走到跟前，伸手左右开弓给一个伪军两个嘴巴，骂道：“他妈的，你们干什么吃的，麦车为什么不送？”四个伪军连连求告：“长官息怒，赵头（指赵文华）说今天再凑几车一块送去！”张晋龄接着斥责：“等着装火车呢，误事要你们脑袋，这几车我们先押走！”伪军齐声道：“是！”车走出西门，张晋龄一改常态，和颜悦色地对车把式说：“老乡，你们受惊了，我们不是伪军，是武工队救你们来了……”几位车把式如梦方醒，悲喜交加不知说啥好。在武工队保护下，急忙甩开鞭子催赶牲口，绕道返回了夏场村。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 李明同志葬礼侧记

宋 湘

十四年领导房山高举三面红旗千秋典范  
廿六载坚持革命献出一生心血百代光辉

这是1962年10月24日房山县委第一书记李明同志追悼大会灵堂两侧悬挂的邓拓同志撰写的一幅挽联。内容显然带有时代特征，但“坚持革命献出一生心血”，确也概括了李明同志革命的一生。

李明同志，宛平县（今门头沟区）沿河城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宛平县委副书记、县委敌工部副部长，怀来县、良乡县县委组织部长；1949年8月任房山县委常委、县委常委、组织部长，1950年2月任房山县供销社主任，供销社、银行联合党组书记，1951年12月任房山县副县长，1952年12月任房山县长，1953年7月任房山县委书记；1954年9月调任通县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1958年4月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时调回房山，任房山县（1958年4月至1960年1月称周口店区）县委第一书记，同时任北京市委房山工委（辖房山、大兴、门头沟三个区县）第二书记，直到1962年6月因病离职休养；1962年10月20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终年仅46岁。

李明同志英年早逝，在房山引起极大震动。市委、县委立即组织治丧事宜。先是从房山北关买一口黑漆

棺木，决定将遗体运到八宝山，举行向遗体告别仪式后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后，县委从县直机关抽调一批干部为治丧工作人员。我当时在县法院工作，也在抽调的工作人员之列。10月21日县委办公室招集工作人员开会，办公室主任张进儒向大家布置了工作，作好赴京准备。10月22日全体工作人员乘一辆大轿车到八宝山。那是一个座北朝南的四合院，北房是告别厅，棺木停放在告别厅内。工作人员在东西两侧房内书写挽联，然后布置灵堂，摆放花圈。一切工作连夜准备停当。

10月23日上午举行告别仪式。我在大门口西侧摆上长条桌子，负责接待签到。上午9时许，忽然有十几辆卧车向大门口开来。车上下来一些人陆续来到签到处。我把毛笔递给为首的一位身材高大、器宇轩昂，穿深灰色风衣，戴深灰色前进帽的人。当他挥笔写下遒劲潇洒的“彭真”二字时，我才注意仰视，来人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长。彭真同志神情庄严凝重，显然是为李明同志的英年早逝而心情悲痛。彭真同志签完字，放下笔，握了一下我的手说：“谢谢你，小同志！”然后大步向院里走去。接着，陆续签到的市委、市政府领导有赵凡(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王宪(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张彭(副市长)、常浦(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玉中(市农办主任)、万里(副市长)、程宏毅(副市长)、郑天翔(市委副书记)、项子明(市委秘书长)、余涤清(市委组织部部长)、张大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人。此后，市直机关、各区县的领导同志以及李明同志的生前友好，房山县直机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也都签了名。彭真等领导同志进入灵堂，向李明同志行告别礼，向李明同志的遗属致以亲切慰问后陆续乘车离去。上午11时许，告别仪式结束。随后，安葬了李明同志的灵柩。下午，我们返回房山。

10月24日上午，县委、县政府在房山礼堂召开“追悼李明同志大会”。礼堂的主席台布置成灵堂，正中悬挂着李明同志的遗像，台上放满了花圈，还有许多花圈放到了台下和院里。台口两侧悬挂着邓拓同志撰写的巨幅挽联。礼堂两侧墙上，窗子上挂满了各单位写的挽联、挽幛。我在礼堂门前仍负责接待签到。参加追悼大会的有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县直各机关、各公社干部，全县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群众代表、少先队员代表。在签到簿上签名的共有642人，实际到会的大约有一千多人，1000个座位的礼堂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站在院里。追悼大会由县委书记霍梁同志主持，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房山工委第一书记常浦同志致悼词。常浦同志在悼词中简要回顾了李明同志的生平，介绍了李明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深入敌后，出生入死，立场坚定，英勇顽强，在领导房山县的各项工作中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的事迹，号召全县人民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成绩。

今年是李明同志诞辰83周年，逝世37周年，谨以此文表示对李明同志的深切怀念。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 陪同钱三强教授参加劳动

罗玉源

钱三强教授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原子能事业的杰出的创始人之一。他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法留学，曾在居里夫妇的亲自指导下研究原子能，在法获博士学位。他生前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钱老从1992年逝世至今已整整七年了，为了

表达对这位老科学家、优秀共产党员的崇敬爱戴和无限怀念的心情，现将我陪同钱老到窦店公社田家园村参加夏收劳动的经过叙述如下：

1967年6月，我在房山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有一天，接县委办公室通知，说国防科工委老科学家钱三强要来我县参加麦收劳动。经研究，由王新华副县长和我陪同一起参加。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社会上有点乱，为了做到既能参加劳动又能保证安全，我和王新华商量后，确定钱老参加劳动的地点在窦店公社田家园村。当时，田家园村是房山有名的蔬菜基地，小麦长势也较好，可望蔬菜小麦双丰收。村里干部群众比较团结，秩序比较稳定，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都比较好。作出决定后，我们通知了窦店公社，并要求党委书记王志也一起参加。

为了安排钱老劳动，我和王新华同志早八点就到了窦店公社，钱老也已到达。然后，我们一起到田家园麦地，没有休息就开始收麦子。钱老一边劳动，一边与我们交谈，问我们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还向我们讲述科学种田的好处。当时钱老已经五十多岁了，我们怕累坏他的身体就劝他休息一下，但他坚决不肯。就这样，从早上直干到中午11点多钟才吃中午饭。我们提议回公社吃饭，可钱老说我们带着午餐呢，所以我和陪同的其他同志一起，就在田间大树下一起吃午餐。饭后稍休息一会儿，我们又陪同去看菜地。钱老看着蔬菜的长势，高兴地提了许多改良蔬菜品种的建议，直到下午四点才返回城里。

钱老年过半百，又是中外知名的科学家，可称为功勋卓著，但毫不居功自傲，在百忙中还不辞辛苦深入实际、深入田间参加体力劳动，给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给我们县、公社、大队的干部群众影响更大，印象更深。钱老平易近人，关心农民、尤其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使我们陪同的同志都很受教育。他劳动时只穿一身半旧兰色的中山装，中午吃自己带的干粮跟老百姓一样，一点也看不出大学问家、大科学家的模样。钱老艰苦朴素和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陪同钱老参加劳动的时间虽然仅仅半天多的时间，交谈中话也不多，可总觉得学到不少科学道理。钱老无论讲政治还是讲科学道理，都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至今每当想起与他一起参加劳动的情景，仍然激起我对他的深深的敬意。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 徐庆文同志二三事

毛锡恩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原房山县南韩继村党支部书记徐庆文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十六年了。当年，由于工作关系，我与他接触较多，有几件事我耳闻目睹，其反映的精神，至今难以忘怀。

1959年的深秋，我和县委办公室的马连仲同志去南韩继村搞调查研究。一天早上，老徐匆匆忙忙找到我们说：“我想解决一下我妈的问题（因其母与徐有成见，一直不愿入社）”。我一愕，问他怎么解决？他说：“开一个全村忆苦思甜大会，教育教育她！”我们说这事儿要慎重，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让他感到是关心她、爱护她，思想不通就等待一段时间嘛！他点头同意了。

晚上，忆苦思甜大会开始了，老徐的母亲坐在会场的一边。徐庆文说了几句开场白后，带头忆苦思甜。

他说：“我从小是在苦水里泡大的。解放前，我家穷得要命，吃了上顿没下顿儿。我八岁那年就给地主家当小作活的。妹妹九岁时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弟弟三岁送了人。有一年寒冬腊月，我身穿空心棉袄，脚上穿着露脚趾头的鞋，去门头沟当‘煤黑子’，下窑背煤，养家糊口。那天回家的路上，忽然刮起大风，冻得手脚不听使唤，手里攥着那点钱被风吹跑了，我东奔西跑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我想妈妈等我买米下锅哪！这可怎么办呢？天黑了，我空着手，饿着肚子边走边哭。”说到这儿，在场的社员痛哭流涕，老徐的母亲当场晕倒在地。苏醒后，由社员把他搀扶回了家。不久母亲的思想问题得到了解决。

1963 的麦收季节，我陪同市委宣传部的赵树枫、周洪才二同志调查总结南韩继村党支部教育党员的工作经验。老徐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我们跟他搞了个“君子协定”，每天和我们谈两个小时。饭后之余，有时我们到村外散步，无意中发现一块草苗一般高的地块，我们感到奇怪。人所共知，南韩继的庄稼几乎块块油黑碧绿，苗齐苗壮，连年高产，怎么还有这样的地块呢？问了过路的社员才知道是徐庆文家的自留地。人们都说，老徐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从来是不顾家的。

有一天清晨，村里的广播喇叭传来了老徐批评他父亲的事儿。原来队里派老徐的父亲看场，夜里他躺在麻袋上睡着了。正赶上老徐深夜查场，见他父亲睡着了，就把他的大皮袄拿走。其父醒后发现大皮袄不见了，认准就是徐庆文拿的，他点着徐庆文的小名骂个不停。当天老徐严厉地批评他看场不负责任，睡大觉，要是粮食丢了你赔得起吗？说得他父亲默默无言，这才把皮袄还给他。

老徐对自己，对自己的父母、子女要求很严格，从来不搞特殊化，赢得了村民的赞扬，也受到了党员、干部的爱戴、拥护和尊重。所以每逢党支部决定的事，布置的工作任务，党员们一呼百应，争先恐后去完成。

在调查了解中，许多党员发表了意见。村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长)王文忠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老徐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他一正二硬！一心为群众，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勤劳致富，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做到。所以我们村的党员心齐，干劲十足，团结战斗，坚强有力。这就是南韩继村连年丰收，夺得亩产吨粮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房山文史资料》第 13 辑)

## 徐庆文同志逝世前后

马 军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南韩继村党支部书记徐庆文，1922 年 5 月出生，1938 年参加八路军，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等职，曾七次负伤，九次立功受奖。1954 年伤愈后，他谢绝组织上的照顾回乡务农。1956 年当选为村联社主任，次年任村党支部书记。多次当选为县、市、全国人大代表和劳动模范。1984 年 1 月 3 日清晨不幸因煤气中毒逝世在水泥厂工地上。

徐庆文同志几十年如一日，无私无畏，勇敢顽强，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在逝世前的最后时刻仍然焕发着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绚丽的光彩。

1983 年 6 月，徐庆文在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讨论会上，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也来到北京代表团一起参加讨论。徐庆文率先发言，他先赞颂党的政策深入人心，然后兴奋地提出了四个要求：第一

是农村政策不能总变。他说：“政策不能老变，不能哪个炕头热就在哪睡！”总理听后爽朗地笑了，感叹地频频点头说：“是啊，农民是怕变”。他提出的第二个要求是希望政府重视郊区的农村建设；第三个要求是防治污染。总理马上答到：“这是个大问题”。第四个要求是加强农村教育。他说：“现在农民富了，钱有了，房有了，就缺少人才，人才是最重要的财富”。在全国最高机构的会议上，徐庆文作为农民代表，向国务院总理实实在在地说出了庄稼人的心里话。

参加六届人大归来，徐庆文的干劲更足了。忙完了收秋种麦，他感觉村子的水泥厂建设跟不上发展，就把铺盖搬进了水泥厂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每天让家人送饭，吃住都在水泥厂，日夜指挥建厂。

他在水泥厂工作期间，每天清晨四点钟准时起床，围着全厂转一圈，看看前一天工程进展情况，看看丢没丢建筑材料。白天奔波一天晚上召开干部会，每天都是深夜12点以后睡觉。他在厂里吃住27天，大大推进了水泥厂的建设速度，一座初具规模的水泥厂矗立起来了。

1984年1月2日清晨四点多钟，徐庆文照例从床上爬起来，迎着刺骨的寒风，查看了全厂，然后同值夜班的保卫人员张俊老汉聊起天来。他问张俊：“你看咱水泥厂，这样干行不行？”张俊说：“你要早来这里吃住，恐怕快投产了。”徐庆文接着说：“这也不慢，水泥厂投产后，咱们村一个人增收一千块钱不成问题。以后咱们再建个构件厂、修配厂、牛奶厂，还要建个敬老院，让咱们村变成花园别墅村。”徐庆文又接着说：“我今年六十三了，再干七年，到时候干不了，在旁边看着也高兴啊！”他拍着张俊的肩膀乐哈哈地说：“好好干吧！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可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月3日清晨，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在水泥厂的工地上。办公桌上留下了没吃完的剩饭，笔记本里记录着昨天晚上开会的内容，棉衣口袋里装着即将讨论通过的年终兑现分配方案。更重要的是——在他心里还有一幅没有完成的宏伟蓝图。

人们发现他中毒后立即送往县医院进行抢救，可是这位农村干部的好榜样再也没有睁开双眼。不幸的消息很快传到县委、市委，也传遍全村街头巷尾。

1月8日，徐庆文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北京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等各级组织敬献了花圈。市委领导段君毅、焦若愚、贾庭三、王宪等及县乡村领导，还有生前好友及各界群众5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市委和房山县委都先后作出决定，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向徐庆文同志学习。

1月10日下午，在南韩继村礼堂，全村干部群众佩戴着白花，含着热泪，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与徐庆文遗像告别。徐庆文同志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十六年过去了，而当年追悼会的悲恸场面依稀还在，北京芭蕾舞剧院一位同志书写的大幅挽联让人永志难忘：

不怕苦、不怕死、怕国弱民穷、怕群众受罪，呕心沥血、改天换地，叹四化征途君眠早；  
不图官、不图钱、图国强民富、图中华腾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愿后死诸君继遗风。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作者系区委统战部副部长

## 石岩先生生平纪略

赵润东

石岩，字湘朴，号藏真，原名石贵峰，1905年生于房山区南尚乐村，书法家。

石岩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其祖父石季安，晚清医士，精通针灸，行医于乡间，为百姓消疾解痛，人称石老先生。石岩的父亲石荣以种地为生。他重视教育，尊重知识，为了三个儿子(老大石海峰、老二石贵峰、老三石继峰)日后成才，特请来原房山完小老校长焦佩之进行家教。石岩自幼喜爱诗书，文思敏捷。7岁起在本村读书，17岁考入进德中学。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石家也日趋贫寒。无奈，只得停止学业，转入商界，到张坊镇庆丰厚店铺作记帐先生。这期间，与当地六善会首领晋汉臣一起经营山货、木炭、药材等，负责将货物经琉璃河放船运往天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很快侵占房山大部村庄。他们烧杀抢掠，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房山人民不甘忍受日寇的欺辱，纷纷起来自卫。仅三、四个月，抗日地方武装就蜂拥而起。如霞云岭一带的联庄会、十渡的六善会、葫芦堡的十八村联庄会、八十亩地的红枪会、洪寺的抗日复仇军、西庄的杂牌军等。同年8月，日军炮轰房山城，炸开监狱，胡振海、白秀亭、郭志和等乘机逃出。尔后招兵买马，发展地方武装。这些人以西部山区为据点，活动于良乡、固安、新城、涿县一带，当地称之为“老便”。

此时，石岩正担任张坊镇商会副会长，在本地区小有名望，各路“老便”不敢慢怠。但处在兵荒马乱社会动荡不安的年月里，石岩无心继续经商，可店里的药材又必须经销出去。当时，北京关了城门，琉璃河、高碑店也不通车，只能去天津、到祁州。祁州当时是全国一个大药材市场。一天，石岩来到祁州。大家闲聊说起打日本，石岩听了拍大腿说：“好！就得这样！”这时，一个身穿旧大褂的人问：“您是谁？哪儿的人？”石岩将自己的情况介绍后说道：“我这回豁出命也得跟日本拼了。”那人又说：“我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干。”石岩一打听，这人是吕正操。当时他任东北军53军388旅691团团长，带部队到安国县南关不再南下。士兵们都挎上“复仇”袖章准备抗击日寇，当地商人都都投身抗日洪流。这对石岩启发很大，增强了他抗日的信心与决心。此后，石岩与吕正操关系十分要好。经过一段时间，抗战形势渐趋不利。吕正操鼓励石岩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够一个中国人的味儿，就怕没志气。”以后两人分手。

石岩回家后三天，白秀亭带队伍攻打北尚乐。其原因是白秀亭带人向大地主杨伯华、杨仲华索要劈柴伍百斤，声称起灶做饭，抗击日本，不当亡国奴。而有钱有枪的杨大地主也不示弱。说为了别的事可以，就是不给劈柴。白秀亭一抖袖子走了。随后带人用牲口驮来炮弹，冲着村里就打。这时，陈东来、胡振江也打开了，一把火烧了杨家。白秀亭等打下北尚乐又打下石亭，接着上张坊，这帮人就这样撮合在一起。

石岩见这帮“老便”没有政治纲领，打家劫舍，随心所欲，便站出来启发引导他们。这年，石岩26岁，占有大商业联合广泛之优势，与结识的众多文人交往甚广，陈东来、郭普泉、王志刚等人与其关系也很密切，因此石对他们说：“现在各路‘老便’都起来了，他们除了打日本，尽干坏事，你们别学他们。”那年是五年，石岩背着众人，撕了半张毛头纸，蘸上醋晾干，在上面书写一首诗：“逢中狂寇犯中原，地覆天翻无净土。重整乾坤何用人，苍天早降二八虎。”写完后趁人不注意，撒上些尘土，叠好压在枕头下面。其中二八虎，指的是陈东来等28人结拜盟兄把弟。石岩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人应该积极抗日，重整家园。一天，石岩借机翻出枕头下的毛头纸，让张坊的秀才白绍亭看。石对白说：“你瞧，这得应在你们身上。你们是天降二八

虎，将来把日本赶出去得组织人。”周文龙听了马上表示：“我不抽大烟白面了，咱们立个规矩。”陈东来看周文龙说话了，也说道：“俩月抽一回。”周马上接过话茬：“咱们立规矩：一是甭俩月仨月的，不忌就枪毙！二是平时不许大摆宴席，以后一饭一菜，随便跟老百姓要猪不行。其他的事得通过司令部。”从此，“老便”的队伍规矩些了。

这之后，石岩又说：“你们的名词不好，我给你们编整编整。往小了说叫游击大队或纵队，往大了说叫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陈东来，副司令郭志合。”这时大伙都推荐石岩当参谋长。石岩推辞不行，推荐由苏洛担任。接着，石岩又建议安排人选：一路司令周文龙，副司令张连东，参谋长张乃东（活动在长沟、涿县一带）。二路司令白秀亭，副司令郑勇，参谋长付云志（活动在长沟、张坊一带）。三路司令胡振海（活动在周口店、黄山店一带）。四路司令张海，副司令宋海，（活动在涑水一带）。五路由苏洛兼任司令。这些人挂铃铛，锁枪栓，把中央军都吓傻了。几乎同时，“老便”之间又发生了争斗。十渡一带的“六善会”，司令是晋汉臣，下设三个大队一百多人。后又成立了四大队，由下滩村张亚斋任大队长。他当了大队长后，带着队伍到涑水野三坡活动，当中有人行为不轨，被山里人团团包围。山里人有枪，打死张亚斋、王寿臣、活埋了一百多人。四路司令张海得知消息后前去攻打，结果行到六渡就被活捉14人。山里人气势汹汹，号称几万人，扬言要出山扫平各路“老便”。双方僵持不下，有人提议石岩可以出面调和。为了避免双方人员伤亡，石岩挺身而出与晋汉臣、安秀云会面。经反复做工作，最后和解。双方以杨家大岭为界，同时编了六路、七路，六路司令安秀云，七路司令杨福通。

1937年下半年，石岩离开“老便”组织，不再参与其事。同年，在张坊放粥济贫，救济百姓。1939年，八路军在张坊建立两山区，石月担任房涑涿西山区区长，副区长高峰佐，县长刘甚之，石岩也在区里工作。这年，日本攻打张坊镇，烧了区部，活埋张坊无辜百姓。工作进入更艰苦的阶段。为了保存实力，扩大力量，石岩随区部转移到龙洼，组织群众继续与日寇斗争。一天，有人报告，日本队伍已开到张坊桥头，就要进入龙洼。当时，人们都急得束手无策，石岩心里也很着急。但他神情自若，十分镇定地说：“为了保住龙洼，我们得想个缓兵之计。大家听着，妇女孩子都躲藏起来，其他人都听我指挥。”说完，让大家都不要动。他举着用白布涂了红圈的旗帜朝日本走去。穿过宽阔的拒马河来到张坊桥头。对面走来一个日本人来迎石岩。忽然，又从四周出来二三百名日本兵，将石岩团团围住。一个翻译说：“太君问你，哪儿有八路？”石岩随使用手往北面的山峰一指说：“往那边跑啦！”日寇看四周没有动静，就命令石岩前边带路，顺着大桥来到龙洼。

日本鬼子把全村百姓集中在一起挨个搜查。首先搜查石岩，没有发现可疑之物。当搜到第三个人时，口袋里恰巧装着一个半截信封，上有“白干河口大队部缄”字迹。情况非常不妙，石岩看得一清二楚。接着石岩与王志申、闫谨楼和闫绍先四人被拉出带到东西街一个胡同，这里架着机枪。日本军官抽出战刀在四个人脖子上比划。石岩气得气往上撞，想猛地扭身踹倒日本抢过战刀。但身边的闫谨楼急得直使劲不让他动。石岩忍了又忍才没行动。结果，日本军官捅了一头猪，战刀上鲜血淋漓，吓唬吓唬人才算了事。这次，龙洼没有一人伤亡。1938年至1939年，石岩又来到天津，主要去热河收购药材。在中宁县结识许多书法名人。互相之间来往密切，研习书法切磋书艺，收获匪浅。当中有个兴安煤矿经理叫李子杰，劝石岩到兴安煤矿工作，说矿上有个朱田先生，是个较进步的日本人，任日本矿业株式会社大台探碳所所长，很好共事。于是，石岩来到大台兴安煤矿，与朱田混得很熟。不久，矿上又从东北调来一部分大学生充实技术力量。其中有张鹏、张连永（解放后分别任交通部秘书和解放军接管天津的代表）、兰昌（中国大学毕业）。

在矿上，石岩和这些大学生一起成立了俱乐部，唱京剧，换新词，骂日本鬼子和汉奸。这时，大台南山盖了工人宿舍，盖好后没打水泥地面。石岩带头不搬，向矿上发难。朱田后来出面调解，宿舍埂了砖地。这次发难长了中国矿工的威风。石岩一身正气，总是抱打不平。矿上有一个叫郭凤持的山东人，依仗日本人的

势力来欺辱中国人。一天,他穿睡衣不穿内裤,到一群正在洗衣服的妇女当中晃来晃去进行骚扰,妇女们十分气愤,但又敢怒不敢言。这事很快传到石岩那里,他非常气愤,说:“日本人到中国横行霸道,中国人也欺负中国人,这是什么世道?”于是,他组织起一部分有觉悟的人商量,决定押着甘当日本汉奸的郭风持游三村。当时正值深冬,准备扒光郭的衣服,抹一身臭油,撒一身煤沫,从大台东西桃沟游到清水涧,再从河沟回来,最后扔到河沟里。这叫惩治汉奸,打击无赖。郭风持得到消息后吓得无处藏身,抛下自己所有东西连夜逃跑了。这次斗争,使日本人和汉奸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中国人了。

再后来,石岩在矿上又遇到两件事:一件事是打了日本人。当时矿上有一个叫孙印亨的矿工,从前是个教师,不知为何得罪了日本人。这日本人气势汹汹,一个大嘴巴把孙的门牙打掉。石岩听见院内吵吵嚷嚷,赶紧上前,发现这日本人如此狠毒,便一步跨过去,一手掐着日本人的脖子,一手用力猛砍,砍得这人晕头转向。打了一阵,石岩觉得这样不行。因为这个日本人有枪,时间长了会伤人的。于是他立即去找朱田告状。结果,朱田又狠狠地批了这个日本人一顿。

另一件事是,矿内有个叫仇汝标的,他思想进步,有民族气节。他常从矿坑内偷雷管、炸药,秘密送给八路军。后来被日本人发现了,他只得只身隐藏起来,而家属却处在危险之中。这时,又是石岩挺身而出,把其全家隐藏起来,至直脱离危险。

1941年,石岩离开大台,兰昌送他去北京。后来,兰昌去密云县“华北重石矿”,石也随去密云,担任总务处长。1943年秋该矿关闭,石回北京。1949年,武兴楼(吴佩孚下属师长)之子武荣林对石岩说:“西安没有日本人,咱们干脆去那儿吧!”于是,石岩与武荣林、张仲三等三人去西安“国民党中央战干第四团学员队第十期”学习,1945年5月,日本投降,战干团到此为止,学员毕业。接着,石岩又考中央警官学校警官班第九期,校长为蒋介石。1946年4月该班提前毕业并分配工作。报志愿时,石岩报河北省,与同学党南宣(河南人),石宝贞(河北人)麻双喜(南方人)等从西安起程,乘公共汽车由大黎、韩城到黄河南岸,转龙门旅社雇大车奔山西临汾。然后到太原转石家庄。石岩在回北京的途中,正遇上在涞水县任县长的表兄史雄飞,史劝其到涞水县警察局任局长,石不同意。于是到北京中央警官学校五分校看望上学时的主任刘承之。刘讲:“你们这些人要服从分配,过两天,我到河北省省部外交大楼找孙连仲。”几天后,石岩来到省部外交大楼见了孙连仲。孙讲:“不久前,你表兄来过,准备让你任涞水县警察局长。”石岩回答说:“我干不了。”之后,石岩又找到在河北省民政厅第四科科长同学李宗耀。李说:“把房山警察局长换了,你去。”石听了仍不同意。李又说:“还有一个好缺儿,遵化县长。要不,你干脆去宛平县。”这样,石岩同意了。

石岩来到宛平县城,没有找到警长和熟人,马上又返回找李宗耀,表示在大城市里干点事算了。李说:“唐山、石家庄你挑。干脆去石家庄吧。”这次石岩同意了。开始,石岩到石家庄督察处,被派到市警察局督察处实习一个月。期间,各处走走看看。一个月后,被派到一分局任总务主任管行政,下属七个派出所。

1947年解放石家庄,石岩到横歧英号防空洞躲避一天。几天后,有人来找石岩,一问才知是解放军11军分区政委丁庄。丁政委问:“你叫石岩吗?有个朋友叫张鹏你认识吗?”“我认识,他是交通部秘书,军代表。”石岩回答。两人又谈了很多。之后石岩被安排在交通部工作。1948年,解放军攻打太原,为支援前线,石岩接受任务,在晋中三个专署收木材。年底,解放北京,石岩被调到石家庄后又派到北京,在中央公路局任总务代主任。在这段时间里,为了选择办公地点,石岩东奔西走,四处联系。先找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地址,后找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地址,公路局有干部职工近9000人,地方小装不下。石岩一个多月跑了40多处。这时,中央公路总局局长曹承宗又交给石岩一项重要任务,即动员群众去建设河南新乡市,平原省。石岩立即响应,带着家眷南下了。就在南下途中,孩子中暑高烧不幸夭折,妻子薛文革(辅仁大学毕业)精神受到刺激患病多年,后来也不幸去世,享年49岁。

1957年反右开始,石岩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3月被遣送还乡回到南尚乐村。他参加生产队劳动,

历尽艰辛，但始终毫无怨言。落实政策中，石岩被平反，上级组织对其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原国家交通科学院院长马奔同志亲自为石岩写书面材料证明其工作情况。由此，石岩办理离休手续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离休后，石岩心情舒畅，焕发出第二次青春，精力也更加旺盛。他关心国家大事，思路清晰敏捷，凭着多年来的努力研习，汲取书家各派之精华，使自己的书法技艺有了较深的造诣。石岩的书法作品以行楷为主，刚柔并用，结构秀润，古厚而凝重，守法而不拘于成规，于凝重端庄中见功力，于朴实平淡中呈神韵。他频繁活动于房山区域内，为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他的精心培养下，南尚乐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书法爱好者，南尚乐镇也成为全区乃至全市有名的书法之乡。1987年，石岩作为房山区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政协的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活动，为房山的两个文明建设提出过不少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以他惊人的毅力为本地区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97年，石岩先生终因年事已高，不抵疾病，于3月10日辞别人世，享年88岁。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 悼念老红军王世清

赵润东

1993年6月27日，区政协主管领导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即代表房山区政协专程护送花圈，赴平西革命老区史家营乡莲花庵村，参加老红军王世清的追悼会。惊悉噩耗，顿时感到有一种人走史亡的遗憾，因为早就听说过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革命老人，并准备尽早地与他见面，聆听他的教诲，了解其当年征杀战场的战斗经历，记下些宝贵的文史资料，以继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激励后人赴汤蹈火永往直前的革命斗志。隆重的追悼会及众多前来吊唁的乡亲们给笔者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 童工生活

老红军王世清，1910年6月13日生于河南省孟津县老城乡上河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清王朝已日薄西山进入末期，朝廷腐败，战争频繁，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幼小的王世清随父母忍饥挨饿，颠沛流离，四处逃荒。在他艰难地步入童年的时候，等待他的不是欢乐与幸福，而是难以摆脱的人间桎梏。他来到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开始学打铁，糊口为生。从此，笨重的体力劳动代替了他那个本应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美好童年。由于漫长的苦难生活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锤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

### 弃工从戎

1934年1月，正当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担起了解放中华民族的重任。已经成长起来的青年王世清满怀一腔热血，弃工从戎，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光荣地成为第一方

面军七团四连的一名战士。同年10月，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艰苦岁月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对我红军部队围追堵截，企图用最短的时间将其扼杀。王世清等红军战士在上级领导的率领下，克服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等重重困难，转战南北，历尽艰辛，终于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胜利。

正当革命形势稍稍好转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国的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全国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8年2月，中央指示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邓华)组织部队挺进冀热边界开辟新的根据地。3月，晋察冀军区派邓华支队挺进平西，开辟平西地区，建立向冀东发展的基地。于是，王世清又随邓华部队来到平西，任通讯连电话排排长。在这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他带领战士们门翻山越岭，披星戴月，冒着敌人的炮火，从后防线上到阵地前沿，确保通讯线路畅通无阻，作战指挥灵活机动。由于这一特殊工作的原因，王世清与邓华同志及其家属相处非常熟悉。在邓华同志的亲切关怀教育下，王世清从一位普通的铁匠成长为一名革命车人，并懂得了小革命道理，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

### 落户莲花庵

1945年，由于革命形势需要，地方政府向军区司令部请求派人搞后方运输工作。当时正在教导队学习的王世清又接到命令，到地方任运输队队长。任务是给房山山区芦子水兵工厂、河北省紫石口、沙岭西、刘家河等地的被服厂、织布厂、皮鞋厂等运送煤炭、粮食、棉花等物资。平西革命根据地处于北平之西，平绥路以南，平汉路之西北，跨冀察两省，是晋察冀边区的北部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王世清不负重任，带领运输队披荆斩棘、翻山越岭转战于太行山一带，保证了工厂的物资供应。因为这一带工作的缘故，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经组织批准，他后来在史家营乡莲花庵村成家落户。

新中国成立后，王世清留在莲花庵村务农，继续操持他的打铁行当，始终保持革命本色。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他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洗礼。他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社长、生产队长、村公安员。但他从不炫耀自己曾在部队中跟随杨成武、邓华将军转战南北，杀敌立功，也从不以一位老红军的身份搞特殊化。他始终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工作，不图名、不求利，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并乐于助人。

### 浩劫前后

就在王世清年过花甲将要安度晚年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是非颠倒，黑白不清，整个社会又卷进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之中。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时期，王世清也没有躲过这场浩劫。他被诬以“历史不清，参加过反动组织”之罪名蒙受不白之冤，被剥夺过党组织生活达两年之久。在此期间，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即使这样，他不悲观也不气馁，仍然坚持党的原则，坚信党会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每个党员的信心。后来，经党组织内查外调，取得大量人证物证，澄清了历史，除去了王世清所蒙受的不白之冤。老将军邓华同志还寄来亲笔信证明，即：

王世清同志：

来信收到了。你写的从参军到平西一切情况属实，我可以证明，请把此信交有关部门考虑。

邓 华

该证明信现存区档案局，编号为“民字，318号，1979年。”

此后，王世清又恢复了党组织生活，恢复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荣誉称号。1993年6月24日，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与世长辞，享年83岁。在27日召开追悼会这天，大街小巷挤满了群众，他家的院里屋内更是水泄不通，乡亲们都要最后再看一眼这位老人，以寄托哀思。史家营乡党委、政府组织全体机关干部职工参加了追悼会。莲花庵村党支部村委会致了悼词，其中写道：“王世清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塑造了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他无私奉献，呕心沥血的共产主义精神将永载史册。忠诚的共产党员王世清同志永垂不朽！”

老红军王世清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在。记下以上文字，以示对王世清老人的悼念。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 金百万浮沉记

赵润东

清光绪年间，房山城南十五公里的五侯村有一家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名叫金相，因在本家排行第六，人称金六爷。一个偶然的机，使他良田千亩，家财万贯。老王爷醇亲王奕昕给他家挂了千顷牌，此后号称金百万，名传京郊。

### 官司打不赢

金六爷原本满族人，其先人随清王朝的迁入而移民至此，定居耕作，繁衍生息，金六爷成人后钻研兽医，行医乡里，颇有名气，并在村东耕种七十余亩旱田。

毗邻五侯的南章村有个来老，在王爷坟守墓。他依靠皇亲，仗势欺人，硬说金六爷的耕地是他家所有。因此，两家发生争执，打了几年官司。据说，所耗费钱财能用银元摆满这块田地，金家据理力争却始终不赢，这地便被称作官司地。

金六爷在乡里一边给牲畜治病，一边搜寻线索打官司。有时就到北京城里转转，下下馆子，聊聊宫庭里的事情。

### 巧遇老太监

一天，金六爷来到北京一个大饭馆里，见到一位赶轿车的老太监在里面闲坐，便对掌柜的说：“掌柜的，今几个我请这位爷吃饭，劳您驾禀告一回。”掌柜的马上传过话儿去。老太监听说有人请，十分高兴，于是，双方就坐在桌前闲谈。

金六爷边喝酒边对老太监说：“我看这位爷好像心里有事似的”。老太监回答：“实不相瞒，还真有点事儿。为的是一头骡子。”“这位爷的骡子怎么啦？”金六爷问。“这骡子是老王爷心爱物儿，专拉老王爷的轿车子。不知怎的，近些天这骡子腿拐了，瞧了好些地方怎么也不见好。”老太监说完又叹了口气。

金六爷本来是要找机会接触上层人物帮助打赢官司，加上自己治牲口的绝活，这下碰个正着，说：“这位爷，您看我给瞧瞧行不行？”“那感情好哇，要是把牲口看好了，老王爷准得高兴。不过，你有把握？”“有把握”！金六爷回答得斩钉截铁。

回去后，老太监往上一传，说明房山五侯村有个人姓氏名谁，如何能看牲口。老王爷听了十分高兴，说：“那好啊！回头把他给我找来”。

老太监遵命又到饭馆里说与掌柜的，约好日子传信给金六爷。

金六爷回到家反复琢磨，可以通过拜见老王爷继续打官司，于是隔些日子又来到饭馆探听消息，掌柜的就把老王爷相约的时间说给金六爷。由此金六爷得见醇亲王奕昕。

## 竹针定乾坤

金六爷仪表堂堂，五官端正，相貌出众，老王爷一见就非常喜欢。见过大礼，老王爷问：“你能瞧这骡子？瞧瞧需要什么，尽管说。”金六爷说要用竹针，这竹针得自己做。选一个没风不阴天的日子，正中午有太阳时候扎这骡子，一扎就好。于是，择了日子，在正午有太阳的时候，将做好的二尺长的竹针扎进骡子的前膀夹骨里。扎过后，一遛骡子明显地好转。金六恐怕不好，回到家，把四个儿子叫到跟前，把家里的后事都安排停当，说：“这回不知是凶是吉。要是把骡子扎好了也就行了。要是扎不好就是掉头之罪呀！”之后，一家人愁眉不展。过了六七天，金六爷来到北京那家饭馆里打听音信。掌柜的一见面就说：“这几天你怎没来呀？老王爷正找你呢！那骡子治好了。正套着大轿车在前门大街玩儿呢。那骡子拉起轿车跑得飞快。老王爷传下话来叫找你。”掌柜的说完赶紧打发人告诉老太监，禀报老王爷。

老王爷召见金六，赐了坐，便问金六治骡子的绝招。金六就将骡子患的是“里夹气”，如同人脚打泡一样，象棒粒儿似的一个气泡夹在两骨缝之间，一走路就磨着疼，用竹针一扎放了气，病就好了，详详细细说给老王爷，老王爷十分赏识金六，非要赐给他十个骡子钱。金六连连拜谢，什么也不要，只说自己有一难，没法解脱。老王爷一拍桌子说：“天下是咱们的，有什么你说吧！”于是，金六就把与来家打官司的事如实说了，并请老王爷作主。老王爷一听，说：“你不就是打官司没地位吗？封你个六品。”从此，金六有了六品官衔。回去后再打官司，七品县官还得给赐坐，官司一下打赢了。

## 突然发了财

金六爷打赢官司后便一心治家，起初开小铺子，后来钱多了就开大铺子。在长沟镇开了“鸿丰泰”店铺。接着又在涿州、码头、琉璃河等地开办店铺，在北京大栅栏开了首饰楼。自己的买卖铺都带鸿字，很快，金家兴盛起来。这时，崇各庄，豆各庄所葬清王坟田产也交与金家由金八掌管。金家一下拥有耕地 700 多顷。

金六家钱有了，地有了。扛活的达一百多口。农忙下地，农闲时抬土推山。盖起了成片的高脊出廊大瓦房，女儿绣楼二层，场院十几亩，每年麦收轧场的骡子就有 30 多头。为了每年去高庄白玉塘进香停车方便，专门在白玉塘两边买了一亩多地作停车场。在甘池一带有山坡地 200 多亩，专种大枣供春节蒸粘糕用。这期间，与老王爷来往，受老王爷关照也是自然的。老王爷去西陵谒陵路过五侯，来到金家，中午见长工们吃轧饴饬（面条），每人拿一大碗从查子缸（矮口缸）里抄上一把，用花椒油炸咸汤一拌，吃得满香，自己也拿个碗，下手抄一把放在碗里。一吃，的确别有风味。回到宫里，虽然吃着山珍海味，但觉得不如金六家的轧饴饬吃着有味。见到金六家如此兴旺，老王爷说：“该给你挂千顷牌了。金六说：“我没有功禄”。但是，王爷还是给了千顷牌。从此，人们称金六爷为“金百万”。

### 眨眼败了家

金家兴旺一阵以后，逐渐走下坡路。而彻底败家，是从金六爷病死开始。这年，金六爷一病不起，家里大办丧事。五侯村前街后街搭过街棚，办大事，即全村人都可以来，系上孝带就在这里吃饭。当时，村里穷人很多，一人系孝带，全家人去吃饭。这时，从北京来了四个人前来吊丧。金家的人不知道，管事的人没热情招待，这四人生气后，来到后院大场。场里团团转是院墙，里面堆满了连年垛好的大滑秸垛。这四人放火点着滑秸垛，熊熊大火立刻蔓延起来。当时，许多人都看着丧戏，棺材没出殡。家中也燃起大火，南房夹皮墙里藏放的各种衣服及绫罗绸缎一什等物全都冒起大烟。张罗人一看，赶紧叫人把冥灵纸活隔墙扔到院外，慌慌张张抬出棺材，直奔墓地。一把火烧掉了金百万的万贯家财。

他儿子四人，其中一个文秀才，一个武秀才，都是花钱买的，这时家中遇到灾祸，谁也不顶用，文秀才见家中败落，一下患病，中风不语，谁欠钱粮，哪有田产，全然不清。外面开的店铺见此情景，也都不交利润，鸿丰泰的掌柜到年底抱着红单子来报账，说是赔了钱……几年之后，金家就败落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 龚澎同志在房山

张 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房山地区的党政机关干部中，一提起龚澎的名字，几乎人人都知道。龚澎是我国外交部下放到房山（当时是北京市周口店区）来体验生活的一位女外交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58年春，房良两县由原属河北省管辖，划归北京市管辖，两县合并，建立北京市周口店区。当时的广大农村，在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新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龚澎同志于1958年4月由外交部下放到周口店区，任中共北京市周口店区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当时的区委书记李明，农村工作部长吕镗、罗玉源，副部长王树瑞，农村工作部秘书王鸿元，我和张庆贵、刘振祥、孟宪周等六、七名农村工作部的干事，以及区委机关的其他领导和同志们，对龚澎这位女外交家的到来，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欢迎。认为外交部的新闻司长，来我们这里体验生活，必将对我区的工作起到促进作用。

和龚澎同志相处一段时间后，她的形象和风度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她40来岁，中等身材，性格爽朗，侃侃而谈，语言严谨而不失幽默。她工作积极主动，关心农村不断发展的大好形势，善于接触广大干部和群众，尊重和听取任何人与她谈话和介绍的情况。她到农村工作部工作后，除听取区委领导和部领导的正规的情况介绍外，还同农村工作部的干事逐个谈心、聊天。对了解农村的形势、政策，了解农村发展中的问题，表现了极高的热情、极强的责任感和虚怀若谷的胸襟。甚至经常是口问手写，不辞辛苦，甘当学生。没有一点高级干部的官气和外交官的架子，更看不出她是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倒是真像一个年长了几

岁的小学生。

龚澎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从来不蹲机关，总是主动到农村去，如饥似渴地了解情况。当时区委领导只有一部轿车，大部分干部下乡都靠步行或自行车。龚澎为了下乡方便，主动从外交部带来自己的女式自行车。在农村工作部部长罗玉源、副部长王树瑞、秘书王鸿元等人陪同下，经常骑自行车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王鸿元经常陪同龚部长下乡，体会最深，他说：龚部长的工作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作完整的记录，她很会作农村干部的思想工作，几句话就能使干部消除顾虑，高兴地向龚部长介绍情况。每次座谈后，龚部长都及时整理出材料，有时连夜就写出调查情况报告。她的身体力行，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干事，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

龚澎同志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对我区一些先进典型村(高级农业社)几乎都去到了，对那时高级社的社长、村党支部书记也都访问到了。如城关北市村的高树林、南韩继村的徐庆文、惠南庄村的杜宝珍、岗上村的吴春山、坨里村的郭华、半壁店的赵仲起以及吉羊村的许士英等一大批先进高级社和市、区级劳动模范，她都亲自去座谈、走访。在座谈走访中，她热情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1958年8月中旬，她去石楼、吉羊村同村干部座谈时，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河南省有的高级社合并转建人民公社的消息，征求村干部意见，是否愿意组建人民公社，村干部们都一致拥护走人民公社化道路。她回到区委农村工作部后，积极向区委领导汇报农村干部对办人民公社的要求，向区委提供了决策依据。

龚澎同志在区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把我们当成她的亲密无间的朋友，经常与我们聊家常，为我们拍照生活像，还邀请我们去北京到她家作客。罗玉源、王树瑞和王鸿元都多次去过她家。甚至在龚澎同志调回外交部以后，还曾邀请房山的同志去做客。每次去她家，都是龚部长亲自接待，乔部长有时还回家陪同接待。”1959年秋季，受龚部长之邀，我也去过她家一次。一进龚部长的家门，身材魁梧的乔冠华副部长就接待了我。乔部长同我谈话中，问我房山的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农民的生活情况。中午在他家吃饭时，乔部长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我喜欢长跑，也喜欢唱歌。乔部长说他也喜欢唱歌，还喜欢京剧。饭后，乔部长让我到他的书房，打开留声机，他随着留声机为我演唱了一首外国歌曲。接着，又放京戏片，唱了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唱段。通过与两位领导的接触，我深深地感受到：龚部长、乔部长与我们这些普通干部的友谊，是多么的真挚，多么的纯朴，使我至今记忆犹新，永生难忘。

龚澎同志在百忙中，还不忘教育子女。在房山体验生活期间，她利用学校放假时间，把儿子乔宗怀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儿子，一起接到房山来，她亲自带着他们到我区域关镇的先进村——北市村去体验农村生活，了解农村情况。龚部长说在北京这些孩子看不到农村情况，更感受不到农村这种生活情景，让他们来农村体会体会，很有好处。

龚澎同志到周口店区委挂职体验生活，至今已四十多年了。她那火一样的工作热情，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 张晋龄三抓邓凡清

唐占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仇民族恨唤醒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纷纷发展起来，平南葫芦堡十八村联庄会就是一个，其中以公议庄村地主邓凡清的少林会势力较强。依仗在村中权势，借抗战之名，发动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村四周挖深沟修土壕，购买火枪，以他家为议事厅，房前大场为练武场，强迫组织青壮年舞枪弄棒，习武练功。为实现独霸一方的野心，又对各村张贴告示，号令“抵御日寇，保卫人民”，招兵买马。因此，一些地痞无赖便投靠在他门下。随着势力的壮大，邓凡清的反动阶级本质开始暴露了：一是以供养少林会名义向百姓摊派粮款归己享用；二是增加佃户地租，支持各村地主苛刻剥削贫农；三是纵容少林会员到永定河大堤抢劫过往行人和商客，以及到各村夜闯民宅绑票。因此，弄得窑上地区民怨四起。

1944年5月，我区小队为了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团结抗日力量，决定攻打公议庄，除掉邓凡清。一天傍晚，我五区书记张晋龄带领区小队隐近公议庄南壕门。只见两个守门的，一个手持标枪，一个抱着火枪懒洋洋地靠在吸烟。区长李风桐（涿县陶营村人，1948年同张晋龄于窑上村被捕遇难）和一名战士悄悄逼近壕门，越过掩蔽体出奇制胜地将两个守敌收拾了。队员们迅速冲进壕门，迎头遇上两个来换岗的，他们见势不好调头就往回跑，一个差声地喊：“不好啦，八路军打来啦！”另一个“当”一声扣响了火枪报警。张晋龄立即高喊：“打！”田连仲听到命令敏捷地甩出手榴弹，“轰”的一声两个逃跑的被炸得血肉横飞。

这时，正在家里和几个少林会头头饮酒作乐的邓凡清闻风丧胆，急忙对其他人说：“事不宜迟，快跟我从后院走！”区小队很快把邓宅包围了，张晋龄、李风桐、田连仲带着几名战士到大门口高喊：“快开门，不然我们用地雷炸了！”里边没有动静，张晋龄急令战士说：“炸！”轰隆一声门炸开了。一行人冲进院里，发现东、西厢房漆黑寂静。只见北屋东间明灯腊烛，进屋发现八仙桌上盘盏狼籍，炕晃昏邓凡清老婆吓得团缩着，经审问说她丈夫跑了。张晋龄感到很遗憾，但转念间心想宣传党的政策团结民众抗日时机不能失，于是对田连仲说：“你去布置一下，让战士们分头将带来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接着对李风桐说：“看案桌上有纸有笔，你准备一下，我写个告示。”不一会儿，告示写成，大意是：“邓凡清悉知：你背叛‘抵御日寇，保卫乡民’诺言，干尽危害人民之事，所以，我们捉拿你。侥幸你跑了。记住，只要你痛改前非回心抗日，我们决不伤害你，若仍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决不放过你，何去何从你自抉择。八路军区小队。”告示写完后，李风桐对邓凡清老婆严厉地说：“告示贴在你家大门上，要保管好……”。随后，张晋龄召集好队员离开公议庄，沿永定河大堤消逝在夜色中。

邓凡清逃跑后很快被驻良乡日军收买，回到家乡重整旗鼓。他在村中东头修起一座两层砖楼，有十几个日军看守，在他的带领下经常到各村去扫荡，无恶不作，民不聊生。

1945年6月下旬，张晋龄决定二打公议庄。一天夜里，他带领武工队、区小队和窑上附近各村民兵，左臂系着白毛巾作为辨认记号，包围了公议庄。深夜11点张晋龄打响了第一枪。这时，攻打东、南、西门的战士们立即向守门敌人开了枪，有的民兵迅速点燃放在水桶里的鞭炮，“哒哒哒，嘟嘟嘟”如同机关枪响彻夜空。队伍踏过铁丝网，跃过壕沟，伴随冲杀声向炮楼扑去。正在炮楼里玩麻将的邓凡清急令锣手到楼顶敲锣，召集住在各家的少林会员迎战。那人刚到楼顶锣未敲响就被我军战士一枪击中坠楼而亡。几个日军想

从正门突围,也被我军密集的子弹击毙。敌人守不住了,钻出后门,仓惶向村北口败退。分散在各家的少林会员被我军强大攻势吓破了胆,缩在家里未敢妄动。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我军缴获机枪一挺,“三八”枪十九支,子弹六百余发和其他一些战利品,但没有发现邓凡清。张晋龄气愤地一拍大腿说:“又让他跑了,不过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命令几名战士到附近住户抱来几捆玉米秸填进楼里用火点着了。随后,我军迅速离开了公议庄。

1946年蒋介石侵吞抗战胜利果实,调兵遣将抢占平、津要地。一些在抗战中依靠日寇为非作歹的地主、汉奸、特务、地痞又投入国民党的怀抱。这时,曾两次侥幸逃跑的邓凡清在伪良乡县保安团的支持下,网罗少林会员回村成立“自卫队”,自任队长。副队长是国民党情报员夏场村的王珍,决心与共产党为敌。

他们配合良乡的讨伐队、还乡团不断到各村搜捕共产党残害革命群众。同时还乱砍树木,搜刮砖瓦,强迫各村出民工到公议庄重修炮楼,增建地堡和高房工事。他亲自监督,昼夜不停。农历五月初麦收时节,各村民工回不了家,到嘴边的粮食收不了。张晋龄心急如焚,为打击敌人,护秋保粮,经上级批准后三打公议庄。

一天夜里,区武工队、区小队来到公议庄村南柳树林里,张晋龄作了战斗部署:区小队分别攻打四门岗哨守敌;他和武工队化装成给民工送饭的,进入工地,见机行事。部署完,张晋龄带着几名武工队员,有的挑着粥桶,有的担着干粮,骗过岗哨盘查来到炮楼工地。邓凡清看到送饭的来了,从炮楼上大摇大摆地下来对民工们喊了声:“开饭吧!”他自己在随从护卫下也回家了。这时,张晋龄和武工队员趁机到吃饭的人群里宣传行动计划。一顿饭工夫,邓凡清又回到炮楼前耀武扬威地骂道:“他妈的,快起来干活……”话音未落,张晋龄从人群里朝着邓凡清站的灯亮处开了枪,“当”的一声灯被打灭了。正在邓凡清晕头转向时,田连仲和几名队员冲向前,一个扫膛腿将其打翻在地,象老鹰捉小鸡似地被捆上了,嘴用毛巾塞牢,推推拥拥混入民工人群里。区小队员听到枪响也迅速向守门敌人开了枪。此时,公议庄村里已乱作一团,民工们有的喊:“八路军打进来了!”有的喊:“冲啊,不伤老百姓,活捉邓凡清!”在各家的“自卫队员”吓得惊魂落魄躲藏起来。仅二十多分钟便结束了战斗。张晋龄带领队伍押着邓凡清返回韩营村,决定三天后召开公审大会就地将其处决。但是出乎预料,邓凡清关押在唐占春家第二天夜里,因看守的民兵杨会睡着了,他挣开绑绳又跑了。事后他又多次同良乡保安团、还乡团到韩营村进行报复性的骚扰。

直至1947年农历八月中旬,我75团奉冀中军分区指示攻打公议庄时,邓凡清在负隅顽抗的激战中被我军战士乱枪击毙。从此,公议庄炮楼被彻底毁掉。这股罪大恶极的地主武装——“自卫队”被彻底消灭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 怀念小烈士唐亮

唐占忠

唐亮,窑上韩营村人,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秋季前在河北省固安县西南牛坨镇一次反击战中为掩护战友而壮烈牺牲,当时年仅15岁。如今五十余年过去,但每当想起他生前事迹仍历历在目,今回忆一些旧事以示怀念。

### 号声唤起革命心

唐亮小名唐球，1932年生于韩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唐文清常年给北蔡村地主张连登扛活。七岁时母亲邵氏病故后便随父当童工，幼年则打上了阶级压迫的烙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韩营村是平南革命根据地之一，张晋龄领导的武工队和平南第一、二支队经常到此休整，该村广大贫苦农民跟共产党结下鱼水情，为推翻三座大山压迫，全村有五分之四青壮年踊跃参军，投入火热的革命洪流。1945年夏季，平南第一支队有一天驻军韩营村，早晨司号员小杨在村口“滴哒，滴哒”吹起床号，嘹亮的军号声把要早起在村外放猪的唐亮唤醒了，他有生以来头次听到这美妙的声音，撒腿就往村里跑，到司号员跟前惊喜若狂地问：“你吹的是什么？”小杨回答说：“是军号。”唐亮接着还问：“吹军号有什么用？”小杨自豪而炫耀地说：“吹它能指挥部队呀！吹起床号战士就起床；吹集合号战士就集合到一起；吹冲锋号战士就冲锋去杀敌。”唐亮听了军号作用如此巨大，顿时心潮澎湃，参军当司号员的想法油然而生。于是渴求地问小杨：“我想当吹号员行吗？”小杨看唐亮那种兴奋执着劲，便若有所思地说：“你还小，现在不行，不过凭我参军时的经验也许行，就是你得先在村里当民兵。干出成绩来再求民兵队长向部队推荐，才有破格接受的可能。”唐亮听了如梦方醒，第二天便找民兵队长刘国珍要求当民兵，开始刘国珍不答应，可是唐亮态度坚决，纠缠不休，拿他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发给他一条白头巾，一颗手榴弹，任务是放哨巡逻。从此，唐亮当了小民兵。他积极肯干，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早日实现参军的目的而努力。

### 献枪弹破格入伍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窑上地区的逃亡地主、地痞流氓、汉奸、特务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走狗，竭力配合国民党向解放区根据地反扑。农历十月的一天傍晚，北风突起，飞沙迷漫。刘国珍召集民兵开会说：“今晚天气坏，敌人有可能前来骚扰，我们要提高警惕，对敌斗争的方针仍是分散防卫，合力共击。会后，唐亮回到家里吃完晚饭，穿上破棉袄，腰中揣上手榴弹，怀里抱着两颗地雷，悄悄离开家，冒着风沙向西北壕门走去。他机敏地在村外大道两边各埋一颗地雷，导火索由一根细麻绳连结，再用树杈支起三寸高，将大道横拦起来。当夜静更深时，不出所料，果然来了一伙敌人。不多时，打头的敌人蹿上麻绳，“轰，轰”两声巨响，地雷开花了，顷刻炸死五个敌人，其他未炸着的吓得赶紧调头逃走了。这时，村里民兵从各自守卫处迅速奔来。只见唐亮一人在打扫战场。他把五支三八枪、五条子弹袋和一把“王八匣子”堆在一起，高兴地对刘国珍说：“把敌人炸死、吓跑了，枪弹交给您算我有成绩吧？”刘国珍高兴地拍着唐亮肩膀说：“当然算啦！”唐亮紧接着又说：“那好，您得答应替我办件事。”刘国珍果断地回答：“行，什么事？”唐亮神秘地说：“我要参军当司号员。”刘国珍听了新奇地说：“你十多岁孩子还没枪高呢，恐怕部队不要吧！”唐亮期盼地说：“如果部队再来，您把我的情况向领导说说并实意推荐，我想会有希望的。”刘国珍只好婉言答道：“行，我帮你！”事后没过几天，平南第一支队又来韩营村休整。当天晚上，唐亮迫不及待地拉着刘国珍去找支广西队长说明来由。支广西对刘国珍说：“论唐亮出身和对敌斗争精神够入伍资格，只不过岁数小点……”话音未落，司号员小杨一旁搭了茬：“我参军那年才十六岁，你不是破格收了我吗？我劝您也破格收了唐亮吧，吹号我教他！”支广西看唐亮招人喜欢，加上刘国珍一心推荐和司号员的帮助，便顺水推舟回答说：“好，我破格收下啦！”当晚唐亮便入伍成了实习司号员和支队通讯员。

## 救战友舍生取义

1947年国民党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河北省新城县的王凤岗在涿、良、宛、固、新、霸、永等县疯狂围剿共产党。对此形势，我冀中军分区党委指示武工队和平南第一、二支队暂时撤到固安县以南大清河北一带活动，保存实力，适时地和敌人斗争。该年农历九月中旬，平南第一支队在固安县西南牛坨镇休整。一天下午五点左右，侦察员任万川火速向队部报告说，王凤岗带领一个团兵力扑来，先头部队已到北边二华里的崔家营，支广西立即作出“保存实力，掩护百姓，迅速转移”的决定，命令唐亮通知各排马上到村南土丘枣林集结待命。由于唐亮机敏迅速，所以老百姓很快离村向大、小孟村和尚各庄等村逃去，部队也如时到达集合点。这时，敌人进了村，发现我军南撤，随后追了上来。在甩不掉敌人的紧急关头，支广西又下达了停止转移变阻击的命令：一、四排埋伏土丘东西两侧打包抄之敌；二、三排守土丘枣林制高点快速做好掩体居高临下打击敌人；不吹号死守阻敌，只要吹冲锋号(为迷惑敌人)就撤退转移。战斗打响了，敌人用密集的炮火攻击土丘枣林，我军二、三排用四挺轻机枪、手榴弹、步枪和掷弹筒交插火力阻击敌人，曾三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天近黄昏，为不和敌人恋战，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敌人以为我援军赶到，怕遭更大伤亡，便立即撤退。但在退败中发现我军没有冲来追赶反有撤移迹象，于是又调头反冲再次攻击。我军又重新与敌浴血拼搏了。这时，敌人一颗炮弹落在机枪射手韩仲田身旁，在生死攸关之际，唐亮为掩护战友，奋不顾身跃出战壕扑向韩仲田，霎时一声巨响，唐亮被弹片穿胸阵亡，横卧在韩仲田身上，韩仲田被救了。一、四排从土丘两侧跃出防线同二、三排集中火力勇猛地冲杀上来的敌人。敌人一次次冲锋又一片片倒下。天黑了，敌人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仓惶撤逃了。

战斗结束后，韩仲田含着眼泪将唐亮的尸体背到土丘半腰一棵大枣树下埋好，同战友们一道默默地离开了战场，为争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 回忆黄志华大夫

王奎武

黄志华大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到大江大河中去游泳”的号召，于1966年从北京友谊医院来到河北卫生院协助该院开展工作。

黄大夫是上海人，北京医科大学毕业，那年三十八岁，中等身材，快人快语，非常热情，在河北卫生院工作期间，曾有许多感人的事迹。

李各庄村东李连伯的五十多岁的爱人和他七十多岁的婶母都患有白内障，已经失明。日子过得很清苦，又没钱治病。

因河北卫生院当时就设在李各庄村中，黄志华得知后在院长王树伟大夫的陪同下，赶到李连伯家中，为二人做了详细检查。认为二人病情可以通过做手术康复，有复明的可能。因此，就在李家房内为两位病人进行了手术。一周后打开包扎在头部的纱布，两位老人真的复明了。娘俩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激动地说：

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叫我们重新见到了光明。后来笔者曾采访了这两位老人，就此写了一篇新闻稿件，刊登在当时的《北京晚报》上。

金鸡台村有一姓刘的小孩，大约五岁，左腿伸不直，觉也睡不好，总喊腿痛，小肚子痛。患者已有半个月不能下地走路。医疗小分队赶到后，确诊为：小儿右胳膊窝囊肿，并有溃烂感染的可能。他们当即给小孩做了手术，经过精心护理，一周后小孩可以下炕走路了。家长感动地说：是白求恩式的好大夫救了我儿性命。

1966年7月10日，黄志华大夫去南车营村给一位老人看病。那天是阴天，晚上雾很大，还有毛毛细雨。夜间河北卫生院给南车营去电话，问见没见到黄大夫，南车营村大队书记孙平回电话说：没见黄大夫来。大家听说都急了，南车营的社员、公社机关干部、河北卫生院大夫以及全公社基干民兵，分兵几路去大花岭、乔麦山满山坡去寻找，直到第三天，才在乔麦山大山下发现黄大夫的遗体。根据出事现场分析：黄大夫可能先去房山矿西区医院借医疗器械，在爬山的过程中，天已大黑了，高山上雾更大，极易迷失方向，本应向东面走，结果黄大夫却向北走了，不慎踏空掉在直上直下足有一百余米高的悬崖下。

事后，北京友谊医院、河北公社、河北卫生院在河南中学大操场举行了隆重的黄志华大夫追悼大会。友谊医院全体职工在北京又召开了追悼大会，追认黄大夫为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黄志华大夫兢兢业业，不辞辛苦为村民看病的高尚精神永远在人们中传颂。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 忆老校长王赞青

侯国智

王赞青，原名王绍，石楼村人。生于1879年（光绪五年），是前清的秀才，后来进师范学校，接受了新式教育。1907年，他以房山劝学所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动员石楼村民拆掉村子西南角紫竹院的药王和菩萨泥塑，建起了石楼小学。拆泥塑前，他在药王和菩萨大殿门口各贴了一副对联：

医俗即医人总需要改良进步；  
治病不治命休信那不老长生。

菩萨心肠唯教育；  
圣贤事业始儿童。

在王赞青的倡改良、求进步、扬教育的号召下，石楼小学顺利诞生了。

清朝倒台后，石楼村第一个剪辫子的是王赞青。他还大力宣传：反对妇女裹脚，并让自己的大女儿带头放足。

1937年春旱不雨，村里一些混混儿就鼓噪老百姓抬着龙王的泥塑像求雨，借机向村民敛钱，用以大吃大喝。当时正当村长的王赞青，坚决反对迷信，严厉禁止求雨。有个专吃蹭饭的混混儿，夜里把龙王庙里的泥塑神像，偷偷地背到王绍家大门口，面朝门倚在大门上。早晨家里人一开大门，只听“咕咚”一声，龙王爷泥塑像向门里倒了进来，如同磕头一样，家里人大惊失色。王赞青见了，十分气愤，叫三儿树桐把泥胎拖

到村中最热闹的十字街口。村民都不知怎么回事，围在一起看热闹。王赞青当众讲话：“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下不下雨，不在龙王。泥胎无腿，怎来讨帐，起哄求雨，混混沾光！我是村长，坚决不让，破除迷信，别再上当！”说罢，举起大镐，三下五除二把龙王的泥塑砸了个粉碎。从此村里传下一句顺口溜：“王赞青，真厉害，龙王给他磕响头，不准求雨砸泥胎。”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在石楼郭家大坑后边，集体屠杀了我村民三十七人，在双柳树、坨头、支楼、二站等村，也集体屠杀了我大量同胞。看到日寇的暴行，时任一村之长的王赞青义愤填膺，鼓励儿子树椿、树梅去河南投军，参加了抗日的队伍。后来，树椿牺牲在河南。日本鬼子在石楼统治期间，要周围各村成立“维持会”。王赞青不愿给鬼子做事，立即辞去了村长之职，重操教书旧业，恢复因兵荒马乱而停办的石楼小学，为此他写了复学布告，在四街传贴。布告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耽误庄稼，只在一春，  
耽误孩子，则在青春！读书识字，黄金之本。  
学习科学，增长见闻。尚志明理，强国强民，  
石楼小学，冬至复学，快来报名，勿误子孙！

当时石楼村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堂号，如敬业堂、慎思堂、三槐堂、筠心堂、积德堂、积善堂、普善堂等等，王赞青给自己家起的堂号就是“尚志堂”，所以在复学广告里特别提出“尚志明理”的主张。

石楼小学复学后的第一难事就是没处买教材。于是发动学生向各家各户去找旧书，低年级念《三字经》，高年级念《孟子》，还找来过去的《国文课本》，让高年级学生给低年级学生抄。

白天，王赞青教学生们一些旧书、旧课本，晚上王赞青叫从河南潜回的儿子树梅又把学生招到学校，教学生们偷偷地学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并宣讲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事迹。同时王赞青还鼓动自己的小儿子树栓，放弃在琉璃河火车站当调度的优厚工作，去西安参加青年远征军去抗日。

在教学过程中，王赞青还自编了一些教材，如新编的“三字经”。五十多年后依然记得其中的部分内容：

冬至过，天渐长。男女生，进学堂。  
敬师长，孝爹娘。母给钱，莫买糖。  
知节俭，惜食粮。明廉耻，爱家乡。  
中华史，五千年，牢牢记，切莫忘……

王赞青一边教学生们念、背，一边给学生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还用讲故事的方法，讲“守株待兔”、“揠苗助长”、“龟兔赛跑”等典故。由于讲的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使学生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极深刻的教育。

老校长还经常向学生们介绍一些科学知识。他告诉学生们说：地球是圆的，我们是生活在空气里吸收其中的氧气活着的。如果想看到空气，可以到铁道边上向铁道上空去看，因为铁道被太阳晒热，空气会像水一样流动，是从下向上流的，是飘飘渺渺的样子。学生们很好奇地结伴到铁道边上去看，还真是像老校长说的那样，所以对老校长说的话，都十分相信。

1948年冬天，房山解放了。

七十岁的老校长虽然不再教书了，可几乎每天遛早回来，都要到学校转转，看看学生们上早自习的情况，校园里常常见到王赞青那白头发，白胡子，身穿兰布大褂、青裤、白袜、青布鞋的身影。有时他还把遛早时构思的古诗，用楷书写在黑板上。大约是1951年寒假，石楼村一抗美援朝的战士牺牲了，要开追悼会，王赞青立即送来一副挽联，记得是端端正正写在高丽纸上的，内容是：

抗美帝，援朝鲜，英雄壮举；  
卫祖国，乐捐躯，烈士永垂。

1964年，老校长王赞青不幸去世，享年85岁。其女儿慧文曾撰挽联一副：

拉神仙，拆破庙，办教育，培育新人；  
教子女，读诗书，继祖辈，多做好事。

至今，老校长去世三十七年了，他生前在房山的二站、韩继、杨驸马庄、石楼等村教出了大批学生，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材。石楼一带的人都深深地怀念着他。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 “两弹”功勋王淦昌

强家华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研制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其中，已于一年前去世的原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所所长、名誉院长王淦昌先生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

王淦昌先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是核武器研究实验工作的开拓者。早在1950年，王淦昌即是我院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的创建者之一，并于1952年担任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他主持制定了近物所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取得了一批有水平、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一批核科学技术人才，为我国核事业发展积累了力量、打下了初步的基础。1956年，王淦昌先生被我国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所合作，领导丁大钊、王祝翔等取得了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重大科研成果。六十年代初，正当我国内有困难、外有压力，原子能事业发展非常关键的时刻，王淦昌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所任满回国。1961年4月3日，他应约来到二机部刘杰部长办公室，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也在座。刘杰部长说：“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着，刘杰传

本文作者与王淦昌（右）合影

达了党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并坚定地说：“有人要卡我们，中国人要争这口气。”王淦昌静静地听着，心理很不平静。他想，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待，都落实到要接过的这一副沉甸甸

甸的担子上。心里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第二天,王淦昌就到二机部九局去报到了。差不多同时到九局报到的还有原子能所副所长彭恒武,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郭永怀。他们三个分别担任了核武器的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方面的领导工作。不久,彭德怀、陈毅、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实验室看望他们。勉励大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尽快研制出中国的原子弹。陈毅元帅紧紧地握住王淦昌的手,高兴地说:“有你们这些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也好当了。”一种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再次在王淦昌心中升起。

原子弹研制工作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对到二机部系统工作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并提出很高的要求,对王淦昌也不例外。对组织提出的“绝对保密、长期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三条要求,王淦昌毫不犹豫地:“可以,我做不到。”从这一天起,王淦昌更名王京,从科技界悄然“失踪”了。国外有些朋友觉得奇怪,怎么看不到王淦昌的消息?国内有的知情人也为他惋惜:根据他在科研领域已取得的成绩,继续搞下去,有可能得诺贝尔奖。但王淦昌是这样想的: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现在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为了中国能造出原子弹、氢弹来,为了给中国人争这口气,我愿隐姓埋名,以身许国。

作为九局九所主管实验研究的副所长,王淦昌带领一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热血青年,在河北怀来县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建立起在中国核武器研制史上具有开篇意义的“十七号工地”,开展爆轰物理实验,以此来摸清原子弹的内爆规律,掌握轰爆实验技术。王淦昌负责全面的实验领导工作,对炸药的研制,炸药成型研究、爆轰物理实验和测试工作等,都要亲自抓。他还给青年们开设了基础实验课,在有针对性地讲有关数学、物理课的同时,重点讲了实验分析课,并亲自深入班组,指导实施。他与郭永怀、陈能宽和实验队一起,通过不断研究、不断设计、不断总结提高,在一年多时间里,研究、设计、制作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部件,大大小小试验了上千炮,基本上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测试工作也突破了技术难关,闯过研制原子弹的第一关。这项工作,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62年底,17号工地已经满足不了大型爆轰研究和实验技术发展的要求,九所除了理论研究人员留在北京外,其他实验、设计、生产人员,都先后转移到大西北的核武器试验基地。年过56岁的王淦昌,告别妻子儿女,谎称“去西安工作”,怀着为祖国研制“争气弹”的宏愿,义无反顾地奔赴大西北。那里平均海拔3200米以上,属高寒地区,风沙大、气压低,条件极为艰苦,王淦昌与大家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毫不特殊。他常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搞科学研究的人,特别是从事我们这个事业的科学工作者,不能怕艰苦、不能过多地考虑个人的生活,饭吃饱了就行,我们甚至可以过原始人的生活。”

在试验基地,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王淦昌。轰爆实验在几个相隔很远的实验基地进行。作为实验委员会主任,他常常冒着凛冽的寒风,坐在颠颠簸簸的吉普车上,奔波于凹凸不平的沙丘路上,深入车间、工号和实验现场,与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他既是一位很好的领导、科研组织者、指导者,又是一位普通劳动者。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尊敬他、爱戴他。1963年11月20日,进行了一次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轰试验。这是一次对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实验结果进行综合性论证的关键试验。由于连日劳累,王淦昌患了感冒,发烧、咳嗽,血压也升高了。但想到这次试验的重要性,他仍旧坚持到实验基地去,进工号现场,检查各种试验装置的准备情况。正式试验那天,他早早地就到现场、再次进行检查验收。试验就要开始了,参试人员都按照要求早已退出现场几百米以外。王淦昌想到了什么问题不放心,又带着几名技术人员进入工号再次查看。这次试验进行得很顺利,内爆波和引爆器都达到了理论设计的要求。王淦昌高兴得像年轻人一样情不自禁地双脚跳了起来。这一炮解决了原子弹设计的关键技术问题,为原子弹的设计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1964年2月,九所改名为九院,王淦昌被任命为副院长,仍主管生产和技术工作。这时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设计到生产实验,进入全面突破阶段。作为分管生产实验工作的副院长,王淦昌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日夜操劳、寝食不安。有时,天不亮就把警卫叫起床,开车到车间、工号,严格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组织

论证，或者改进，并且要求随即拿出结果来。1964年6月6日，基地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全尺寸大型试验。这是原子弹爆炸前的一次综合演习。王淦昌强调，这次试验测试工作要做到“一次成功，多方收获”。为此，他让工作人员想办法、动脑筋、找隐患、除障碍，反复进行操作练兵。这次试验结果非常理想。当听到“测量信号理想，试验圆满成功”的消息时，王淦昌高兴极了。他想，离我国“争气弹”爆炸成功的日子不远了。

9月，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进入最后阶段。人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干。一天深夜，王淦昌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总想着207车间。那里还在装配炸药部件，这是非常关键的技术工作。他翻身起床，叫醒警卫驱车赶到装配车间。车间的同志们看到老科学家深夜来到车间专注地看着大家进行部件装配，都非常感动，干劲倍增，同时，也很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他回去休息。但王淦昌就是不肯走，他们只好搬来一张行军床，让王淦昌靠在上面。直到凌晨三时多，主要配件装好了，他才回宿舍休息。

第一颗原子弹正式试验之前，王淦昌彻夜未眠。为了做到周总理要求的“一次成功”、“万无一失”，他层层把关。对身边的同志千叮咛，万嘱咐：“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细，做到周到细致。”总装的工序全部完成后，57岁的王淦昌与其他科学家和领导，坐着吊车，登上了100多米高的高塔，对装置进行一项一项的严格检查验收。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道强光闪过，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朵硕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一群年轻人跑过来围着老院长欢跳，王淦昌激动地说：“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

## 二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尽快研制氢弹。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也明确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研制氢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制造技术上，都比原子弹要复杂得多。当时国外对氢弹技术严格封锁，我们只能自力更生，靠自己摸索，揭开氢弹的谜。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早就向国家建议，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探索氢弹。1960年12月，钱三强所长在所党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刘杰部长指示：“现在九院正忙于‘原子号’，你们四〇一所应在‘氢字号’方面先走一步，做些准备。”原子能所在钱三强所长主持下，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并抽调20多名物理、数学骨干组成以黄祖洽、于敏为组长的轻核理论组，着手对氢弹中各种物理过程、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进行重要探索，分析研究基本现象和规律，探讨了不少关键性的概念，为氢弹的研制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1965年初，根据突破氢弹技术的统一部署，黄祖洽、于敏等30余人合并到九院。

同时，九院在朱光亚、彭恒武等指导下，着手制定突破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理论部在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主持下，确定了分两步走的方案。理论部副主任于敏带领一批青年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奋战二个多月，终于摸到了解决自持热核反应所需条件的关键，探索到了氢弹原理，这是氢弹研制中最关键的突破。1965年底，理论部拿出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

理论方案确定后，作为主管实验的副院长，王淦昌要考虑怎样选好实验路线。1966年初，王淦昌和实验部的同志研究制定了爆轰核模拟试验方案。通过一次接一次的冷试验，很快就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技术关键。为了测试氢弹原理的一些数据，理论设计和实验测试两方面的科技人员，共同拟定了有关试验项目。实验测试人员做了大量巧妙、有效的工作，在氢弹突破中起了重要作用。以后，王淦昌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国能赶在法国前面把氢弹研制出来，关键之处就是理论和实验紧密配合，理论设计人员与实验、加工人员团结协作。”在氢弹研制突破过程中，从热核材料的部件研制、产品设计、爆轰试验、物理测试，王淦昌都要一一过问，严格把关。他常常深入第一线，从研究室、车间到实验现场，四处奔波，亲自解决实际问题。要求大家像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那样，“严肃、认真、周到、细致”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后,1966年12月18日,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结果证明,新的理论方案既先进、又简便,切实可行。当蘑菇云升起的时候,在现场主持这次核试验的聂荣臻副总理紧紧地握住王淦昌的手说:“王院长,怎么样?”王淦昌也紧紧地握住聂帅的手,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说:“不轻松。”王淦昌深知,这次试验非常成功,是一次重大突破,但要真正把氢弹送上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那时,“文化大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不少领导干部靠边站,王淦昌要抓生产、抓实验、做好科学实验的管理工作,难度很大。氢弹的研制加工十分复杂,不仅组织管理工作十分繁重,技术上也比原子弹要求更高、更严格,因而更需要巨大的“凝聚力”。

1967年6月17日,西北大漠。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聂荣臻副总理亲临现场指挥。一架高速飞行的飞机,成功地抛出了一颗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

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振奋了国威军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争气弹”的成功研制,是党和政府正确领导、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像王淦昌这样的一大批隐姓埋名,甘当无名英雄的研制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结果。

### 三

1969年初,党中央决定在建国20周年大庆之前,进行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王淦昌先生一直是地下核试验的积极倡导者,组织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肩上。按照国家的部署,地下核试验的理论设计工作在于敏领导下很快开展起来,并及时提供了原子弹装置的理论设计没汁方案。王淦昌则在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组织实验人员、理论设计人员进行方案的讨论,测试等各项工作。

那时,“文化大革命”正热闹非常。青海基地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谁还有心思搞什么试验。面对这种情况,王淦昌心急如焚。他奔走于车间、科室和职工家中,反复宣讲地下核试验的重要意义,一个一个地动员科技人员,工人回到岗位上去,开展工作。当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高原上严重缺氧,渐渐地,他感到身体支持不住了。但想到任务那么紧,困难那么大,他不敢休息,也不愿休息,仍坚持每天到科研室、车间去。缺氧气喘,实在跑不动了,他就在办公室接上氧气办公。有时还背着氧气袋到生产第一线去。就这样,他抓试验产品,抓测试准备工作的落实,并和试验队一起去试验现场,一起钻地下坑道。地下坑道里,通风设备比较简陋,有些地方是弯道,测试间新鲜空气进不去,里面既阴暗,又潮湿,工作条件非常差。王淦昌先生坚持在洞里和大家一起安装、调试仪器设备。

1969年9月23日,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随着一声闷雷声,山峦突然剧烈地跳动起来,顿时尘土飞扬,山上的花岗石变幻着颜色,石块哗哗往下滚,轰鸣声持续好几分钟。

这次试验是成功的。但是,王淦昌、于敏等科学家高兴,又感到遗憾。由于当时对新情况下的电磁干扰认识不足,致使在试验之后,没有拿到理想的测试结果。后来在总结时,王淦昌特别提到这一点,提出以后要加强抗电磁干扰的措施。

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的地下核试验中断了一段时间,直到1975年才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1976年进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这两次试验同样是王淦昌担任现场指挥。像历次核试验那样,他一直坚持在第一线,坚持亲自检查,逐项验收。他不顾69岁的高龄,亲自爬进洞里,仔细地检查每一个实验装置的结尾准备情况,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察看,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论证、推敲,一直到他满意为止。这两次地下核试验,都注意了加强抗干扰的工作,试验都很成功。特别是第三次试验,彻底解决了抗干扰问题,测到了几百个预想的数据,获得“全面大丰收”。就这样,仅仅经过三次平洞试验,我国就顺利通过了地下核试验技术

关，为核武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王淦昌还对核武器的测试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和研究，提出了许多绝妙的“点子”，指导青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具体去做。从六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末，他一直带领着大家工作，并培养出一支思想素质好、业务能力强、能“打硬仗”的技术队伍，其中如胡仁宇、唐孝威、王乃彦等先后成为中科院院士。

1978年7月，国务院任命王淦昌为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已过古稀之年的王淦昌才离开四川回到北京，回到他阔别17年的原子能所。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为我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发展，继续呕心沥血、奋斗不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王淦昌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史册里；他崇高的科研道德风范和以身许国、死而后己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原子能院人的心中。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 一代清官高骧云

赵润东

高骧云，字逸帆，清咸丰年间举人，浙江山阴县人。咸丰年间（公元1851年—1861年），任房山县知县。他在任期间，勤政廉洁，两袖清寒，重士爱民，主张文化教育，积极治理自然灾害，政绩突出，功不可没，为邑人所念。作为一位县官，能够深入于乡间百姓之中，足迹遍布于域内穷乡僻壤、河川峻岭，而且亲自绘制“岭西诸村图”，记下较为详尽和不可多得并在当时具有较强实用价值的《房山志料·养恬斋笔记定本》，其勤奋耐苦的精神，的确应作为后人学习之楷模。

大房山，地域广阔，地貌复杂多样，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据《房山县志》记载，自西汉时期至民国年间，房良地区的蝗旱灾害连年不断，蝗螟害稼，饥荒遍野，致使众多百姓厄运难逃。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房山蝗祸，扰境过半。时任县令的高骧云面对蜂拥而来的蝗虫灾害，立即号召并组织乡民积极行动起来，采用各种办法捕杀飞蝗。他“日夜督捕，餐风宿露，忧形于色。且不惜数年官囊罄尽，出资千余，悬赏捕捉。”此时，有人散布谣言，称“蝗灾实神所为，捕之愈甚，不若向神祈祷。”高骧云闻知后，及时纠正，据理力驳：“蝗，动物也。一旦发生，扰村害民，如洪水，如猛兽，如反叛，哪有不防御扑捕，而坐听于冥冥之神的呢？”于是，更加紧了扑捕飞蝗的行动。不十日，得虫20余石。在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不惜余力，采用人工灭蝗，有效地遏止了蝗灾蔓延，使乡民的贫困生活降低到最低限度，这不能不说是高骧云勤政为官之举。

关于捕蝗之事，高骧云写道：“是时，邑西南隅东北隅先后见飞蝗，幸急捕捉获尽，不料秋间大集扰县境过半。予适患缠腰疮，不能乘骑，乃携同城寅友赴四乡督捕，而自于城西南设两厂收买，掘如屋大坑埋之。满十坑可二十万斤。飞蝗落处辄遗子，予及收买蛹子，不十日得二十余石，而未尽者纷出土，不及则刨矣。飞蝗不到处亦间有小蝗萌生，大似气化，予并力于春夏而卒。因于秋始信天灾流行，不可以人力挽回也。捕蝗法宜简便，刨蛹子，有孔穴可寻，小蝗宜随处挖坑殴而埋，之中大者跳跃善遁，宜掘长壕。捕飞蝗宜月下五更分手静捉，人多喧嚷，即惊不可得业。优价收买，联庄补扛皆善，法可相机行之，防飞蝗入境，莫如排鸟枪迎头放烟，然不易伺枪亦无多，古人乘弃炎火当烟，地势合围，用之在禾中即木使无十全也。”

从这段文字中可看出,在飞蝗侵扰灾害四起的情况下,高骧云勤于执政,积极组织人力,采用多种方法灭蝗治灾。特别是在自己腰患疮疾,且又大集堵塞交通不能赴四乡督捕的情况下,依然带领百姓并出资设厂收购蝗虫,掘壕掩埋。同时,拟出捕蝗办法,将飞蝗扼杀在萌生之中,真可谓忠于职守,尽职尽责。

有关捕蝗灭灾之事,高骧云曾作诗抒怀,翔实记述当时情景。如:

### 《捕蝗有感三首》

春麦登场候,秋禾脱颖时。  
连番膏雨足,间岁一逢之。  
可惜飞灾过,独多螭孽遗。  
搜岩终不尽,惭愧县称知。  
瘞埋五十石,起解八千斤。  
都是挖刨得,非关扑捕勤。  
倘教齐出土,势直似崩云。  
只此零星剩,独惊数十村。  
弭患几绸缪,丰登保麦秋。  
何图斯羽集,又错犬牙投。  
德簿难生孽,民劳不可休。  
惟应大风雨,一夜送东流。

### 《瘞螭叹》

生非生,纤纤螭子形未成,土生土,掩返其宅三十三。石埋双坑死非死,变化独堪作虫豸,桓沙微命亦可怜。汤火不施但深瘞,叶源源,刨挖来,正多未知遗孽独几何!更有疑蒙不可悟,谬言耨麦已翻土。叶子民,何殊舐犊心,纵匪佳儿疼不禁,祝天速灭洗洗种,毋俾遗育殃我房山民!

作为房山县令,高骧云本可以坐堂听政,呼三喝四。然而,他上任后,却一改旧衙之风,常常是单人独骑,亲自深入乡间,察访民风民情。房山虽地处京畿,但因西北多山,百姓深居简出,故村民多不读书。由于知识贫乏,且孤陋寡闻,历届地方官员又多认为当地教育应从长考虑,因此对教育的重视也就无从谈起。“高骧云则下车单人独骑驰往,察访其详,从容宣谕。”大力主张知识的传授与教育。在任期间,他踏遍了房山域内的山川和平原,记述并绘制了较为清晰完整的“岭西诸村图”,为朝理时政和治理环境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在《养恬斋笔记定本》中,他详实记述了房山西部几道山沟的地理情况:“自房山县迤迤西山行,经长沟峪南窖石堡霞云岭王家台等村,抵庄户台可一百二三十里。自庄户台西南逾白崖角大岭,顺红姑娘港至邛安又南至十渡凡三十里。自县西南七十里之张坊迤西北涉拒马河,历一渡至十渡凡四十里。自十渡赴邑西界镇上亦有二道,循河套西北行经西庄平峪及涑水之罗北角杜家村下庄上庄子石口曹南冈仍入房界。经椒江口抵镇上北道,由山路经邛安蒲洼折而西经芦子水抵上俱百余里,由庄户台西经达蒲洼至镇上亦百余里。芦子水北路通保安洲镇上西北路通蔚州并隔涑州三坡……由涑水至乾河口、张坊以至折回由北经下石堡长操,又东北至山神庙与东源会,东流经黑龙关陈家台河北磁家务,又东有漫水河村。自此出山口东南行为大石河,复南行为芦村河,下注琉璃河,入良乡界。凡行境内二百余里,其户旧传一百六十有四,今可倍之,皆农民,无士商工贾,荒山瘠土,生息无多转得安愚守拙为深山野人。”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高骧云不

辞辛苦，翻山越岭，实地考察，将所属地域的路线、距离、相连村落记述得清清楚楚。

在考察过程中，高骧云认真细致，一丝不苟，针对有关记载房山志料中出现的疏漏与错误，均一一指出，予以更正。如：“大安山在县西北八十里见畿辅通志县志谓八十里误也。山麓有村，县志谓西北一百五十里又误。大安山下有龙泉河，东南流会入漫水河，下注琉璃河。畿辅通志山川门载，琉璃河源出龙泉峪，盖取其旁会之，近源非源也。其顺天府图内琉璃河道直接宛平西境之百花山，东麓颇为得实然亦。只知东源未悉其东源也。百花山在大安山之西八十里，于诸山最高，其南偏西即房邑岭西地，其西偏南即涿州三坡地，其东五十余里过大岭即大安山地。大安山西境北境并约二十五里交宛平界，其东北七十里至宛平之沿河口营即浑河上流又有平罗营（即斋堂），在其西南皆房令监放兵饷，不由宛平知其山道更难矣。”上述文字，明确指出史籍记载中的错误，然后详细陈述该地之地理位置，邻接属地及其距离。如上述文字，在《养恬斋笔记定本》中还有多处记述。

在考察房邑地理的同时，高骧云还就境内的诸多名胜古迹进行了实地考证。如“房志古迹载玉室洞天，县西北七十里有玉室洞天，张子房辟谷处。予久访不可得，比见涿州志云，白带山在县西南七十里有玉室洞天，张良微时隐此，县志误也。按白带山即石经山，其东有白玉塘即古燕石似玉者，故有玉室之名。其地名怀玉乡则因张良故事致怀古之意云尔，洞天无实迹可考。”

“因县志误，西南为西北，殆一字之讹，又县志山川马鞍山庞涓孙臆诸洞，娥眉峪冷峪九华峪黑龙潭柳林水古迹之钓鱼台乡村之柴厂坟山沙峪关梁之黑龙关等处今皆属宛平。”高骧云治文如此严谨，并对志书上所记误谬，均予以查实纠正，为防止以讹传讹，贻害后人，做了非常细致的阐述。

高骧云坐骑老马，踏遍房邑的山川峻岭，在体察民风民情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他曾作诗咏怀，抒发胸臆。现录其部分诗作如下：

### 《惜老马》

驿有紫骝老矣，予为进山试骑甚妥，自是每出必骑不衰乘车马于予，若有缘相待者，虽以惜之。

老人驭老马，展步稳而拙。  
下阪每纾迟，上坡趋以疾。  
险夷既误途，近远亦勉力。  
老人乘坐便，呼名紫叱拔。  
独惜精气颓，庞然虚有质。  
生无汗血流，图岂八骏入。  
马老识人性，恍若对以臆。  
自糜君栈豆，臣心亦怀赤。  
君逾杖乡年，乃始学控勒：  
纵有追风材，何如贡以德。  
君又若倦勤，长途耐不得。  
臣见鞭影垂，知君欲睡瞌。  
四蹄凜履冰，不教君倾跌。  
君不察臣忠，请更试啮蹶。

《晓登房山城口号四首(之一)》

平生雅有登山兴，脚力年来已不支。  
晓上城头看山色，恍如身列大房时。  
城南平旷北苍峤，西指边关四百遥。  
闻道此邦分涿鹿，而今惟有采煤窑。  
珍奇百货拥南门，庙会今年拢百村。  
遏密八音三载久，哄人最好是梨园。  
桔槔辘轳转城隅，蓬首遽身俨画图。  
菜蕪一举葱一握，灌园人费几勤叩。

《岭西图题词》

连峰际天天欲低，山径错落行人稀。  
披图循揽恍身历，奇境特指房山西。  
房山西有十度里，山石萃确村逶迤。  
旁崖临涧数百户，耕樵事业无迁移。  
民心安静诉讼息，诤劳牒诉公庭齐。  
追呼并绝吏胥迹，岁输租税恒如期。  
深山非必远世外，浑朴乃独钟山栖。  
桃园第比境仿佛，闷高澗径欲追豨。  
鉴湖逸客古循吏，简礼从俗惟其宜。  
刍蕘毕询下情达，山川包络从周知。  
远澗反朴自有术，非侈封域图山溪。  
我诗浅薄不足道，请公点笔重标题。

《贻房山李少伯明府四则》

我馆磁家务，馆生久通籍。  
兹山喜重游，言寻旧行迹。  
行迹亦依稀，纪年越二十。  
长少各有时，浇澗或殊习。  
夏虫孰语冰，秋蝉启知雪。  
俯首令尹贤，诏我治安术。

其二

近畿盼甘澗，麦侯嗟蹉跎。

兹土半沙砾，生殖知如何。  
我行入山垄，渐渐披坡陀。  
上捻启无歉，中收粮可歌。  
颇闻指义毅，官家修仓多。  
乐输讵可比，利导惟人和。

### 其三

石灰发地宝，济彼柴薪穷。  
京华冠盖地，络绎输春终。  
我曾探窑窟。譬木穿蠹虫。  
计度动千百，屈曲通幽风。  
曳筐臂下黑，灼灼灯头红。  
专利属垄断，苦哉采煤佣。

### 其四

吾宗克恭老，丹青高有元。  
不知苍崖际，有无名迹完。  
昔观云蒙山，汨汨来温泉。  
方舆偶佚记，埋没沦荒烟。  
良才何处物，提倡惟所先。  
愿君起文教，一开山中天。

高骧云一生勤奋，任房山县知事，连续十年，善政廉洁，两袖清寒，口碑极佳。离任后告老还乡，寄居于房山乡下，后因病去世。当时，由于家境贫寒而不能葬。后来依靠县里人和亲朋故友的资助，才得以埋葬。其尸骨安葬于北尚乐村。

参考书目：

《房山县志》

《房山志料·养恬斋笔记定本》

《房山区志》

民国十七年本

清咸丰八年本

北京出版社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 王建中传略

罗英 侯国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已经成立半个世纪了。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纪念那些为筹建军乐团曾经呕心沥血的先辈们。王建中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是军乐团的创始人之一。

### 在战火中成长

王建中，1925年生于房山区石楼镇北庄村(杨驸马庄村)。小学毕业后，去北京当过学徒。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打进北京，他回到老家，看到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暴行和村民的惨状，他幼小的心灵里燃起了仇恨的火焰，埋下了矢志抗日救国的种子。

1938年，王建中经房山抗日志士姜石之(地下党员)介绍，参加了抗日游击队，那时他虚岁只有十四。在部队，他先后作过警卫员、文书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觉悟逐渐提高。1940年，年仅十六岁的王建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宋时轮将军领导的挺进军，在百花山下庄头村建立了挺进剧社，因王建中自幼喜爱文艺，组织便调他到剧社音乐队工作，不久即提升为挺进剧社音乐队副队长。他在担任副队长期间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同时还创作了大量抗日救国歌曲，在部队和群众中广泛演唱受到热烈欢迎。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挺进剧社一直跟随部队转战平西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王建中年轻力壮，不怕吃苦受累，在通过封锁线和过拒马河时，常常背着小同志和病号在枪林弹雨中前进。在残酷的反扫荡中，他与几位男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侦察敌情，为大家筹集充饥的土豆、玉米等食物，哪里艰苦哪里危险哪里就有王建中的身影。特别是在开辟根据地、瓦解敌伪军的多次政治攻势中，他每次都力争参加。他们在部队掩护下冲破重重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在炮楼林立大小据点包围之中开展政治攻势。那时曾到过北京郊区的妙峰山、百花山、镇边城等众多敌占区村庄写标语，散发传单，演出抗日救国文艺节目。同时做了大量伪军家属工作，说服伪军弃暗投明；发动群众掩护我方在敌占区工作的抗日干部；帮助群认清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战争形势，坚定抗日救国的信念。政治攻势起到了枪杆子不能代替的积极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在妙峰山庙会上的一次政治攻势。我武装部队包围住敌人的一处据点。王建中立即和十几个人组成了政治攻势宣传队，带着宣传八路军战绩和解放区人民抗日救国活动的图片在妙峰山庙会上摆开了展览阵地。同时在庙台前面演出了《王大炮回头》、《张二嫂巧计救干部》、《血泪仇》等戏剧节目。来妙峰山上香的群众把图片展览和演出场地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从图片展览中看到母亲送儿参军、妻子送郎上战场、儿童团站岗放哨捉汉奸、妇救会的女同志做军衣军鞋、看护伤病员、民兵们埋地雷、抬担架、送军粮等动人场面。王建中在介绍这些感人情景时，许多群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一个工人当时失声痛哭起来，他抽泣着说：“解放区人民和八路军为打败日本鬼子出力，我一个五尺男儿还不如解放区的老人和娃娃呢！”他把带来上香的钱交给了剧社，在场的不少群众也慷慨解囊，大家纷纷向宣传队领取传单，准备带回北京城偷偷散发。

在解放战争时期，王建中工作仍是一如既往，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有机会就和部队一起去战斗。1947年，国民党撕毁了和平谈判协议，重兵进攻解放区。我军某部从张家口、宣化撤退时，在下花园不远处，被

敌人包围了，情况非常危险。为了解救这部分被围困的同志，部队准备组织一支突击队冲进包围圈。王建中自告奋勇要与突击队一起冲进去，当时我军已经打开的一个突破口，但被敌人强大火力封锁得极其严密，通过突破口的指战员：十有八九会受伤或牺牲。当时，部队领导劝阻王建中不要和战斗部队一起去，他的态度十分坚决，一定要去支援被围困的部队。那场战斗打得十分残酷，最后我们的突击队终于带领大多数被围困的战友冲出了包围圈。战斗结束后，王建中没有立即回到剧社，也无任何关于他的音信，剧社同志们以为他牺牲了，一直在为他担心。正在焦虑等待之时，王建中笑眯眯地回来了，他幽默地对他爱人说：“给我开追悼会了吗？”却连一句如何过五关斩六将的话都没讲，他永远是一个乐天派。

剧社撤到解放区不久，王建中被晋察冀军区调到军区政治部准备另委重任。

### 新中国军乐事业的开拓者

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命政治部调干部接收国民党第三军罗历戎部队的军乐队，以鼓壮军威，活跃部队。罗浪、晨耕、王建中相继调到军区政治部，将该军乐队改建为晋察冀军区军乐队。这支仅有46件乐器的军乐队，于1948年1月正式成立。王建中任副队长，负责训练、排练等项业务的组织领导工作，驻石家庄。即使在国民党飞机猛烈轰炸石家庄的时候，军乐队的排练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10日举行了入城式。第一辆装甲车上挂着一面大红旗，其后的四辆大卡车上我军军乐队在王建中的指挥下高奏着《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大军在群众夹道欢迎中，踏着嘹亮而雄壮的军乐节奏，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北京城。

1951年，毛泽东在国庆大典上看着天安门城楼对面的军乐演奏队列忽有所感，对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天安门广场又这么大，应该成立一支千人军乐团才相称。”于是1952年7月10日全军军乐团成立了，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委员会总参谋部军乐团”，人员共有一千多。26岁的王建中就任副团长，有人给军乐团长们送了个外号，叫“音乐司令”。麾下千人他深感肩上的担子重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还从未有过全军军乐团，如何能把军乐团建设成为具有我军特色，又能体现部队军威的高水平的军乐团，他日思夜想，到处求教。他认为人才是军乐团之本，必须狠抓人才培养。所以他多次选送优秀演奏员、作曲、指挥到音乐学院学习进修，宁愿目前演出和其他工作受些影响，也要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业务人才。为了提高全团业务水平，他组织了专业水平较高的军乐团二队，通过二队的演出和训练，培养了一批独奏演员和学员队的教员，而且通过演奏难度较大的曲目，也为其他几个队提高演奏水平起到了示范作用。

只有人才没有高水平的创作曲目，同样不能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不能只演奏世界军乐名曲，必须培养自己的军乐作曲家，要创作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军乐曲目。为此，根据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欣赏特点，他组织创作出一批深受我国人民欢迎的军乐曲目。军乐团的建设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后继有人。只靠音乐学院培养的少数演奏员是远远不够的，要自力更生，利用本团的力量自己培养出接班人。总参为军乐团提供兵源时，军乐团的教员就亲自去挑选适于军乐演奏的新兵加以训练和培养。

在如何普及军乐知识方面，王建中带领军乐团做了许多尝试与创新。他曾经以相声形式由军乐队的演奏员风趣幽默地、戏剧性地将一件件军乐乐器介绍给观众，使观众对乐器名称、音色、特点有了一定了解，受到群众的欢迎。

1957年，王建中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从此，每年国庆大典，王建中这个“音乐司令”就担任全国联合军乐团总指挥，并受到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司令员的表彰。他创编的《炮兵进行曲》成为阅兵时演奏的保留曲目。

王建中在完成国家各种庆典和外事仪仗工作中，历来十分认真负责。周总理出访众多国家，随访的军乐仪仗队每次演出都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军乐团在国内的演出同样得到观众高度赞扬。可以这样说，军乐团的演奏水平享誉国内外，他们为解放军争了光，为祖国争了光。

### 赋有音乐天才的人

王建中自幼喜爱音乐，上小学时就参加过村里的铜锣会(民间花会的一种)。除按谱敲打锣、镲等乐器外，只要有唱词和伴奏的乐曲，王建中一听就会。老乡们回忆说：“他有弦儿能拉，有眼儿能吹，有词儿能唱，天生的是块搞音乐的料儿！”参加八路军之后，特别是调到文艺单位之后，他更是文艺方面的多面手。乐器几乎没有他不会的，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还学会了作曲和写歌词、写剧本等，他是一位特别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期间，王建中创作了(在天上要属太阳亮)等众多群众歌曲，在部队和群众中流唱。解放初期他创作的<农代会上唱一唱知心话>和<家家户户送军粮>两首歌曲曾荣获中央文化部和文联1949—1951年群众歌曲创作二等奖。调军乐团工作之后，他创编了(炮兵进行曲)等多部军乐曲目。五十年代曾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1955年曾带薪到天津音乐学院苏联专家授课的作曲系进修两年，苏联专家非常赞赏他的音乐才华。音乐学院许多老师和同学每当提起王建中都啧啧称赞：“聪明过人！聪明过人！”他学习中门门功课优秀，是班里的高才生。学习回来之后，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培养人才上，而并不追逐个人名利。军乐团是全国公认的军乐人才方面水平最高、人才最多的单位。王建中为我国军乐事业的发展 and 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党的好干部

王建中常说：“个人名利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只要你的一生对得起培养你的党和人民，自己问心无愧，欢乐而去就算没有白来人世一遭。”这就是王建中在战争年代，置生死于不顾的力量的源泉，这就是王建中把军乐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看得比个人名利更重要的根本。

王建中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善于听取群众不同意见。有的队员家中困难，他就把津贴支援队员，谁家有困难他都一一记在心里，尽最大力量帮助他们。他常和队员们一起打球、下棋、聊天，没有一点儿架子。1955年评定军衔时他被评为少校，有的同志对他讲：“你的级别太低了。”他笑呵呵地说：“肩章上多一个星少一个星，不都是解放军吗！”六十年代组织上给他晋升为上校，他对爱人讲：“除了肩膀扛着沉一点，责任重一点，又有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建中被“四人帮”诬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修特务”、“反动权威”。江青曾对“造反派”说：“军乐团团长王建中是个坏人”。四十一岁的王建中在饱经摧残、残酷批斗中被迫害致死。

打倒“四人帮”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为王建中平反昭雪，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解放军总政和总参领导，文化部和文联领导，许多文艺界著名专家和王建中的朋友及部队老战友数千人，都来参加追悼会，追悼会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感人至深，军乐队的战友们演奏的哀乐催人泪下。

王建中参加创建的我国军乐事业永远灿烂辉煌！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作者罗英系原文化部儿童艺术司司长

## 徐庆文事迹纪略

韩磊

徐庆文，原名杨百顺，房山区周口店镇南韩继村人，生于1922年11月，出身贫寒。他被生活所迫，12岁那年开始给地主打短工，14岁扛长活。后来不甘忍受地主的欺压，于1939年4月在平西涞水县城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晋察冀军区平西十一支队三十一大队一连当通讯员。1940年10月，在涞源和灵寿反击日军的大扫荡中，因作战勇战，荣立战功，徐庆文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徐庆文在河北省赵川镇的战斗中，被敌军的磷毒炸弹炸伤了胯部、头部、腹部和四肢，后经察哈尔军区直属医院检查，被定为二等乙级残废，留在医院疗养。

徐庆文从军十五载，参加过大小战斗百余次，7次负伤，9次立功，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并担任过营参谋长等工作。

1954年10月，徐庆文转业回到地方，主动放弃了县领导为他安排的县直机关工作，义无反顾地回到阔别了15年的南韩继村参加农业劳动。

他回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了自己的1000元复员费为缺少资金的初级社买了一头骡子、一匹马、十六头猪、五十只羊和两条马车轮胎。回乡第二年，村里准备成立小学校，却苦于没有房子，他就把土政时分给他家的五间瓦房腾出来，作为小学校的教室，赢得了乡亲们的好感与信任。1955年12月，众人一致推举他担任高级社主任。1957年10月，他又顺利当选了南韩继村党支部书记。

工作期间，徐庆文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与期望，带领乡亲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干就是几十年。打井抗旱，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使南韩继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放初期，南韩继村的粮食亩产不过百十斤。在徐庆文的带领下，到1957年全村粮食亩产达到了350斤。1960年，粮食亩产676斤，集体储粮40多万斤。1965年，粮食亩产首次突破千斤关，达到1074斤。1982年，粮食亩产2044斤，突破两千斤大关，成为京郊吨粮第一村。因农业成绩显著，徐庆文分别于1962年、1963年、1965年、1981年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1965年首次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79年再次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83年当选房山县委副书记，同年12月被房山县委授予劳动英雄称号。1965年，南韩继成为京郊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1984年1月4日，正当南韩继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徐庆文在村建的水泥厂工地上，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享年62岁，用自己的心血谱写了一曲华丽的乐章。

### 农田建设掀高潮

徐庆文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做了三件了不起的事。

第一件事：打井抗旱。从前的南韩继是有名的“旱高台”，严重缺水，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村里仅有的两眼井，天旱时，不用说浇地，就是人吃水都有困难，想改变南韩继贫穷落后的面貌，首先要治水。“旱高台”地质结构十分复杂，由于是多年河沙淤积形成，地下有流沙和卵石层，极易塌方，水线也极深，是打井的“禁区”，以前村里人在这些地方打井从来没有成功过。徐庆文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拿出当年在战场上

不怕死的精神，决心闯一闯“禁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他本着科学的态度，和大家一起，研究出一套较完善的打井方案。1957年冬，仅用20多天就打成了“早高台”上的第一眼水井。当清澈的井水被水泵抽上来的时候，全村的人就像赶庙会一样，一齐涌到井水旁，欢呼跳跃。成功的经验给足了大家信心和动力。从此，南韩继人打井一发不可收拾。从1957年到1962年这几年间，年年打井，一共打了107眼井，最深的井打到474米，解决了农田的灌溉问题，粮食产量也直线上升。

为了确保早年也能丰产高产，徐庆文又萌发了到外村打井的念头。他通过民主的方式，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最后经过科学论证，一致认为到地下水源充沛的石楼公社北庄村打井最合适。1972年秋后，征得对方同意，徐庆文带领几十人，开始在北庄村的土地上打井，为了不破坏耕地，他采取了用地下暗渠引水的方法。引水工程历时四个多月，打了三眼深水井，修筑暗渠6华里，于1973年3月顺利通水。引水工程的投入使用，形成了内水、外水一体和渠道纵横的灌溉网络，使水浇地面积达到百分之百，旱涝保丰收，南韩继从此彻底摘掉了“早高台”的帽子。打井抗旱的先进经验在京郊普遍推广。

第二件事：平整土地。由于历史原因，南韩继村的地表极不平整，分布着很多大沟和高岗，成为粮食高产的“瓶颈”。为了便于灌溉和提高粮食单产，徐庆文决定每年利用冬闲的时间平整土地。1958年农历腊月廿六这一天，徐庆文破天荒地提出了“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口号，号召大家放弃年节休息，积极投身到平整土地的活动中去。160多名男女劳动力在徐庆文的带领下，在村东的大沟两旁摆开了平整土地战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南韩继人共削平了四座高岗，垫平了十八条大沟，用工30多万个，运土320万立方，平整土地510亩，使全村土地连方成片，为粮食丰产高产铺平了道路。

第三件事：改良土壤。“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庄稼人出身的徐庆文深深懂得这些道理。

1959年的春天，徐庆文组建了一支40多人的积肥专业队，配备运输车辆。这支积肥专业队，常年坚持打青肥、沤绿肥，到社员家中和附近工厂掏运粪便。为广开肥源，他还号召社员积极参与积肥造肥。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南韩继村一千多亩农田，肥力普遍达到二、三级标准。经过改良的土壤，土质疏松，透气性好，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

### 科学种田产量高

1959年，南韩继村农田的水、土、肥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何适应新情况、充分发挥大农业生产的优越性、逐渐摸索出一套新的耕作制度，成为徐庆文研究的新课题。他把民间套种的传统经验和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在麦田里进行套种春玉米的试验，获得成功，当年就增产粮食五万多斤。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参观了南韩继村套种的农作物时，曾赞赏地说：“你们把一个太阳当两个太阳来用了，京效农村都应当学习你们”。

徐庆文除了自己学习科学技术，还培养了一支农业科技队伍，每周请专家前来讲两次课。市、县科研单位在这里常年建立农作物监测点和设立试验项目。徐庆文有时也会根据生产需要出项目，组织科技人员搞试验。南韩继村的小麦由于底肥足，春天施肥量大，小麦生长过快，曾一度后期倒伏严重，影响了产量。于是，他要求做如何适量施肥、浇水和抗倒伏的试验。通过试验，小麦抗倒伏能力增强，而且化肥施用量减少了四万多斤，节约了开支。

徐庆文历来还重视优良品种的使用和推广。1958年，他得知“小八趟”是玉米的一个高产品种，就想试种。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怕不能增产，徐庆文就先试种了44亩。同样的水肥管理，秋收时，“小八趟”的产量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品种，大家信服了。第二年，南韩继全面推广了该品种，获得了大面积增产。“丰抗”

和“京花一号”等小麦品种，也先后在南韩继被推广使用。

徐庆文不仅自己重视使用优良品种，还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建立了种子基地，为附近村子培育了大量的优良籽种。仅1983年一年，他们就向国家提供了六十万斤优良小麦品种，为京郊农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身遭磨难志不移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徐庆文因为一心维护集体利益而得罪了不少人。这部分人怀恨在心，联名向北京市委写诬告信，列举了他的所谓“十大罪状”，其中有少报耕地亩数、虚报粮食产量、集体存粮不给社员吃、贪污盗窃等等。

北京市委十分重视这件事，为了查清事情的真相，专门组织调查组前往南韩继调查，在没查清之前，徐庆文暂时停止主持日常工作。徐庆文面对诬告、审查、停职，镇定自如，无所畏惧，他坚定地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调查组进村以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逐地块丈量耕地亩数，仓库里的粮食逐斤过称，集体果树逐棵过数，财务帐本一页一页地核查，调查结果表明，徐庆文上报的数字与实际情况相符，所谓“十大罪状”纯属诬陷。

恢复工作后，徐庆文的干劲更足了，继续带领大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1965年，全村1142亩耕地，粮食总产量达到122.7万斤，平均亩产1074斤，首次突破亩产千斤大关。南韩继村在解放初期，每年要吃国家3万多斤返销粮，从1958年到1965年的8年时间里，非但不吃国家返销粮，而且平均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32万多斤。这时的南韩继，已经成为京郊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1965年3月，徐庆文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给徐庆文和南韩继带采了深重的灾难。徐庆文又被诬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罢了官，关进“牛棚”时间长达8个月，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他的家属也因此受到牵连，老伴被打成重残，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和三岁的小女儿，被活活饿死。

面对污辱、毒打、监督劳动和亲人的悲惨遭遇，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党的无限忠诚，从未动摇过。他渴望有一天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

1970年7月，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灭亡，瘫痪多日的南韩继党支部又恢复了正常活动，徐庆文又重新当选党支部书记。这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副烂摊子：粮食减产，集体收入减少，家家缺粮，户户亏款，粮食亩产由1074斤降至710斤，人均收入不足80元，百分之八十五的存款户变成亏款户，社员欠集体款8万多元、欠集体粮食6万多斤，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面对这一切，徐庆文振作精神，重建家园。他在农业生产中坚持“以农为本，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指导思想，农、林、牧、副、渔共同发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粮食产量迅速回升，以每年平均亩产递增104斤的速度增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庆文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不断学习和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1979年到1983年，南韩继继续保持了粮食亩产在京郊地区的领先地位。1982年，粮食平均亩产突破两千斤大关，达到2044斤；1983年，又创下了平均亩产2141斤的最新纪录。五年来，南韩继年年超额几倍完成国家征粮任务，向国家提供商品粮548万斤。除此之外，还向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肉、蛋、鱼、果等农副产品，丰富了首都的“菜篮子”。村里还先后建起了砂石厂、塑料厂、钉子厂和镀锌厂，增加了集体收入。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员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到1983年，人均收入已达到450元，家家盖了新房，有的还住上了两层小楼。

为了利用本地丰富的石材资源，为了壮大集体经济。1983年夏天，南韩继投资150万元，建设一座年产五万吨的水泥厂。这时的徐庆文，正在设想将来利用建成的水泥厂，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 一世英名留后人

1984年1月3日,徐庆文到正在建设的水泥厂工地了解工程进度,当晚住在工地上。1月4日凌晨,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

1月8日,徐庆文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敬献了花圈,北京市主要领导人段君毅、焦若愚、贾庭三、王宪等及他的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悼会。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同一天,中共房山县委三届九次会议作出决议:号召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向徐庆文学习。同年6月,北京市主要领导人段君毅、王宪等联合署名发表了题为《学习徐庆文同志,做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文章,号召全市党员、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向徐庆文同志学习。

1991年,中共房山区委为了永远纪念徐庆文同志,在房山城西的山脚下,树立起一座他的汉白玉雕像。

徐庆文一生对党无限忠诚,长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的农业事业,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是京郊农业战线的举旗人。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 人民教师赵松柏

任正通 卓成栋

1968年,赵松柏老师从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志愿来到当时史家营公社曹家坊中学任教,为了山区的教育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史家营公社是一个革命老区,地处房山县城西北百花山下,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六十年代以前没有公路,人们出山要步行二十多公里以外才能乘车出山,经济非常落后。当时的曹家坊中学,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共七个班,共有师生三百左右人。1970年1月开始成立了两年制的普及高中班。校址设在曹家坊村北河沟边的一座破庙里,周边的孩子上学,最远的每天来回要走二十多华里。在这穷乡僻壤的大山里,人民的优秀教师赵松柏同志,为了山区人民的教育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

事情发生在1971年3月24日。当时学校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教育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规定每周五下午最后两节课为劳动时间。在这期间,由校长和老师带领同学在学校西边建了一座小砖窑,同时又准备在学校北约一公里的河沟边开荒平整了两亩多地。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三块大石头无法搬动,需要用炸药爆破。当时在学校里,谁都没有爆破的经验。于是赵松柏老师主动带领几名身体壮实的同学,实施爆破任务。装好炸药之后,开始点火,当前两炮点燃之后,点第三炮时,因导火索质量不好,怎么也点不着。情况十分危急,赵老师只好决定放弃点燃最后一炮,带领点炮的学生史辅齐飞快地向远处跑去。由于在点燃最后一炮时耽误了时间,前两炮因导火索留得短,就在这时爆炸了。霎时,大小石块漫天飞,随之劈劈啪啪地落下来。在这危险时刻,赵松柏老师首先想到的是学生安全,他伸手扑倒了离他最近的史辅齐。炮声过后,当史辅齐爬起来时,发现赵老师再也没有起来。这时我们闻讯后都跑过来,大声呼唤着赵老师,并轮流为他

做人工呼吸。只见他双眼紧闭脸色苍白，无论怎样喊叫都没有反应。这时乡卫生院的医生也来了，经检查发现，赵老师的后背上方有一块重重的紫血印，前胸左侧心脏前的肋骨折断，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大家难以相信，赵老师就这样匆匆的离开了我们。

赵松柏老师的追悼会是在学校院子里举行的。当时参加追悼会的有公社的领导、全校的师生、赵老师的家属、还有附近村庄的群众。大家泣不成声，含泪送走了赵松柏老师。为了永久的纪念，由当时的史博涛、张宗曦二位老师发起，创作了《赵松柏之歌》来缅怀赵松柏老师的先进事绩。赵松柏老师牺牲后，被迫认为烈士，授予北京市模范教师的称号。在当时（北京日报）头版头条还以《松柏长青》为题，刊登了赵松柏老师的事迹。

赵松柏老师调到史家营教学时，是从几十里以外的汽车站下车后，步行来到学校的，山里无论教学还是生活条件都很差。因为是利用破庙改建的学校，每间教室都不一样，严格地讲，根本不具备办学的条件。操场是一片不足一百平方米的院子，桌椅板凳黑板全部是用当地的木材制成，更谈不上实验室、图书室，冬天教室是用石头垒起的炉灶取暖。由于交通不便，一年四季，都要以粗粮为主，很少吃肉，蔬菜则是当地种的萝卜、土豆。冬春季节主要靠储存的干菜。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赵老师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当时山里的学生基础特别差，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很多学生甚至家长都不重视学习，“读书无用论”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学生。在重重困难面前，赵松柏老师知难而上，通过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教育学生，长大为人民服务必须要学好知识，没有真才实学怎么能做好工作？他还经常步行几十里山路，利用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家访。冬天，教室里的土炉灶经常断火，为了不冻着学生，他每天夜晚都到教室里检查，只要发现火灭了，就立即找来劈柴把炉子升着，所以同学们总是感到教室里像家里一样温暖。在课堂上，同学们由于基础差，经常跟不上正常的教学进度，赵老师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讲解，对于实在不会的同学，就利用课余和放学后进行单独补课。很快，他所带的班级，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在假期，赵松柏放弃了回城休息，和其他老师一起组织宣传队，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到公社的各个大队进行义务宣传演出，受到了老乡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赵松柏老师牺牲已三十多年了，今天回想起来，心追手记，往事历历再现。以他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由城里进山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师们，为发展山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的言传身教，我们这一代从山里走出来的人，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子。

1990年，区教育局和史家营学区将赵松柏老师的墓地由曹家坊学校迁移到学校西侧的山梁上，并为他树立了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着赵松柏老师的生平事迹，让山区的人们，永远记住这位为了山区的教育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好老师！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作者任正通系区政协办公室老干部科科长

## 回忆三区区长方锡智

傅洪珍

《房山人民革命斗争史》是一册图文并茂的革命史料，其中有一幅四十七人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张照片的前排左起第五位，是我年轻时认识的方锡智同志。1947年的时候，他任三区(长沟地区)区长。当时我十五岁，他约四十岁年纪。斗转星移，五十年过去了，多年的往事仍记忆犹新。

当时，房山大部分地区正在轰轰烈烈进行宣传《土地法大纲》和实行“耕者有其田”及“二五”减租等土地政策。被吓坏了的当地反动派，派出“还乡团”、“黑杀团”疯狂向我村干部、民兵和进步群众进行报复。长沟地区是个“拉锯”区。尤其是四甘池一带，伪保安队常来骚扰，老百姓无法安心生活。

那时由于敌情复杂，我白天很少看见方区长。每到晚上他悄悄地进村，进村后他就积极地组织贫下中农成立“农民协会”，当时农会主席是我的父亲。

方区长常到我家来，开始只说些家常话，等我们睡着后，就把我父亲和西屋刘聪大爷爷叫走，不知上哪儿悄悄开会去了。方区长偶尔白天来一回，进门后边聊家常边给扫院子，要么就挑起水桶给挑水去了。农忙时，他还帮老百姓去锄地。有空儿就悄悄教我们唱一些革命歌曲。记得有一首男女对唱的歌词是这样的：“(男)什么样的葫芦拉好样的瓢？什么样的谷种出好样的苗？什么样的政府老百姓享福哇？什么样的政府老百姓受苦哇？”“(女)好样的葫芦拉好样的瓢，好样的谷种种出好样的苗，人民的政府老百姓享福哇，法西斯的政府老百姓受苦哇……”

方锡智区长还是位医生，到哪儿去都带着药包儿，随时随地免费给老百姓看病。有病人家过意不去想请他吃顿饭，他就不客气地说：“叫我吃饭也成，吃小米饭加大咸菜就行！”他知道，小米老咸菜谁家都有。吃完饭他就掏出两张像毛头纸油印的东西交给饭主，说这是粮食周转单和边区票，可以交给村公所，顶公粮上交。群众不肯收，他又说：“你们若不收，我以后就不到你家吃饭了。”群众只好收下。

1948年上半年，党组织开始在甘池地区公开活动。由于方锡智处处想着老百姓，所以村上人都很爱戴他，有什么话都跟他说，无拘无束。方区长除了搞秘密工作以外，同时号召人们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的《土地法大纲》和减租减息等土改政策。

1948年底，房山县城解放了。从此，方锡智区长就离开了三区。

1983年，我被安排到房山中医院上班，发现有位老中医天天拄着拐杖到医院来上班。有次他到总务室领取处方纸，我见他很面熟，就问他：“大爷，您贵姓？”“我姓方。”我心里一动：“您是当年的方区长吗？”他摘下老花镜端详起来：“你是哪里家呀？”“我是长沟乡北甘池家。”“噢。”他似乎想起什么，说：“北甘池的？付瑞、付旺、刘聪他们还健在吗？”我回答说：“付瑞还在，付旺是我爸不在了，刘聪也不在了。”“哎，真快呀，一眨眼快四十年了。我在甘池工作时，你才十多岁，我还没少吃你们的小米饭大窝头呢。”我说：“您今年高寿？”“八十多了。”“不是早该退休了吗？”“是早退了，但是有病人求到我头上，我还照样给看。”方锡智区长南征北战几十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但还是当年那股精神，还在散发着一个共产员的光和热，多么令人钦佩！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 日伪时期第一任房山县长项镇安

杨亦武

项镇安，名西藩，号镇安，河北省房山县大韩继村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十四日生。项氏于清初徙居大韩继，世代务农，光绪中，项镇安父始到北京绸缎行经商。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在前门外廊坊三条开斌记石印局。

项镇安读七年私塾，二年小学。光绪三十五年(1909)随父到北京斌记石印局做工，后到福泽银号学徒。民国元年(1912)，项镇安在斌记协父经商。民国四年(1915)，入北京警察厅任便衣稽查。民国七年(1918)，进皖系西北边防军第二混成旅当学兵，直皖大战爆发，皖系失败，项镇安在通州被遣散。于是回京到大同东一煤矿总公司任运输员，此后，又在北京财政部印刷局任庶务员。民国十三年(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项镇安投冯玉祥部，任总司令部副官处中校副官。冯玉祥“五原会师”，进军甘肃，项镇安以足疾脱离冯部返京。民国十六年(1927)，项镇安投绥远道伊刘任选，任绥远道禁烟局庶务员。刘延选改任黑龙江省民政厅长，又随刘延选到齐齐哈尔，任民政厅四科庶务员。此间，与耿秀成等在齐市开办德盛祥印刷局，德盛祥并入瑞和祥，项镇安遂成瑞和祥股东。“九一八”事变前夕，项镇安庶务员一职被裁，返回原籍。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项镇安在北京珠市口开红果行。民国二十三年(1934)，与人在天津开办洪胜德洋纸店。此时，项镇安开始在北京梁家园慎业里一号定居。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占北京。

北京城内有位经营眼镜的日本商人，名叫坂本。此人清末就在北京廊坊头条开店，经营洋纸油墨。那时，与项家开办的斌记石印局时有生意往来，因此与项镇安交往甚密。日军侵占北京不久，坂本来到梁家园慎业里项镇安寓所，对项镇安说：“现在你回不了房山，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找个好事，你就能回家了。”项镇安欣然应允。8月16日，坂本带项镇安到长辛店晋见日军某部军部顾问乔本石笑。乔本石笑将项镇安带到军左参谋北川处，北川命项镇安回房山组织维持会，北川说：“不久皇军就到房山去。”说罢，提笔在项镇安的名片上签属了日文证件。9月14日，乔本石笑亲自到梁家园慎业里项镇安家里，命项镇安提供攻取房山的引线人。项镇安说：“房山人陈月生、李君石可担此责任。”又写介绍信交给乔本，信文略谓：乔本石笑来房山，请予接洽。9月16日，进犯房山的日军突破了大石河防线，乔本石笑持项镇安之介绍信带领日军侵占房山县城。9月18日，项镇安奉乔本石笑之命，回房山县城组织维持会。9月底，房山县维持会成立，项镇安自任会长。10月，北京十四县维持总会会长江朝宗委任项镇安为伪房山县县长。

“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胡振海部得知项镇安出任伪房山县长，派蒋维平、冯子扬携同盟书潜入房山县城，与项镇安秘密接洽，劝其改弦更张，设法与活动于紫荆关一带的八路军取得联系，联盟抗日，项镇安虚与周旋，未为所动。

11月1日，胡振海率所部两千余人攻克房山县城，寻项镇安不得，终于在县署对过的张家床下搜出。项镇安抖若筛糠，士兵将项镇安拖至一家粮店，胡振海下令将项镇安就地枪毙。房山邦派组织“家里”头目邵振亭出面劝阻，项镇安方免一死。胡振海沉吟半晌，命项镇安为房山百姓当县长，项镇安不从，胡振海怒道：“你能给日本人当汉奸，不能给中国人当汉奸？”项镇安佯从。胡振海留一队人马驻守县城，率部回山。

将项镇安父及妻女带走，名曰保护，实为人质。11月4日，“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陈东来，正式委任项镇安为房山县长。

房山县城失守，驻北京日军大为震惊，11月28日下午，日军出动三千讨伐队，9架飞机，10余辆坦克，由牟田口指挥。从县南长沟，县北坨里两个方向发动进攻。当日晚，项镇安伺机逃离县城，从琉璃河乘火车返回北京，连夜向日军驻北京特务机关报告了房山情况。29日11时，日军讨伐队开进房山县城。县城内胡部驻军已于28日夜主动撤往山里。随即，胡振海派人将项镇安父及妻女送回大韩继家中。29日12时，项镇安由北京返回房山县城。

牟田口所部三千日军驻县城三日，留一个中队驻防，其余撤至良乡。此后不久，日军宣抚班招降王凤来，王凤来亲日，所部一百余人改编为伪房山县警察大队，王凤来任队长，率部进驻房山县城。

年末，东庄子地主殷耀东成立四区自卫团。

民国27年(1938)1月，项镇安将殷耀东招至房山县城，命令他必须服从日本人。

2月，日军驻房山县联络员乔本石笑成立汉奸特务组织宣武班，需要“精干、忠实的人材”，项镇安从伪县署司法警中挑选孟显章、韩德山、赵国强、袁振等6人编入宣武班。

此时，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邓华部挺进平西，包森支队到房山开辟抗日根据地。包森来到房山后，曾多次通过百姓给项镇安转去亲笔信，争取项镇安。

4月8日，乔本石笑派宣武班特务韩德山、孟显章到长沟峪刺探胡振海部情况，韩、孟到长沟峪后被胡部发觉，胡部追到西庄将二人枪毙。10日，乔本石笑与司口队长率百余名日军到西庄报复，项镇安派出10名伪警。日伪到西庄村后，烧毁民房无数，当场将村民郭振荣、冯财、赵老五杀死。撤走时将冯兰、冯敏忠等20人捕到伪房山县署，随即将其中12人枪毙。

日军侵占房山以来，自田各庄至下坡店一带的电话线经常遭破坏，项镇安派出暗探侦察数月，在田各庄起出铜线3丈余。于是派伪警察大队长王凤来带领10余名伪警到田各庄村，将村长高侯、村民肖功、高甫财等5人抓捕。项镇安亲自审讯，次日，贴出告示将高侯枪毙。

伪宣武班特务赵国强，房山北街人。此人系社会流氓，自从投靠乔本石笑，颇有势力，暗中活动要取代项镇安。项镇安不动声色，终于发现他私诈钱财，于是亲自报告日军石田队长，得到石田默许，项镇安将赵国强骗至伪县署拘捕，问实罪状后枪毙。

伪县署有司法处，生杀之权则专于乔本石笑与项镇安。日军每次出动都要捕回百姓，伪县署警特也四乡刺探捕人。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县城被处死；其中有抗日义士，有无辜百姓。或由日兵用刺刀行刑，或由伪法警执行枪决。行刑时不准百姓观看，房山城内一净街，便是要杀人了。据不完全统计，项镇安任伪房山县长的两年间，经他审讯后杀害的房山百姓近50名。

8月，项镇安成立伪房山县保安大队。王凤来的伪警察大队改编为保安第一大队，羊耳峪保卫团首苏志超率180余人亲日，改编为保安第二大队。保安第三大队长段荣梅，无人无枪。项镇安命殷耀东到河北、漫水河、大安山等20余村抽了40人，并征款购枪，第三大队成立。

此后，项镇安又强令县城附近百姓到饶乐府为日军修飞机场，强占饶乐府民田300余亩。

民国二十八年(1939)4月，房山自发武装王大牙部200余人与日军大岛部队长接洽亲日。大岛命王部开进房山县城，在小学校操场集合，听候编遣。伪涿房自卫团团长孔宪江恐王大牙亲日后威胁自己的势力，便密告大岛，谎称王大牙假投降，实与八路军约定里应外合夺取县城。大岛将大批日军布置在房山城内，四面城头架起机枪，王大牙率部一到，便被强行拉至东街祠堂后身，先行埋伏的日军即刻将该部包围。大岛命王部缴械，王部见此情形，不肯交枪。项镇安上前道：“老乡亲放心，今日要被机枪打死，我先死。如果我在，大家就不会死。”王部受骗，全行缴械。结果被日军装入火车拉去当劳工，只有王大牙跳车逃脱，投奔了八路军。

6月，山洪爆发，房山县遭水灾。伪县署成立“赈灾会”设粥厂，县城内设收容所两处。

民国二十九年(1940)4月9日，丛殿擢接任伪房山县县长。项镇安去职回北京，与张仲华在门头沟开煤矿，后因水而废。三十二年(1943)，在房山周口店与人合股开裕民煤矿。三十四年(1945)8月15日，日本投降。

民国三十五年(1946)1月7日，项镇安被控以非刑将龙骨山地质调查所工友董仲文等三人拷打至死。原告，通州人董仲元，证人龙骨山地质调查所贾兰坡。项镇安被民国政府北京市警察局收押，转送高等法院。最终因证据不足，以“协助敌伪推行县政，有利敌伪，不利本国人民”。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服刑于北京第一监狱。三十七年(1948)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困北京，监狱内囚粮短缺，项镇安被释，留居北京。

1949年2月，项镇安回房山大韩继。大韩继村召开群众斗争大会，项镇安在会上坦白任县长时的罪行，并将房地产契纸交与村政府。1950年，项镇安往来于北京、天津、张家口之间，作布匹、菜子生意。

1951年初，镇反开始。4月间，项镇安取道天津出关，5月6日抵达齐齐哈尔，避风于瑞和祥印刷文具。齐市群众发现项镇安踪迹，向当地派出所检举。11月27日晚，齐齐哈尔公安机关将项镇安逮捕，随即转押于房山县监狱。1953年，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处项镇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缓刑期满，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服刑期间，项镇安死在狱中。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 伪房山县临时参议会议长殷祖豪

许冬梅

殷祖豪，号耀东，房山县东庄子村人。殷氏为房山望族，在清代，得功名者颇不乏人。民国以后，亦多为官者。殷祖豪，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民国十年(1921)毕业于京兆第三中学，同年考入中国大学，就读一年半，因病休学。此人有大片地产，并经营富春石板公司、三圣煤矿，常年雇佣十几个持枪护院的打手。在白石口沟私立造枪厂，强迫东庄子、李各庄、河北、河南等村百姓摊款造枪，又私设公堂、欺压良善，为河套劣绅之首。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房山为日寇侵占。年底，殷祖豪受伪县长项振安之命在河套沟组织起西北维持会，殷祖豪任维持会会长。西北维持会管辖范围下至磁家务、半壁店、黄土坡等；上至班各庄、英水等共16村。维持会成立以后，又成立了四区自卫团。自卫团设一个大队，四个中队，计280余人，直接受殷祖豪调遣。

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独立师政委邓华率部挺进平西，在涑水县马水村成立房涑涿联合县政府。月底，房涑涿工委派包森率一个连到房山县开辟工作。包森部队开到长操村后，得知殷祖豪成立了伪维持会，于是包森亲自前往东庄子向殷祖豪及维持会成员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他们改变立场，投身抗日。包森对殷祖豪说：“八路军到长操是抗日救国来的，你必须把救国会组织起来。”经过包森做工作，在场的多数人接受了抗日救国主张，表示同意成立救国会。殷祖豪未公开反对，就把救国会组织起来了。包森还派出干部到东庄子村指导救国会的工作，可是殷对抗日主张阳奉阴违，并未与伪房山县政府断绝关系。同年四月，包森部队开赴冀东，殷便加紧了同日寇的勾结，并接受日寇配给的军服，正当他们准备率四区自卫团投降日寇

时,八路军五支队(赵侗部)来到房山,在长操村成立了房良联合县政府。五支队获悉殷祖豪预谋投敌后,便将四区自卫团召集到陈台村,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他们起来抗日。会间,赵侗带警卫排突然包围了会场,缴了自卫团的枪支,除少数顽固分子拒绝抗日外,多数人员接受了改编。殷祖豪被迫表示愿意抗日,便随赵侗到宛平斋堂,并委任殷祖豪为司令部参议。但是,殷祖豪始终存在着敌视共产党的心理。八月间,殷祖豪伺机逃回东庄子村。此时,八路军正在东庄子开辟工作。于是,殷祖豪躲藏在磁家务三圣煤矿。

不久,日军侵占坨里村,派汉奸王凤来将殷抓到坨里,又转到伪房山县政府,最后,转押到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日本特务对殷训话:“你要服从皇军,为皇军做事,就不杀你。如果不服从就杀你的头。”殷贪生怕死,向日屈服。日本特务又把殷派回房山,接受伪县长领导。殷祖豪回房山后,伪县长项振安说:“房山保安大队已经成立了二大队。第一大队王凤来,第二大队苏志超,第三大队已委任了殷荣梅为大队长,他的队伍还没有成立起来,你在河套沟是绅士,你回去帮着他把三大队成立起来,人枪都由地方筹办。成立好后,你就没罪了。”于是,殷祖豪回到河套沟,召集二十余村开会,抽了40人,征枪款万元,交县购制枪械。第三大队宣告成立。殷祖豪未任伪职,回东庄子经营杂货铺、煤矿,往来天津、北平经商。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投降,国民党在房山县设立县政府,委任常玉为房山县长。控制着县城和境内的少数村镇。当时房山大部分地区已成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殷祖豪等一伙地主,逃到北平。

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国民党房山县长常玉在北平花园饭店召集殷祖豪、谢景潭、段培德等10余人开会,命他们成立还乡队,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武装还乡,夺回财产。会后,殷祖豪与谢景潭等在北平大北客栈组织房山在北平的逃亡地主成立了40人的还乡队。谢景潭任还乡队大队长,带队到长辛店训练。同年五月,殷祖豪与还乡队返回房山,与国民党部队一起进攻河北一带的解放区。还乡队在花石片村将村民王某杀死。之后,反攻倒算,殷祖豪拉走了三头骡子、一头马、一头驴。

国民党为了使内战合法化,强奸民意,在各县筹建所谓临时参议会,由各省民政厅出面负责。常玉把房山县参议员名单呈送河北省民政厅后,县党部,三青团与军界的张德祥都想安排自己的人当议长,三方相持不下,闹得民政厅没法下台。殷祖豪族兄殷子固任民政厅秘书主任,见名单上有殷祖豪,便与民政厅孙振邦暗通关节,于是,孙振邦委任殷祖豪为房山县临时参议会议长。殷祖豪受任后,在房山召开筹备会议,筹备妥当,到北平向孙振邦汇报,孙振邦说:成立参议会帮助县政府消灭共产党,凡是县政府合法的开支,参议会不得阻挠。同年六月,在殷祖豪的主持下,房山县临时参议会召开成立大会。临时参议会由15人组成,议长殷祖豪,副议长黄宝涵(夏村人)、秘书王鲁卿(石楼人)、驻会委员郭普泉(五侯村人)、李静一(北半壁店人)、苏成(洪寺人),其他参议员9人。

参议会成立后,县财政用于内战的财政开支提案,都经参议会通过,参议会还协助伪政府征兵。民国三十六年(1947)五月,殷祖豪奉常玉之命,亲自主持参议会印发《劝降书》,散发到房山城乡,进行反动宣传。《劝降书》的内容大意是:国民党武器好、军队多,又有美国的帮助,必胜。共产党一定要失败。让共产党和八路军投降,投降后给事做,由参议会担保。民国三十七年(1948),常玉去职,高清继任房山县长。此时,解放军力量一天比一天壮大,县城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县财政预算必须赶快通过。十月,殷祖豪在高清的催促下,提前主持召开了临时参议会。会议结束后,殷祖豪打算返回北平的寓所。因高清挽留,没有走成。一天,高清与县党部书记、副县长马静波,保安团团团长张德祥去涿县,行至琉璃河,看到涿县的国民党军败退,涿县被解放军攻占。高清当即乘火车返回北平。马静波、张德祥回到房山县城。次日,解放军刘秉彦部队就包围了房山县城。殷祖豪陷于围困之中。

一天,他听说由城外传进解放军的《劝降书》当即找马静波,二人一同到总队部张德祥那里看《劝降书》。张、马问他对此书的看法,殷表示,事情重大,一切听从军政当局主持。马说:“国军援兵马上就到,降与不降须取决各大中小队长,因为守城需要他们,降必须他们同意。今日张团长(德祥)已经召集各队长报告了

《劝降书》之事。他们均表示战到最后决不投降。我在县政府召集了各科室人员会，大家也愿按总队长意见办。”马静波问殷祖豪有何意见，殷表示没有意见。马说：“那好极了，复信已经送出，因为时间不允许，没有对大家发表，内容就是决不投降。”

殷祖豪看孤城难守，回参议会命驻会人员随时做好突围准备。又派出人员观察县政府和守军动静。子夜两点钟左右，枪声平息了。派出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县政府官员和守军已从北门突围而去。于是，殷率参议会人员亦突出北门向北平逃去。

殷祖豪与副议长黄宝涵因年老体弱落在后边。行至卢沟桥受阻。殷便随黄宝涵逃回房山县夏村。在夏村黄宝涵家住一个多月。

北平解放后。殷祖豪回到北平郑王府夹道二号的寓所。后在和平门外西河沿183号开织布作坊谋生。解放后在镇反运动中，殷祖豪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转押房山后以反革命罪被镇压。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 苏志超其人其事

赵玉文

苏志超，原名苏振铭。清光绪二十年(1894)生，幼时酷读经史，因家境拮据、终不能果。稍长善结乡里，忠厚待人，素聪敏孝慈。至而立之年，由于事事皆有心计，所以家境便始逐富裕。到抗战前，已有煤窑几座，田亩数顷。

抗战前，苏因经济案触怒官府，入狱。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溃退南逃，监狱大墙又被日军大炮轰毁，苏便乘机逃出。

苏志超在中央军已退却、日军尚未留踞房山，而且“老便”又出没于乡野砸抢之际，便以保本村、联村为名，实际是保自己，便想成立“自卫团”。此消息一经传出，招至了当时的“三路”司令胡振海的妒忌。于是胡振海便亲领部众，于1938年初踏至羊耳峪抓捕苏志超。苏志超闻讯，全家躲出，家人倒未遭殃及，可他的家舍房屋，却被抢劫一空，然后付之一炬。

这场大火使苏志超更加坚定了加速成立“自卫团”的决心。

于是苏以拾获中央军的枪械为主，又积资买了些枪枝。至此，苏家“自卫团”便组建成了。

1938年，一大队驻守房山。

一大队是由王佐乡王凤来的“自卫团”于降日后改编的。为所谓的保卫地方，保卫房山城，日本把王凤来的“自卫团”招进了房山城，把王凤来的大队部，安设在西街路北的车家大院，与此同时，苏志超的“自卫团”也不敢违背日本的改编，便由“羊耳峪”调驻大洪寺村驻防、称“二大队”，队部设在大洪寺村东头路南一个高门洞的院内。从此、苏志超投降了日本，成了伪军大队长。

后来，王凤来的一大队调出房山城，回防王佐，王在房山的防区则由苏志超的二大队接防。自此，二大

队便驻进了房山城。大队部仍设在大洪寺。此时，苏志超的家正住在房山西街营房胡同，实际是苏志超的指挥中心。

1938年夏的一天夜里，二大队队部给苏打来一电话，称逮着一个八路军。请示苏志超如何处置！

苏志超闻讯后，立即派人赶到洪寺，将所抓的人连夜带到苏志超住处，苏给这名“八路”亲解绑绳，并安慰道：“到我家了，你不用耽心，你的安全没问题了！”苏边谈边安排吃饭。两人边吃边谈，欲问彼此，并道出各自的肺腑。八路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是组织安排独自一人前来同你会面的，没想到正被你的部下碰上(其实是有意相碰)，算是有缘。苏说：“是啊，好极了！对‘八路军’早有所闻，知道贵军是志在抗战，为民众求解放，我敬仰异常，今日相见，真是有缘呢！”

饭间一来一往，谈些时局形势。还是苏志超先提议说：“您看，什么时候把你送走”！“八路”道：“这次来准备在你这多打扰几天，再走。”苏说：“那也好，欢迎、欢迎。”就这样，这名二十六七岁的八路便住下了。

次日饭后，二人又促膝长谈。这位“八路”说：“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了八、九年，经“西安”事变，双方已携手共同抗日。”苏说：“知道，早就应该这样，不然中国会灭亡的……”“八路”道“亡！中国亡不了，有共产党在，有毛主席的领导，中国绝不会亡……”苏说：“是，是。”“八路”又说：“您看，在这民族危亡已迫在眉睫之时，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办呢！”苏说，应团结抗日中国才有出路。“八路”说：“你说得对！说得好！应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是原则，是政策，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这也是政策……”话锋一转，“你帮助日本，这是走了错路，你应旋即勒马，下定决心，回到抗日一边，回到人民一边。”苏说：“当初我成立“自卫团”是为了保家、保村、保乡，可日本非要威胁我，并把我招至房山驻防，为了一家老小，为了部下家属的安全，实在没办法。”八路”又说：“那没关系，可以事前做工作，把你的家属及你的部下的家属逐渐转入山里，然后‘举义’反正”！苏考虑良久，连说不成、不成，那太危险，这件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过了一会儿，“八路”又首先开口：“反正你既然有困难，那你能帮助“八路军”做些什么呢？”苏道：“这好说，只要能混过日本人的眼，我什么都可以做”，“那好”，到此双方要说的都已倾囊倒出，于是双方又说了些战场形势，政治形势……

这位八路军战士，就这样在苏家住了三天，做了三天工作，由于仍无大进展，所以便决意离开。一日夜由苏志超把这位“八路”亲押北山。每走一程便留下一些人，放哨断后，就这样，由苏志超，亲自送到上店鸣枪联络，于是，便在“后会有期”声中双方握手分别了！这位未留名姓的英俊的八路军代表，在上店被接回了根据地。

1938年冬，一天，部下给苏志超送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有位朋友相约在拴马庄村西南面相见。次日，苏志超率人来到了拴马庄村，在八寨子与“朋友”见面了。双方见面，虽不相识，但又象旧友相逢那样，握手后，来说：我叫包森，是应张振汉同志(萧克的部下)，也就是今年夏天曾在你家住过三天的那位同志的指派，故捎信给你，约你来此相商，现在是形势有利抗日，望你能组织反正起义，以震动敌人。苏志超虽未应允举义之事。但他保证为我根据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从此，根据地所需的盐、布、洋火、药物、粮食等各种军需物资，都经过洪寺、迎风坡、车厂等各条路线运进根据地。

后来据苏志超回忆说：自与包森相会后，仅过了不到一年，那位英俊的萧克部的政委张振汉同志，在其劝白秀亭(土匪、二路司令)参加抗日队伍的时候，被白秀亭阴谋地把张振汉同志给杀害在石亭沟了(土匪、二路司令白秀亭“五一”年镇反时被押往张坊处决)。

1939年春夏相交，苏志超的母亲新病故。苏为尽孝子之道，自然要把丧事大办一番。在“送三”后由随从非常秘密地领入一位给苏母“吊孝”的“朋友”，与苏密见。苏志超将朋友领入内室，让他的老伴把门，凡家人、宾朋皆不能入。待后半夜两人便开始了长谈。

来人叫姜时喆(江石之)、是八路军房、涞、涿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兼支队长。姜时喆深入“老友”丧

居，适时地来做争取工作。因苏曾向张振汉、包森两位领导讲过尚有母反正有困难，而今，老母已过世，当是一次争取的好机会。尽管苏志超没能如姜时喆之愿，但苏志超更加坚定了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次日晚，苏命心腹给姜化妆，送走了他。

因苏志超决心做真正的中国人，所以在同日军进犯根据地时，他总是以“勿躁稳进”为名，实则是控制部队减少与八路军接触，给八路军腾出手，全力对付日军。也有时同鬼子一起把小部分“八路军”包围起来。每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苏总是对部下讲，八路军善于声东击西，我们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与八路正面交锋，实则是命部下怠进、让路、使被围的八路军从绝处突围，以保其锐！也有时总找些理由释放从根据地俘来的抗日军民，也有时捎信给根据地，让根据地来人保走被俘人员。

后来，苏志超所辖的二大队部下与房山的两个汉奸发生纠纷并将那个汉奸严惩了一顿，在沦陷区打特务，自然是一件大事。所以，二大队的弟兄们惩治狗特务事件，被日本认为是有意欺主，这就使日本对二大队，对苏志超不信任了。于是，以苏志超为一方，以日本特务机关“新民会”和伪县长聪殿犀为一方的所谓的打“官司”便开始了，实则是日本“新民会”和聪殿犀要借机搞掉苏志超及他的二大队。对方由于出于这个目的，所以苏志超很快便成了日本的通缉对象，二大队也给改编了。自此，另一支降日的土匪，孔宪江、张德祥便开进了房山城，苏志超的家门也被警察站上了岗。从此，苏志超便一直偷居在“京津”，直到1948年解放，苏志超才被人民政府，以其投靠日本和顽伪队长罪，逮捕归案。

由于苏志超在投靠日本后，有意不与八路军交手，也未杀过八路军，也没有更多地殃及百姓，所以，苏志超在被捕后于某地劳改农场劳改时当了仓库保管员。又由于他在交待罪行的材料中有同萧克、张振汉、包森、姜时喆曾会过面，也曾给根据地运送过紧缺物资，所以未被处决，并提前释放。在文革中，苏志超不堪子孙之辱，自缢身亡，终年73岁。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李仲三被劫获始末

张玉泉

1945年12月7日，我驻守在班各庄的八路军独立团接到上级的指示：要到山外捉些舌头进山来。独立团团长杜达中听说北京有开往房山的客车，夜12点左右路过房山的小董村。团部立即决定当晚派一个连的兵力去捉。于夜11时前赶到小董村。

夜12点左右，从北京方向开过两辆大轿子车。我八路军立刻上前把车拦截到小董村内，让车上所有人集中到一农家院子里。我八路军在前一辆车中发现一盛票子的箱子，想打开看看里边盛的是什么东西。怎么也打不开。便把箱子拿到人群问“是谁的箱子？”开始没人言语，经再三追问，一个高个子，穿大褂，戴礼帽的人答话：“是我的！”他神色很不安。我八路军一排长打开箱子检查，里面全是国民党的票子。箱子内盖上的兜儿里有一枚手章。我八路军检查人员一看是李仲三的。方知道他就是国民党房山县党部书记、伪房山

县长、房良涑三县剿共联防总司令。立刻让他交枪，他说没带。对他搜身，什么武器也未搜出。原来乘着漆黑的夜色，他在进这农家院门时，把手枪丢在猪圈一旁，用土埋上了。

被我八路军截持的还有孔宪江的儿子、保姆，还有李仲三的勤务员。

在我独立团战士的押送下，两辆客车开到红煤厂停放，把李仲三等人押到南窖我县政府所在地。经一番审讯后，又送往平西专署(门头沟的煤窝村)关押。1946年初经我南窖解放区一带人民的强烈要求，把这个罪大恶极的房山国民党魁首又押回来交县政府。县政府为了满足人民的强烈要求，召开了群众大会，揭发、检举和控诉了他的罪行，最后被我义愤填膺的群众砸死。

## 二

国民党房山县党部得知李仲三被八路军俘获之后，便慌了手脚，立即采取营救措施。详见国民党房山县党部给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的报告如下：

为呈报窃我县李书记长仲三，本月初因公赴平，于十七日公毕返房途中，在县东12里大(小)董村，突遇共匪七、八百名。同行两辆汽车乘客均被裹胁而去。本县团队闻警后当即率队兜剿。进至县北十八里之坨里村与匪遭遇激战二小时，双方各有伤亡。本冀将李书记长仲三救出险。但终因日暮天黑，不敢忘(妄)战。不得已整队回县，巩固城防，以防意外，为此呈报钧部迅速筹谋有效措施(施)，俾便遵循，而维党务，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谨呈河北省党部

中国国民党河北省房山县党部

秘书：王××(印)

中华民国卅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 三

1945年年底，国民党房山县党部在本年9月至12月底的总结工作报告的第八、九两项中，均报告了营救李仲三的各种措施和办法。摘录如下：

### (八)奸匪分布及其活动之侦察：

本县境内山脉绵亘，奸匪运用天然形势掩护，其流寇式之工作，山岳地带村庄虽不可谓完全为匪之根据地，也多属在其范围。本党力量能达到之区域不过距城较近地带。有时出发清剿，匪则利用“我进彼退，我退彼进”之政策来应付。而我之剿伐工作，时感疲于奔命，但决不稍事松懈，总用尽策与之周旋。尤在李前书记长蒙难后更不遗余力，协助团队清剿，终于在去年12月22日于县南20里赵各庄村与匪演成遭遇战。是役计当场击毙七名、俘虏12名，内有抗联主任张炳星、政委王新民，均匪方重要角色。

### (九)关于营救李前书记长之经过

去年12月7日前书记长李仲三因公于途中被奸匪劫掠而去，业经呈报在案。当日虽出动大批团队前去营救，只以限于天明。当日晚李前书记长被押送班各庄伪良乡县政府。我方虽欲用武力进剿，但恐投鼠忌器，有碍于李书记长之安全，何况劳师远征，事实上又多不便。于是辗转委托当地各村人民联名具保，终至无效。泊我方捕获抗联主任张炳星、政委王新民等12名后，为目的不择手段，乃想用走马换将之法，双方互释所俘，张炳星曾有亲笔函致匪方首脑，至于能否如愿实难逆料。

## 张德祥其人

张克耕

张德祥是个嗜杀成性的反革命杀人犯，他当过土匪，日本汉奸，国民党上校团长。据不完全统计，他亲手或指使其部下残杀我县区村干部和无辜群众一百六十余人。他肆章施暴，惨绝人寰：用开水把人活活煮死；割生殖器，耳鼻；用刀把人活活刷死；火烧张坊、白岱……天网恢恢，终落法网，受到了应得的惩处。本文以切实的史料，记述了他的一生所作所为。祈望读者能对那个时代——抗日战争前后，解放战争时期，我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有所了解。缅怀先烈们创业之艰难；珍惜今日；面向世界，开创未来。

张德祥，1906年生，号瑞亭，国民党员，曾任河北省保安三十三团上校团长，人称“青头愣”、“老天爷”、“活阎王”。房山岩上村人。家贫、文盲，自幼在家务农。1921—1923年，在纸坊隗家放牛三年。1924年回家务农一年。1925年，到涿县花园村谢家扛长活。同年，跑到涿州加入国民第一军三师第五旅十三团二营五连当副兵，一年以后当正兵；之后，又给团长李洪彬当传令兵。1926年7月，随团去天津打仗，后又到南口与吴佩孚作战，到怀安县西边队伍溃散，私逃回家。回家后，种地兼营小买卖。1927年7月，在房山县七区保卫团当兵。1930年8月，请长假回家，开一个小杂货铺，兼种地，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后，中央军向南溃逃，枪支弹药遗弃遍地。日军进房山前，曾炮轰房山城，城内大狱被炸开，羁押在狱的一些打家劫舍的土匪乘机逃窜，重新拉起杆子。于是在房山、良乡、涿县、涑水一带土匪蜂起。十一月，在张的家乡一带起了便衣队，俗名“老便”。首领是段正伦（周口店人）、白秀亭、郑永。张认识其中的郑永（涿县杜村人），和他一起当过保卫团。当时张的父亲和母亲对他说：“不要出门了，闹土匪了”。张一听首领是郑永他们，就说：“不要紧的”。那时，张在村里当跑腿的。不久，这几股土匪到了石亭村。1937年12月，张和王庄褚士奎、瓦井村的张德（以后改名张德林）一起到段正伦手下当兵。当时分三个大队，周文龙是一大队，白秀亭是二大队，胡振海（外号胡嘎巴）是三大队。张在二大队，段正伦是中队长。开始是徒手，后来有枪了，张要未给。于是张就到郑永（支队长）那里当了传达，干了几个月。以后又去陈雅林（南尚乐乡北郑村人，中队长）那里当分队长。后来由于日本攻打和飞机轰炸，队伍散了。这时，涑水有一个叫张老座子（亲日分子）的，扯旗拉杆子，号称“华北抗日同盟军”。于是，房、良涿几股土匪啸聚涑水石亭，合编为一、二、三、四路，陈东来为总司令。一路司令是周文龙，二路司令是白秀亭，三路司令是胡振海，四路司令是张海。这时，张仍然当分队长。后来在龙泉村（涑水县）开会，郑永（已当上二路副司令）因与白秀亭不合，被白给枪毙了。这时，张所在的中队已编成了团，团长是孔海亭（孔宪江）。1938年，孔海亭带领本团二、三百人投附日本，驻房山、长沟，改编为涿房县境自卫团。1939年春，改为房山六、七、八区自卫团，张仍任分队长。秋后升为中队长。1940年，改编为县警备队，张仍充当中队长。此后，张带队到大次洛、天开、张坊、半壁店、长沟、河套沟（坨里—贾峪口）长操等地驻防。效忠日寇，充当日寇鹰犬。1941年，又改编为县警备队，共四个大队，张任第四中队长。在职期间，曾在日伪燕京道干部训练所受训一个月。1944年，改名为保安联队，队长是县长，副队长是孔海亭，联队副是陈雅林。之后，孔海亭调燕京道，陈雅林代理副联队长，张仍任中队长兼第二大队副，管三个中队。后来孔海亭由燕京道回县，仍任副联队长。

在此期间,张常带领伪军配合日寇,袭击、扫荡我解放区,捕杀我军民,烧我房屋,抢我牲畜财物,1943年,张在西甘池捕住我解放区工作人员苏魁,奉孔海亭之命,将其活埋于长沟村外。同年,张又将大峪沟的苏瞎子活埋于县城外。1945年,张又带领伪军到河套沟驻防,大队部设在河北村。后因情况紧张撤回县城。不久,八路军打进了县城,孔海亭受重伤死去。县长王德玉调张代理副联队长。张上任二十余日,日寇投降。

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派李仲三接收房山,任县长。不久,李被我解放军于大董村俘获,押到南窖村戏楼处决。后由宛平县长常玉来房山接替李职。同年,房山保安联队改为“晋察冀冀北分区五十四支队”,张任支队长。约一个月,又改为“房山县义勇壮丁队”,张任副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共一千零九十人。同年,张派其部下夜袭芦村,我十三名干部被包围,突围时牺牲七人。同年冬,张的第一大队长尤茂志捕住我解放区工作人员李刚送交张德祥,后被张活埋于房山西门外。

1946年,“义勇壮丁队”改名为“民众自卫队”,张任副总队长。张积极执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总方针,一面网罗汉奸、特务和地痞流氓,扩充队伍;一面进攻、蚕食解放区,肆无忌惮地乱杀无辜。1946年春,成立壮丁队时,县党部马静波和李静一说壮丁队内有八路军工作人员,张即将姜××活埋于县城;将北庄村赵××枪毙于城外。同年,张带领伪军三百多人打曹庄,捕住我县大队一班人,当即将刘福旺枪毙,其余七名带回县城。同年,张带伪军官兵三百余,向太和庄、长沟等地扫荡。在太和庄与我军发生战斗,捕住我方五、六人,返回途中,在龙门口村东,将一道士枪决;其余带回县城,不久,悉被其枪决。同年,张带领伪军三百余人,向沿村、坟庄等地扫荡,打死我军战士三人,捕住十多人。同年,张以“通八路”为名,将南河村姜××、牛沟牛万清、塔照乡队的马玉真活埋于县城外;将山里人刘××枪毙于韩村河。同年,张在坨里将我村干部陈胖子及陈家台村马××二人给枪杀了,在王庄将岩上村干部佟福利一家四口全给枪杀了,在岩上村将村干部张维贵一家三口全给枪杀了。在此期间,张曾在伪河北省保安司令部干部训练所受过训。

1947年,张亲自带领或指使他的部下,频繁袭击我解放区。不完全统计,较大规模的袭击有十三次之多。捕杀的重点是区、村干部和土改中的骨干;为了使用暗杀手段破坏土改,同年秋季,组建了“黑杀团”,共有六十多人,均身穿便衣,用短枪,夜间行动。也残杀了许,无辜群众。同年春,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冰天雪地里张强迫长沟、天开、周口店、夏村、县城、坨里、王佐等乡的民伕挖护城壕、修筑工事。并将县城东关全部和北关、西关各一部之民屋拆毁。据不完全统计,共拆民房1032间,挖壕侵占群众土地和禁止群众种地1855亩,修筑工事,强伐群众树木10058棵,强要石板8505斤;砖瓦25700块,勒索小麦二十五万斤。

同年,张令其部下陈雅林进攻我根据地张坊一带,将张坊、白岱之民房烧毁大部。

同年,张带领三百多人,向长沟、南正、半壁店一带袭击时,将我工作人员隗××捕住,毙于半壁店村外。同年,张命令他的第三大队长陈雅林带队,向石窝、石门一带袭击,在石门打死我军干部三人,并捕住邢××和王××两名干部,带回,毙于县城北。同年,张带三百余人,向孤山口、中院等村扫荡;之后,又转向西域寺扫荡,正值我区干部在该寺开会。我区干部钱宝仁等三人被捕,在向县城返回路经长沟时波杀害。同年夏,张带官兵三百多,到天开扫荡,与我独立团相遇,张以炮火打死我军三人。同年,张指使其部下袭击芦村,打死我军干部五人。同年,张指使其部下:将岩上村佟××妻枪毙于该村;在良各庄将村干部朱××枪毙于该村;在峪儿打死和尚一名;在五侯将金占侯枪毙于家中(因金劝其侄携械投八路)将岩上村干部张××、独树村干部赵××活埋于县城外;以通八路罪,在良各庄,长沟、南正、赵各庄、县城等地,杀害八人;同年,张奉伪县长常玉令,活埋两批人共十余人;同年冬,张指使其黑杀团,于一天黑夜,从顾册杀起,经石楼、大韩继、瓦井、东西周各庄、孤山口、罗家峪、四甘池、六间房,一直杀到坟庄。一夜之间杀害我区、村干部七十二人。张杀人常用酷刑,除用枪毙、活埋等方式外,还用刀割生殖器、耳、鼻、用刀把人活活刚死;用开水将我军干部马文亮活活煮死等惨绝人寰的酷刑。

1948年,伪“房山县民众自卫队”改名为“河北省保安三十三团”,张任上校团长。该团共有十二个连,

一个特务连，共一千七百多人。张仍执行宁可错杀三百，也不错放一人的杀人指示。同年，张带三百来人，向长沟、南尚乐、半壁店袭击时，将南尚乐农会主任和赵××枪毙。同年，在六间房将我工作人员刘××和郝××枪毙于该村；在城外将北尚乐杨××弄死，一人送大狱；在塔照乡枪决我八路军一名；又以通八路之名：将南正村金××枪毙于县城外；将龙门口罗均杀于岳各庄西；又将瓦井村杨贵生枪毙于大韩继。同年夏，张带四百多人，向河南、河北扫荡，与解放军独立营战斗三小时，在李各庄村北捕住我军一个班。带回坨里后，张奉县长常玉令，命其部下一营长，将所俘我军战士七、八人杀害于坨里。

同年十二月，我军将房山县城包围。我军攻城部队总指挥刘秉彦和政委刘洪涛几次向其发动劝降书。张令其部下康苳卿和劣绅王荫亭写信答复说：“房山地小兵薄，俟平津解放后，不攻即降。”十三日张接到伪河北省主席楚溪春电报：令其坚守县城，如果守不住，要尽量破坏，突围如突不出去，即自杀，尽军人之职守。是日夜里楚又来电报，令其突围，先进行破坏。于是张召集副团长及营长、副县长开会，谋划突围。夜里，张带领其部下和党部的共一千多人，从北门突围。在北门突围时，县党部书记长，副县长马静波脚被击伤。到南岗洼后，张与马静波见了面。到长辛店，马静波去了北京，张带领尚不足千人的残部，奉命去南苑。逃到大红门，张将大枪手枪一百多支藏匿于王凤岗部保安第一旅书记处，图备来日作恶之用。待逃到宛平县境高米店一带，这时北京已不准出入。张此时已走头无路，被遗弃于城外，后面是解放军大军压境。张带领其残部惶惶于两军之间。据说，此时张曾向城内破口大骂其主子不仁不义……张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然间，看见周文龙、李岗二人骑着马向他走来，先是寒暄，接着周文龙说自己现在无事，骑的马是王凤岗部队的马。后来就劝张投降。张开始不相信周的话；晚上，在大红门找到周文龙，商量投降的事。此时，张才感到山穷水尽，别无出路，无可奈何地集合队伍，在高米店向我解放军放下了武器。之后，张被带到冀中军区、华北大军区等处受训八个月。后发给遣送回家证。但张畏罪不敢回家，到北京与其妻见面后，即改名车得路去张家口。在其本家叔父张永丰家与侯振华一起营商。不久侯振华被捕，张与张永丰继续作小买卖。1950年2月29日，张在路过张家口朝阳洞派出所门前时，被我公安人员捕获。张当时说自己叫车得路，是涿县下胡良人，后由张家口公安局转送到察哈尔省公安处，张才承认自己叫张德祥。

房山县人民法院在接受公安局起诉之后，曾经多方查证，在审讯中张对上述所犯罪恶事实：也供认不讳。故于1950年7月15日，判处反革命杀人犯张德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张不服判决，上诉于河北省人民法院通县专区分院。1950年9月12日，河北省人民法院通县专区分院（令），你县反革命杀人犯张德祥经省审核准死刑上诉驳回。希即依法执行。

1950年9月22日，当将反革命杀人犯张德祥押赴刑场时，全城空巷，人们涌向街头欢声雷动，房山古城沸腾了，人们欢呼：人民政府为民除害！共产党万岁！

### 参考资料

- 1、《房山区公安局档案》
- 2、《房山人民革命斗争史》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 周文龙的一生

贲麟

1983年1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签发了(83)京公国字第2122号《关于周文龙同志的结论》的文件。其结论为:经复查,周文龙虽(曾)任伪职,但在我教育下毅然起义,参加革命行列,应按起义人员予以结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逮捕审查系属错案,应与纠正,予以昭雪,落实政策。强加在周文龙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对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等应消除影响。该结论充分表达了党和政府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此,周文龙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

### 一

周文龙,1912年(一说1914年),出生于豆庄村(现属涿县),祖籍是山西榆次县张其村。其父先在北京学徒,后开小油盐店,勉强度日。

1922年,周文龙入本村私塾,但学习不甚上进,却喜欢舞枪弄棍。1924年周父干脆不再让他读书,带他来到北平当学徒,学纳千层底布鞋。12岁的周文龙生性好动,却只好坐在这里无冬立夏地纳鞋底,冬天手冻僵了,不听使唤,常常被锥子扎得满手是血,干活稍慢一点,就会遭到东家打骂。一次,他找到父亲,希望能回家看看母亲,父亲却残暴的将他毒打一顿。从此,他再不想见到父亲,也恨透了这令人难以忍受的日子。

### 二

1926年,周母病故,安葬之后,周文龙不再回鞋铺,与好友薛德顺一起到天桥招兵处报名当了兵。

这时北平被张学良所带的奉军主力所控制,周被分配到位于通县的奉军学生教导队,几个月后完成新兵训练。1927年春天,周文龙被分配到东北军陆军第13师369团任士兵。当时正值东北军击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以后,势力扩张很快。周先是随军南下从河北一直打到河南,在河南击溃靳云鹗部,但又败于从潼关打进来的北伐军(原西北军部队)。1928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中,周文龙随东北军退到关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指导下,渐次退回关内,周文龙也被调入东北军205师手枪队,不久又当上了东北军将领黄显声的护兵。

### 三

在充当黄显声将军护兵的日子里,他耳闻目睹了东北军将领倾诉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强烈愤恨和失去家园的悲痛,以及对蒋介石乘机调他们打内战的不满,自己也常常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不久,部队有消息要南下“剿共”,许多不愿打内战的士兵和军人开始逃离军队返回东北老家去参加抗日游击队。周文龙的好友张志忠也有这个想法,正在积极筹划带枪回东北,他希望周文龙跟他一起行动,但周始终没有同意。部队向大别山地区调动命令终于下达了,蒋介石要利用东北军去剿灭在大别山区活动的由吴焕先、徐海东等

人组成的红 25 军。周文龙终于动心了，他要逃走，不再参与这个无意义的内战。然而就在此时他被逮捕了，原因是张志忠携枪逃跑未遂被抓获审问时，供出了周文龙是同谋。尽管周文龙一再声称冤枉，但有张志忠作证，周文龙仍以携枪逃跑同谋罪被判刑七年。

### 四

周文龙被判刑后关入良乡监狱。他在狱中上诉打官司，可打了三年多，未见结果。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良乡监狱内的犯人得以获释。在狱中周结识了一些义气相投的难友，其中一名叫王俊臣的难友家住良乡赵庄，让周先到自己家里暂住几日，了解一下外边的情况，再作打算。于是，他只好跟随王俊臣回到赵庄暂住。

这时，中日战场已进入十分激烈的状态。日军占领卢沟桥以后，气焰十分嚣张，其第一军第 20 师团在得到步兵第 39 旅团的补充后，开始向良乡、琉璃河一带突进。为抵抗日军侵略，国民党 26 路军在孙连仲军长的带领下，由保定迅速抵达码头、琉璃河进行布防，其所属 27 师防守琉璃河、良乡一带，其 30 师、31 师沿左翼的房山、八十亩地及坨里一线展开中日对峙，良乡也成了中日军队反复争夺的地段。

周文龙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犯我国土，毁我家园的嚣张气焰，也看到房山民众纷纷拿起武器保卫家园的决心，一股对鬼子深仇大恨的怒火在心头重新燃起。他开始联络一些狱友，组织队伍，准备与日军作战。受朋友引见，周文龙结识了家住窑上五间房的陈东来。陈东来早年在北洋军当过兵，又曾在固安县保卫团任职，有一定的军事经验，在战场上曾被日军扎伤，家中亲属也遭到过日军蹂躏。陈为报仇已经开始对零散日军的袭击，有了几杆枪，正需要周文龙和狱友们的参加。酒桌上，俩人发誓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打鬼子的战场上，决不枉来人世一生。集结队伍时，共有 28 人，自称为二十八宿。

### 五

陈、周打出抗日复仇的旗号以后，队伍迅速扩大至 200 多人，由陈东来出面向正在良乡作战的 26 路军 27 师 79 旅请缨，要求参加对日作战。经请示 27 师师长冯安邦后，这支队伍被任命为 79 旅第四游击大队，任务是对敌骚扰和破坏良乡长舍大桥等。任务完成后，队伍已增至 600 余人，这时战争形势更加险恶。日寇因在良乡、琉璃河一线久攻不破，日第一军司令部命令由战车第二大队、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迫击炮第五大队等组成第十四师团向涿州松林店方向迂回攻击，由第二军第五师团自张家口方向由北向南攻击蔚县、涞源，目的是切断位于房山一线顽强抵抗的第 26 路军的退路。为保存有生力量，受第一集团军司令指示，孙连仲带 26 路军向涞水、易县方向撤退，日军得以进入房山县城。

为避日军锋芒，陈、周亦带队伍撤到房山西南的大峪沟，将队伍改名为“抗日复仇军”。由于不断有失去家园的民众的参加，队伍迅速发展至 8000 多人，以至造成给养出现困难。于是陈召集各村开会，要求由驻地各村摊派队伍给养，需要时由他写条子通知，各村村长负责送到。但是，一些地主、大户拒绝陈的摊派，于是发生了一些大户被砸、抢、烧的现象，加上队伍的成份较为复杂，其它破坏纪律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因此被一些地主、富户和不明真相的人看作“土匪”，而老百姓多从这支队伍着装称之为“老便”。为加强队伍纪律，陈、周要求队伍在驻地做到三不准：一不准招兵买马，二不准催款要粮，三不准胡作非为。为了与河北地区民众抗日武装统一称号，队伍改称为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陈、周将队伍编为四路，分片驻防，其中，周文龙为一路司令，驻长沟，其它三路分驻张坊、娄子水和涞水，陈自任总司令。这四路队伍中，周的第一路因纪律最好，很快发展到近万人。

## 六

1937年9、10月间,日军西进的一股骑兵小队30余人闯入长沟镇。为打击日寇的侵略气焰,周文龙早已布好口袋在等着他们,等这30多名骑兵进入伏击圈后,周一声令下,万枪齐发,鬼子纷纷落马,几个未死的鬼子也很快当了刀下鬼。这次战斗取得全歼鬼子骑兵小队的大捷,光东洋马就缴获了30多匹,使“同盟军”头头都骑上了日本马,部队很是振奋,也鼓舞了房山以至周边地区民众的抗日决心。

消息传到距长沟不远的上胡良村,住在该村的共产员于振坛再也按捺不住奋起抗日的激情。在上级党组织安排下,也组织了以共产党员李合、吕志、董秀丰等人为骨干的“抗日救国军”,进行对小股日军的袭击。第一次在冯村伏击战,竟打死日军巡逻队长等七名鬼子,11月于又带队在王家桥伏击日军巡逻队,获得大批给养。但于部很快遭到日军的报复,由日军大队长板田中佐带300多鬼子,向抗日救国军袭来。于振坛带队伍向西北转移,以靠拢周文龙部队。当于的队伍进入太和庄后迅速与周取得联系,周紧急部署战斗,当场击毙板田,毙伤鬼子多名,其余狼狈逃回老窝,周再次打了胜仗。战斗胜利后,于振坛率部参加抗日同盟军一路,任第四中队中队长。不久,于在周文龙的鼓励下,只身到日军占领的涿县县城,趁守城的鬼子兵不备,将岗哨的大枪夺回驻地,被周文龙提升为自己的副参谋长。

## 七

周部的抗日行动引起很大反响。一方面,日军开始把他们当作自己在本地区作战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中共保属省委(即中共河北省委)的关注。为了争取周部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共保属省委派出了资深的中共党员张廷瑞(化名张乃东)去做周的工作。1937年末,24岁的周文龙结婚了,婚礼在房山天开举办。根据副参谋长于振坛的引见,张廷瑞到场祝贺。因周对张廷瑞的大名早有所闻,观张谈吐不凡,周表示了十分欢迎。后来张在周文龙及部下的挽留下,停留在周的司令部,被周聘任为政训处长。

1938年初,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团长陈正湘、政委于道邦带领部队来到房山周边地区。经张廷瑞同志接洽,为加强周文龙部队党的力量,陈正湘团长派出杨贯之同志带领八路军一个排来到周文龙部队,周文龙任命杨贯之为秘书。不久,另一名由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五支队派来的党员徐正冲也来到周部,经张廷瑞同志建议,徐正冲被任命为周的高级参谋。在张、杨、徐的帮助下,周文龙开始了整肃军纪及加强军事训练等工作,部队的抗日热情逐步高涨。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寇,周文龙、张廷瑞、于振坛等人亲自深入日军占领的涿县县城了解敌情。然后派出勇士付德才带领13名战士,利用农历3月18日(阳历4月18日)庙会期间化装进入县城,一举捣毁时任房良涿日军司令的对马大佐司令部,并击毙对马大佐。早已埋伏于城外的于振坛带队伍乘胜攻入涿县县城,消灭大批的日伪军,部分伪军也乘机起义。周部的胜利,震动了华北地区,北平报纸以显著字幅报道:游击队攻占涿县城两日,狠狠打击了日军侵略者。

1938年4月26日,八路军陈正湘团长在涑水石亭召开抗日同盟军首脑会议。会上达成了由陈正湘团长统一指挥的“破交打点”联合军事行动的决定。周文龙回到驻地后,根据分配的任务,积极布置对铁路、公路的破坏,致使房山以南近百里平原的铁路全线瘫痪,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日军疲于奔命,十分惊慌。

### 八

1938年夏天，在张廷瑞的安排下，周文龙带领部队的十几名干部，到八路军根据地参观学习。回来后，着手对部队进行改编，周亲自拟定部队改编方案。主要内容为：接受八路军对部队的全权领导，加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部队改编模式参照冀中吕正操部队的办法。方案拟定后，派出高级参谋徐正冲、韦亦英等带着部队序列、名单及改编方案，去晋察冀军区找聂荣臻司令员具体洽谈。同时派出部分参加部队的童子军前往涞源的杨成武部队接受军事训练。

1938年9月，正当徐正冲等人返回之际，日军的飞机对周文龙部队进行猛烈的轰炸。地上鬼子兵分两层形成拉网式进行包围，冲出包围圈的部队与鬼子拼死肉搏，于振坛、付德才等许多战将都牺牲了。周文龙、张廷瑞各带十几个人虽然冲出包围圈，但是部队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当徐正冲等人回到西域寺周文龙司令部时，见到的只是战斗结束后的悲壮场面。华北抗日同盟军第一路已不复存在，徐只得返回军区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后遂留在晋察冀军区工作（徐在石家庄离休时为正军职干部）。

冲出包围圈的周文龙随时都有被日军捕杀的危险。他在警卫的掩护下，化装逃到河北永清县小孟村躲藏起来。不久陈东来回到房山西部山区重树将旗，召集旧部，周听到消息后，连夜北上，穿过平汉线，找到陈东来，被陈任命为副司令。后来，周又进入平原地区招集被打散的部下，部队渐渐开始恢复。

### 九

刚刚恢复的部队严重缺乏辎重、弹药，这时原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派人找到陈、周，谈到他已受国民政府委派，在北平郊区组织了平东抗日挺进军，并担任司令，希望陈、周的部队能跟他合作。经陈、周的同意，马占山委任周文龙为挺进军第十六路司令，给予了弹药、辎重的援助，同时委派干部担任部队的一些领导职务。

1939年5月，陈、周到冀中找到吕正操司令员，汇报了部队恢复情况，要求在冀中军区的领导下，与八路军协同作战。经吕正操司令员同意，部队改编为人民抗日军，陈、周分任司令和副司令，马占山派来的高伯衡也担任了副司令，另一名国民党员徐弘担任了政治部主任。为了加强该部的我方力量，吕正操特地从抗日军政大学挑选了12名大学生，充任部队下属各个大队的政委和教导员。按照吕正操司令员的安排，陈、周的部队配合冀中五分区朱占魁司令员的抗日活动。由于陈、周过去管辖的势力范围很大，因此根本没有把朱占魁看在眼里，加上新来部队担任领导的国民党员高伯衡、徐弘的作祟，在与朱的配合中，常有抗拒命令及不愉快的事发生，引起了朱占魁司令员的不满和怀疑，从而造成了陈、周的人生悲剧。

### 十

1939年11月，朱占魁召集陈、周参加抗日人民军将领会议，周文龙未出席，陈东来带另一名副司令高伯衡前往朱占魁司令部参加会议。会上，朱占魁扣留了陈、高并缴了陈东来手枪队的枪械。经陈要求，陈东来对手枪队讲了话，他说：“我不回去了，你们在哪干都行，绝对不许给日本人干，都得枪口对外，我们是中国人，绝对不能中国人打中国人。”当晚，朱占魁将陈东来、高伯衡杀死后，就地掩埋了。

未参加会议的周文龙得到陈东来被扣杀的消息后，大惊失色，发现五分区部队对自己已有动作，急忙集合部队向涿县境内突围，六千多人的队伍抵达涿县望海庄时只剩残兵2000多人。这时周想到生死与共的大哥陈东来的死，不觉痛哭失声，他想找吕正操司令员问个究竟，但又担心自己也会一去不返。思来想去决定

召集会议研究今后部队去向。会上，刚刚带一营部队归并过来的总务处长王凤岗提出，由他出面去找当地日军头目小滨司令官联系，求得妥协，否则被八路军和日军两面夹击，部队十分危险。这时，周文龙同意了王凤岗的建议，从而走出了错误的一步。王凤岗表面老实，但心狠手辣，野心勃勃。他早已看透了周文龙的矛盾心里，正好以这 2000 多人的部队做为见面礼，向日军邀功请赏。经过王凤岗的暗中活动，部队被日军包围收编，日军给周的番号是房涿固新联防司令部，下属四个大队和一个特务大队。周文龙为司令，王凤岗也因收编有功被提升为副司令。

### 十一

周的思想状况被日本顾问藤野看得清二楚，为了防止周文龙有变，由小滨司令官将周文龙的一大队调房山坨里改编为矿警部队，三大队调周口店驻防，部队的实际指挥权逐步转到王凤岗的手中。王将部队逐步换血，并扩大到 3 个特务大队和 15 个伪军大队，成为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的汉奸走狗。在王凤岗和日军的共同策划下，对八路军根据进行了疯狂的扫荡，根据地进入了十分艰苦的状态，连张廷瑞等一批党的优秀的干部也战死在王凤岗的枪口下。不久，日军把周文龙调到县政府，安排了一个县参议员的闲职，又送周到北平市内闲居。

据记载：周在北平卖掉手枪，靠一些旧时朋友资助过日子。1944 年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的叶荫南找到周，让他出任保安司令部驻北平办事处的处长。后来又调他任河北省安新县县长和高、安、博、蠡四县联防主任。但周文龙在任上总是与日本人不配合，后来干脆离职返回北平。

### 十二

1945 年 8 月，日军正式宣告投降。周文龙再次萌发了要找到吕正操司令员的想法，可这时吕正操早已调离冀中。

年末，马占山将军派人来找他，约他去东北为马占山收集旧部。周抵东北后，被杜聿明部队以冒充军人罪逮捕关押于沈阳监狱，1946 年 9 月获释。出狱后的周文龙打听到吕正操司令员也已到达东北，于是他一面做小生意，一边找吕正操，终于在安东省军区找到吕。经吕的安排，周文龙来到辽宁省军区，被我辽宁省军区任命为沈、平、津、保高级情报员，负责对敌的高级将领的策反活动。

接受任务以后，周文龙首先找到马占山，被马占山任命为中将高参，不久马离职去北平。周文龙看到对马占山的策反已无机会，便回到北平。

### 十三

1948 年 9 月，周文龙在北平见到了自己的旧部姚瑞亭，姚是周的部下，曾担任人民抗日军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后来第四大队被五分区朱占魁部打散，失去联络。见面后才知道他已为中共社会部平西情报站情报员。姚根据站长闫塘的安排，(闫解放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要求周文龙串连国民党部队待机起义。周受命后到房山、涿洲、良乡、新城等地，策动了国民党保安队 2700 多人起义投诚之后，周文龙又受命进入北平，策动国民党 101 军铁甲大队副司令邹立敬起义。

为安全起见，周文龙进城后即住进邹家，经周文龙说服后，邹立敬答应按指示率部起义。周文龙将邹部答应起义的消息告诉姚瑞亭，由姚赴西山向闫塘汇报，闫塘经请示上级后答复：(1)同意邹立敬的起义计划；(2)

在邹起义时，要争取扣住王凤岗、谢大谦两个敌首（王凤岗当时任华北剿总副司令，仅次于傅作义的位置）。

正当邹立敬、周文龙按计划做好起义准备工作时，傅作义宣布，北京放弃抵抗实行和平解放，王凤岗等也连夜带家眷乘飞机逃往南京，致使起义计划未能最后实现。

### 十四

当解放军进入北平时，站在人群中的周文龙感慨万千，他庆幸自己最后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也为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根据周文龙在对敌情报方面的特殊作用，被中共北平市委安排到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做情报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周担任了北京“大众小苏打厂”、“世文消防器材厂”、“北京光学仪器厂”三个企业的董事长、经理和公私合营的副厂长，实际上是以此为掩护，为肃清王凤岗、张德祥等人留下的残匪做公安系统的情报工作。周文龙不负厚望，在完成这项任务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1956年周文龙先后调入北京市沙河铁厂和北京钢厂工作，享受行政十九级干部待遇，除在企业正常拿工资外，北京市公安局还按时发给补贴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文龙被华北工作组逮捕、审查、关入监狱。1971年周被转押山西，1972年2月14日，逝于吉县监狱，享年58岁。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 马德福、尤茂志股匪被歼记

宋 湘

1950年初，原国民党房山县县长常玉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任命为“河北省冀西区人民反共自卫军”总司令。同年3月，常偕第一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尤茂志等人潜入北京，开设一福记烟店作为联络点。同时，经尤茂志发展，马德福出任第二副总司令兼第二纵队司令。

马德福，化名马锡波、马程志，男，时年29岁，河北省涿县马踏营村人。抗日战争期间充任日伪房山县汉奸队分队长。抗战结束后又先后充任伪房山县自卫团（后改编为河北省保安第33团）中队长、大队长；1948年，伪保安第33团扩编为河北省保安3760部队（旅），马升任第8团团长。充任伪职期间，曾率部在房山、涿县、琉璃河等地杀害我革命干部8人。

尤茂志，化名尤阴堂，男，1950年时36岁。抗日战争期间充任日伪房山县汉奸队大队长。抗战结束后又先后充任伪房山县自卫团中队长、大队长；1948年任河北省保安3760部队（旅）第7团团长。任职期间，曾在房山地区屠杀我干部、群众56人。

马德福、尤茂志都是房山县伪军头子张德祥的得力干将，解放前就已是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1950年5月，常玉为总司令的反革命组织更名为“河北省人民自卫军”，尤、马仍任副总司令。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时机已经成熟，遂潜回房山加紧策划发展反革命组织，联络、收罗旧部，密谋袭夺我民兵枪支，抢劫商店、银行、供销社等，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7月,马德福指挥匪徒刘甫全、李银亭在曹章村南枪杀了房山县公安队员张国印,抢走冲锋枪1支,子弹30发。在周口店持枪抢劫石灰厂人民币1968.6万余元(旧币)及衣服、面粉等。马还策划率领匪徒抢劫坨里税务所,进攻房山城,砸开监狱,“营救”已被关押的伪军头子张德祥。

8月,马德福率10余名匪徒在房山县石楼村袭击民兵,用手榴弹炸伤1人。在房山县南河村策动民兵中队长丁福旺等叛变,袭夺村干部步枪2支,子弹104发。马还率领匪徒在涿县宋家营村武力胁迫群众,截留公粮7千余斤。同年8月,马德福股匪在房山被我公安部队歼灭;马德福只身脱逃。

9月初,马德福又伙同杨逸民去天津活动,纠集武装匪徒一百余人,潜伏于津郊,伺机暴乱。

9月23日,马德福潜入北京,在中山公园召集匪徒秘密开会,策划夺取豆店火车站公安人员枪支,当场被我公安人员逮捕。尤茂志等匪徒亦相继落网。

11月21日,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由王斐然任审判长,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提起公诉,公审了马德福、尤茂志反革命案。旁听的有中央机关、北京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司法机关代表500人。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7条规定,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以反革命罪判处马德福、尤茂志等五犯死刑,并于当日执行枪决。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 霞云岭地区一霸杨天沛

宋 湘

杨天沛,化名杨作霖,1905年生,本区霞云岭村下河人,捕前住房山城内北街仓房胡同。

### 割据一方

杨天沛出身于地主家庭。其家有土地300余亩,房40余间,是当时霞云岭一带的首富。该人幼读私塾6年,又到宛平县斋堂师范读书2年。1927年回村任村公所司账。1929年至1932年任本村村长。后在本村开设广聚杂货铺。1936年再度出任村长。

“七七”事变后,1937年10月间,中央军向南溃退,日寇在房山立足未稳,房山平原地区地方武装蜂起,后联合成立以陈东来为总司令的“抗日救国同盟军”,下分一、二、三、四路。与此同时,杨天沛与北直河村杨万芳、笛子港罗宗奎等组织霞云岭地区(原房山县九区)联庄会,又称自卫团,有武装200多人,杨万芳任团长,罗宗奎任副团长,杨天沛任参谋长。因杨天沛“财大气粗”,从此操纵了九区民团的实权。

不久,九区自卫团与蒲洼、南窖、十渡地区晋汉臣、安济云等组织的地方武装联合,控制了张坊、坨里以上的广大山区,统称“六善会”,晋汉臣任司令员,安济云任副司令员。

1938年初,冀中八路军邓(华)宋(时轮)支队开到房、涞、涿一带,驻在涞水县板城。晋汉臣曾前往联络,被授予民团独立团番号。1938年春,邓宋支队北上冀东,八路军五支队接防。晋汉臣又派人联络。八路军将晋部改编为七支队,委晋汉臣为支队长,安济云为副支队长。杨天沛、杨万芳、罗宗奎的九区民团虽

亦属于七支队，但却拥兵自重，不服指挥，独成体系，形同割据。

### “王家台惨案”的罪魁祸首

1938年6月，五支队驻大安山的一个连连长叛变，打死指导员，带40余人跑到龙门台。五支队致函杨天沛等堵截。杨天沛、罗宗奎率队于庄户台将该连全部消灭。五支队派人前来接收，给杨部留下七支步枪，将其余枪支带走，引起杨天沛的猜忌。

1938年6月，五支队在河北、陈家台、佛子庄一带将预谋叛变投降日寇的四区民团殷耀东部解除武装，进行改编。杨天沛闻讯大为恐慌。7月，涞水县紫石口发生叛变。叛军首领之一董凤海逃至九区与杨天沛联络，扬言“八路军要下地方武装枪支，扩军”。杨天沛遂预谋伺机叛变。此时，五支队司令员赵同叛逃，部队奉命南撤涞源。杨天沛、杨万芳、罗宗奎乘机煽动九区叛变。8月初，杨成武率部北上，其中一个营到达霞云岭一带，分驻霞云岭、堂上、王家台三村，营部也驻王家台。8月9日，杨天沛、杨万芳、罗宗奎勾结二路匪首邢德章，率五、六百人将王家台包围，激战两昼夜，打死八路军战士40余人，被捕20余人也被杨天沛下令枪杀、活埋。是为房山革命史上著名的“王家台惨案”。

### 混入革命队伍

1938年10月，邓宋支队由冀东返回平西，与杨成武部会合，分三路包围九区，激战数日，杨天沛部被击溃，杨天沛、杨万芳、罗宗奎被俘。

当时，为了争取扩大抗日力量，未能对这些叛匪头子进行严惩。平西六专署致函杨天沛，争取其参加抗日。杨天沛佯作允诺。1939年旧历正月十四，专署派人到王老铺村将杨接到涞涿县政府。正月二十三随杜伯华专员到涞水县三坡峨峪村专员公署任庶务主任，管理本署及各县所需物品。1939年8月，专署在涞水县六区龙安村成立办事处，杨天沛被派去任财政科长兼实业。1940年2月，专署办事处改为涞涿县政府，杨被委任为二区区长，驻涞水县木井村。1940年7月，专署在涞水县沈家庵村建立远大造纸厂，调杨天沛任经理。1940年10月10日，日寇扫荡张坊一带，将造纸厂烧毁。杨天沛于10月12日擅自离队回家。

### 制造房良“一区事变”

杨天沛回家后，立即与杨万芳、罗宗奎、杨天滋(杨天沛之弟，从平西抗大二分校病休回家)密谋向八路军“复仇”，恢复霞云岭地区(此时已属房良县一区)伪组织。杨天沛给南窖日寇据点伪军头子程子良写信，要求武装配合。又派罗宗奎率罗家兄弟20多人到南窖求援。程子良留下4人作人质，亲率伪军60多人随罗宗奎向霞云岭进发。此前，上石堡村支书于进琛曾获此情报，向区、县分送三封快信报警，但未能引起有关领导重视。

1940年11月13日拂晓，由叛徒王秉旺带路，程子良亲率伪军秘密包围了房良县一区区公所驻地庄户台。区公所工作人员仓促应战，因寡不敌众，经三小时的战斗，区长王英武、区干部景一民等11人被捕，其中，1人跳崖牺牲，王英武、景一民等6人被押至霞云岭惨遭枪杀、活埋。11月14日凌晨，杨天沛、罗宗奎等召集霞云岭地区各村村长开会。杨天沛公开宣布全地区叛变投敌，要求“各村立即将八路军工作人员捕起来，成立维持会，请‘皇军’保护。”此后至17日，仅三、四天时间里，四马台、龙门台、堂上、宝水、东关上、王老铺等村相继叛变。一区区党委委员韩景义、区长崔一春、四区区长常守德、七区区长罗化之等40余名干部，或战斗中牺牲，或被捕后惨遭杀害。罗化之于东关上村被捕后押至霞云岭。罗与杨天沛相熟，

杨却佯作不认识，至罗化之被活埋。

## 效忠日寇当汉奸

房良“一区事变”中，因杨天沛有“功”于日寇，即被委任为南窖自卫团团长，1941年2月委任为霞云岭自卫团团长。杨曾率罗宗奎等到霞云岭修筑岗楼，以为长驻霞云岭之计，后被八路军打垮，不得不退据于南窖，不时向霞云岭地区进犯。曾率队进攻霞云岭，打伤一区史区长，大肆抢掠民财。

1941年11月20日，杨天沛率队到上石堡村抓捕村长于进声、农会主任李富贵、民兵指导员王兴云(王嘎子)、青年主任解景声，带回南窖杀害。同时烧毁解景声房屋，强令解父交出罚款130元。

1941年11月，日伪房山县警备队团长、汉奸头子孔宪江将各区民团改编为县警备队。杨天沛任命为一中队分队长，驻南窖、大安山、河北等地。尤茂志升任警备队第一大队长后，任杨天沛为大队部中尉副官；杨天沛全家也迁入房山城内北街仓房胡同。

## 摇身一变成伪警

日寇投降后，杨天沛摇身一变成国民党房山县警察局第二警察所(驻坨里)所长。

1946年5月，杨率队在坨里抓捕枪杀良乡县政府秘书安济民、县干部马向森、磁家务村村长郭芳。

1947年4月，杨率队到磁家务村进行反动宣传，从该村搜出一孙姓村干部，当场枪杀。

1946年10月，杨天沛加入国民党，任第五区分部委员。直接领导坨里警所和坨里乡公所两个小组。

1948年3月，杨天沛调任伪房山县警察局督察员。

1948年12月14日凌晨，解放军冀中七纵二十旅攻克房山城。杨天沛率伪警数十人从北门仓惶逃跑，企图窜入良乡。但当时良乡城已解放。杨天沛见后有追兵，前有堵击，于大苑村北被俘。

## 可耻的下场

杨天沛被俘后化名杨作霖，被送至河北省雄县冀中军区伪军官兵训练队受训两个月。释放后回到房山城内北街家中，仍以化名到公安机关报上户口。三日后房山县公安局察觉其系杨天沛，遂于1949年2月28日将其逮捕。经预审，4月30日向房山县人民政府提出起诉。5月8日，房山县人民政府司法处以刑字第3号判决，认定杨天沛犯“叛变祸首，汉奸战犯”。罪，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宣判后，杨犯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6月13日，被察哈尔省(当时房山县属察省平西专区)人民法院平西分院驳回上诉。杨犯仍不服，再提出上诉。1950年3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以50年度刑上字第109号终审刑事判决书判定“上诉驳回，原判决判处杨天沛死刑应予维持”。

1950年3月31日，房山县人民政府在房山城内城隍庙戏楼召开宣判大会。是日，房山城内万人空巷，群情激愤，欢欣鼓舞，奔走相庆。当宣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将杨天沛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会场上掌声雷动，“拥护人民法院判决”“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声响彻上空。会后，将杨天沛押赴西门外沙滩上，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这个曾不可一世的恶霸、叛徒、汉奸的一生。当日，房山县人民政府在城内十字街前的揭示牌上张贴了“法字第1号”布告。这是房山城解放后人民政府判处的第一名死刑犯，同时也揭开了房山县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

## 王兰亭罪行录

张玉泉

王兰亭，字王彬，乳名梅龙，男，1915年生于房山区长沟镇沿村一个地主家庭。解放前有土地百余亩，水碾两座，砖土房20余间。王，8岁上本村小学，16岁、在北平志成学校念初中。毕业后跟祖父学医、看阴阳宅。1934年考入南苑国民党29军军官团。受训3个月于1935年初派往冀北边区伪保安司令部一旅三团一营任连长。1936年4月升任三营营长，归26军孙连仲部指挥。1937年卢沟桥事变，因部队被打散，王呆在家里。同年10月参加抗日同盟军任副官，第二年任第三大队大队长。1939年正月与冀中八路军合并改编，受李仲桃指挥，同年4月被日寇打垮。7月混入我军，投到邓华部下，当上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因恶习不改，此间因勒索抢劫房山石门一带的群众造成不良影响而被撤职，调往涿县山南随营学校，受训三星期。出校后派往第九团任游击队队长。

1940年7月间王兰亭带着40多名队员、全副武装叛变，跑到涿县。一头扎到日寇的怀里，当上涿州日本工作队队长，即：房、良、涿三县日本宪兵特务队长。直到1944年4月改编为保安队，在唐山制铁所任矿警队队副。1945年3月调回，任讨伐队队长。

日本投降后，王兰亭即化名王海龙以经商的名义潜伏到西安，秘密接受国民党的任务，1947年回到北京，在张家口、天津等地“经商”。1949年6月26日被我地下公安人员在京捕获。1950年9月21日专区法院下达判处死刑的命令，被我处决。

王兰亭在日寇统治时期，充任铁杆汉奸，依仗日寇势力，在房、良、涿一带任意横行霸道，鱼肉乡里、大肆敲诈抢劫，奸淫良家妇女，惨杀我党干部、群众，摧毁我地下组织。在押期间企图杀我看守，越狱潜逃，被我重新捉回。其罪行主要表现在：

### 杀害干部群众

王兰亭自1940年7月至1945年8月间，为了献媚取宠日寇，提出每日向日寇交两个八路军的口号，逮不着八路军就拿群众顶替。因此，他经常出动向我区、乡村的干部、群众发动突然袭击。据不完全统计，五年中他杀害干部、群众百余人，仅在新区的几个村他亲手杀掉21人。

1941年4月，王在涿县兰营村，打死我一名八路军战士。同年9月王兰亭在涿县高村村外一块白薯地将正在干活的村民陈广才无故逮捕，带回涿州交给日寇，被活活刺死。10月在涞水县龙安镇把卖粮食的村民赵和宽、荣小五等四人带到涿县高村，以私通共匪，用刀挑死。同月，又以同样手段将房山大峪沟的村民周德九等人带到涿县杀害。

1942年春，在长沟纸店把我地下采购员周景秀逮捕，带回涿州刑讯逼供。周避口不语，先用凉水灌后又用尿灌，把周灌死。同时将我三区（房山）助理员崔敬贤（惠南庄村人）以同样手段杀死。同年6月把我辛庄小学教师、地下党员崔警民逮捕，施以毒刑。崔宁死不屈，王兰亭用竹签钉进崔的双眼，将其活活折磨死。同月，把我蔡庄、史各庄等村七名村干部逮捕，用木笼圈起来，用火烧、灌凉水等刑，索要钱财不计其数。交钱财少者交给日本挑死。同年冬，将我区干部崔凤廷等三人逮捕，逼迫交待我方情况，不语，便把肚子灌

满冷水，再用力猛蹬，将其整得半死，又喂了洋狗。

1943年2月。在房山广禄庄坡后打伤两名八路军战士，被王兰亭捉住，用木棍穿透肚子，抬到日本宪兵队领功受奖。

1944年7月，将房山辛庄村青年农民何玉恒、崔士志，石窝的邢祖珍、刘悦逮捕，在送往涿县途中被其挑死。同年8月22日将南尚乐乡南白岱的宋廷贤拉出村外枪杀。同年10月。打死我八路军战士10名。同时把我三区区委委员常守文杀害。还有南正村村民侯仲勋，公开身份为日伪半壁店乡乡长，实为“两面政权”人物，白天应付敌伪，夜里向我根据地运送物资，输送情报。后被王兰亭捉走，关押在宪兵队，受尽迫害，以后取保就医，回家即逝去。

### 勒索民财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五年中王兰亭以各种残暴手段勒索民财达137390元，物品无计。

1940年8月4日深夜，王兰亭闯入房山南白岱村宋廷荣、赵瑞文等四人家中，把他们捆绑到涿州，索款1300多元。

1941年8月1日，闯入房山广润庄村把李福合、许德才等五人抓起来，敲诈现金2500元；8月13日，又把北白岱村周富抓起来，要款700元。同夜又把西白岱村干部赵洪瑞、王兆槐等三人捕去，索款650元。同年12月，把惠南庄村我涞水县干部朱光亚带走，索款20元。

1942年2月4日把房山下滩村村干部抓走，索小米15石、大洋700元。

1943年正月，抢劫房山广禄庄吕在的棉花50斤，口袋50条。同年6月13日逮走南白岱村宋有臣、王宪章等4人，诈款840元。强迫蔡庄村买机关枪一挺。

1944年6月，把下滩村刘永清抓走，强迫交玉米15石。同时抓走郑家磨村高进文等人强迫交小麦15石。同年11月，把房山石窝村刘太，石门村王德存等7人抓起采严刑拷打，令其交出小米40石，将人赎回。同年秋，王兰亭和弟弟同时结婚，强迫本村及附近村民送猪羊，送帐子，出大份子。同年到长沟附近各村要砖、瓦、灰、沙、石料，要几十辆马车、百余人给他家修建祖坟。年底，又将张坊村施永生、南尚乐村赵顺抓起来强迫交款交粮，他们不答应，便施以酷刑灌凉水、压杠子、过电，逼着他们交出小麦7石，海带700斤，碱、糖300多斤。

### 大抓劳工

王兰亭为了效忠日寇，肆意大抓老百姓送到日本当劳工。光1944年就先后出动兵力四次，捕捉青年农民，每次抓走二、三百人，他亲自下手抓了30余次，共捉80多人。他每抓一个劳工交给北朝队长后，给他300元，再由北朝运往“北京劳工协会”，然后运往塘沽上船。王兰亭在一年中就抓了2000多人，获利60多万元。

1944年11月1日夜，王闯入石窝村，以捉八路军为名将刘太、刘秀明等9人逮走，圈进涿州监狱。11月2日又闯进王庄村，让村干部每天交两个八路军，不交就烧房。当日就逮走22个青年。11月9日在房山的前石门、高庄、下营、良各庄等村抓走40多青年。当年11月11日到张坊一带抓走何茂顺、佟殿甲等六人送到日寇手里，其中有4人死在日本北海道煤矿。当年12月初。在王庄村抓走王恒，被打得遍体鳞伤，送到塘沽轮船上，因病扔进大海。

### 霸占民女

王兰亭不仅惨杀百姓，勒索民财，还肆意蹂躏妇女。他霸占良家妇女多人，仅知者就有5名。他霸占的第一位为上坡人姓贾，第二位孤山口村人姓徐，他霸占第三位为张坊王××的孙女，第四位为固安县宫村的一青年寡妇，第五位为洪寺村韩姓，年仅17岁。王兰亭霸占姓韩少女时全家人反抗，不料一家老少都被抓起来，圈在涿县宪兵队，该少女被迫与王成婚，不久就跑了。

王兰亭每次出去扫荡只要发现漂亮的民女就强行抓到他地与他结婚(奸污)，达到玩弄女性的目的才肯罢休。1942年春，王兰亭去房山王庄村勒索民财时，发现王××的妹妹长得很好看，便不顾一家老少的求饶，强行把她带走“结婚”，该女被糟蹋后，深夜乘机逃跑。同年又在涿州城内霸占了朱××17岁的孙女，婚后几日便逃跑，全家离乡背景躲到外地。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发出能通令：捉拿王兰亭。王在涿县、房山、长沟等地财产庄院、林木、土地、房屋等，县府责令长沟警察所所长王省三去全部查封。一批粮食、浮财变卖，买了枪支弹药，武装县保安队。

王兰亭化名王海龙潜逃，至1949年6月被我公安人员抓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江石之 1950年2月24日给杜恩霖、杨清波的信：

恩霖、清波同志：

田焕章来张市，知我县已扣起白秀亭和王兰亭，引起我前仇旧恨，特提出我个人意见。

王兰亭于1938年后期曾入我军当队长。三九年当我房涿涿支队长时，王因勒索抢劫石门一带老乡，被我撤职押起来，原应枪决，被萧克司令员(挺进军)给我命令，押他三月开除军籍。以后王某即投了涿县敌人当特务队长，是房涿涿一带最著名最厉害的坚决汉奸，不知毁灭了多少人民和我们的干部。我平西领导机关对王恨之入骨，罪不容诛，现在既然捉获，应该按汉奸处罪，召集人民代表，实行枪决。

白秀亭原为抗战后之土匪头子(同盟军二路司令)，于38年秋投靠鹿钟麟。39年初，我奉命争取他(他和我高小同学、盟兄弟)。他表面上跟了我们，实际上与国民党(当时可能还是鹿钟麟)并未断绝连(联)系。我当时是他们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当39年6月，我去胡振海(同盟军三路，只表面上投了我们)部时，被胡将我扣押。当时国民党的命令是枪毙我，而胡慎重了一直未下手(原因是怕我军报复他)。后于日寇进攻胡部时，我才借机脱了险。此次扣我，后来我才知道是一国民党要员先到白秀亭部，然后秘密到胡部的，白瞒着我，可能与胡有密议，要胡杀我。不然为什么当我被胡一扣下而白秀亭却下了我留在白部的小鬼的枪呢!此事有关密计谋害我军代表，应予追问。详细情况我已和田同志谈了。可问他一下。至于对白如何处理，我暂不提意见。

以上意见供你们参考：

敬礼！

江石之

(1950年)二月二十四日

注：①杜恩霖为当时房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②杨清波为当时房山县公安局长兼检察长

③江石之原名为姜时喆，当时在张家口市人民政府任秘书长。

④田焕章，为当时房山县公安局刑警队队长。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 刘振山与“天下第一团”

张玉泉

民国初期，房山有个闻名京郊的草寇，名叫刘振山，乳名刘小老虎，原房山县周口店乡车厂村人，1898年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上过两年私塾，以后随父走窑。不久又流入社会，组织人马，盗棺掘墓。1932年被杀。

### 游荡

刘振山家境贫寒，幼年靠父亲走窑背煤维持母、兄一家四口人生计。刘在长育小学读了两年私塾便辍学，呆在家里吃闲饭。十五、六岁时父亲把他带进窑里拉煤，他因个子矮小，缺乏力气，撅着屁股拉煤筐，一走一晃。因卖不了苦力，便干干停停。父亲便训他不正经干活，性情粗暴的刘小老虎一赌气就不干了。因家境贫困，不干又没有饭吃，只好出走，闯荡社会去“挣”饭吃。开始了偷摸、绑票、劫道以至后来的结伙盗棺掘墓的生涯。

### 投师

他独自到外地行抢、劫道，常常因身单力薄干不成而丧气。有一次他去河北新城县抢劫，结识了一个叫姚老疙瘩的人。刘小老虎想与他搭伙，姚没有马上答应。决定考验考验他再说。第二天晚上，姚老疙瘩给他布置个任务，让他到新城县县城北门口把国民党县大队岗哨的大枪夺过来。别看刘小老虎个子小，胆子特别大，还会点儿武功。他满口答应下来。当晚从姚老疙瘩手上接过一只手枪插在腰里，披上个破棉袄，趁着浓浓的夜色，向新城北门走去。

“干什么的？”城门岗楼下的哨兵警惕地问。

“走道儿的！”刘小老虎轻松地回答。

“你上哪儿？”

“进城去看有病的姥姥”，他边说边往近走。

当他走近岗哨时，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地说：“兄弟辛苦了”，便擦身而过，他回头见岗哨毫无反映。便掏出手枪对准岗哨的后脑勺，说：“放下武器，交枪不杀！”那岗哨被吓得连忙把枪扔在地上，刘小老虎迅速拣起枪，说：“你领我上岗楼把枪都敛出来，不许声张，不然要你的命。”那岗哨哆哩哆索地把他领进城楼上。两哨兵正睡觉。他便把挂在墙上的枪摘下来，递给了刘振山。刘背上大枪连忙赶回老疙瘩的驻地。这才发现姚给的手枪，根本打不响。

从此，姚老疙瘩把刘小老虎正式留在身边。他们混了一段时间，刘小老虎觉得没有任何权力，得不到甜头，就分手了。

### 举旗

刘振山回到家乡，便开始举旗拉竿子，他到处收兵买马，网罗社会上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很快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最后发展到近百人的队伍，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天下第一团”五个大字，口号是：“天下第一团，人人该我钱，只许我不要，不许你不还。”

人马最多时发展到200人，分别驻扎在长辛店、大灰厂和本村，经常四处流动。这伙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盗坟掘墓获取珠宝玉器卖和抢劫富人的钱财为主要的费用来源。他们与北京的珠宝玉器商及军火商有密切的往来，挖得金银财宝和玉器销售后，购来武器、弹药及其它装备用骆驼队或马车运送回来。

他们主张“兔子不吃窝边草，”规定驻地30里地以内不准做案，如有发现立即处之。南窖一带百姓常常下山路过车厂村到平原、县城赶集上店以货易货。起初曾遭到刘部下的抢劫，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每到集日他派兵巡逻，以防万一。起初他们纪律比较严明，注意尊重当地百姓。

他们武器精良，一般都是长短武器配备，还不断组织军事训练。常常到车厂村金陵遗址一带练兵，夜里点上香，瞄准射击。他们三天两头把队伍拉出去主要任务是掘墓或抢劫，每到太阳快落山时扛上武器背上炸药出发，据说北京周围的一些坟墓，还有京东北京西南的清东陵、西陵，都留下了他们的劣迹。挖不开就用炸药炸，当时看坟的根本抵挡不了。如有一次去盗崇各庄的一座清王爷墓，棺木为大理石砌成的拱形地穴，并吊起来，棺下是天井，刘小老虎盗墓队清早开进村，把村内出入口各户门口都站上岗，把看坟的捆起来，便开始爆破，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把墓打开了，盗走了全部陪葬品。

### 围剿

刘小老虎还常活动在京津以南，保定以北的新城、定县、仓州一带。一次，他来到新城县一富户家，两层深宅大院里叫开了门。见到女主人就问：“你家老头儿呢？快给我们拿盒子来。”女主人以为他要盒子吃（中间有馅儿的饼）便说：“你们请坐下来，稍等，我给你们去做。”“做什么，我们自己找。”说着就满屋子翻起来，是值钱的就拿走了。

刘振山的天下第一团抢劫、绑票越干胆子越大。一次，他带着全副武装的便衣开进房山县城。守城门的国民党保安队听说天下第一团的刘团长来了，赶快开城门躲开，从南门进到北门出一条南北大街无一人敢惹，他们的胆子就越发大起来。最后一次进房山城，竟敢给县衙下通牒，让县政府限期给筹集一批粮食、军火，还有一大笔款子送到车厂团部，若有违抗，将打进县城，消灭保安队，再拿下县长的头。这就直接动摇了国民党的基层统治，直接威胁了当地统治者的安全，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房山县政府经请示北平派一个营的兵力围剿。在一天夜里分三路，分别从长沟峪，坟山和南窖向车厂方向袭击。由于刘小老虎事先从南窖得到了消息，早已有防备。没等国民党保安队进攻，就都逃之夭夭了。这样先后包剿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抓到一兵一卒。刘小老虎用划整为零，划零为整的办法对付国民党保安队。平日四散在乡间村野，一有情况就集中起来，有利时就打一阵儿，不利时就跑得四散了。因此，保存了实力。

### 败落

在刘振山的天下第一团正红火的时候，附近有个叫邢福的人，曾在京东一带当过土匪头头。跟刘小老虎从小就熟悉，通过接触，邢福把几个残匪拉过来编入了天下第一团。这部分人严重破坏了原来的规矩。在当

地绑票、抢劫、强奸妇女、欺压百姓。遭到当地人民的辱骂和反抗。此时，刘振山已经管不了他们，第一团的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刘振山逐步甩掉了邢福等人。

后来，刘振山又接触了活动在良乡一带的土匪头子，号称能钻天入地的石猴子。此人武艺高强，能窜房跃脊。他家住在北京天桥一带，有个娇妻是妓女，名叫小猴精的。刘小老虎与石猴子频繁往来，倒卖珠宝玉器，经常出入他家。与其妻小猴精勾搭成奸，刘小老虎盗来的珍宝常藏在她家，并通过她转手倒卖给珠宝玉器店，小猴精从中渔利。

有一次，刘小老虎盗墓回来，路上劫持一位少女，带回车厂村北皇陵附近正在蹂躏，只听从山口外传来“啪——啪——”的枪声。放哨的气喘吁吁地向他报告：“冯大个子来了！”刘小老虎丢下绑在树上的姑娘，慌慌张张地钻进西边的密林里。

冯大个子就是冯玉祥。他早知京西有个刘小老虎组织个天下第一团，经常抢劫盗墓的劣迹。他率队进了车厂村北，解开了姑娘，进山追击一下，只逮了几个年老体弱的。通过俘虏的口供和当地老百姓的反映，冯元帅掌握了刘小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以及和他密切往来的珠宝、玉器商人。

当日傍晚，夕阳西下，冯玉祥从山中走出，走到主龙山的山腰中，发现一皇陵遗址有个巨大的洞穴，冯元帅想起有人报告过，不久前刘小老虎曾从这个皇陵中盗走一件珍宝，即一只长鼻子金象，背上还有个粉色的莲花托儿。他决心找到它的下落，除掉这个盗窃和挥霍国家财宝的恶棍！

冯元帅在车厂附近驻了两天，便挥师回京，到了京城，立即派人到几个古董店，高价收购兽形金银古董。从一个古董商口中得知，附近八胡同住有一个妓女叫小猴精的，她有一只金象半尺多长，背上还有粉红宝石雕的莲花托儿。原来这是刘小老虎窝藏赃货的黑窝子。

经过秘密侦查，刘小老虎正住在这里。四天前冯元帅追击他时，他早跑到北京躲到小猴精家里享清福来了。当夜便把他掏了出来。第三天，把刘小老虎拉到天桥示众，不久便砍掉了脑袋，时年 32 岁。

刘小老虎的“天下第一团”从此也散了伙。

（《房山文史资料》第 8 辑）

## 黄侃其人

苏秉刚

黄侃，别名苏仁泉，男(1907年生)河北省良乡县东石羊村人。

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七月加入中国国民党。父黄葆辰，母黄苏氏。黄侃有兄弟七人。

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一月曾任初级小学教师。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上半年在河北省良乡县国民党县党部任助理员(办旬刊)，同年七月因考入大成中学离职，民国二十三年毕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七月自大成中学毕业后，至抗战前曾历任沧县充任县府合作社指导员，北平华洋义赈会合作社调查员。

抗日战争时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六月在冀察游击战区总司政治部充任宣传助理干事，在津密驻河北省主席代表邢国光处，充任军、政联络员，充任地下县长秘书，1943年初又任国民党良乡县党部书记长。

1947 曾兼任国民党良乡县自卫队副总队长。充任良乡县参议会副议长。

1948 年五月经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调派在省党部组训组服务，担任整理国民党新党员登记表责任。1949 年 7 月 13 日至 1950 年在兰州省政府充当电报局检电员。

1950 年二月经公安部移送察哈尔省公安厅起诉河北省良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五日以反革命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良县城皇庙召开宣判大会，宣判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黄侃的主要罪行是：

该人一贯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该人 1929 年 7 月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国民党良乡县党部任书记。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1941 年至 1948 年发展国民党党员 1100 余人，建立十个区党部，一个县直属党部；1948 年 1 月兼中统·特务组织，良乡通讯站站长，编号第十二信箱，建立通讯员十八名，搜集我方情报；一贯积极进行反动宣传，1947 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时该人积极组织宣传并亲自下乡宣传；1947 年 5 月命令伪中队队长杨贤传令小队队长邱玉林杀死兴隆庄村农会主任赵奉山，并缴得手枪一支；同年六月该人与伪县长等会议决定将我韩营村工作关系鲁拐子和我八路军战士何××二人活埋。

注：摘自房山分局档案室黄侃卷

（《房山文史资料》第 8 辑）

## 民族败类冯毓梅

宋 湘

冯毓梅，男，1898 年生，房山区石楼镇吉羊村人。曾任日伪张家口高等检察厅厅长兼地方检察厅厅长。1946 年 7 月 29 日被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逮捕判刑。据现有史料，这是被人民法院判处的房山籍“官”位最高的一个大汉奸。

冯毓梅，捕前住张家口市堡内玉皇阁 31 号。早年毕业于天津法政专门学校，继入司法储才馆修业兼充律师于北平。1929 年后，历任张北万全地方法院检察官、推事、院长等职。

“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张垣，冯毓梅丧失民族气节，密谋通敌，代表万全地方法院亲赴日寇特务机关及宪兵队接头，受命维持及整理地方法院。不久，任万全地方法院刑事临时庭主任推事。1939 年刑事临时庭改组为伪张家口地方法院，冯转任该院院长，并兼任伪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推事及伪张北地方法院院长，位居伪蒙疆司法要职。因冯帮助敌寇血腥统治甚力，为敌器重，1941 年曾代表伪蒙疆司法部参加伪察哈尔盟县旗长会议。1942 年曾与伪最高法院次长、日寇安倍代表伪蒙疆政府参加伪满司法官会议。1945 年升任伪张家口高等检察厅厅长兼地方检察厅厅长，进一步强化敌伪司法，执行日寇“防护治安法”，镇压抗日干部及人民，有功寇敌，曾受“肇建”“司法”功劳二章。为取媚敌人，冯曾向日寇中实、野吕赠送礼物。赠野吕感谢状文曰“云山苍苍，江水洋洋，先生之功，山高水长”，露出一副摇尾媚主的奴才嘴脸。此外，冯还兼教于司法职员养成所训练伪司法人员，兼日本总领事馆调解委员。尤其在兼，任伪司法研究会主任时，擅改国法，制定背叛国家之敌伪法案，交各级伪法院实施。

1945年日寇投降，张垣解放后，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将冯逮捕，并查封其财产。院长兼审判长王斐然、推事李毅、薛柏林、书记官文祺组成刑事法庭，对冯犯依法审判。

1946年7月29日刑字第17号特种刑事判决书认定：“查被告受过高等教育，为中华民国官吏，于日寇占领张垣后竟叛国投敌，历任伪蒙疆司法要职八载之久。”“其为敌效劳，加强敌伪血腥统治，镇压人民，使我无数同胞惨遭杀戮，流离失所，被告应负其责。”“且其八年一贯忠实事敌，与敌亲如一家”。“至其陷害善良、放纵日寇、实难尽述。由是显知被告已构成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应依法判处，以为通敌叛国者戒！”判决书依据“修正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款、同条例第九条、第十条、(民国)刑法第37条第二款及(民国)刑事诉讼法第291条前半段之规定”，以“冯毓梅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汉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没收。

1948年7月，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将冯毓梅安排到华北人民政府行政处生产科运输社任会计(当时，解放战争激烈，边区各级法院将已判刑之犯人安排一定工作监督使用，是改造犯人的一种形式)。1949年1月改判该犯徒刑6年，并予假释。1950年6月3日华北人民政府致函房山县政府称：该犯“到运输社工作后，一贯帐目不清”，1949年12月底“结账时缺款5168.5元(人民币)，随即停止工作，让其进行反省、检讨”，“该员已承认其款系个人贪污”。“经行政(处)研究和取得法院同意，除另(令)将其贪污款退回外，给予撤职处理。因该员徒刑已予假释，现让其回家从事生产，自即日起该员与本处脱离关系”。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 东山再起的孙殿英

贲麟

孙殿英，人称“孙老殿”，河南永城县小牧马集人。民国初年他投入土匪部队当兵，后靠制造烈性毒品发财。发家后，带匪部鱼肉百姓，危害一方，曾给河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后投靠张宗昌，被委为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

1927年，孙殿英被北伐军打败，逃至河北蓟县、马兰峪一带，走投无路，只好投降，被北伐军收编。谁知，他在这里却以军事演习为借口，掘开慈禧和乾隆两座墓，将墓内稀世珍宝盗窃一空。他后来自我解释说：“满清杀了我家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我枪杆子没几支，只好崩皇陵，革死人的命。”

1933年，孙在去青海途中，被蒋介石密令宁夏马鸿逵寻机消灭，孙果然被马鸿逵打得一败涂地，只身逃往山西太原的晋祠居住。而这时恰逢二十九军军部设在阳泉，孙不甘寂寞，时常带礼物拜访宋哲元及诸将领，联络感情，以图东山再起。

“七七”事变爆发，宋哲元给了孙老殿一个“冀北民军司令”的称号，但没给其一兵一卒。光杆一个“孙司令”困坐北平，有时与国民党蓝衣社走动，以恢复旧好，有时去天津与汉奸特务勾勾搭搭，寻找出路。

1937年7月28日，宋哲元撤离北平。孙殿英看到时机来了，立即来到房山县，竖起冀北民军司令的大旗，招来一些旧部，让他们沿铁路、公路收容从北平溃退下来的部队、警察、青年学生及乘乱而起的土匪武装，其中收容最多的二十九军阮玄武保安旅的一部分队伍，共在房山收容三千多人。这支队伍，就成了孙殿

英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资本，房山县也成了孙殿英再次起家的发祥地。

孙殿英离开房山后，先撤到河北武安、涉县，又移驻太行山区的林县，通过向戴笠行贿被委为新编第五军军长。

1943年，日军进攻林县，孙殿英率部投敌，当了可耻的汉奸。他又设计诱降了自己的上司庞炳勋，演出了一场“孙庞投敌”的丑剧。

1945年，日寇投降，孙被蒋收编为第三纵队司令，驻防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1947年4月，该部在河南汤阴被解放军包围歼灭。孙殿英俘后被镇压，结束了其丑恶的一生。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 刘振池落网记

赵润东

刘振池，1916年生于今霞云岭乡三流水村，土匪出身。1938年至1918年曾充任蒲洼、十渡、南窖等地区的地方武装“六善会”连长，日伪时期任伪房山县六、七区自卫团团团长和伪房山县还乡团中队长。这期间，他曾带人多次对我抗日干部、村民和解放区烧杀抢掠，其心狠手毒、血债累累、罪大恶极，曾被我公安机关通缉逮捕。

三流水村地处霞云岭地区东南部，四面环山，地势险恶。翻过山岭向南即上方山、黄山店地区。这一带距房山城较近，受城内敌人影响较大，历史上较为复杂。1946年，国民党军队对我房山西南部解放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国民党还利用特务深入我解放区刺探军政情报，造谣蛊惑，策动叛乱，严重破坏了我解放区的建设和巩固。因特务的策动和受黄山店、圣水峪的叛变的影响，7月中旬，刘振池与刘信等人策划了三流水村叛乱。参加三流水叛乱者54人，被欺骗的群众334人，带走大枪3支，子弹100发，地雷10枚，手榴弹30枚，公粮3500斤，伙聚于黄山店。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教育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区分区领导和房山县委决定对叛乱分子实行镇压。时隔不久，分区独立团和房山县大队开到黄山店。刘振池等人闻风逃往上方山，隐匿在密林之中。

1947年初秋，我军开始了战略反攻，国民党为了保住华北，加强了对平、津、保地区的军事控制。对临近的解放区进行野蛮而疯狂的进剿。这时，盘踞在房山城内的张德祥保安团猖獗起来。他们组织武装多次对房山西南部山边村庄进行袭击，杀害区、村干部和被视为通八路的群众。接着，张德祥又组建了以林茂为首的“黑杀团”。隐居在上方山一带的刘振池充任了“黑杀团”的中队长。他四处探测和搜集共产党的县区干部和武装活动情况，进而剿杀。“黑杀团”残杀手段极为残忍，他们逮住党员、干部，不是刀挑、活埋，就是割耳朵、挖眼睛，用尽一切办法进行人身摧残。据当地受害的群众讲，刘振池亲手杀害的就有七八个人。其中三流水村农会主席刘某和其弟弟（八路军）就是刘振池亲手活埋的，据统计，“黑杀团”从石楼村杀起，经过大韩继、瓦井、东周各庄、孤山口、罗家峪、四甘池、六间房，一直杀到坟庄等地，一夜间就残杀共产党员和干部及贫苦农民72人。几个月中，共残害160多人，制造了白色恐怖。

1948年，房山西南部山区与平原交界的地区，已由游击区变为解放区，革命力量日益壮大。年底，张德

祥的保安团,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逃亡,刘振池等一批残余分子抱头鼠窜,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网罗同伙负隅顽抗,继续搞颠覆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为了彻底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房山县委于1949年6月成立了剿匪委员会,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剿匪工作,并以周口店、长沟、英水、上方山为中心。刘振池见形势不妙,逃到上方山潜伏起来。他白天藏在山里,夜里偷偷回家。一次,在他返回三流水时,路遇本村姓杨的一位羊信赶着羊群回家。羊信身背一捆山柴,与刘振池撞个对面,互相都认出对方,但谁也没有说话。当时正值傍晚,羊信低头走路赶着回家没注意刘振池的去向。刘振池害怕羊信告密,便扭过头紧跟几步,在一个险要的地方将羊信推下山崖,致使羊信当场身亡。刘又返回隐藏地点。这件事过了几年,始终没人知道。村里人都认为羊信回家不慎蹬空坠入山涧所致,直到刘振池被捕后坦白交待这一罪行时,村民们方知晓。

解放后,房山的社会秩序安定,群众生产生活不断得到改善,而剿匪清特工作始终没有停止。罪大恶极的刘振池深知自己在房山下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人民是不会放过他的。因此,无法在三流水村呆下去,便让家眷搬到长沟镇附近的北甘池村住下来,而他个人仍潜藏在上方山一带,继续进行犯罪活动。

上方山地域广阔,仅圣水峪村方圆就有四十余里,荒山野岭,灌木丛生,捕获刘振池非常困难。自1952年至1958年,房山公安局曾几次组织全县民兵围山搜捕,但因地势复杂始终没有发现刘振池的踪影。后来,公安人员明查暗访,发现刘振池与圣水峪村五队社员史正金家有着密切联系。

史正金家住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离村里有20多里路的荻子草。史家是双烈属,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一位在解放战争中献身,在县里享有很高的荣誉。但是,他一家人慑于刘振池的凶狠残暴,不敢检举反而让他吃住在家里,一有动静便传声报信,刘振池马上躲到山洞里。

刘振池躲藏的地方叫老龙湾,两侧是悬崖峭壁,上不去人。半壁中有一个小洞,方圆2米多,里面还有一个大洞。白天刘振池躲在里边,用荆条编成的囤子堵在洞口,人们很难发现。村里有的人知道刘振池住在里面,但谁也不敢说,史正金的三儿子史福义当时住在黄元井村,他曾与父亲商量说:“弄死他得了。”可史正金一琢磨说:“不行,他有一支长枪,一支短枪,手又黑。再说,弄死他好说,他还有儿子,以后不好办。”所以,一直不得动手。

一天,生产队长史德起午更来到老龙湾,明着是收购鸡蛋,暗着查访刘振池。史德一进门就喊:“你们家有人吗?”屋里答话:“没有!”又问:“有鸡蛋吗?”回答:“没有!”史德说着进了门:“翻翻。”随后进了里屋,里屋炕上有一个大囤圈,史德上去一看,囤口盖着一顶草帽。他掀开一摸,有个人脑袋。史德说:“这是谁呀?”一看正是刘振池。这时史家的小儿媳说:“是我家孩子。”史德觉得不好,赶紧出来。一出门,刘振池拿着棍子追出来,照史德头上就是一棍子,鲜血马上流了下来,史德顾不得回头,撒腿就往外跑,刘振池紧追不放。史德不顾前边几丈高的崖坎儿一纵身跳了下去,刘振池则从旁边绕山路往下追,结果,史德得以脱身,回村马上报案。公安局立即组织全县民兵搜捕了几天,没有发现动静。公安人员就在史正金家“蹲坑”,不出屋。这天夜里,刘振池饿不过,终于来了。一进门,躲在门后的公安人员一下扑上去,把刘振池按在地上。这个罪恶多端的反革命终于落入法网。史家也成窝主。

1961年4月5日,县委在霞云岭召开公判大会。会上,村民们控诉了刘的罪行,然后将反革命罪犯刘振池执行了枪决。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 乌林达氏与金世宗

赵思敬

距今八百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在良乡县城衙署东面的“固节”馆驿中，葛王完颜雍的原配夫人乌林达氏自杀了。这件事的发生，促成了完颜雍称帝之举，从而推翻了海陵王完颜亮的残暴统治，成为金朝历史上改天换地的导火线。

公元1115年，此时，金太祖阿骨打统领女真族称帝，继而入主中原，历十帝，计一百二十年，其中金世宗完颜雍的统治时间达二十九年。他在位期间“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见《金史·本纪第八·世宗下》）后世称世宗为女真“小尧舜”。所有这一切，都与世宗的原配夫人乌林达氏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史书中得知，金世宗曾有元妃张氏与李氏，称帝后还曾续娶昭仪梁氏、才人石抹及柔妃大氏等。这些妻妾虽然对金世宗的政治生涯有过影响，但都不及乌林达氏对他的帮助最大。《金史》载，乌林达氏是女真人，姓乌林达，通称为乌林达氏。其（祖）先居海罗伊河（即黑龙江海罗伊河畔）世为乌林达部长，率部族来归（完颜部下），居上京，与本朝为婚姻家。曾祖胜管，康宗时累使高丽。父石土黑，骑射绝伦，从（金）太祖伐辽，领行军猛安（猛安是女真族部落联盟的单位，一猛安包括八至十个谋克，在金太祖建立政权的前一年规定，一某克为三百户，十谋克为一猛安）。虽在行伍间，不嗜杀人。以功授世袭谋克，为东京留守。”可见，乌林达氏从小是生长在战功赫赫的官宦之家。大约在乌林达氏十六、七岁时，远赴金廷上京会宁府，与完颜雍成婚。

乌林达氏“聪敏孝慈，容仪整肃，在父母家族皆敬重之，既归世宗，事舅姑孝谨，治家有叙，甚得妇道。”（见《金史·列传第二·后妃下》）可见，乌林达氏是个颇受人们欢迎和尊敬的人。在金熙宗当朝时，太祖、太宗朝的开国宿将及贵胄子嗣们拥兵称霸，与中央集权抗争，结果完颜宗磐、完颜宗隽、完颜挾懒皆死于非命。此时，悼平皇后裴氏亦干预朝政，事事掣制熙宗，致使熙宗经常酗酒杀人。乌林达洞查时势，知世宗有其父完颜宗辅伐宋时所得的“白玉带”，便说：“‘此非王邸所宜有也，当献之天子’。世宗以为然，献于熙宗，于是悼后大喜”。从而保住了完颜雍兵部尚书的职务。

金海陵王当政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曾杀太祖子嗣及功臣后代百余人。乌林达氏继用前策，劝完颜雍将家中“辽骨睹犀佩刀、吐鹳良玉茶器之类”珍宝，尽献于海陵王。使他以为“世宗恭顺畏己”，从而达到了“由是（海陵王）忌刻之心颇解”的目的。又一次使完颜雍保住了在京城里出任会宁牧和判大宗正等官职。几年后，完颜雍虽被排挤出朝，但仍能官居三品，乌林达氏两次的佐助之功，使金世宗终生不忘。

完颜雍迁任济南尹后，乌林达氏一直陪其左右。可是有一天，海陵王突然感到济南尹地处金国东海岸，又是南防赵宋王朝的战略要地，他担心如果完颜雍一旦失去控制，将对其统治地位造成威胁，于是下令让完颜雍将妻子乌林达氏送往中都（今北京）作人质。以达到使完颜雍听命于己的目的。就在完颜雍进退两难时，乌林达氏决定自己“奉诏，去济南而死，世宗可以免”。“并对世宗说：“我当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公元1154年6月，乌林达氏“召家人谓之曰：‘我自初年为妇以至今日，未尝见王有违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

者，皆奴仆不良，傲恨其主，以诬陷之耳。汝等皆先国王时旧人，当念旧思，无或妄国也。违此言者，我死后于冥中观汝所为’，众皆泣下”。同时，她还对心腹仆人张仅言说：“我不负王，使皇天后土明鑑我心。”数日后，乌林达氏一行来到了距中都西南七十里的河北良乡固节驿，乌林达氏深知“金主完颜亮荒淫不道，使彦括杀其夫节度使乌带，而以定秀多妃，又纳其叔母为昭妃。”她自度此行，如到中都，亦难免不被欺辱。其时，“妃问(此地)何名，左右以固节对。妃曰：‘吾得死所矣’。(见《长安客话》)于是在仆人疏忽之时，投湖而死。事后人们发现，在她临终前，已给完颜雍留下了一封三百七十九字的绝命书。这封书信被后人收进《金文最》，史称《上世宗书》，全文如下：

尝谓女之事夫，犹臣之事君，臣之事君，其心惟一，而后谓之忠；女之事夫，其心惟一，而后谓之节。故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良以此也。妾自揆蒲柳微躯，草茅贱质，荷蒙殿下不弃，得谐琴瑟之欢。奈何时运不齐，命途多舛。打开水面鸳鸯，折散花间鸾凤。妾幼读德书，颇知义命，非不谅坠楼之嘉，见金之可愧，第欲投其鼠，恐伤其器，是诚羝羊触藩，进退两难乎。故饮恨以行，挥涕而别。然其心岂得己哉？诚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尔。妾既勉从君危，幸免逆亮，不知此意，以为移花就蝶，饥鱼吞饵矣。吁燕雀岂知鸿鹄之志哉？今至良乡，密迩京国，则妾洁身之机，可以逞矣。妾之死为纲常计，纵偷生忍辱，延残喘于一旦，受唾骂于万年，而甘聚鹿、鹑奔之消。诮谓之有廉耻者乎。妾之一死，为后世为臣不忠、为妇不节之劝也。非若自经沟渎而莫知者比焉。逆亮罪恶滔天，其亡立待。妾愿殿下修德政、肃纪纲，延揽英雄，务悦民心，以仁易暴，不占有孚矣。殿下其卧薪尝胆，一怒而安天下。勿以贱妾故哀毁以伤生，而作儿女子态也。裁书永诀，不胜呜咽痛愤之至。

这封在良乡固节驿写成的遗书，系用骈体文写成，辞语洗练，结构严谨，用典准确。可见，乌林达氏不但是完颜雍政治上的得力帮手，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远大的政治预见。当完颜雍得知妻子死于良乡驿站时，遵照乌林达氏的遗嘱，没有举行更多的哀悼活动，而是装作无所知晓的样子。只是在过了些时日，在他奉命由济南尹改任西京留守时，才在赴任途经良乡时，派鲁国公主把乌林达氏的遗体从良乡取出，在宛平县土鲁原找了一块墓地，草草地把她埋葬了。

公元1161年10月7日，完颜雍拥兵数万称帝于东京辽阳府的宣政殿，改元大定。同时准备讨伐海陵王完颜亮。海陵王得知完颜雍称帝改元的消息后，叹曰：“朕欲俟江南平后，取‘一戎大定’之义以纪元，是子乃先我乎？”(见《大金国志校证》卷之十六)1161年11月27日，年仅40岁的海陵王在攻宋前线，被哗变的金兵用乱箭射死，是年12月19日，金世宗率满朝文武攻占了燕京。翌年，世宗追谥乌林达氏为“昭德皇后”，并立庙祀之。此后，他再也没有封立皇后，而把皇后的桂冠留给了乌林达氏。

公元1179年，金世宗诏令将乌林达氏的灵柩，迁葬于大房山金廷皇陵中。当年11月，乌林达氏的灵车到了燕京外的杨村，金世宗即亲率文武百官出城奉迎，世宗扶柩痛哭，情景催人泪下。待安葬时，正值风雪交加，金世宗又特令亲生儿子完颜允蕃扶柩而行，允蕃“拒戴雨具”，“徒行挽灵车”于盘宁宫，后葬乌林达氏于坤厚陵。公元1189年1月2日，金世宗67岁，病逝于燕京福安殿，是年4月25日，葬于房山金帝陵，其孙章宗完颜璟继位不久，又将乌林达氏的遗骨迁葬于兴陵，同金世宗葬在了一处。金世宗陵墓的确切位置，因年代久远，现已无从考察。

明代蒋一葵著的《长安客话》中，录有关中人李嘉宾的一首吊诗，专咏乌林达氏与金世宗的夫妻关系及历史往事，原诗为：“猛金跨中原，南渡转炎精。海陵灭三纲，醜类禽兽行。杀夫纳其妇，节义渐以倾。贤哉葛王妃，挺挺女中英。被召欲不往，夫祸与之并。辞王随便去，庶使全王生。行矣死传舍，而不坠初盟。

乌禄行再世，众推帝东京。江上毙凶逆，境内乐升平。人称小尧舜，实完颜氏衿。燕山有佳色，燕水有余清。山青节不朽，水远流芳声。乾坤气磊落，驿名永以旌。”

参考资料：

- 1、《金史》
- 2、《大金国志校证》
- 3、《金文最》
- 4、《良乡县志》
- 5、《长安客话》
- 6、《中国历史大辞典》
- 7、《金世宗传》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